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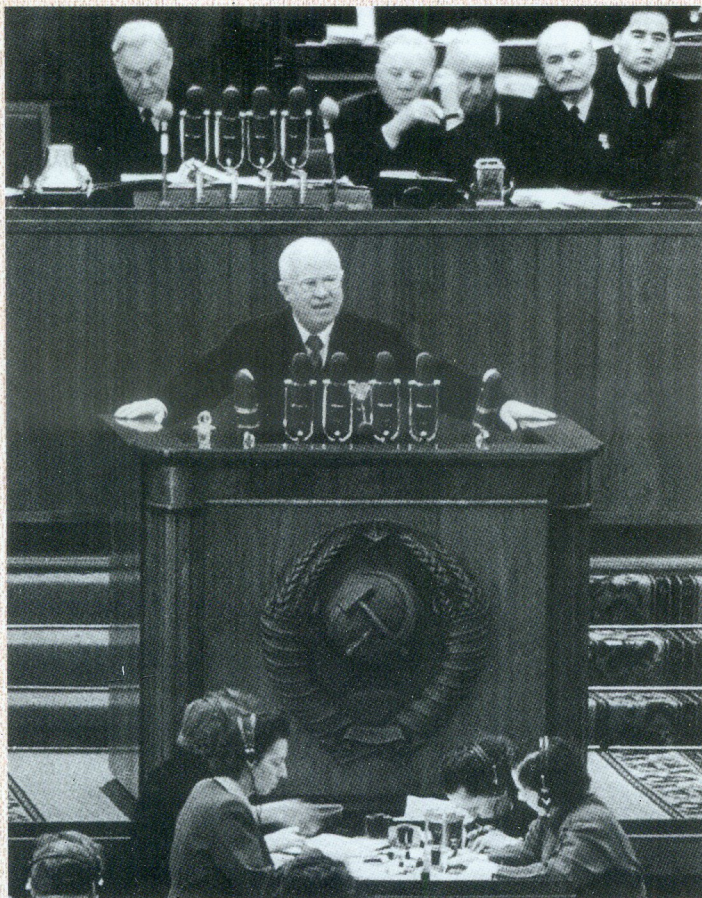
苏共二十大

“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ая Подлость

〔美〕格雷弗·弗 (Grover Furr) / 著

马维先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9

苏共二十大

“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ая Полнота

[美] 格雷弗·弗 (Grover Furr) / 著

马维先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Grover C. Furr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ая Подлость

ООО «Алгоритм – Книга», 2010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10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Russian Language edition

by Grover C. Fur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俄罗斯 «Алгоритм – Книга» 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出版社 2010 年版译出

目 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9

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还是……（代前言）…………… 1

第一部分 50年之后真相大白：原来， 全部指控都是谎言

第一章 理论基础……………	3
“个人崇拜”……………	3
列宁“遗嘱”……………	7
文献资料……………	14
第二章 “践踏”集体领导制的后果……………	35
“不容忍”集体领导制……………	35
斯大林“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意见不同的人……………	36
大规模镇压活动……………	38
专用语：“人民公敌”……………	40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42
托洛茨基分子……………	43

斯大林“践踏”党内生活准则·····	44
文献资料·····	47
第三章 “斯大林对党专横跋扈”·····	68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	68
叶努基泽 1934 年 12 月 1 日签署的指示·····	72
赫鲁晓夫暗示斯大林参与杀害基洛夫·····	73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 1936 年 9 月 25 日发给政治局的电报·····	74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1937 年）上的讲话·····	75
“许多中央委员怀疑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 特别是波斯特舍夫·····	78
文献资料·····	81
第四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的“案件”和与此有关的问题·····	93
罗·因·埃赫案·····	93
尼·伊·叶若夫·····	98
扬·埃·鲁祖塔克案·····	101
亚·莫·罗森布吕姆的供词·····	104
伊·德·卡巴科夫案·····	106
斯·维·柯秀尔、弗·雅·丘巴尔、帕·彼·波斯特舍夫、 亚·瓦·科萨列夫·····	108
“处决名单”·····	113
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 年）决议·····	116
“贝利亚反革命集团”·····	117
“关于刑讯的密电”·····	118
根据贝利亚的指示，罗多斯残酷殴打了柯秀尔和丘巴尔·····	123
文献资料·····	125
第五章 斯大林与战争·····	161
斯大林“没有重视”战争开始的预报·····	161

沃龙佐夫的情报	163
德国逃兵	165
被处决的统帅们	166
战争初期斯大林“丧失”指挥能力	168
斯大林是“毫无水平的”军事领导人	169
哈尔科夫, 1942年	170
斯大林“根据地球仪”拟订军事战役计划	172
斯大林“贬低”朱可夫元帅的功勋	172
文献资料	173
第六章 “践踏列宁民族政策原则”	197
强制性大规模民族外迁	197
“列宁格勒案”	200
“梅格列尔案”	202
与南斯拉夫的相互关系	204
“医生反革命分子案”	204
文献资料	206
第七章 贝利亚, 其“阴谋”与“罪行”	214
贝利亚——“外国情报机关的奸细”	214
卡明斯基谈贝利亚为木沙瓦特党工作	215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耶夫案	216
对米·谢·克德罗夫的“残暴镇压”	218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利亚	219
文献资料	221
第八章 意识形态与文化	232
“约·维·斯大林传略”	23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235
斯大林在关于建造自己塑像的1951年7月2日决议上签字	237

苏维埃宫	239
列宁和斯大林奖金	240
文献资料	241
第九章 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	251
斯大林提议对集体农庄增加征税	251
斯大林对波斯特舍夫不满	252
政治局工作“瘫痪”	254
斯大林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	255
对安德烈耶夫“专横跋扈”	255
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无根据的”指控	256
扩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259
文献资料	259

第二部分 赫氏“揭发”探幽

第十章 赫鲁晓夫造假手段	269
新观点问题	269
揭露论点造假并不等于查明了所有真实情况	271
历史证据	272
刑讯和与此相关的问题	273
赫鲁晓夫的骗术分类	276
第十一章 平反造假	284
亚·尤·季维尔	286
帕·彼·波斯特舍夫	287
亚·瓦·科萨列夫	294
扬·埃·鲁祖塔克	297
伊·德·卡巴科夫	301
罗·因·埃赫	301
文献资料	307

第十二章 赫鲁晓夫的“揭发”暗藏玄机.....	317
赫鲁晓夫为什么发表批判斯大林的讲话.....	317
赫鲁晓夫——阴谋参与者.....	321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	326
对苏联社会的影响.....	332
政治后果.....	335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的问题.....	338
附 件.....	341
文献资料.....	392

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还是…… (代前言)

纪念尼·谢·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秘密报告”50周年时，曾引发了一些完全可以预见的反响和评论。伦敦《每日电讯报》将该报告赞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同日，因撰写赫鲁晓夫传记(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而获2004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威廉·陶布曼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是事件史册上最值得表彰的“伟大的英勇行为”。

而就在不久前，在多年停顿后，笔者产生了重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想法。^①重读该报告时，笔者发现该报告中有许多荒唐的说法。

研究孟什维克的著名学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对“秘密报告”所做的注释中写道，报告中的部分论据远不是真实情况。比如，在报告中赫鲁晓夫说：

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揭露贝利亚反革命集团后，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该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系列案件。同时，发现了与斯大林错误行为相关的极其无耻的粗暴专横情况。

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为引用的这个段落做的注释中指出：“这一看法不完全正确，对斯大林晚年恐怖行为的调查始于贝利亚……斯大林去世后的最

^① Nikita S. Khrushchev. *The New Leader.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Introduction by Anatol Shub, notes by Boris Nikolaevsky.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1962.

初几个月，赫鲁晓夫，这个现在把自己描绘成清查斯大林刑讯逼供室所作所为的倡议者，实际上当时正企图为这一切制造阻力。”

正如约翰·阿奇·格蒂在其奠基之作《大清洗根源》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赫鲁晓夫的一些荒谬证据中，将贝利亚与叶若夫张冠李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时也提到叶若夫的名字，但提出的如此大量的犯罪和镇压指控却是针对贝利亚的；但1938年之前，贝利亚所担任的只是地区党的书记职务。不仅如此，还有大量材料提及，警察恐怖活动的减少恰恰是在1938年贝利亚接替叶若夫之后。在自己的报告中，赫鲁晓夫为什么肆无忌惮地用贝利亚替换叶若夫？他还会在什么问题上混淆是非？至少，赫鲁晓夫和当时的领导层判处贝利亚极刑，使他变成了合适的替罪羊。自然，纯粹为权宜之计利用贝利亚的名字，为赫鲁晓夫其他论据的正确性投下了阴影。”（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①

总之，笔者开始考虑依据曾对外完全保密，而现在对历史学家稍稍打开一点儿门缝的苏联档案文件进行研究，或许笔者可以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找到更多一些对斯大林“揭露”的不实之处。

事实上，我竟然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发现，即发现“秘密报告”中所有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竟然没有一个与事实相符。更加确切地说就是：所有经过检查的论据，全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原来，赫鲁晓夫在其讲话中没有谈及一件可以称得上符合斯大林和贝利亚真实情况的事实。整个“秘密报告”全是由形形色色歪曲的事实编织而成，而这就是被陶布曼所称的“伟大的英勇行为”，并为此把赫鲁晓夫捧上了天！当然，这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纪念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对赫鲁晓夫谎言的批评，尽管篇幅很短，但还是值得赞许的^②。

^① Nikita S. Khrushchev. *The New Leader.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Introduction by Anatol Shub, notes by Boris Nikolaevsky.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1962.

^② 举几个例子：不是赫鲁晓夫，恰恰是贝利亚，解放了许多犯人，虽然并不是如陶布曼所说的以“百万计”；赫鲁晓夫提议应搞周年纪念的“解冻”，实际上在斯大林晚年已经开始，恰恰是赫鲁晓夫限制了其规模，缩小至仅搞反斯大林的材料；斯大林想在1952年10月辞职，但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拒绝了他的请求；赫鲁晓夫说自己“没有参与”镇压，但实际上，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听从斯大林的训诫，而且在该问题上采取主动，要求得到比斯大林所希望的更多的处决“限额”。陶布曼断言：“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保持了他的人性。”准确地说恰恰相反，赫鲁晓夫比任何其他人更像歹徒和杀人犯。

作为学者，这一发现并不让笔者感到愉快，甚至不是笔者所希望的。因为这样的研究结果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惊讶和怀疑，就连笔者自己最初也只预计，赫鲁晓夫的“揭发”中有1/4或大约1/4的内容可能会是捏造的。研究的结果立即使我不安，而且至今也无法平静。如果我确认赫鲁晓夫所有的“揭发”都是假的，人们会相信我的论据吗？如果不被人相信，笔者的这一研究将没有任何价值，尽管为收集和归纳证据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笔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甚至可说是为之呕心沥血……

20世纪（如果不说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演讲”竟是欺世之作？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荒谬绝伦。要知道，问题并不只是这一想法如何，而且还包括其显而易见的后果。请问，谁愿意仅仅以笔者做出的结论为理由，“从零”开始重新看待已经成为过去的苏联、共产国际，甚至是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对问题做出如下想象要容易得多：显然，这个作者是以粗制滥造冒充史实的作品为生，其在隐瞒真实情况并试图以捏造方式炮制指控赫鲁晓夫的东西，以求轰动效应。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笔者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阁，问题也因此而自行消失。

另外，笔者因对斯大林的尊敬（虽然也有批评）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斯大林在几十年中是该运动公认的领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当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其带有“偏见”的政治倾向性完全一致时，最善意的说法是怀疑该作者不够客观，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如果笔者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揭发”中只有1/4是毋庸置疑的造假，我将会平静得多。

但既然已经查明，赫鲁晓夫所有的“揭发”事实上都不是真实的，那么作为学者的我，就要承受比一般情况下更加沉重的证明“揭发”是造假的压力。因而，我希望读者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某种不同寻常的提供材料的方式。

本书分为两个独立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是相互交叉的部分。

第一部分（一至九章）研究“秘密报告”中的论据，这些论据是赫鲁晓夫“揭发”的精华。这里要提前指出，作者将赫鲁晓夫“揭发”的论据，归纳为57个。

对“秘密报告”中的每一个“揭发”，先引用“秘密报告”中的说法，

然后，再通过历史证据进行研究，而这些证据多数引自第一手资料，少数情况是来自其他资料。笔者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现存的所有证据中提供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的演讲是谎话连篇。笔者使用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俄罗斯档案部门。鉴于大篇幅引用文件有碍于对历史证据本身的理解，正文中只对所使用的证据做了扼要概述，而比较详细的文献原文，放在每一章的文献资料中。

该书的第二部分（十至十二章）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并从笔者所完成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该部分对赫鲁晓夫在其充满谎言的“秘密报告”中所使用的手段类型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提到的那些党的领导人的平反材料，予以特别关注。

需要对文献资料的引用说几句话。除了传统的脚注外，笔者力争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指出互联网现有的全部或部分资料来源。在该书俄文版完成之日，这些资料均可浏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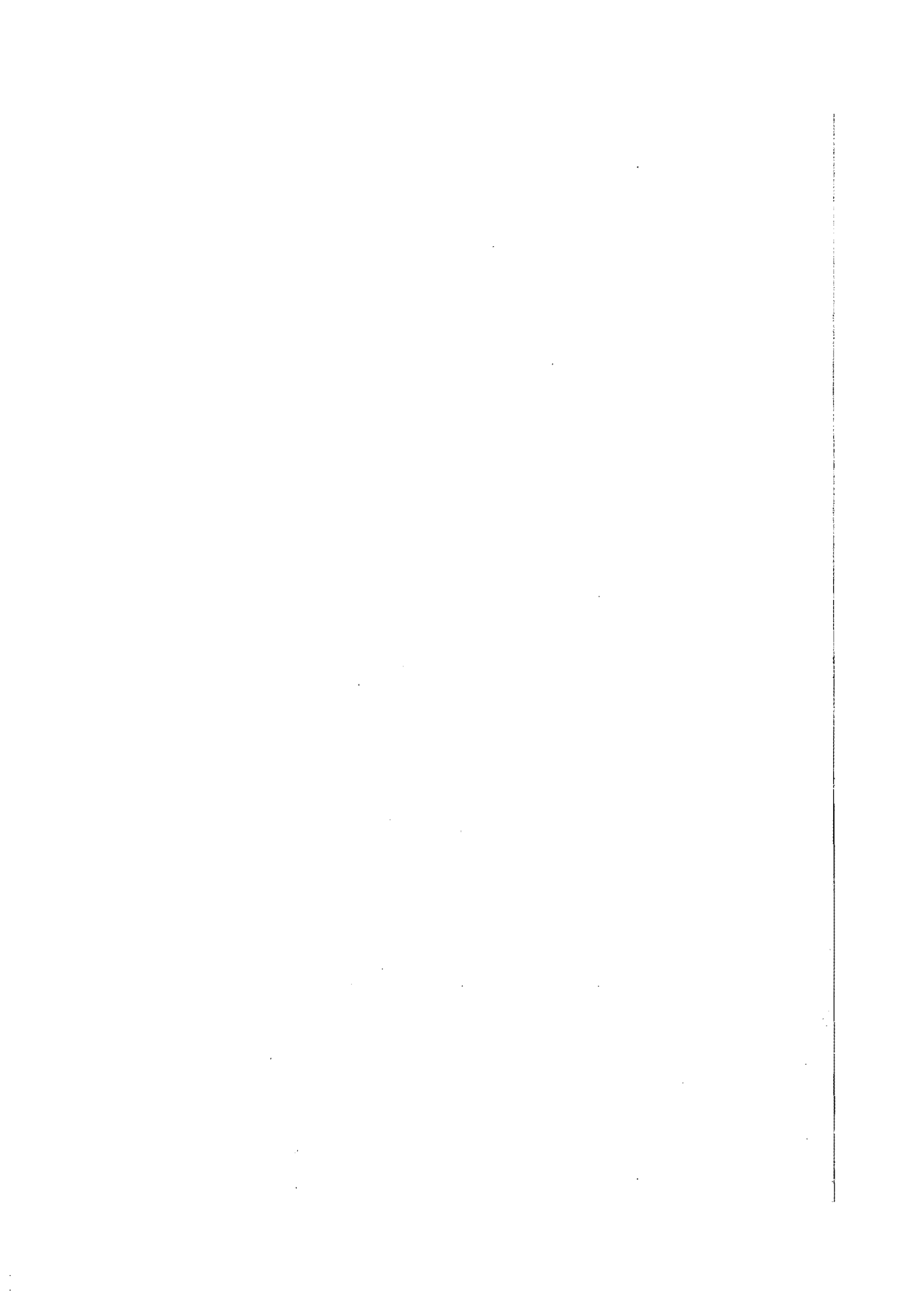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美国同行和俄罗斯同行，他们阅读了本书较早期的版本并进行了评论。自然，他们不应对本书依然会有的任何缺点承担责任。在任何情况下，笔者都将感谢读者提出的意见和对该研究的评论。

格雷弗·弗

2006年10月

第一部分

50年之后真相大白：原来，全部指控都是谎言



第一章

理论基础

“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同志们！在党中央委员会向二十大所做的总结报告和大会许多代表的发言中，以及在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个人崇拜及其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不少。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严格和坚持不懈地执行如下方针：阐明不能容许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地赞颂某个人，把他变成如同上帝那样具有神仙般品质的超人。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无所不能，他的行为万无一失。

对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对斯大林这样的看法，我们已形成多年。

本报告没有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进行全面评价的任务……现在要谈的，是一个对党的现在和未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成为一系列规模极大和非常严重的歪曲党的原则、党的民主制度和革命法制行为的根源……^①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 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28.

“揭发”斯大林的犯罪活动被认为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本任务。实际上，整个讲话的主题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然而，“个人崇拜”问题首位发现者的荣誉并不属于赫鲁晓夫。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早已人所共知，比如，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就对该问题进行过讨论。

在讲话中，赫鲁晓夫故意回避了斯大林本人是否赞成搞“个人崇拜”的问题。而在整个讲话中，报告人暗示，或准确地说是提前将他应予证明而最后也没有证明的论点视为无须争辩的事实：为了得到独裁者至高无上的权力，斯大林坚持搞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事实上，在“秘密报告”中根本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说明，正是斯大林煽动了对自己的“崇拜”，显然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未能发现一个这样的例子。

整个“秘密报告”建立在这一谎言的基础上。赫鲁晓夫的其他“揭发”不过是围绕关于“个人崇拜”的拙劣拼凑，根据报告人的说法，“个人崇拜”源于斯大林本人并得到了他的培植。

以下将证明，赫鲁晓夫的所有“揭发”实际上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但首先想指出，赫鲁晓夫设计的观点本身就是伪造的，即似乎是斯大林创建和鼓励了“个人崇拜”的恶劣做法，好为他在完全不受惩罚的气氛中进行犯罪活动创造条件。真实情况是，斯大林不仅没有进行强加在他头上的各种犯罪活动，而且也远远谈不上主动树立对他个人的崇拜。相反，从目前所拥有的大量证据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强烈反对令人作呕地对他个人的歌颂。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将斯大林讨厌对自己崇拜的行为视为虚伪。因为，他最终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人，而如果他真想结束“个人崇拜”，大概，他会立即把它肃清。但这种意见毫无道理，因为它事先确定了应予证明的东西的真实性，即认为既然斯大林拥有如此无限的权力，就意味着，他通过树立“个人崇拜”，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东西，即可以把持苏联的一切权力，独断专行。

斯大林本人厌恶崇拜

多年以来，斯大林不断地反对对他的颂扬和阿谀奉承。他赞成列宁关

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提出了实际上与列宁同样的意见。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大量引用列宁的话，却“忘记”指出，斯大林实际上讲了同样的话。斯大林大量的讲话证明，他对为他歌功颂德极为反感。^①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几乎所有在某个时候曾与斯大林见过面的回忆录的作者，通常都会记起能在生活中证明斯大林对崇拜他个人所表示的反感甚至厌恶的有关情况。

不久前（2001年）出版的阿·伊·姆格拉泽（曾任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1980年去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斯大林》，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该书中，他不止一次涉及斯大林对围绕自己所制造的崇拜的否定态度。姆格拉泽写到，1949年斯大林反对为自己70寿辰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后来斯大林非常不情愿地听从了他的中央委员会战友们的劝告，而且主要因为战友们提出的理由是，届时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袖可以造访莫斯科，他们可以相互商谈并交换意见，这将有助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加强。

1937年，斯大林得以阻止将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但他未能阻止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没有去认领这枚奖章。直到最后，在他的葬礼上，这枚奖章才被别在小枕头上，与他的灵柩相伴……

格·马·马林科夫试图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崇拜”问题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立即提议召开中央全会并讨论关于“个人崇拜”极为有害的问题。马林科夫相当诚恳，他既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同事，并提请注意，斯大林如何经常警告他们不要煽动“个人崇拜”，但这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遗憾的是，马林科夫的提议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未能得到支持，而拟解决“个人崇拜”问题的中央全会最终也未能举行。如果情况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也许，后来就不会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了。

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的建议是支持还是反对，暂时没有准确的证据，但这无关紧要。毫无疑问，他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不可能不参加讨论这些建议的会议。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确切地知道，马林科夫早就提议公开解决“个人崇拜”问题。但他对此却装聋作哑。

^① 见本章附件。附件引用了大量证据中的部分例证说明斯大林对树立对他的崇拜持否定态度。

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贝利亚因批评“个人崇拜”而遭攻击

在揭露贝利亚罪行的中央七月全会上，许多发言人谴责贝利亚批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密谋反对贝利亚的行动及在那次全会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表明，他不仅是搞党内审判的主谋，而且也是搞“个人崇拜”的最积极的拥护者。

谁在鼓吹“个人崇拜”

研究“个人崇拜”出现的原因超出了我们提出的任务范围。但我们拥有证据证明，推行并进而大肆鼓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企图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反对派面目的那些人的活动有关。

在一次对质中，尼·伊·布哈林偶然说漏了嘴：在《消息报》工作时，他曾逼迫以前的反对派用顶级的溢美之词赞扬斯大林，而就在那次审讯中，他使用了“个人崇拜”一词。1934年1月1日，另一个反对派卡尔·拉狄克的文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在《真理报》发表。之后，该文又被单独印成小册子。如通常被认定的那样，该文是对斯大林进行无度颂扬和“个人崇拜”的开山鼻祖。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非斯大林化”政策的发起人和最积极的传播者——在1930年代正是“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者。

如果事情仅限于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斯大林面前真的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罢了。当然，对于某些人，这样的情况是有的。而赫鲁晓夫时代的受害者、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姆格拉泽，则是为数不多的在如果放弃自己的信仰会对自己更好的情况下，仍对斯大林保持赞扬态度的人之一。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三月全会（1953年）上表现得积极活跃，他们对马林科夫提出的由全会集体研究“个人崇拜”问题的尝试予以反击。在七月全会上（1953年），两人又都发言猛烈地批判贝利亚阻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以上对事实的粗暴歪曲以及赫鲁晓夫其他所谓的揭露性“新发现”表明，历史学家在探求到真实情况之前，尚要进行非常艰辛的工作。

列宁“遗嘱”

赫鲁晓夫：由于关怀党和苏联国家的未来命运，弗·伊·列宁对斯大林做出了完全正确的评语，同时还指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对同志不够关心，任性和滥用权力，应当研究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调开的问题。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例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信里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暂时停止引证，以便注意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这里，赫鲁晓夫把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加在列宁头上。但真实情况是，列宁只写了“他（斯大林——作者注）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换句话说，列宁的信中，并没有指责斯大林在“滥用权力”。

赫鲁晓夫：这封信是众所周知的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了这个文件，大概，今后还会不止一次地阅读该文件。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列宁这些质朴的话语，它们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未来政治方向的关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0.

指出他会考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意见，并能够改正使列宁深感忧虑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正是对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斯大林所做评语的补充。

两个文件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负责政治局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现在我宣读这些信件。

(1)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鲍里瑟奇：

昨天，斯大林以我经过医生允许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写的一封信为理由，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中，我没有听到一个同志对我讲一句粗话。与斯大林相比，我更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现在我需要保持最大限度的自制力。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对他无所谓，至少比斯大林要了解。我请求您，请求格里戈里——弗·伊·的最亲密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免受对我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免受不应受到的谩骂和威胁。我不怀疑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全票通过的决议，但我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极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这封信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922年12月23日写的。两个半月之后，1923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将以下信件寄给斯大林。

(2) 弗·伊·列宁的信

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场骚动）

致敬

列宁

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对这些文件进行评论，它们本身已经雄辩地说明了问题。如果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对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党对她非常了解并对她作为列宁的忠贞朋友和自党诞生之日起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予以高度评价，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会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他的这些恶劣品质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了晚年，已达到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①

赫鲁晓夫在撒谎，说什么转发给二十大代表的文件是“众所周知的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政治文献”。恰恰相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托洛茨基曾用同样的标题写了一篇文章，1934年这篇文章又单独印成小册子出版。

我们提请大家注意：1925年，托洛茨基曾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撰文对马克斯·伊斯门的《列宁逝世之后》一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该书作者的一些谎言，即似乎列宁留下了什么“遗嘱”。在该文中，托洛茨基表达了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的观点，即不存在任何列宁“遗嘱”。应当认为，这符合真实情况，因为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列宁最后的几篇文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0-131.

章和信件被视为“遗嘱”。但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为使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耸人听闻。所以，赫鲁晓夫，或多半是他的某个助理，从托洛茨基那里借鉴了某些东西，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承认，这些东西是提出指控的第一资料来源。

“秘密报告”中的一系列其他论点更加说明赫鲁晓夫与托洛茨基在思想方面的接近。比如，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的公开诉讼是弄虚作假的审判表演。对此不难理解，因为托洛茨基是其中的主要被告，虽然是缺席被告。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还为不公正地镇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分子而表示伤感，尽管直到二十大闭幕一年之后，赫氏才为其中的一个被告、被判极刑的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恢复了名誉。^① 赫鲁晓夫做出这样的声明不为什，只是为了宣布他所点名的那些人无罪，因为，如果是对毫无疑问地从事了犯罪活动并已认罪的人进行判决，绝不会被公众认为是惨无人道和不公正的。

实际上，赫鲁晓夫将所有对社会主义的扭曲活动和破坏法治的现象都加罪于斯大林一人身上，他这番慷慨激昂的反斯大林的讲话，与托洛茨基妖魔化了的斯大林肖像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遗孀准确地判断了局势，在赫鲁晓夫讲话仅一两天后，即提出为已故丈夫恢复名誉的要求。^②

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那些与列宁生命最后几个月有关材料。

有重要证据认为，列宁1923年3月5日致斯大林的信，可能是伪造的。关于文件的真实性问题，不久之前出版的瓦·阿·萨哈罗夫的700页专著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者最重要的一些论点和根据，已在作者本人的书和其他人对他的书的评论中发表。^③

此外，斯大林和所有知道1923年信件的人，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该信件

^① Икрамов реабилитирован 03.06.1957, см.: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2. Февраль 1956 — начало 80-х. — М.: МФД, 2003, с.851. См. также: <http://www.memo.ru/memory/communarka/chapter5.htm>.

^②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раздел IV. Док. № 3, с. 610. Редакторы у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письмо следует датировать не ранее 25 февраля, т.е. связывают появление письма с выступлением в этот день Хрущёва с «закрытым докладом». По другой версии, письмо Седовой-Троцкой написано в ответ на речь Микояна на съезде 16 февраля.

^③ В.А.Сахар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авещание» В.И.Ленина: реальность истории и мифы политики*. — М.: Изд-во МГУ, 2003.

是真实文件。但即使是这样，在这封信中也没有人们经常提到的东西，即列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的证明。因为不到两个星期后，克鲁普斯卡娅便向斯大林求助说，列宁坚持要求斯大林承诺为他搞到氰化钾，以便他服用后结束难以忍受的痛苦。斯大林回答同意。但在日期为1923年3月23日的一封信中，斯大林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政治局，同时声明，他坚决拒绝列宁让其承担的使命，“不管它是如何的人道和必要”。1923年3月23日的这封信，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已公布在其撰写的充满敌意的列宁传记中。^① 便函副本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谓的“沃尔科戈诺夫档案室”。对便函的真实性已无须怀疑。莉·亚·福季耶娃，列宁的秘书之一，留有1922年的日记记事本，根据该记事本，列宁曾请求为自己提供氰化钾，以便在自己病情继续恶化时服用。1991年，公布了福季耶娃的日记片断。^②

所以，即便列宁1923年3月5日的信件是真的——瓦连京·萨哈罗夫的研究对这一事实提出质疑，列宁仍然信任并继续依靠斯大林。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疏远”，更不要说“断绝关系”。

沃尔科戈诺夫及其他许多作者都援引过下述文件：

12月24日清晨，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曾讨论了以下情况：他们无权强迫领袖沉默。但需要谨慎、预防不测和保持最大限度的安宁。通过了以下决定：

(1) 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口授的权利，每天5~10分钟，但这不具有通信来往的性质，对这些便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应等待答复。禁止探视。

(2) 无论朋友，还是家人，都不应向列宁通报任何政治生活方面的情况，以便不让这些情况成为他思考和不安的材料。^③

① См. факсимиле письма Сталина к Политбюро от 23 марта 1923 год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Д.А.Волкогонов. *Лен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В 2-х книгах. Кн. II. — М.: Новости, 1994, между с. 384-385. Письмо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о с комментарием в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6-67.html> и помещено в приложении в конце главы.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 6. См.: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6-9.html>.

③ Волкогонов. *Ленин...* Кн. I, глава 2. Цит. по: http://militera.lib.ru/bio/volkogonov_dv/02.html.

正如罗伯特·瑟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在以下一些日子里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看来是中风）：1922年5月25日，他“重度中风”^①；1922年12月22~23日，列宁的“右半身不能动弹”^②；1923年3月6~7日夜，他的“右肢不能动弹”^③。

1922年12月18日，政治局委托斯大林跟踪列宁的健康状况，禁止任何人与列宁讨论任何政治问题。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了这一决定，为此，在12月22日她受到了斯大林的警告。那天夜里，列宁再次严重中风。

1923年3月5日，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讲述了上一年12月，斯大林如何粗暴地与她谈话。一怒之下，列宁给斯大林写下了那封众所周知的信件。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秘书薇·索·德里佐的回忆，情况如下：

“为什么弗·伊·列宁在斯大林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粗暴谈话两个月后才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向她道歉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实情况，因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常常向我讲述这件事。

事情发生在1923年3月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交谈着什么，电话铃响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接电话（列宁住宅的电话总是放在走廊）。当她回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谁的电话？’‘是斯大林，我与他已经和好了。’‘究竟怎么办呢？’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得不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即斯大林与她通话时讲话非常粗暴，并以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事不必介意，因为一切都已顺利解决，她已忘掉此事。

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不从。约·维·斯大林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尊重，使列宁深感受辱，于是，1923年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副本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信中要求斯大林道歉。斯大林不得不道歉，但他没有忘掉此事，也没有原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而且这也影响了她对她的态度。”^④

①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Belknap Press, 2000), p. 443

② 同上，第461页。

③ 同上，第473~474页。

④ В.С.Дридз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Коммунист*. 1989, № 5.

第二天，列宁再次出现了严重的中风。

每一次，当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就政治话题交谈之后，其健康状况就会急剧恶化，也就是说，她作为一个党员，无论如何都不应被允许进行这样的谈话。所有这一切很难视为事件的单纯巧合，因为医生已经以特别的方式警告：绝对禁止破坏列宁的情绪。所以，只能认为，多半是克鲁普斯卡娅考虑不周的行为，加速了列宁最后两次中风的发作。

列宁前秘书莉季娅·福季耶娃指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行事并不总是恰如其分。她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时可能会说漏嘴。她已经习惯于与列宁分享一切，甚至是在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比如，为什么她要告诉列宁，斯大林在电话中辱骂了她？”^①

事实上，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了下來。

1932年，当斯大林的妻子自杀身亡后，克鲁普斯卡娅表示慰问并写给斯大林一封信，该信于1932年11月16日刊登在《真理报》上^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内奇：

这些日子，不知怎么，总是想起您并想握您的手。失去亲近的人是痛苦的。我回忆起伊里奇生病期间在他的办公室与您的两次谈话，当时的谈话给了我勇气。再次握手。

娜·克鲁普斯卡娅

该信再次表明，即使在1922年12月吵架之后，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继续保持着同志式的温馨关系。

总的说来，斯大林在列宁的家人中很受尊重。作家亚·贝克曾撰写了莉季娅·福季耶娃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强调：“你们不理解那个时代，不理解斯大林发挥着多大的作用。斯大林是个大人物（她没有说‘伟大’，而是说‘大’）……玛丽亚·伊利尼奇娜（列宁的妹妹——译者注）早在弗

① Цит. по: А.Бек. К истор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нин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з архива писателя, беседовавшего в 1967 году с личными секретарями Ленина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 17, 23 апреля 1989. С. 8-9.

② Цитируется также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 46, 14 ноября 2004, см.: <http://www.newtimes.ru/time.asp?n=3059>.

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就对我说过：‘在党内，斯大林是列宁之后最聪明的人’……对于我们，斯大林是权威。我们热爱斯大林。而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只是列宁的一个学生。’”^①

显而易见，赫鲁晓夫引用的所有信件，回避了事情的前后关联和来龙去脉，从而严重歪曲了所发生事件的实质。他只字未提中央全会的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为保持列宁的体力和健康而让列宁远离政治生活的个人责任，由斯大林承担。对于列宁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也有禁令。由于秘书未必敢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家人”一词是指列宁的妹妹和他的妻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正是因违反党的最高机关的指示，斯大林才批评了克鲁普斯卡娅。

赫鲁晓夫只字未提1923年3月7日斯大林对列宁便函的书面答复意见，同样也未提列宁稍后向斯大林提出为他搞毒药的请求。为抨击斯大林而抛开这些文件，赫鲁晓夫歪曲地解释了列宁要求斯大林道歉的情况，从而有意歪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性质。

报告中，没有任何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证明材料。1956年，列宁的前私人秘书玛丽亚·沃洛季切娃和莉季娅·福季耶娃以及克鲁普斯卡娅的前秘书薇拉·德里佐都还健在，但她们的回忆录也没有被采用。赫鲁晓夫对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中央关于让列宁与政治事务隔离的严格指示的事实视而不见，显然，这成为列宁健康状况两次急剧恶化的原因。赫鲁晓夫也没有谈及，在拟断绝关系之事发生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列宁求助的对象恰恰是斯大林，彬彬有礼地请他为自己搞点毒药。最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恢复正常关系的事。

赫鲁晓夫想尽一切办法把斯大林搞臭，对于事件的真实进程，以及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的含义，他没有任何兴趣。

文献资料

斯大林本人对崇拜反感

非常多的证据说明，多年以来，斯大林激烈反对树立对自己的崇拜。

^① Цит. по: А.Бек. К истории...

以下是斯大林在其信件、讲话和座谈中表达这一观点的部分内容。

1926年6月：

“同志们，我应对你们说，说句良心话，这里对我所说的溢美之词，我连一半都配不上。原来，我既是十月革命的英雄，也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什么神奇的勇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同志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小事，无论如何不应夸大。这样的语气，通常是在已经去世的革命者棺材前讲话时才用。而我还没有想死……”

我过去的确是，现在依然是梯弗里斯（现为第比利斯——译者注）铁路修配厂先进工人的学徒工之一。”^①

1927年10月：

“斯大林算不了什么，斯大林是渺小的。”^②

1929年12月：

“我把你们的祝词与贺词归功于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党，是党以自己的榜样养育了我。正因为如此，我把祝贺和祝词归功于我们光荣的列宁的党，并勇敢地向你们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感谢。”^③

1930年4月：

“有的人认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是斯大林本人创意的结果。当然，这一看法很荒唐。我们中央的存在不是为了在这样的事情上有个人创意，不管他是谁。”^④

① И.В.Сталин. Ответ на приветствия рабочих главных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мастерских в Тифлисе 8 июня 1926 г. //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8.— М.: ОГИЗ;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8, с.173. См.: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8-19.html>.

② И.В.Сталин. Троцкист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ь. Речь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объединённ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и ЦИК ВКП(б) 23 октября 1927 г. // *Там же*. Т.10, с.172.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0-15.html>.

③ И.В.Сталин. Все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 и товарищам, приславшим приветствия в связи с 50-летием т. Сталина. // *Там же*. Т.12, с.140.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2-6.html>.

④ И.В.Сталин. Ответ товарищам колхозникам. // *Там же*, с.213.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2-11.html>.

1930年8月：

“你们说你们‘忠于’我。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也许……但如果这不是偶然的一句话，我想建议你们放弃忠于某些大人物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忠于工人阶级、它的党和国家吧。这是需要的，也是好的。但不要把这一忠诚与对某些大人物的忠诚混为一谈，与旧知识分子无聊和不需要的迂腐习气混为一谈。”^①

1931年12月：

“至于我，我只是列宁的一个学生，我人生的目标是做无愧于他的学生……

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或一些人创造历史……只有当伟大人物善于正确了解这些条件和知道如何改变这些条件时，他们才有某种价值。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条件和想按照自己的幻想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只会遭遇堂吉诃德的下场……

不，不能一个人做出决定。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总是或几乎总是片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任何一个集体，都有一些人的意见应予以考虑。任何一个委员会，任何一个集体都有一些可能提出不正确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大约100个没有经过集体检查和纠正而只由一个人做出的决定中，90个决定是片面的……

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工人都不会容忍现在由一个人掌握权力。我们有一些最具权威的人物，一旦工人不再信任他们，一旦他们失去了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他们便会消失和变得一文不值。”^②

1933年2月：

“您关于将您的第二枚勋章让给我以表彰我的工作量的信，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您热情洋溢的话语和同志式的礼物。我知道，为了我，您自

① И.В.Сталин. Письмо тов. Шагуновскому. // Там же. Т.13, с.19.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3-31.html>.

② И.В.Сталин. Беседа с немецким писателем Эмилем Людвигом. // Там же, с.105-107 и 110.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3-2.html>.

已失去了什么，我珍视您的感情。

不过，我不能接受您的第二枚勋章。不能和不应接受，不仅是因为它只能属于您，因为您当之无愧，而且还因为我已经得到同志们如此多的关注和尊敬，因此，我没有权力再掠夺您。

勋章不是为那些本来已经很知名的人而设的，它们主要是为那些很少有人知道而又应该让所有人知道的英雄设立的。

此外，我要告诉您，我已经有两枚勋章。请您相信我，这已经超出我应得到的。”^①

1933年5月：

鲁宾斯：我认为，有机会拜访您是我很大的荣幸。

斯大林：这方面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您过奖了。

鲁宾斯（笑）：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走遍俄罗斯，我发现到处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列宁—斯大林，列宁—斯大林在一起。

斯大林：这也是过奖。我怎么能与列宁相比？^②

1937年1月：

福伊希特万格^③：我在这里仅待了四五个星期。初步印象之一：我感觉某些对您表达尊敬和热爱的方式过于夸大和庸俗。您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朴实和谦虚的人。这些表达方式对于您是否是太重的负担？

斯大林：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夸大过度令人不愉快。人们为了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陷入狂热。几百件贺函，我只回复了一两件，多数不允许发表，完全不允许一些过度颂扬的贺词发表，只要我知道其内容。1/10的贺词的确非常庸俗，它们带给我的是不愉快的感受。

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不能辩解，而想从人性的角度解释围绕我个人的达到肉麻程度和无法遏制的狂热从何而来……

① И.В.Сталин. Письмо тов. И.Н.Бажанову. // Там же, с.235.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3-29.html>.

② И.В.Сталин. Беседа с полковником Робинсом 13 мая 1933 г. (Краткая запись). // Там же, с.260.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3-3.html>.

③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德国作家。

从剥削中解放出来，是非常大的事件，群众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庆祝。他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我，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个人能做什么？他们把我看成一个集合的概念并围绕我点燃篝火，表达他们无比狂喜的情感。

福伊希特万格：作为一个同情苏联的人我看到并感觉到，对您热爱和尊敬的情感完全是真诚的，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对您如此热爱和尊敬，您能不能自己发话停止那些使您的外国朋友感到难堪的狂热的表达形式呢？

斯大林：我曾试图这样做，但毫无结果。你对他们说，这样做不好，不合适。人们认为，我这样说是假谦虚。

想在我 55 岁时搞庆祝活动。我通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此做出了禁令。^① 抱怨信接踵而至：说我妨碍他们搞庆祝活动和表达自己的感情，说事情与我无关。另一部分人说我摆架子。如何禁止这种热烈情感的表达？不能使用武力，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只能友好地请求。

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文明的表现……

至于这使某些国外的人伤心，毫无办法。文化的差异不是马上能解决的……

福伊希特万格：我说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群众热爱和尊敬的感情，而是其他情况。在各个地方摆着的您的半身塑像——不漂亮，做工很差。在莫斯科，在这里不管怎么说都会首先想到您，为什么在建筑展览会上也摆放劣质的半身塑像呢？在引人入胜的伦勃朗画展上，为什么也要摆放劣质的半身塑像？

斯大林：问题提得很好。我刚才指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各个机关的官僚主义者。至于说到官僚主义者，不能说他们没有鉴赏力，他们是担心，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半身塑像，报纸或上级领导会骂他们，或者造访者会惊

^① 如文件出版人列·马克西缅科夫所指出的那样，1934年12月19日根据斯大林的声明，政治局通过决议：“尊重斯大林同志关于12月21日他55周岁生日时不允许举行任何庆祝、纪念活动或在报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意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文献库：17，目录：163，保管单位：1048，案卷页：26。Л.Максименков. Очерки 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падные пилигримы у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престола (Фейхтвангер и другие)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4, № 2. См. также: <http://magazines.russ.ru/voplit/2004/2/max13.html>.

讶。这是个人名利主义的场地，是官僚主义者“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有方式：为了不被调离，就要摆放斯大林的半身塑像。

任何一个胜利的政党内都会混入一些异己分子、野心家。他们设法用见风使舵的方式保护自己——摆放半身塑像、写口号，其实这些口号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至于塑像质量差的问题，这不仅是有意所为（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还因为不会选择。比如，我看到过五一节游行时我和我的同志们的肖像：都像鬼一样。人们高兴地举着这些肖像，他们不明白，这类肖像不能用。不能发布一个命令，要摆放好的半身塑像——见鬼去吧！我们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事情，我们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和需要关注的问题，没有时间对这些半身塑像评头论足。^①

1938年2月：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故事》。

该书充斥着大量错误的事实，歪曲、夸张、不应有的赞美之词。一些自告奋勇进行这一工作的人把作者引向歧途，已经到了神话、瞎扯（也许是‘善意’的瞎扯）、溜须拍马的地步。可惜了作者，但事实终究是事实。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该书有让个人崇拜，即领袖永远正确的观念深入苏联儿童（和所有人）意识的倾向。这是危险和有害的。‘英雄人物’和‘芸芸众生’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人民造英雄——布尔什维克这样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该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的水磨加水。任何这类的书都将是为社会革命党人的水磨加水，都将危害我们共同的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建议烧掉该书。”^②

①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с германским писателем Лионом Фейхтвангером. 8 января 1937 года. Цит. по: Л.Максименков. Очерки 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См. также: <http://magazines.russ.ru/voplit/2004/2/max13.html>. Описание того же самого фрагмента беседы см.: Л.Фейхтвангер. *Москва 1937. Отчёт о поездке для моих друзей.*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37. Гл.3. См. также: <http://istoria.h10.ru/lib/read.php?what=moscow37&p=28> <http://istoria.h10.ru/lib/read.php?what=moscow37&p=29>.

② И.В.Сталин. Письмо в Детиздат при ЦК ВЛКСМ.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3, № 11.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29.html>.

“类似倡议会加剧‘个人崇拜’”

以下列举的是回忆录撰写人的证据和二手资料来源的摘录，在那里也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瓦季姆·罗戈温引用《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3期）指出，1934年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信中提议就斯大林55岁生日开展宣传运动，斯大林做出批示：“我反对，因为类似倡议会加剧‘个人崇拜’，这是有害的和不符合我们党的精神。”^①

在《崇拜——关于苏联政治文化中的象征词札记》一文中，列昂尼德·马克西缅科夫（从大量事例中）列举了许多有文件依据的斯大林谴责吹捧他个人的例子：

“斯大林在1933年读了亚·尼·阿菲诺格诺夫的剧本《谎言》的手稿后，给剧作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该信的附注中他指出：‘P.S. 不应大谈特谈领袖，这不好，也许这也有失体面。不是领袖，而是集体领导人，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约·斯大林。’斯大林指的是什么？是指剧中主人公之一、副人民委员里亚多沃伊在与前反对派纳卡托夫的争论中慷慨激昂地断言：‘我说的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我说的是领导我们的领袖，他撕下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曾拥有无限可能但遭遇失败的领导人的面具。我所说的是苏维埃国家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其力量是由千百万人岩石般的信任构建的，它的旗帜在世界各种不同的语言中都是布尔什维克事业堡垒的象征。而这一集体的领袖是不可战胜的……’”^②

“1936年，马·季·奥拉赫拉什维利撰写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生平传略出版。斯大林读了这本书，在书上留下了很多批注。在传略中，关于1917年7月危机是这么说的：‘在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时期，面对日益临近的危机，许多人害怕得发抖，而斯大林却坚定地坚守在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党组织领导人的岗位上（列宁当时处于秘密状

^① В.З.Роговин.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л.* — М., 1994, глава «Культ Сталина и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я истории». См.: <http://trst.narod.ru/rogovin/t3/xli.htm>.

^② Л.Максименков. *Культ. Заметки о словах-символах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3, № 10. См. также: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677.htm.

态——列·马克西缅科注)。奥尔忠尼启则经常与他在一起，并在他的领导下为党的列宁口号进行坚决和忘我的斗争。’斯大林在上述话之下打了着重号，并在页边的空白处，用红铅笔写下：‘中央在哪里？党在哪里？’在另一个地方讲到第六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1917年夏）时说，隐藏在拉兹里湖的列宁如何‘就代表大会的日程问题发出原则性的指示。为了得到列宁的指示，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根据斯大林的委托，两次前往列宁住的窝棚。’斯大林再次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而中央委员会在哪里？’”^①

“1937年1月27日，在看过《伟大的公民》（弗·马·埃姆勒导演的电影，其情节使人想到谢·米·基洛夫被害事件）的电影剧本后，斯大林给苏联电影业领导人鲍·扎·舒米亚茨基写了一封信，下达了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具体指示：‘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应予删除。应用党中央取代斯大林。’”^②

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中，有关于在克·叶·伏罗希洛夫住宅举行隆重午宴的记载。该午宴是为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而举行的。在祝酒时，季米特洛夫就强调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这一提法展开了自己的讲话：

季米特洛夫：……谈列宁，不能不把列宁与斯大林联系在一起！

（全体举杯）

斯大林：我非常尊重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是朋友，今后仍将是朋友。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他的表达方式甚至不能说是符合马克思

^① Л.Максименков. Культ. Заметки о словах-символах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3, № 10. См. также: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677.htm.

^② Л.Максименков. Культ. Заметки о словах-символах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3, № 10. См. также: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677.htm. *Суровая драма народа: Учёные и публицисты о природе сталинизма.* / Сост. Ю.П.Сенокосов.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с.494.

主义的。事业的胜利需要相应的条件，而领袖是能够找到的。^①

他的另一篇日记是关于1939年4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见，会见中讨论了共产国际五一节口号问题。对斯大林提出的季米特洛夫是否看到了口号文本问题，季米特洛夫回答说，最后的版本没有看到，但这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而马努伊尔斯基是总编辑。斯大林请他们注意赞扬他个人的那些口号（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并表示：

马努伊尔斯基是个溜须拍马者！他曾是托洛茨基分子！在清除托洛茨基破坏分子的时候，我们曾经批评过他，他沉默，没有表明态度，但他开始搞溜须拍马。这有点可疑！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斯大林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篇有害的挑衅性文章。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同意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的口号，只同意“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②

斯大林60寿辰正值苏联-芬兰战争，而其65寿辰时正在进行卫国战争，所以，在那些年组织隆重的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但正如阿卡基·姆格拉泽所指出的，即使在比较安宁的年代，斯大林也强烈反对搞庆祝活动。1949年，他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中央委员会战友的劝告：

“斯大林被告知，政治局委员主张在他70寿辰时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坚决反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他认为，政治局最终会通过这一决议，而斯大林同志也不得不服从。政治局考虑的是，生日庆祝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一，为了加强共产党、工人党对群众的影响；第二，这是所有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在莫斯科聚会的最好理由。在

① Цит. по: *Застольные речи Сталин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приложения В.А.Невежина.* — М.: АИРО-XX;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3, с.149.

②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New Haven; London, 2003), pp.104-105.

莫斯科，你们自己都知道，他们会讨论哪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斯大林不可能无视这些情况，他应该会同意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试图谈谈生日庆祝问题，但斯大林用不容置疑的语调制止了他：‘请选另一个题目。’

关于这个话题再没有被谈及……

虽然斯大林反对，政治局仍通过了庆祝他 70 寿辰的决议。组建了以尼·米·什维尔尼克为首的周年庆祝委员会。

1949 年 12 月 21 日大张旗鼓地举行了生日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口号下举办的。此外，他允许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一系列会议以便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进行协商，交换意见。”^①

在与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座谈中，维·米·莫洛托夫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授予斯大林苏联英雄称号的事：

“斯大林说，他与苏联英雄的称号不符。苏联英雄是授予有勇敢表现的个人。斯大林说：‘我没有这样的勇敢表现。’

他没有接受这枚奖章，只是在为他绘制的肖像上画上了这枚奖章。他逝世时，奖励局局长交出了这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送葬时这枚奖章被别在了他的枕头上。”

莫洛托夫补充说，“斯大林只戴过一枚星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②

在回忆 1945 年的事件时，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指出，庆祝游行后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以·维·斯大林苏联英雄称号。这是马林科夫提议的。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一崇高荣誉，还与签署该命令的加里宁进行了严肃的谈话。他说，他没有参加过战斗行动，没有建立过功勋，他不过是一个领导人。^③

① А.И.Мгеладзе. *Сталин. Каким я его знал. Страницы недавнего прошлого.* — б /м., 2001, с.125-126.

②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9, с.311.

③ В.Ф.Аллилуев. *Хроника одной семьи: Аллилуевы — Сталин.* —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5, с.195.

对苏联奖励制度最熟悉的专家瓦列里·杜罗夫在自己的一篇札记中列举了1945年6月22日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和由苏联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签署的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提交以下建议供政治局研究：

1. 授予斯大林同志“胜利”勋章；
2. 授予斯大林同志苏联英雄称号；
3. 设立斯大林勋章；
4. 在通向莫斯科的莫斯科—明斯克干线入口处建造斯大林凯旋门。相应命令，建议在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例会上通过。

1945年6月22日

维·莫洛托夫
拉·贝利亚
格·马林科夫
克·伏罗希洛夫
阿·米高扬

后两个建议未能实现。左上角有用铅笔写的批注：“放入我的档案。约·斯大林。”^①

1937~1938年提出了将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的建议。

“但名称没有改成。米·伊·加里宁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报称，斯大林坚决反对这一建议……”^②

莫斯科依然叫莫斯科。

^① В.А.Дуров. Орден Сталина Сталин не утвердил. // *Родина*. 2005, № 4.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durovorden.pdf>.

^② Б.А.Старков. Как Москва чуть не стала Сталинодаро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12, с.126-127.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stalinodar.pdf>.

格·马·马林科夫试图召开中央全会和在全会上讨论“个人崇拜”问题

根据尤里·茹科夫的说法，格·马·马林科夫曾提议，立即在1953年4月召开非例行的中央全会，并在全会上讨论“个人崇拜”问题。根据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管和研究中心（现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历史学家详细引用了马林科夫的讲话草稿，其中写有：

“众所周知，斯大林坚决谴责这类个人崇拜，并将个人崇拜视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做法。鉴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和坚决摒弃我们的宣传中存在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倾向——其路线是崇拜个人，贬低党制定的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贬低坚如磐石般团结和统一的党和政府集体领导的意义和作用。”

茹科夫继续指出：

“没有允许他（马林科夫——作者注）召开全会讨论个人崇拜问题。究竟是谁反对这样做，今天已经无法查清……反对者可能是……尼·谢·赫鲁晓夫……”^①

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贝利亚因批评“个人崇拜”而受到攻击

在七月全会（1953年）上发言的忠于赫鲁晓夫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阿·伊·米高扬，猛烈抨击拉·帕·贝利亚，因为他对“个人崇拜”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在起初几天（斯大林逝世后），他（指贝利亚——译者注）对个人崇拜是赞成的。我们知道，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过火问题，包括斯大林在世时。斯大林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斯大林同志说，围绕我制造的崇拜，是社会革命党人制造的。我们当时未能纠正这一问题，而这样的情况就延续下来了。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对待个人。而贝利亚赞成个人崇拜，原来他是想破坏对斯大林同志的崇拜，制造对他个人的崇拜。”^②

在全会上，安·安·安德烈耶夫也做了谴责贝利亚的发言，他指出，“从

① Ю.Н.Жуков.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 М.: ТЕРРА —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0, с. 617-621. Тезисы из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ого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аленкова подробно цитируются в: М.П.Одесский, Д.М.Фельдман.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 гиперссылке). //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2003. Вып. 20. См.: http://old.sgu.ru/users/project/pdf/osv_dv/vipusk20/09.doc.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с.168.

某个地方”突然冒出“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无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都是早已解决的问题。^① 卡冈诺维奇也做了相同的发言。^②

事实上，类似的关于对“个人崇拜”说法的背后暗含着对马林科夫的谴责！

马克西缅科夫也将1953年3月马林科夫对“个人崇拜”的批评视为“自我批评”，因为这一问题首先涉及他本人。但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上因“个人崇拜”问题而谴责贝利亚，显然，是安德烈耶夫不择手段进行批评的典型手法。

谁在煽动“崇拜”之风

摘自1936年12月7日列·谢·索斯诺夫斯基与尼·伊·布哈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质速记记录：

布哈林：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插曲。根据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的指示，我写了一篇关于红军展览会的文章。那里谈到了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和其他人。当斯大林说：你在那里写的是什么呀。有人反驳道：他敢不这么写吗！我对这一切的解释非常简单。我知道，用不着制造对斯大林的崇拜，但我个人认为，我的描述是适宜的。

索斯诺夫斯基：在我看来，您是认为必须这样做。

布哈林：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曾经是反对派。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坏处。^③

将读者注意力集中在“拉狄克，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多年来曾积极进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с.207.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с.283.

③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очных ставок в ЦК ВКП (б). Декабрь 1936 год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3, с.28.*

行了反斯大林的斗争”上之后，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那本已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经典著作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中写道：

“1934年《真理报》第一期，用整整两版刊登了卡·拉狄克的长篇文章。文章露骨地醉心于对斯大林的吹捧……这大概是报刊上第一篇专门吹捧斯大林的长篇文章。更有意思的是，拉狄克的这篇文章很快就以小册子形式大规模地发行了22.5万册。”^①

斯大林也已预料到，许多情况下对他的“个人崇拜”之风是隐秘的反对派吹起来的。芬兰的修正主义分子图沃米宁曾讲，1935年，当有人告诉斯大林，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最显眼的地方都摆放着他的半身塑像时，他愤怒地高声说：“这是露骨的对抗活动！”^②

赫鲁晓夫与米高扬

根据英国研究人员威廉·布兰德的看法，^③赫鲁晓夫是应为鼓吹“个人崇拜”承担责任的人之一。

正是赫鲁晓夫提议使用“领袖”（类似德语中的“元首”）一词。在1932年1月举行的莫斯科党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下^④，空前地团结在列宁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在为社会主义、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中，精神饱满和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胜利。”^⑤

1934年，在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是“我们的天才领袖”，^⑥而且只有他一人这样做。

① Р.А.Медведев.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Генезис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талинизма*. — Нью-Йорк: Alfred A. Knopf, 1974, с.303-304.

② Цит. по: William Bland. *The Cult of the Individual (1934-52)*. См.: <http://www.mltranslations.org/Britain/StalinBB.htm>.

③ 同上。

④ МК —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КП (б).

⑤ *Рабочая Москва*. 26 января 1932.

⑥ *XVII съезд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26 января — 10 февраля 1934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 М.: Партиздат. 1934, с.145. См.: http://www.hrono.ru/vkpb_17/6_4.html.

1936年8月，在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即所谓“16诉讼案”）期间，《真理报》刊登了题为《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即赫鲁晓夫——作者注）向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敬爱的朋友、父亲和劳动人民的导师斯大林同志致敬！》的文章，其中讲道：

我们的亲密朋友，我们的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党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无不胜的斗争，与你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你，斯大林同志，你在全世界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旗帜向前迈进……

斯大林的名字（原文如此——作者注）——活在我国千百万人的心中，它是希望，是今天的欢乐，是全人类美好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我们向你保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是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可靠支柱，将把斯大林式的警惕性提得更高，无情地根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残渣余孽，更加紧密地将党的布尔什维克队伍团结在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①

如布兰德所指出的，正是赫鲁晓夫提议将苏联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36年11~12月）通过的宪法命名为“斯大林宪法”。根据他的说法，宪法似乎“从头到尾”都是斯大林同志亲笔所写^②。不过，无论当时的苏联政府（人民委员会）首脑维·米·莫洛托夫，还是列宁格勒的州委和市委书记安·亚·日丹诺夫，都没有说过任何关于斯大林在制定宪法中有特殊作用的话。

最后，正是在这次讲话中，赫鲁晓夫“发明了”专用术语“斯大林主义”：“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地球1/6土地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不怀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将会在全球取得胜利。”^③

① *Правда*. 23 августа 1936.

② 同上，1936年12月2日。

③ *Правда*. 23 августа 1936.

在审判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的万人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言用的同样是顶级溢美之词：

他们反对斯大林同志，就是反对我们所有人，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对劳动人民！他们反对斯大林同志，就是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

他们反对斯大林同志，就是反对人类拥有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因为斯大林代表了希望，代表了夙愿，是所有先进和进步人类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①

在1939年3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颂扬为“我们的天才领导人，领袖，我们的伟大的斯大林”。在20分钟讲话中他还说，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领导我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导师和领袖”。^②在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中，共有32次提到斯大林。

米高扬不仅不比赫鲁晓夫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大大超过了他。1929年3月，即在赫鲁晓夫被选为莫斯科鲍曼区区委书记之前，米高扬在祝贺斯大林50寿辰的讲话中称：

斯大林的功勋不仅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瞄准手帮助党在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前线，进行大炮总攻的准备工作……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提出和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政策的基层问题（原文如此——作者注）上的伟大胜利，与斯大林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③

还有：

① *Правда*. 31 января 1937.

② *XVIII съезд...* См.: http://www.hrono.ru/vkpb_17/6_4.html.

③ *Известия*. 21 декабря 1929.

……斯大林同志 50 寿辰，对我们根据群众的合法要求，最终着手撰写他的传记，并使党和我国全体劳动人民都能看到这本传记，是一个推动。^①

而十年之后，米高扬在就斯大林 60 寿辰发表的讲话中，依然继续坚持提议撰写符合学术著作规范的斯大林传记。

列宁“遗嘱”

1925 年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的《关于伊斯特门的〈列宁去世之后〉一书》的文章中，列·达·托洛茨基写道：

伊斯特门在其书中的几个地方说，中央委员会对党“隐瞒”了列宁生命的最后时期撰写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文件（涉及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以及所谓的“遗嘱”等），这不能不认为是对我们党的攻击。根据伊斯特门的说法，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事先确定将这些党内建议性信件发表。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随着病情的发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和写信。所有这些信件和建议，自然而然被送到应送的地方，并告知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自然也总是能对党的决议产生应有的影响。如果说，这些信件不是都已发表，那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并没有预先确定发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恰恰是他与党的关系的性质以及党本身的性质，排除了这一“遗嘱”的可能性。在“遗嘱”的幌子下，在侨民、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的出版物上，总是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信（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该信包含所提出的以组织方式进行处理的一些建议。如其他文件一样，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极为认真地对待这封信，并做出了适合当时条件和形势的结论。任何关于秘密“遗嘱”或违背“遗嘱”的说法都是居心叵测的

^① *Известия*. 21 декабря 1929.

臆造，完全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真实意愿和他创建的党的利益背道而驰。^①

正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授予斯大林关于隔离列宁的权力。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议

1922年12月18日

如果列宁同志询问关于外贸问题的全会决议，根据斯大林与医生达成的协议，告诉他有决议文本和补充书，无论决议还是委员会组成，都是一致通过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应保存起来，无论如何现在不应转告，直到医生与斯大林同志商定允许后再转告。

斯大林同志负责隔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既包括与工作人员的个人往来，也包括通信往来。^②

斯大林对列宁关于与克鲁普斯卡娅“电话冲突”信件的回复：

1923年3月7日

列宁同志！

五个星期之前，我曾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志谈话。我认为，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的党内老同志。我对她（电话）讲了以下内容（大意）：“医生禁止向伊里奇提供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样的治疗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最重要的方法。但您，娜杰日达·康斯

① Л.Д.Троцкий. По поводу книги Истмена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 *Большевик* № 16, 1 сентября 1925 года, с.68. Цитируется по оригиналу; фрагмент статьи воспроизведён в речи Сталина «Троцкист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ь. Речь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объединённ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и ЦИК ВКП(б). 23 октября 1927 года». См.: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stalin/10-15.htm>.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2, с.191.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6-62.html>.

坦丁诺夫娜，却违反了这一制度。不能将伊里奇的生命视为儿戏等。”

我不认为，这些话可以被视为粗暴或不能允许的“反对”您，因为我没有其他任何目的，除了更快地使您的健康恢复外。而且，我认为，监督这一医疗制度的执行是我的职责。

我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进行的解释证明，这其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问题，除了无足轻重的误会外。

不过，如果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该把以上所讲的话“收回”，我可以把这些话收回。但我不明白，问题究竟何在，我的“错误”在哪里，究竟想让我怎么做。

约·斯大林^①

如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所告知的那样，上述信件并没有让列宁看：“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终也不知道斯大林道歉的回信。”^②

多年之后，列宁的秘书玛·沃·洛季切娃回忆说：

“信是我亲手转交的。我请求斯大林立即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回信，因为他等待答复，他着急。斯大林站着，当着我的面读完了信。他的面色是平静的。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慢慢地、清晰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词与词之间还做停顿：‘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病说的。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作为一个党员，做得不对，她会受到处罚的，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预这件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但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愿意为了自己的粗暴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③

列宁的另一个助手，莉季娅·福季耶娃指出：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行事并不总是恰如其分。她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时可能会说漏嘴。她已经习惯于与列宁分享一切，甚至是在不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2, с.193.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6-62.html>.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6-47.html>. 杂志同一期，刊登了与所涉及题目有关的其他信件。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2, с.195.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6-62.html>.

^③ Цит. по: А.Бек. К истор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нин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з архива писателя.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 17, 23 апреля 1989 года, с.8-9.

能这样做的时候……比如，为什么她要告诉列宁，斯大林在电话中辱骂了她？”^①

在一次与作家丘耶夫的座谈中，拉·莫·卡冈诺维奇谈到了斯大林与列宁相互关系问题：

“的确，列宁生前，他曾非常不愉快。有一次斯大林对我说了关于列宁写信的事：‘在这件事上我能做什么？政治局委托我监督不要让他负担过重问题。为了执行医嘱，不给他送文件，不给他送报纸。我能做什么，难道可以违反政治局的决议？我不能这样做！而为此我受到攻击。’他很难过地对我一个人说——确实非常难过地说过。他心里非常难受。”^②

在因克鲁普斯卡娅问题与列宁发生所谓“冲突”不到两个星期后，克鲁普斯卡娅秘密地请求斯大林为承受严重疼痛折磨的伊里奇搞一些氰化钾。斯大林在转告列宁自己同意后，向政治局写信通报了所发生的一切：

绝密

政治局委员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娜·康·）同志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让我，斯大林，负责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搞一些氰化钾并转交给他。在与我的谈话中，乌里扬诺娃顺便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忍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继续这样活下去是不可思议的”，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由于娜·康·特别坚持和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他曾两次在与我谈话时将娜·康·叫来，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认为没有可能做出拒绝的答复。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放心和相信，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你的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确放心了。

但是我要说，我还没有力量执行伊里奇的请求，我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这一使命是多么人道和必要，关于此情况，特通告中央

① Цит. по: А.Бек. К истор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нин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з архива писателя.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 17, 23 апреля 1989 года, с.8-9.

② Ф.И.Чув. *Каганович. Шепилов*.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с.263.

政治局委员。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①

在信件正本上，政治局委员们表明了对斯大林报告的态度。第一个写批语的是托姆斯基：“已阅。我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应严格在政治局成员范围内交换意见。不要让（从事技术工作的）秘书参加。”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的批语很短：“已阅。”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只有签字，没有写意见。

^① Цит. по факсимиле документа, воспроизведённого в: Волкогонов. *Цит. соч.* Кн. II, между с. 384 и 385. См. также: http://grachev62.narod.ru/stalin/t16/t16_ap08.htm.

第二章

“践踏”集体领导制的后果

“不容忍”集体领导制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用了几个段落来对斯大林没有坚持集体领导制表示不满，并抱怨是斯大林破坏了集体领导制的原则。以下是“秘密报告”中此类典型声明之一：

我们应认真研究和正确分析这一问题，以便排除任何可能再次出现斯大林在世时的问题，哪怕仅仅是类似的问题：在领导和工作中他完全不能容忍集体领导制，对所有人，不仅对与他有矛盾的人，而且对因他的任性和专横感觉到与他的观点有矛盾的人，肆无忌惮地施暴。^①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指责非常笼统，很容易驳斥，当然也是笼统地驳斥。为此目的，引述一些人的证明，他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有时候甚至比赫鲁晓夫某个阶段与斯大林的关系更加密切。

格·康·朱可夫，整个战争期间都与斯大林在一起，对斯大林的领导有很好的研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朱可夫对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做了详细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1.

的介绍。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指责，元帅明确指出，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和斯大林没有搞集体领导制的说法是一派胡言。^①在谢·马·什捷缅科将军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几乎同样的看法。

根据苏联前农业部部长伊·亚·贝内迪克托夫的说法，政治局的所有决定都是集体通过的。虽然德·特·谢皮洛夫与斯大林的关系不很密切，但他也就集体领导制的话题讲了很有趣的有代表性的故事。甚至赫鲁晓夫本人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也与自己的说法相矛盾。其回忆录称，斯大林的“特点”之一是能够改变观点，即当某个人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而那个人又善于以相应的方式论证自己的意见时。

阿·伊·米高扬真心实意地支持赫鲁晓夫，同时也对斯大林抱有敌意。与此同时，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译者注）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制原则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表示不满。

在提到“秘密报告”中所说的要排除任何可能再次出现哪怕仅仅是类似的背离集体领导制的问题时，应提请读者注意：很快赫鲁晓夫本人就抛弃了这一原则，这成为他在1964年被迫辞职的原因之一。这从十月全会（1964年）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出：米·安·苏斯洛夫在其带有指责性的长篇发言中，一方面重复了列宁1922年对斯大林的“评语”，并借此指责赫鲁晓夫；另一方面，为了同样的目的，借用了“秘密报告”对“个人崇拜”的攻击……估计，对这种嘲讽，赫鲁晓夫和其他听众不可能没有觉察。

斯大林“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意见不同的人

赫鲁晓夫：他（斯大林）不是采取说服、解释和耐心的方式与人合作，而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求无条件服从他个人的意见。如果有人对此抵制或设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个人肯定会被清除出领导集体，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②

^① 该证据及其他证据，见本章附件。

^②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1-132.

在斯大林一生中，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即在某个时候某人仅仅由于不同意斯大林个人的意见而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也没有举出一个这样的具体例子。

需要提醒的是：斯大林是联共（布）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和在政治局，他只有一票。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解除他的职务，斯大林本人也曾四次要求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但每一次他辞职的请求都被拒绝了。最后一次提出类似请求是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如每次一样，这次请求也被拒绝了。

赫鲁晓夫和其他人不仅能够为斯大林制造阻力，而且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是反对他的意见的。比如，1953年2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实施对农民征税的尝试，被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否决了。^①任何一个或明或暗反对斯大林提议的人，既没有被“清除出领导集体”，也没有被“精神上消灭”（不管其含义是什么），更不要说是“肉体上消灭”。

斯大林并没有仅仅因为观点不同而解除任何人的职务，但赫鲁晓夫却这样做了。1953年6月26日，根据捏造的指控，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同伙突然对拉·巴·贝利亚实施逮捕。之后，贝利亚和他的六个最亲密的战友——弗·尼·梅尔库洛夫、弗·格·杰卡诺佐夫、波·扎·科布洛夫、谢·阿·戈格利泽、帕·雅·梅什克和列·叶·弗洛济米尔斯基均被处决。斯大林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类似行为。

贝利亚并不是唯一的因与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而被他除掉的党的领导人。1957年7月，赫鲁晓夫举行中央全会，驱逐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因为他们不同意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政策。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无法无天是他1964年被中央委员会罢免的主要原因。

赫鲁晓夫和所有支持他的人需要某种辩护或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年他们没有抵制斯大林及其所谓的“犯罪活动”？为什么他们依然与斯大林一起留在党的领导层？给人形成一种印象是，“被消灭”的威胁成了他们“不在现场”的理由。的确，赫鲁晓夫多次表示，如果“我们”敢于尝试“恢复

^① 见第九章。

党内的列宁准则”或建议斯大林辞职，“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①。

有一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类似的辩解多么有失体面：“当苏联领袖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率苏共代表团赴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彭德怀当面问他，为什么直到今天苏联党才谴责斯大林。米高扬以揣测的方式回答说：‘当时我们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意味着死路一条。’对此，彭德怀反驳说：‘怕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②

当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消灭所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指控本身就是捏造的。

大规模镇压活动

赫鲁晓夫：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甚至在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残酷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都没有采取过极端的镇压措施。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几年之后，当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成，当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经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开始对他们进行镇压。

正是在这一时期（1935~1937~1938年），开始了在国家机关中的大规模清洗，首先是清洗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是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党的干部。而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起步时那些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③

① Например, см.: Юрий Шаповал. Прощание с властью: случай Никиты Хрущёва. 40 лет назад, в октябре 1964-го, «отец оттепели» был смещён со всех своих постов. //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23-29 октября 2004 г.: <http://www.zerkalo-nedeli.com/nn/print/48113/>.

② См.: Roderick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Vol. 2 (1983) , p.194.

③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2.

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没有什么比指责斯大林挑动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镇压更加恶劣的了。对报告中涉及的那些遭受镇压的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的具体评价，将在以下章节来分析；这里有必要就其共同性和即将研究的镇压问题，突出谈几个重要观点。

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恰恰是赫鲁晓夫应该对大镇压承担个人责任。而且他甚至可能要比任何其他一人——除了尼·伊·叶若夫外，承担更大的责任。自1936年中至1938年底，叶若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毫无疑问，他是这类人中血债最多的。^①与斯大林和中央党的领导（所有第一书记都要向他们报告）不同，赫鲁晓夫和叶若夫不是道听途说而是确切地知道，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甚至有可能是绝大部分在其参与之下遭到镇压的人并没有罪，或至少是在没有进行缜密侦查的情况下，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1956年2月1日，即宣读“秘密报告”的24日之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既为叶若夫，也为格·亚戈达（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职务的前任）辩护。这种辩护很难解释，如果考虑到赫鲁晓夫以下的个人意见：所有遭到镇压的人都应被认为是无辜的牺牲品。为叶若夫和亚戈达辩护的观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之后还坚持了很长时间。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肯定地说，叶若夫搞镇压的责任应由斯大林承担。赫鲁晓夫本人不可能不晓得这种观点的欺骗性，其他人不好说，但赫鲁晓夫，毫无疑问，在当时掌握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证据。但从所有研究人员今天可以接触到的文献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是：应对非法大规模镇压承担责任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叶若夫。

在对叶若夫确凿不移的犯罪进行侦查时，赫鲁晓夫先是担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是政治局委员。当时的政治局成员还有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克·叶·伏罗希洛夫。不过这种情况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意了“秘密报告”的基本论点（哪怕是暂时同意）。^②

① К деятелям такого же сорта Ю.Н.Жуков причисляет Р.И.Эйхе (Ю.Жуков.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Иосифа Сталин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7, (№ 8) 28 февраля), о чём речь пойдёт ниже.

② 见最后一章对该问题的讨论。

在对某个被处决的党的领导人的案件审理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不少情况是在开始之前），赫鲁晓夫就已经先人为地主地宣布他们是无根据镇压行为的牺牲品。而这与今天拥有的证据完全矛盾，虽然关于这些人活动的文件，暂时只有一小部分公开。彼·尼·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准备的报告，^① 专门为赫鲁晓夫提供他所需要的材料并事先做出党的领导人遭受了不公正镇压的结论。但该报告对大量保存在档案馆的，据我们所知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完全没有进行研究。因此，虽然报告号称对被镇压者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但依然缺乏能证明他们无罪的证据……

现存的所有证据都表明，确实存在着一系列有分支机构的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组织及反政府的阴谋活动，而卷入该活动的有许多党的主要领导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亚戈达和叶若夫，还有高级军官和其他许多人。^② 总的来看，对当时的形势，斯大林政府已经以各种方式进行了通报，只是没有提及叶若夫参与领导右派阴谋活动的具体细节，对此，此前也没有任何通报。

大量间接证据证明赫鲁晓夫本人参与了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活动。虽然这一猜测有大量证据予以支持，^③ 但与其说这是最后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思考。无论如何，借助于这一猜测，可以理解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第一原因，甚至可以解释此后苏共历史中的某些特点。

专用语：“人民公敌”

赫鲁晓夫：斯大林首次引入“人民公敌”这一概念。有了这个术语，你可以无须任何证据就能指控与你辩论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犯了思想错误，就可以对那些仅仅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仅仅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或是那些受到诬陷的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完全无

① 日期为1956年2月9日的“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或称“波斯佩洛夫报告”，官方称谓是“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查明对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原因的报告”。除波斯佩洛夫外，在该报告上签字的还有：阿·鲍·阿里斯托夫、尼·米·什维尔尼克和帕·季·科马罗夫。

② 详见第四章。

③ 其中的一部分，见本章附件。

视任何革命法制的原则。“人民公敌”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被告本人的“招供”成了主要的和唯一的犯罪证据，然而后来已经查明，这些“招供”乃是对被告施行体罚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
所有准则都是背道而驰的。^①

当然，绝不是斯大林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1930年代的苏联词典。

其实，“人民公敌”（*lennemi du peuple*）这一专用语，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被广泛使用。好像是政论家让-波尔·马拉特在1793年的《革命通报》（*L' Ami du Peuple*）第一期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用语。^② 易卜辛的一部知名度很高的剧作叫作《人民公敌》（1908）。1897年出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随笔《赫尔松涅斯》中的赫尔松涅斯人在宣誓时使用了这一术语。

1917年的所有革命者倾向于通过1789年的法国革命来观察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人民公敌”这一术语在他们中间非常流行。在1905年革命爆发之前，列宁也多次使用这一术语。“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和被1917年11月28日人民委员会法令禁止合法存在的政党，被认为是“人民公敌”的党。

1930年代，“人民公敌”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32年8月7日做出著名决议中的标准用语（*Locus classicus*^③），这个决议被称为“三穗法”。决议中，“人民公敌”这一专用语并不是针对党的反对派，而是针对在法律框架内被追缉的形形色色的窃贼、强盗和骗子。决议是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萨·叶努基泽签署的。没有斯大林的签字，因为这一时期他没有在苏联政府中担任立法机构和执行权力机构的领导职务。

自1917年开始，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人民公敌”的概念被使用过大约十次。经常和多次使用该专用语的正是赫鲁晓夫自己。^④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4.

② С м.: <http://membres.lycos.fr/jpmarat/jpmif.html>.

③ 标准句（拉丁文）。

④ 赫鲁晓夫最后一次使用这一专用语是在他发表“秘密”讲话11天之前所做的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时。Ю.В.Емельянов. *Хрущёв. Смутьян в Кремле*. — М.: Вече, с.32.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遗嘱”中，列宁警告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更不要说提出处决他们的问题。^①

赫鲁晓夫的意思是，正是斯大林应对无根据地地处决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鲍·加米涅夫承担责任。但关于他们在预审和在法庭上的供词，赫鲁晓夫只字未提。而整个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不管如何不可思议，但至今，不管在哪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供过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词不应该被视为是不实的。俄罗斯当局暂时没有公布侦查材料，不过我们掌握了一系列他们犯罪的证据，这些证据是不久前刚刚掌握的。

2001年公布的斯大林与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一封私人通信，是这类证据之一。至少根据该信，斯大林本人既相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罪，也相信确实存在着他们参与组织的阴谋活动。还有一个直接做出这一结论的重要原因是，斯大林仔细研究了被告在法庭的供词并试图从所得到的通报中做出自己的结论。

第二个文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州局的局长德·马·德米特里耶夫的供词。他的部分书面供词，作为贝利亚1938年10月23日就案件侦查发给斯大林报告的附件于2004年公布。我们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正是那些日子，贝利亚对制造假案、司法机关的欺骗，以及对在布哈林、雷科夫及其他“右派”制订推翻政府的计划时支持他们因而负有责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进行了惩治。

在其他大量的事实中，有德米特里耶夫回忆关于审问加米涅夫妻子的供词，这份供词正是在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1936年8月23日通信中曾引用过的内容。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两个文献资料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右派”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4.

反政府阴谋活动完全一致。

最后，我们还掌握其他一系列文件，即保存在被称为“沃尔科戈诺夫档案室”的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记录。根据这些记录，他们（早在预审中）相互指责进行了背叛活动，而且他们所有供词可以相互证实，我们要强调，这些供词与庭审中的供词完全符合。

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被告的严判，只有在他们没有犯罪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是没有根据的判决，而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证据都证明他们确实有犯罪活动。不难推测：赫鲁晓夫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们无罪的证据，否则他一定会公布这些证据。所以，完全有理由认为，当赫鲁晓夫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可悲结局表示伤感时，他在撒谎和耍两面派。

托洛茨基分子

赫鲁晓夫：……或者我们再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和非常客观地弄清这一事情的本质。要知道，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绝对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阶层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党的知识分子，某些人出身于工人。可以指名道姓地说出一大批当时被视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人，他们曾在革命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而后又积极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并献身于捍卫最伟大的革命成果。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与托洛茨基主义分道扬镳并站在了列宁的立场，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吗？^①

的确，1937年3月3日，在二-三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谈及托洛茨基分子时措辞强硬。但在谈到要提高警惕性时，斯大林并没有要求对他们起诉。相反，他建议为所有党的领导人员开办特别的思想学习班。可见，斯大林提出应将出现托洛茨基主义视为布尔什维克政治觉悟水平低的后果之一。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4.

正是在这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在其3月5日的总结发言中，坚决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所有在某个时间段动摇过，或曾向托洛茨基主义方面靠近的人，同时坚持在该问题上要严格地“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而“秘密报告”正是指责斯大林没有那样做。

换句话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观点正是斯大林在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坚决坚持的，但是赫鲁晓夫却将完全不同的话语和意向强加在了斯大林头上。实际在这一问题上，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讲话如此相似，简直就是他抄袭了斯大林报告的有关段落。

最后，讲几句关于托洛茨基分子本身的话题。

严格地说，下述认识与实际并不符合：托洛茨基分子已被解除武装，因而他们不会带来任何危害，他们不过是与“斯大林主义”不同的理论的拥护者。目前发现的不少证据证明，1930年代苏联宣传部门的看法是正确的。根据这些证据，托洛茨基与苏联国内的其他反对派有联系，参与了目标为推翻斯大林政府的阴谋活动，并与德国和日本军界有接触。文件还证实，党内外的托洛茨基分子秘密团体，在苏联进行了暗中破坏和间谍活动，对不合他们心意的人散布了伪造的叛变指控。

以不久前已经开放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这些问题加以仔细研究，还有待于从事这一工作的研究人员去完成，^①所以，这里我们只限于引用帕·阿·苏多普拉托夫将军提供的材料和一批从纳粹文献资料中得到的情报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证实了苏多普拉托夫所提供的材料的正确性。^②

斯大林“践踏”党内生活准则

赫鲁晓夫：如果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举行，多多少少还算正常，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越来越滥用权力的时候，这些原则开始遭到粗暴破坏……难道可以认为，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超过13年的事实是正常的吗？在这期间，我们的

① 关于该题目，将有单独的著作，目前作者正在准备出版这方面的研究。

② 见本章附件。

党和国家经历了多少事件？^①

赫鲁晓夫企图将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如此长时间才召开，说成与斯大林故意藐视党的生活准则有关，从而将为此应承担的整个责任转嫁到斯大林的头上。

目前，苏联档案文献资料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对外公开，但即使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也可以得出下述肯定的结论。

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曾计划在1947年或1948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由于某种考虑（该考虑至今还没有解密），政治局拒绝了这一建议。关于该计划的建议，是通过安·亚·日丹诺夫的口说出的。众所周知，日丹诺夫是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人之一。所以，不预先与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协商，日丹诺夫敢于就代表大会问题说出这样意见的可能性极小。

另一点也很重要：毫无疑问，关于日丹诺夫的建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一定知道！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秘密报告”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直接谈到是斯大林说“没有条件”或“拒绝”按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代表大会。显而易见的还有，赫鲁晓夫讲话的许多听众事先也都知道曾有过举行党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大会的计划。

谈及代表大会之间这种不正常的长时间的中断时，赫鲁晓夫故意忽略了卫国战争（1941~1945年）和与芬兰的战争（1939~1940年）的因素。如果只以和平年份计算，那么若在1947年，1948年或甚至是1949年，也就是说，在1939年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经过三个和平年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也可以算是适时的。^②

换句话说，赫鲁晓夫再次表现出他的不诚实。本来是计划在1947年或1948年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但因某种原因，代表大会未能举行。显然，赫鲁晓夫知道导致政治局讨论后做出这一决定的详细情况以及放弃举行代表大会的原因。总之，赫鲁晓夫后来再也没有利用过这件事。无论他自己，还是在他之后掌握权力的那些人，都没有公布上述讨论及此后所有中央全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36.

^② 例行的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见联共（布）党章。Устав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5, с. 13.

会的速记记录，至今这些材料还有待于公开。

赫鲁晓夫的另一项声明与以上所说的事有着直接的关系：

几乎没有举行过中央委员会全会。实际上只要说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都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就足够了。当然，曾打算在1941年10月举行中央全会，当时，已专门从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待了两天等待中央全会的召开，但最终也未能等到开会。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中央委员们见面和座谈，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斯大林沮丧到何等地步，以及他如何傲慢和轻蔑地对待中央委员。^①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为《新领袖》杂志发表的“秘密报告”所做的注释中说，以上援引的赫鲁晓夫的说法是编造的，但其注释的最后一句又说，^② 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第一手资料来源相比，他本人更倾向于相信赫鲁晓夫所说的论点。

可惜，尼古拉耶夫斯基将愿望当成了现实。如果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谁能保证他不在其他什么地方也撒谎呢？学术版文件汇编收入的“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提到，^③ 在战争期间，拟举行两次全会，但最终只举行了一次。尽管（赫鲁晓夫）撒谎是很清楚的，但学术版文件汇编的编辑们却回避指出显而易见的问题，即赫鲁晓夫说了谎话。

1941年10月，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在前线。当纳粹的军队逼近莫斯科时，完全没有可能举行全会。此外，1944年1月27日在比较平静的气氛中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批准了新的苏联国歌，还研究了一些次要的问题。^④ 1956年，几乎每一个二十大代表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6.

② 见该章附件。

③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прим. 23 на с.152.

④ О решениях январского (1944) Пленума ЦК ВКП(б) см.: <http://www.biografia.ru/cgi-bin/quotes.pl?oaction=show и name=воуна083> (*Б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опросы и ответы.* П.Н.Бобылев и др.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5).

都知道那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忍不住就以下问题撒了谎，即说在整个战争年代，都“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大概，这是我们遇到的赫鲁晓夫最愚蠢的失误之一。当然，这里所指的是“秘密报告”中许多谎言之一，这一次，在代表大会的讲台上所说的这番话，出席秘密会议的所有代表几乎全都心知肚明。

文献资料

“不容忍”集体领导制

朱可夫元帅认为，说斯大林“不能容忍”其他人的意见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约·维·斯大林逝世后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他个人单独做出军事战略决定。不完全是这样。以上我已经说过，如果向最高统帅报告的问题有真知灼见的话，他会认真接受的。我知道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即他曾经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和此前通过的决议。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许多战役的开始阶段。”^①

朱可夫还说：

“顺便说说，正如我在战争期间能确信的那样，约·维·斯大林绝不是那种在他面前不能提尖锐问题并与他争论，甚至固执己见的人。如果某些人（即赫鲁晓夫之类——作者注）对此持相反意见，那我要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②

朱可夫还说：

“斯大林通常的工作风格，是认真的，不喜欢激动，所有人都可以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意见。最高统帅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严格而庄重。他善于认真听取有真知灼见的情况报告。他本人言语不多，也不喜欢别人讲话时滔滔不绝……”^③

^① Г.К.Жу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В 2 тт.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глава 17, с.163. См. также: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zhukov1/17.html>.

^② 同上。第九章，第 229 页。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zhukov1/09.html>.

^③ 同上。第 11 章，第 338 页。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也不支持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在1964年之后撰写的回忆中写道：

“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人完全有可能说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辩解。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所有最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就我自己来说，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这样说），多数情况下，得到的是斯大林的理解，即使有时我们的意见明显不合他的心意，他也表现得很通情达理和耐心。

他对将领们的建议也能认真听取。斯大林倾听他们的谈话和建议，感兴趣地听他们之间的争论，善于从中汲取真理成分，以便于他制定出最终的、最合适的决策，因此，产生的决策是集体讨论的结果。不仅如此，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被我们的道理说服后，斯大林便会改变其最初对某一问题的观点。^①

……不过，领导层同志式的工作气氛，丝毫没有降低斯大林的作用。相反，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最终由斯大林签署的我们的建议，我们全都记在斯大林的账上，没有人说，作者不是斯大林，而是另外一个同志。在签字时，有时他做一些修改，有时不做任何修改，甚至出于信任，有时连看都不看。”^②

以下是苏联前农业部长伊·亚·贝内迪克托夫的看法：

“与流行的意见相反，那些年代的所有问题，包括著名党、政、军事活动家的罢免，都是在政治局里集体解决的。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经常发生争论、辩论，提出各种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意见——自然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党的方针的问题。没有不敢表达意见或顺从的完全一致，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我这样讲有充分根据，因为我多次参加过政治局会议。是的，斯大林的观点通常会占上风。但这是因为他考虑问题时更为客观，更加全面，看问题也比其他人更长远、更深刻。”^③

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有密切工作联系的谢·马·什捷缅科元帅，在其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强调指出：

① А.И.Микоян. *Так было*. — М.: Вагриус, 1999, глава 37, с.464.

② 同上。第41章，第516页。

③ И.А.Бенедиктов. О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ёве.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9, № 4. См.: <http://stalinism.newmail.ru/benedikt.htm>.

“应该说，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喜欢一个人决定战争中的重大问题，他非常清楚在这一复杂领域集体工作的必要性，认可在某些问题上有权威的人，重视他们的意见，对他们每一个人给予应有的评价。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后，要求确定未来的行动计划。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国家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和阿·因·安东诺夫做关于前线斗争及其前景的报告，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报告了军事经济问题，约·维·斯大林负责分析国际方面的问题。”^①

德·特·谢皮洛夫讲述了这样一个笑料插曲：

“斯大林气色不错，不知为什么非常快乐，又开玩笑，又哈哈地笑，非常民主。

‘你看，谢皮洛夫对我说，《真理报》很难办。当然有困难。我想，是否应该任命两个总编辑？’

这时所有人开始大声反对：‘不，那是双重政权……将不会有秩序……问题将会没有人负责……’

‘是吗？我看人民不支持我。那好吧，人民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吧。’”^②

甚至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也与自己上述的声明相矛盾：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有意思的是（对于斯大林也是典型的），这个人在暴怒时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当你证明自己确实正确，与此同时又向他提供了合理的事实时，他最终会明白，这个人是在坚持有益的事业，并予以支持……是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当你坚持反对他的意见，如果他又相信你是正确的，他会放弃原先的观点，接受与他谈话人的观点。这当然是优点。”^③

忘记了自己关于这一特点“对于斯大林也是典型的”说法，赫鲁晓夫紧接着又补充说：“但遗憾的是，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屈指可数。”^④

① С.М.Штеменко.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В 2-х книгах. Кн. 2.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89, глава 8, с.275.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shtemenko/index.html>.

② Д.Т.Шепилов. *Непримкнувший*. — М.: Вагриус, 2001, с.236-237.

③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Кн.2, часть 3.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глава 3, с.43-44.

④ 同上。

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赫鲁晓夫自己拒绝了集体领导制，才导致了他1964年的被解职：

1964年10月14日中央全会召开。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会开幕并称，会议日程将讨论关于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错误行为而在中央主席团形成的不正常的状况问题。之后，米·苏斯洛夫做了长篇报告。他指出，最近一个时期，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对党和国家不正确的领导方法，在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形成了不正常的局面。赫鲁晓夫违背列宁的集体领导制原则，竭力追求由一个人解决党和国家工作中最重大的问题。

苏斯洛夫说，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都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决定的。他粗暴地把其主观的，常常是完全不正确的观点强加于人。他妄自尊大，以为自己一贯正确，把垄断真理的权力据为己有。对所有提出不合自己心思意见的人，赫鲁晓夫总是傲慢地给他们起各种贬低人格的藐视和侮辱性外号。其结果，集体领导制实际上变成了一句空话。而且，赫鲁晓夫同志不断地搞阴谋活动，企图让主席团成员之间相互争吵。关于赫鲁晓夫设法摆脱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控制的另一个证明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是举行中央全会——全会的召开本可以对业已成熟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而是举行五六千人参加的全苏代表大会，在讲台上的发言，都是对赫鲁晓夫同志的吹捧。^①

全会速记记录刊登在《历史档案》杂志上。以下是比较完整的米·安·苏斯洛夫发言的摘录：

赫鲁晓夫同志集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于一身，但不是总能正确利用赋予他的权力和职责。他违背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制原则，开始追求由一个人决定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最重大的问题，藐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考虑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最近一个时

^① И.А.Мусский. *100 великих заговоров и переворотов*. — М.: Вече, 2001. Цит. по: <http://salebook.igg.ru/files/rv/381814292904.htm>.

期，甚至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都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决定的。他粗暴地把自己主观的，常常是完全不正确的观点强加于人。他妄自尊大，以为自己一贯正确，把垄断真理的权力据为己有。对所有提出自己意见和做出不符合赫鲁晓夫同志心意的结论的人，他总是傲慢地给他们起各种贬低人格的藐视和侮辱性外号。

罹患特殊的自大狂妄症之后，赫鲁晓夫同志开始把党和人民在我们的社会中执行列宁主义方针取得的胜利成就归功于自己……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错误行为，中央主席团作为富有创造性的集体讨论和解决问题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小，集体领导制实际上变为一句空话……

越来越清楚的是，赫鲁晓夫追求的目标是吹捧他自己，无视主席团和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的这些错误行为，可以解释为他追求树立对他个人的崇拜……^①

斯大林曾四次要求辞职

(1) 1924年8月19日

给俄共中央全会

在列宁离开政治局和逝世后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共同工作的一年半中，使我完全弄明白了，在一个狭小的委员会里我无法与这些同志共同进行诚实和真诚的政治工作。鉴此，请认可我已经从中央政治局离职。

由于不是政治局委员不可能当总书记，请认可我已经从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离职。

请给我两个月假期治病。

休假结束后，请确认给我分配的工作，或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或到雅库特州，或到国外某个地方做点职务不高的工作。

所有这些问题，请全会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予以解决，而且，除本函第一段已提出的意见外，不需要我再做出解释，因为我认为解释

^① Как снимали Н.С.Хрущёв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1, с.7-10.

是有害的。

我想请古比雪夫同志将该信副本发至中央委员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约·斯大林

1924年8月19日^①

(2) 1926年12月27日

中央全会（雷科夫同志）。请解除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我声明，我不能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我已没有力量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约·斯大林。1926年12月27日^②

(3) 1927年12月19日（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摘录）

斯大林：同志们！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已经三年了，每一次全会都拒绝了我。我觉得，不久前的条件使党认为有必要让我，一个多多少少严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当抵御反对派危险抗毒剂的人留在这一岗位上。我同意，确有必要将我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尽管有列宁同志的著名信件。但现在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因为，现在反对派已经被粉碎。反对派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失败，他们不仅被粉碎了，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因此，可以认为全会拒绝尊重我请求解除我总书记职务的根据，已经不那么迫在眉睫。而且，你们也有列宁同志的指示，对于这一指示，我们不能不考虑，我认为，应该执行这一指示。我觉得，不久之前，党被迫回避了这一问题，因为众所周知的党内发展条件使党被迫这样做。但我要再次说，这些特殊条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依我看，已到了领导层执行列宁指示的时候了。所以，请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这样做，党只会是赢家。

^① Цит. по: http://duel.ru/200117/17_6_2.

^② Ю.Мурин. Ещё раз об отставках Сталина. См.: http://rspp.su/articles/07.2005/stalin_otstavka.html.

多加多夫：无辩论表决。

伏罗希洛夫：提议拒绝所听到的声明。

雷科夫：无辩论表决。其基础是柯秀尔同志的建议。现在对斯大林关于解除他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进行表决。谁同意这一建议？谁反对这一建议？谁弃权？一人。

所有人，除一人弃权外，都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

斯大林：那我再提另一个建议。也许，中央委员会认为取消总书记这个设置是适宜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过没有设置这一职位的时期。

伏罗希洛夫：当时我们有列宁。

斯大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没有设置总书记的职位。

会场插话：是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前。

斯大林：是的，好像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我们没有设置这一职位。这还是在列宁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如果列宁认为有必要提出设置总书记职位的问题，那么我认为，他遵循的是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即党内建立了多多少少较为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反对派。但现在这一形势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反对派已经被彻底粉碎。所以，可以取消这一职位。许多人将总书记的职位与某些特权联系起来。我要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说——同志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任何区别于书记处其他成员权利的特权，总书记不应该有。

会场有人问：而职责呢？

斯大林：职责也不比其他书记处成员多。我这样认为：有政治局——中央最高机构；有书记处——由五个人组成的执行机构，他们所有人，书记处五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实际上工作也是这样做的，总书记没有任何特殊权利和特殊职责。没有不经书记处批准而只由总书记一个人做出任何指令的情况。所以，总书记的职位，在我们这里实际上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权利，有的只是被称为中央书记处的集体。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一没有生命力的职务。我还没有说说这被叫作总书记的职务，在许多地方引发了一系列的曲解。在最高层实际上没有任何与总书记职位相关的特权和职责，而与此同时，在地方上

却出现了某些扭曲，在各个州，同志们正在争抢被称为总书记的职务，比如民族中央委员会。现在，出现了很多总书记，与此相关，地方存在着一些特权。为什么要这样？

施密特：地方可以取消。

斯大林：我认为，取消总书记职务对党有好处，也能给我一个解脱这一职务的机会。由于党章并没有规定这一职务，所以做起来会容易些。

雷科夫：我提议，不要给斯大林同志辞去这一职务的机会。至于各个州和地方机关的总书记，需要改变，但不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职务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设置的。在已经过去的整个时期内，无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前，还是在他去世后，政治上已证明，设置这个职位无论从组织方面，还是从政策方面看，是完全正确的。组建这一机构和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整个反对派，即今天已被开除党籍的人，都参与了；这对于所有党员来说，已完全没有任何疑问（即是否需要设置总书记和谁应该成为总书记）。据我看，“遗嘱”问题也因此而不再成为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是由反对派和我们同时解决的。对此，全党都是知道的。现在，十五大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需要取消总书记这个职位？

斯大林：反对派已经被粉碎。

接着，雷科夫还有一个很长的独白，如以上讲话一样，语无伦次和令人费解。雷科夫的张皇失措可以从以下表现看出：他删掉了许多话，之后又把这些话讲了出来，之后又用其他的话代替。有意思的是应指出，斯大林对自己的讲话从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可见，他对这一讲话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最后，雷科夫再次提议拒绝斯大林的建议。

会场多人表示：对，表决吧！

雷科夫：有人建议进行表决。

赞同声音：对，对！

雷科夫：表决。谁赞成斯大林取消总书记职务的提议？谁反对？

谁弃权？没有。

斯大林：同志们，在第一次进行关于解除我总书记职务的表决时，我没有表决，我忘了。请认为我是反对票。

有个人在自己座位上发言：这没有多大的作用。^①

(4)1952年10月16日

阿卡基·姆格拉泽的回忆录：

“……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苏共中央第一次全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参加了该全会的工作），斯大林确实提出了或解除他总书记职务，或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问题。他提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年龄及负担太重。他说，干部已经成长起来，有人可以替换他，比如，可以任命尼·亚·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但中央委员们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大家都坚持让斯大林留在这两个岗位上。”^②

大规模镇压活动

赫鲁晓夫不是旁观者，他是贯彻镇压政策最狂热的人之一。1939~1945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瓦·普·普罗宁，在《军事历史杂志》（1991年第十期）上发表谈话指出：

问：而赫鲁晓夫呢？关于他留下了哪些回忆？

答：……他积极地为镇压活动推波助澜。这是因为，在他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1920年，赫鲁晓夫拥护托洛茨基的纲领。所以，显而易见，他担心被镇压，因而加倍卖命地与麻木不仁、丧失政治警惕性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等进行“斗争”。赫鲁晓夫批准镇压了大量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其中市属23个区委书记几乎全部被捕。州的几乎所有区委书记被捕。

^① Цит. по: Г.Чернявский. Прыжок из партийных джунглей. // Интернет-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азете «Каскад», см.: www.kaskad.com/article.asp?article=37.

^② А.И.Мгеладзе. Сталин. Каким я его знал. Страницы недавнего прошлого. — б /м., 2001, с.118. См. главу 9, где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запись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лина на Пленуме, выполненная Л.Н.Ефремовым.

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员会所有书记都被镇压：卡采列涅勃根、马尔戈林、科甘、科雷特内……所有部门负责人，包括赫鲁晓夫自己的助理。赫鲁晓夫到乌克兰工作后，在1938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坚持对莫斯科市委第二套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镇压。我们当时都是年轻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吃惊：赫鲁晓夫该怎样教育我们提高警惕性，如果他的周围全是“人民公敌”的话？莫斯科委员会中，只有他一个人安然无恙。

问：您认为，莫斯科的镇压规模应“归功于”赫鲁晓夫一个人？

答：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因为1938年秋季，自谢尔巴科夫领导市委后，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州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区委会工作人员中没有任何人受害。我知道，1940年，由于航空工厂的工作糟糕，政治局曾提出免除谢尔巴科夫工作职务的问题。当时对他的指责就有他不愿意而且很少同意进行镇压。不仅如此，在我出席的市委书记处会议上，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提议，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局的负责人因无根据地抓人而被开除党籍。^①

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称：

“必须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十个。我们从事的是千百万人的事业，所以，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毫无畏惧地跨越敌人的尸体。”^②

《共青团真理报》一位女读者向历史学家尤里·茹科夫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考虑“有文件证实的名单，而根据这些名单，他（指斯大林——作者注）大笔一挥就能让千百人死亡”？对此，茹科夫的答复是：

“怎么考虑那些名单呢？名单上甚至没有姓名，只写着：‘请允许我处决两万人。’签字人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我告诉您，这个文件在哪里！”（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③

① Цит. по: В.А.Аллилуев. *Хроника одной семьи: Аллилуевы, Сталин*. —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2, с.172. См. также: http://nkozlov.ru/?resultpage=10&s=42&d_id=2324.

② Цит. по: <http://www.pravda.ru/politics/authority/kremlin/30-08-2002/11739-0>. Ту же цитату использует Вадим Кожин в: В.В.Кожин. *Россия. Век XX (1939-1964) Опыт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Алгоритм, 1999, с.317-318. См.: http://www.hronos.km.ru/libris/koz39_3_1.html.

③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3 декабря.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читателей газеты перепечатаны в: <http://www.nomad.su/?a=15-200212030006>.

此前不久，茹科夫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关于1937年镇压规模的文章中指出：

“第一批镇压人数的一半来自莫斯科州——它绝不是国家最大的州。这里组建的‘三人小组’成员，如规定的那样，有党的州委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与他的名字和签字并列的总是雷德斯的名字和签字，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局的局长，斯大林第二任妻子娜·阿利卢耶娃的亲戚。雷德斯今天也被列入了斯大林暴行的牺牲者名单。情况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和雷德斯向政治局提出了……不过，我最好还是引用他们向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处决：2000名富农，6500名刑事犯；流放：5869名富农，26936名刑事犯。’这仅仅是动了一次杀人的镰刀！”（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①

1937年7月10日，赫鲁晓夫要求批准对成千上万的人实施逮捕和处决：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兹通报：刑满释放并落户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刑事犯和富农分子共计41305人。

其中，刑事犯33436人。现有的材料为将其中的6500人定为第一类人和26936人定为第二类人提供了依据。这些人中，莫斯科的第一类人大约有1500人，第二类人5272人。

服满刑期落户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地区的富农7869人。根据现有的材料，有理由将其中的2000人纳入第一类，5869人纳入第二类。

请批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局局长雷德斯同志和莫斯科州副检察长马斯洛夫同志、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并请授权：如有必要，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阿·阿·沃尔科夫替换委员会成员。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尼·赫鲁晓夫）^②

^① Жупел Сталина. Беседа журналис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абова с историком Юрием Жуковым. Часть 7.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19 ноября.

^② Труд. 1992. 4 июня. Документ такж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г.: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прим. 22 на с.747.

约翰·格蒂引用赫鲁晓夫关于对 41000 人进行镇压的报告并指出：

“在莫斯科，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知道，他必须镇压 41805 名富农和刑事犯。几乎从 40 个州和共和国发给斯大林的所有电报报告中，都包含着如此准确的数字。”^①

格蒂继续说：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由党的领导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之后，被纳入应镇压的人员范畴显然扩大了。但最终，“这一早先被地方领导人批准的数字，经检查后被极大地删减了”。^②换句话说，“中央”，即斯大林和政治局在努力限制镇压的规模。

威廉·陶布曼在其厚厚的长达 876 页的著作《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③中，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州进行镇压活动中的作用，尽管这两个地方的镇压规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

但在涉及乌克兰的镇压时，陶布曼写道：

“依然是那个赫鲁晓夫，对他上任后明显加大的清洗，进行着控制。根据计算，仅在 1938 年，就逮捕了 106119 人。而自 1938 年至 1940 年，逮捕总数达到了 165565 人。莫洛托夫是一个未必客观，但掌握情况很多的人。根据他的说法，赫鲁晓夫‘作为三人小组成员，让 54000 人命赴黄泉’。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着他的毒辣，至少有这样一个事例：他在一份文件的上角随意写了‘逮捕’二字，于是该文件便决定了乌克兰一名身份很高的共青团工作人员的命运。”^④

现在看个例子，因中央领导提出要求降低乌克兰镇压人数的“限额”，赫鲁晓夫向斯大林抱怨说：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乌克兰每月报批的镇压人数为 1.7 万 ~1.8 万，但得到莫斯科批准的不超过 2000~3000 人。请您采取紧急措

① J. Arch Getty. Excesses are not permitted.: Mass Terror and Stalinist Governance in the Late 1930s. // *The Russian Review*. Vol.61 (January 2002), p.127. Жуков говорит о 41 305 чел., Гетти — о 41 805;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речь идёт о процитированном выше документе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 неточност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сторика.

② Getty. *Excesses*, p.128.

③ W.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Y: Norton, 2003).

④ 同上，116 页。

施。热爱您的尼·赫鲁晓夫。”^①

《参与镇压》一文的作者 C. 库兹明告知：

“将尼·谢·赫鲁晓夫推荐到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岗位是有目的的。他在乌克兰共和国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片断可以证实这点。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光荣地完成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的委托——将乌克兰变为敌人无法逾越的堡垒。’

为此，尼·叶若夫向他提供了帮助，叶若夫在使用逮捕和审讯手段发现敌人方面，可谓是‘登峰造极’。而这一切之后，再也没有无罪的人了。他的‘功劳’得到了赫鲁晓夫应有的评价。他亲口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到乌克兰和乌斯片斯基同志到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之后，乌克兰才真正粉碎了敌人的巢穴。’

……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尼·谢·赫鲁晓夫有意绕开乌克兰事件，列举的全是其他地区采取镇压行动的事实。但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比如，应当认为，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乌斯片斯基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赫鲁晓夫组织镇压作用的评价是完全客观的。人民委员说：‘我和许多在这里发言的同志一样，应该声明，乌克兰真正开始歼灭人民的敌人，仅仅是在几个月之前，即当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伟大的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领导我们之后。’”^②

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下设的进一步调查与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镇压有关资料的委员会准备的“报告”指出：

“尼·谢·赫鲁晓夫1936~1937年作为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对逮捕相当数量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亲自表示了同意。克格勃档案中保留着证明赫鲁晓夫战前参与了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乌克兰大规模镇压的文件材料。特别是他亲自报送了关于逮捕莫斯科市苏维埃、莫斯科州党委领导人员建议的文件。1936~1937年，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内务

^① *Слово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 Сост. Р.И.Косолапов. — М.: ЭКСМО, 2002, с.355. См.: *Воля*. 1993, №11; *Искра*. 1993, № 4, с.6.

^② С.Кузьмин. К репрессиям причастен.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 Н.С.Хрущёва. //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надежды*. 1997. № 2. Цит. по: Н.Ф.Бугай. *Народы Украины в «Особой папке Сталина»*. — М.: Наука, 2006, с.252-253.

人民委员部机关镇压了 55741 人。

赫鲁晓夫自 1938 年 1 月领导乌克兰的党组织。1938 年在乌克兰逮捕了 106119 人。之后的年代，镇压依然没有停止。1939 年逮捕了约 12000 人，1940 年逮捕了约 50000 人。1938~1940 年乌克兰共逮捕 167565 人。

对乌克兰 1938 年加强的镇压措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解释是，由于赫鲁晓夫来乌克兰工作，因此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的活动增多了。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了对几百个被怀疑针对他个人组织了恐怖行动的人进行镇压。

1938 年夏，经赫鲁晓夫批准，逮捕了一大批党的以及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员，其中包括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党的州委会书记等，他们都被判处极刑和长期监禁。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呈送的名单，仅在 1938 年，赫鲁晓夫同意镇压的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就有 2140 人。”^①

专用语：“人民公敌”

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随笔《赫尔松涅斯》（1897 年）中的赫尔松涅斯人宣暂时使用了这一词语：

“……我既不参与反对村社，也不参与反对任何没有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的公民的阴谋活动。”

1918 年 5 月 1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伊·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亚·阿瓦涅索夫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粮食人民委员提供与隐藏粮食储备和投机倒把的农村资产阶级斗争特权”的法令。列宁提议对法令第三部分补充下述内容：宣布所有拥有多余粮食又不送到粮食收集站的人，以及所有利用储备粮食自己酿酒的人，是人民公敌（粗体字为作者所标），并将他们移送到革命法庭，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没收全部财产和永久地赶出其村社；而对自酿酒者，除此之外还要强制他们进行社会

^① Массов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оправданы быть не могут. (Документы 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 «Вестник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Источник*. 1995, № 1, с.126-127; См. также: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3. 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одов — 1991.* — М.: МФД, 2004, с.146.

劳动。^①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1932 年的法律（即“三穗法”）赋予专用语“人民公敌”新的生命力，该法律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其含义究竟是什么：

“蓄意侵吞社会财产的人应视为人民公敌，因此，与侵吞社会财产者进行坚决的斗争，是苏维埃国家机关职责的重中之重。”^②

赫鲁晓夫经常使用这一专用语。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他声明：

“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复辟资本主义的忠诚卫士，为从内部破坏列宁的党的队伍的团结，进行了毫无希望的尝试，他们所有人被这一团结碰得头破血流。”^③

还有一个文件，见第五章附件（“被处决的统帅们”）。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

斯大林从索契写信给卡冈诺维奇，交流了自己对那些日子在莫斯科进行的“16 诉讼案”的一些想法：

1936 年 8 月 23 日

莫斯科联共（布）中央

卡冈诺维奇：

第一，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的文章效果不坏。根据记者的通报，外国记者对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沉默无语。应当把这些文章在挪威、瑞典、法国和美国的报纸上重新发表，哪怕是在共产党的报纸上。顺便提一下，文章的意义在于，它们使我们

^①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 Под ред. Г.Д.Обничкина и др. Т. 2: 17 марта — 10 июля 1918 г. —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с.265. См. прим. 263: <http://www.1917.com/Marxism/Trotsky/CW/Trotsky-War-I/REF-Q.html>.

^②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27-1939. Т.3. Конец 1930-1933.* — М.: РОССПЭН, 2001, док. № 160, с.453. См. также: http://kc.koenig.ru/aktkbg/KALININ/akkab_05g.htm.

^③ Цит. по: Ю.В.Емельянов. *Хрущёв. Смутян в Кремле*, с.32.

的敌人无法再把诉讼程序描绘成是由中央委员会一派导演的镇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派的剧目。第二，从赖因霍尔德的供词看出，加米涅夫曾通过自己的妻子格列博娃向法国大使阿尔凡试探法国政府对未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政府”可能采取的态度。我认为，加米涅夫也向英国、德国和美国大使进行了试探。这意味着，加米涅夫会向这些外国人透露其阴谋和谋杀联共领袖的计划。这也意味着，加米涅夫已经透露了这些计划，否则，外国人不会与他们谈及关于未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政府”。这是加米涅夫及其朋友企图直接与资产阶级政府结盟反对苏联政府的行为。这里隐藏着众所周知的美国记者提前写好悼词的秘密。显而易见，格列博娃对这方面的肮脏活动了如指掌。应该把格列博娃带到莫斯科，并对她进行一系列细致的审讯。她可能会公开许多有意思的东西。^①
(粗体字为作者所标)

以下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前局长德·马·德米特里耶夫关于该事件供词的摘录：

“塔基扬娜·加米涅娃案。她是列·鲍·加米涅夫的妻子。有这样的一些材料：塔基扬娜·加米涅娃根据列·鲍·加米涅夫提出的任务，到了法国大使阿尔凡那里，并建议其与列·鲍·加米涅夫会面就法国政府对在苏联进行秘密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给予帮助的问题进行谈判。

我和切尔托克审讯了塔基扬娜·加米涅娃，‘忽略了’这一指控，并让她在侦查中不要坦白这一事实。”^②

托洛茨基分子

在1937年3月3日二—三月全会的发言中，斯大林说：

^① *Сталин и Каганович. Переписка. 1931-1936 гг.* — М.: РОССПЭН, 2001, № 763, с.642-643.
См.: <http://www.idf.ru/6/33.shtml>.

^②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1937-1938.* — М.: МДФ, 2004, док. № 356, с.586.

.....

(5)需要向我们党内的同志解释清楚，代表外国情报机关进行破坏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潮流，他们也不再为与工人阶级利益兼容的思想服务，他们已变为外国情报机关雇用的无原则和没有思想性的破坏颠覆分子、间谍、杀人犯。

要解释清楚，现在已不能用老的方法与当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即不是用辩论的方式，而是用根除和粉碎的方式。^①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所做的闭幕词中继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但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粉碎和根除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德日间谍？这是否意味着不仅根除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也包括根除某个时候向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动摇，并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不仅根除名副其实的托洛茨基主义破坏活动的代理人，也要根除那些某个时候曾偶然生活在某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生活过的街道上的人？至少在这里，在全会上有这样的声音。是否可以认为对决议做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在这一问题上，如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需要单独和有区别地对待。不能一概而论。这种不加区分的态度只能损害与真正的托洛茨基破坏分子和间谍的斗争。

我们的负责同志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前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早已摆脱了托洛茨基主义，并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而且表现不比某些令人尊敬的、没有向托洛茨基主义动摇过的同志们差。现在丑化这些同志是愚蠢的。

同志们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思想方面一直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尽管如此，他们却与部分托洛茨基分子保持着私人联系，但一旦他们看清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真实嘴脸后，他们立即斩断了

① И.В.Сталин. О недостатках партийной работы и мерах ликвидации троцкистских и иных двурушников. Доклад на Пленуме ЦК ВКП(б) 3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29 марта.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20.html>.

这一联系。当然，他们与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友好联系的中断晚了一些，不是一开始就立即中断的，这不好。但把这些同志与托洛茨基分子混为一谈是愚蠢的。^①

斯大林在二-三月全会（1937年）所讲的话，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讲话如出一辙：

“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绝对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阶层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党的知识分子，某些人出身于工人。可以指名道姓地说出一大批当时被视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人，他们曾在革命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而后又积极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并献身于捍卫最伟大的革命成果。他们许多人早已与托洛茨基主义分道扬镳并站在了列宁的立场，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吗？”^②

在“秘密报告”的另一部分，赫鲁晓夫再次回到了苏联托洛茨基主义的题目上：

“应该指出，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夕，表决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人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人有72.4万人。从党的十五大到中央委员会二-三月全会，十年过去了，托洛茨基主义已经被彻底粉碎，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③

其意思与斯大林在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的发言非常相似：

“请回忆一下最近一次我们党在1927年的一次辩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公决。85.4万名党员中，73万名党员参加了表决。其中72.4万名党员投票拥护布尔什维克，拥护党的中央委员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2600名党员弃权……对此还需要补充一点，这一数量中的许多人对托洛茨基主义表示失望并放弃了该主义，你们可以得出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微不

① И.В.Сталин.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Пленум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КП(б). 5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1 апреля.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8.html>.

②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4.

③ 同上，第32-33页。

足道的概念。”^①

帕·阿·苏多普拉多夫将军指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绝非无害：

“现在，出于政治需要，将 1930~1940 年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国外的活动只归结为搞宣传。但实际并非如此。托洛茨基分子活动十分积极，利用与阿伯韦尔（希特勒德国的侦查和反侦查机构——译者注）有联系的人员的支持，1937 年在巴塞罗那策划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乱。托洛茨基分子圈子里的人向法国和德国情报机构发送了‘提示性’的关于共产党（指外国共产党——译者注）支持苏联行动的材料。后来成为我们的‘红色乐队’秘密小组领导人的舒尔策-博伊森，向我们通报了 1937 年叛乱的托洛茨基分子领导人与阿伯韦尔在巴塞罗那的联系。结果，舒尔策-博伊森被捕。盖世太保指控他向我们转交了上述情报，而这一事实写在了盖世太保对其案件审判的死亡判决书上。

关于 1941 年阿伯韦尔利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关系对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侦查的其他例子，1940 年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我们驻巴黎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另有相关报告。”^②

苏多普拉多夫还说：

“消灭‘宁’的行动（‘宁’，即安德烈斯·宁，曾任托洛茨基的秘书——译者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标为‘尼古拉’战役。采取该行动前期，特工奥尔洛夫-尼科利斯基成功打进托洛茨基运动。通过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政府部长高多西尔·奥里维罗，1937 年 6 月成功阻止了支持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援军的托洛茨基叛乱分子。此外，尼科利斯基招募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安全部门领导维·萨拉-‘霍塔’定期报告托洛茨基分子的意图并协助完全掌控加泰罗尼亚托洛茨基运动所有领导人的来往通信和谈判情况，该运动在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支柱。正是‘霍塔’抓住了一些德国信使，是他们挑动了巴塞罗那动乱，并使动乱很快变成了托洛茨基分子的

① И.В.Сталин.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8.html>.

② П.А.Судоплатов.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Лубянка и Кремль, 1930-1950 годы.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7, глава 4 «Ликвидация Троцкого».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sudoplatov_pa/04.html.

武装行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德国特工机构参与组织了巴塞罗那的动乱，动乱使托洛茨基分子的领袖人物彻底地臭名远扬。”^①

纳粹法庭的速记摘录证实了苏多普拉托夫所言：

“1938年初西班牙国内战争期间，由于职务原因被告得知，反对巴塞罗那地方红色政府的起义是与德国秘密部门共同准备的。这一情报与其他从波尔尼茨得到的情报，一并由他转交给苏联驻巴黎使馆。”^②

在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前不久，文件中提到的吉塞拉·冯·波尔尼茨 (Gisella von Pöllnitz)——“合众社”工作人员，加入了“红色乐队”情报网，并将“情报藏进与苏联使馆人员约定的地点”。^③

斯大林“践踏”党的生活准则

就安·亚·日丹诺夫关于在1947年年底或1948年举行例行代表大会的提议，亚历山大·佩日科夫是这样写的：

“在中央二月全会上（1947年），安·日丹诺夫谈到决定在1947年年底或无论如何于1948年举行联共（布）例行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除此之外，为了活跃党内生活，他提议通过一项有关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简单的制度，即每年举行一次，并必须根据会议结果，更新不少于1/6的中央全会人员。”^④

学术版“秘密报告”中的一个注释，实际上证实赫鲁晓夫撒谎了，因为他断言：“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实际上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

“1941年10月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确定于1941年10月10日举行中央全会，日程是讨论：‘①我国的军事形势；②党和政府保卫国家的工作。’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41年10月9日决议，全会推迟举行是因‘不久前前线形成的令人担忧的形势和不适宜将

① 《西班牙的苏联情报机构》第2章，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sudoplatov_pa/02.html。

② Haase, N. *Das Reichskriegsgericht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Berlin, 1993), S.105.

③ S.B.Bryson. *Resisting Hitler: Mildred Harnack and the Red Orchest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37.

④ A.B.Пыжико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уть во власти (1946-1949).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1, №3, с.96. О том же Пыжиков пишет, в частности, здесь: <http://www.akdi.ru/id/new/ek5.htm>.

领导同志从前线召回’。战争期间只在 1944 年 1 月 27 日举行了一次中央全会。”^①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英文版“秘密报告”的注释中（注 10）指出：

“如果相信正式的苏联文献资料，赫鲁晓夫的说法是不对的。根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决定》文集（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 1954 年出版），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是在战争期间举行的（1944 年 1 月 27 日），全会确认了各个加盟共和国有权拥有自己的外交部，以及决定用新的苏联国歌代替国际歌。但也有可能赫鲁晓夫是正确的，即并没有召开全会，只是搞了一个骗局：宣布举行全会，但实际上并没有举行。”^②

^①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Прим.23 на с.152.

^② Khrushchev, Nikita S. [WTBX]The New Leader.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WTBZ]. Introduction by Anatol Shub, notes by Boris Nikolaevsky.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1962, note 10.

第三章

“斯大林对党专横跋扈”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

赫鲁晓夫：委员会查阅了大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文献，查明了大量伪造的反共产党人案件、伪造的指控、令人发指的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等事实，结果是造成无辜的人们的死亡。已经查明，1937~1938年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人员的真实情况是，他们从来都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实际上，他们一直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但遭到了诽谤，而有时因经受不住残酷的拷打，自己给自己罗织形形色色重大的和不可思议的罪名来诬陷自己（在侦查—伪造人的授意下）。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大量关于对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和这次党代会选出的中央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文献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这一材料进行了研究。

已经查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和枪杀（主要是在1937~1938年），即占70%。（会场群情激愤）

……遭到如此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还有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代表大会1966个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代表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即1108人。^①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6-137.

上述论点，是赫鲁晓夫报告中的三个所谓“特殊情况”之一。^①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赫鲁晓夫强烈暗示，斯大林应对此承担某种责任，但究竟应承担什么责任，他没有说。严格地讲，这里既没有指控，也没有“揭露”，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当然，赫鲁晓夫企图使用这类骗术把事情描绘成：似乎是斯大林通过大镇压消灭了十七大的多数代表和党的中央委员。但这样的暗示毫无根据。毫无疑问，尽管故意做出斯大林参与此事的暗示，但很明显，斯大林没有什么可以被指控的。

现在，历史学家手中已有赫鲁晓夫所提到的委员会的报告文本，它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而闻名，^②委员会以彼·尼·波斯佩洛夫名字命名。彼·尼·波斯佩洛夫是苏共中央辖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院长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历史学家波斯佩洛夫领导着该委员会，并参与了撰写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最开始的文本。波斯佩洛夫在斯大林时期撰写的文章，是大肆鼓吹“个人崇拜”的令人作呕的范例。但1953年之后，波斯佩洛夫成了赫鲁晓夫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波斯佩洛夫被认为是政治上颇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但考虑到他所处的地位，使用别的评语会让人更感到奇怪。^③即便我们对波斯佩洛夫一无所知，那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报告本身，就可以让我们对他一目了然。

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报告的主要结论认为，斯大林时期所有或绝大多数被处决的党的领袖，实际上都没有犯过任何罪行。不过，对于他们无罪的说法，在报告中并没有用证据加以证明。委员会只是宣布他们无罪，仅此而已。从报告的架构很容易看出其目的是说明斯大林应对大镇压负责，对任何与这一事先做出的结论不一致的证据均被故意忽略，不予采信。

除该报告外，历史学家手中还有一些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党的领导人

① 关于“特殊情况”及作者提出的分类法，详见“赫鲁晓夫造假手段”一章。

② См.: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Март 1953 — февраль 1956. — М.: МФД, 2000, с.317-348, а также: <http://www.idf.ru/2/7.shtml>.

③ 以下仅是波斯佩洛夫履历中的某些评价：“参与撰写充满伪造的《苏联内战史》；波斯佩洛夫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苏共党史》编委会主任；曾领导撰写弗·伊·列宁传记的创作集体等。所有他参与撰写的著作都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与历史毫无共同之处，<http://www.hrono.ru/biograf/pospelov.html>。

平反的简要材料。一些材料是在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完成之前准备好的，但多数材料是在报告之后出现的。它们与波斯佩洛夫报告和其他文献资料一起由“国际民主基金会”（亚·尼·雅科夫列夫基金会）付印和出版。

由于该基金会预定的目标是揭露所谓斯大林和共产党的犯罪活动，不难设想，基金会当然会利用任何机会公布可以将对无辜人们的镇压责任嫁祸于斯大林的文件。

以下将研究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大量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报告中提到的相当大一部分被镇压的党的高层官员，都是或多或少有罪的！至少，数量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仅靠列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的简短证明材料来为他们辩护，还远远不够。

第二，叶若夫应对许多假造的反苏联公民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当然，这些公民中包括赫鲁晓夫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官员。斯大林时期就对叶若夫的案件进行了侦查，根据法院判决，他被处决（见以下关于叶若夫的单独章节）。

第三，调查证明，在审理中蓄意歪曲供词和对被逮捕人大搞刑讯逼供的许多案件，如果不说是大多数的话，是在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之前发生的，贝利亚是在1938年年底接替叶若夫担任这一职务的。

第四，正是赫鲁晓夫开创了掩盖对中央委员逮捕、侦查、审判和处决具体原因的先河。

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引证了在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人成为大镇压牺牲品的百分比。如1989年公布的较详细的关于中央委员们命运的通报一样^①，赫鲁晓夫对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由于什么原因被抓捕、被审讯，以及其中许多人后来因为什么被处决，只字未提。赫鲁晓夫的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似乎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所为，无须调查其他人与此有什么关联。

但赫鲁晓夫完全清楚这一事情的真实情况。这不难确认，因为我们拥有平反材料和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从中可以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

^① О судьбе членов и кандидатов в члены ЦК ВКП(б), избранного XVII съездом парти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2, с. 82-113.

逮捕和处决都有完全明确的原因。

比如，根据委员会的报告：

(1) 只是“多数”被镇压的人无罪，这意味着“无罪”对某些人是不适用的，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明确指出，除了叶若夫之外，还有哪些人确实是罪有应得；

(2) 有些人成了被诬告的牺牲品，但无论是埃赫还是叶夫多基莫夫，在遭到殴打和刑讯后，也都诬告了他人，其中包括许多后来被判处中央委员们；

(3) 某些人在刑讯后的确提供了指控他人的证据。

此外，委员会的报告强调，许多被告在审讯时的供词和速记记录都转交给了斯大林，而他又把它们分发给其他政治局委员。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其中一些资料如今已经公开。

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波斯佩洛夫委员会，都想把大镇压活动的全部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但两个报告提到的一些事实材料和公布的统计数据都驳斥了这一论调。真实情况是，恰恰是贝利亚终结了“叶若夫式的大镇压”。

尽管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目的性与倾向性很强，但它还是稍稍撩起了笼罩在真实情况之上的面纱，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相反，一切都被无法穿透的秘密所包裹。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1991年之后，都没有让研究人员接触有关侦查档案材料的机会，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那些年代事件的真实情况依然不为人知。可能做出下述假设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这其中存在着某种关联，仔细研究这一关联，可能会做出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无罪的结论，虽然赫鲁晓夫使尽浑身解数，企图将所有的罪状都强加在他们头上。

实际上，赫鲁晓夫正是应当对大镇压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的人之一（详见“大规模镇压活动”部分及第二章附件引证的资料）。

这里和以下一些章节将会研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点名的党的活动家的案件。还没有一种情况表明，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收集到足够数量可以确定这些人确实丝毫无罪的证据。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承认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证明。

后苏联时代，由于只有部分苏联档案解密，而且只有被选定的研究人员可以接触这些档案，所以赫鲁晓夫讲话和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提到的指控党的高级官员的有关证据，很少被人所知。俄罗斯政府拒绝将上述某个人物的调查材料全部公开。因此，我们没有可能准确地证明他们的罪行属实与否。但今天我们已经得到的证据足以表明，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关于他们完全无罪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

叶努基泽 1934 年 12 月 1 日签署的指示

赫鲁晓夫：谢·米·基洛夫被残忍地杀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和肆无忌惮地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行动。1934 年 12 月 1 日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没有政治局决议，直到两天之后，才以询问方式办理了决定通过的手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努基泽签署了下列决定。^①

这一看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向党代会代表抱怨，决定是由政府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而不是党中央政治局签署的。但宪法没有任何关于类似问题应该由政治局决定的说法。因此，将决定草案交政治局研究缺乏合法依据。批准决定的签字人是米·伊·加里宁和阿·萨·叶努基泽——其相应的职务分别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书记。

赫鲁晓夫对决定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的那句话，没有做任何扩展。在文件的草案上，斯大林留下了一个批注：“同意颁布。”这意味着：决定草案曾呈报斯大林，以便征得他的同意在报刊上发表该决定。既然草案是在最后时刻呈送斯大林的，那么决定是出自他手的可能性极小。^②

在官方出版的“秘密报告”（1989 年）中也对有关决定问题进行了歪曲，其中说，“决定没有如苏联宪法所要求的那样，报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又是这类问题：出版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7-138.

② 从“沃尔科戈诺夫档案”中的影印件看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意公布决定并将决定转交给叶努基泽，叶努基泽签字的日期是 1934 年 12 月 2 日，那里重复出现了关于将决定交报刊发表的批注。

性。即使情况是这样的，这与斯大林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不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不负责该执委会的工作。赫鲁晓夫的不满主要是：政治局，即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事先表示赞同决定。但没有任何必要这样做。

对赫鲁晓夫因斯大林没有把决定提交政治局批准而表示不满的事实，某些研究人员提出了这样的解释：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时所使用的论点之一，是斯大林企图让党摆脱管理社会和国民经济的负担。从不同角度赞同这一看法的研究人员包括尤·尼·茹科夫、约翰·阿奇·格蒂、尤·伊·穆欣和本书的作者。

赫鲁晓夫暗示斯大林参与杀害基洛夫

赫鲁晓夫：应该说，与杀害基洛夫同志有关的情况，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这要求进行最细致的调查。有理由认为，负责保卫基洛夫的人中，某个人对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提供了帮助。在谋杀的前一个半月，尼古拉耶夫曾因可疑行为而被捕，但后来被释放，甚至没有对其进行搜查。最可疑的是，当1934年12月2日要对专门负责基洛夫安全的肃反人员进行审讯时，这个人却在汽车“事故”中丧生，而陪他一同来的人无一人伤亡。基洛夫被杀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被撤职，只受到很轻的处罚，但他们却在1937年被处决。可以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掩盖杀害基洛夫组织者的犯罪痕迹。^①

这里，赫鲁晓夫是指斯大林参与了谋杀基洛夫，虽然他没有明说。如格蒂所指出的那样，一些苏联时期和后苏联的委员会企图找到斯大林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证据，但一切都枉费心机。《恐怖之路》一书^②曾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该书作者格蒂和瑙莫夫得出的结论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与杀害基洛夫有任何关系。苏多普拉托夫也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斯大林参与了这一暗杀活动。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8.

^② J. Arch Getty and Oleg V.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41-147.

格蒂及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持有这样的意见，即斯大林“伪造”了对反对派的指控，以莫须有的参与杀害基洛夫罪起诉他们，并判处死刑。但有相当的证据证明，对杀害基洛夫案提起公诉，并非空穴来风。根据今天研究人员可以接触到的数量很少（其中可以公开的更少）的侦查档案，一方面我们已拥有部分审讯尼古拉耶夫的速记记录，在审讯中尼古拉耶夫指控包括科托雷诺夫在内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地下团伙参与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另一方面，也有在这之前一天对科托雷诺夫的审讯材料，在审讯中，他表示对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承担“政治和道德责任”。^①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 1936年9月25日发给政治局的电报

赫鲁晓夫：自1936年末，即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向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发了电报后，大规模的镇压突然加剧。该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显而易见，在执行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案件的任务中，亚戈达力不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所有党的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多数州的代表都在谈论这一问题。”

……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即在采取大镇压方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应当迅速“弥补所耽搁的时间”，是在直接怂恿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进行大规模逮捕和处决。^②

应当说，“斯大林的这一指示”与镇压没有任何关系，与大规模镇压更没有关系。该指示与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活动侦查工作进度有关。约翰·格蒂指出，斯大林“延误了四年”之说表明，时间不是从“留京行动纲领”（即1932年1月留京集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斯大林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ВЧК-ГПУ-ОГПУ-НКВД. Январь 1922 — декабрь 1936. — М.: МФД, 2003, док. № 481 и 482, с.575-577.

^②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8.

行动纲领——译者注)出现的日期,而是从1932年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集团成立之日起计算,而知道该集团成立的消息,不会早于1936年年中。^①正是这些情况的发现,成为笼罩在亚戈达身上的阴影和要求立即撤换他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理由。罗·特斯顿、马·扬森和尼·彼得罗夫赞同这种观点。^②

实际上,赫鲁晓夫对这一切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他在“秘密报告”中对此做了隐瞒。在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为赫鲁晓夫准备的讲话草稿中,直截了当地提到“四年”是从1932年(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建立之日算起。^③在草稿中,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还使用了“弥补所耽搁的时间”这样的词句。但这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斯大林并没有使用过这些词。不过,赫鲁晓夫还是用这些词武装了自己,只是对“四年”是指右派集团建立后已过去的时间沉默不语。在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没有使用集团一词,而延误了“四年”被解释为号召镇压。

很清楚,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所说的“耽搁的时间”是指,必须采取紧急侦讯措施,以揭露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活动以及该集团成员与外国政府代表的联系,查明他们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和进行恐怖活动(即暗杀活动)的情况。利用哈佛大学1980年公开的托洛茨基档案的研究资料,格蒂和著名学者、研究托洛茨基的专家皮埃尔·布鲁埃发现了可以证明这一集团存在的文献资料。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 (1937年)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所做的报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肃清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措施》,企图为大

-
- ① J.A.Getty.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1938.* (Cambridge: 1986), Chapter 5; О н ж е. *The Great Purges Reconsidered.* Unpub. PhD diss. Boston College, 1979, p.326.
- ② Robert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1934-1941.*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5; Marc Jansen, Nikita Petrov. *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5-1940.*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54.
- ③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125.

规模镇压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使用的是同样的借口：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似乎应越来越尖锐化。同时，斯大林坚定地认为，历史这样教导我们，列宁也是这样教导我们。^①

斯大林在那次全会的发言中，甚至连为大镇压寻找理论根据的暗示也没有。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讲话歪曲得面目全非。斯大林从来没有说过“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会更加尖锐化”。以下是斯大林在1937年3月3日第一次发言的真实内容：“我们向前迈进的步伐越大，我们的成就越大，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就会越加凶狠，他们更可能使用更加激烈的斗争方式，他们会更加祸害苏维埃国家，他们会更多地采取最冒险的斗争手段，即注定要灭亡的人的最后手段。应予指出的是，在苏联被击溃的阶级的残余并不孤立。他们得到了来自苏联境外的我们的敌人的直接支持。”^②

在之后的讲话中，斯大林要求在审理个人的案件时严格采取个案处理的态度；他要求开办政治教育学习班，而不是搞什么镇压、“恐怖”。至于说有“来自苏联境外的我们的敌人的直接支持”，斯大林是正确的。当时已发现大量外国间谍机构招募苏联公民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事实，全会之后的几个月中发现了更多的情况。

应当指出，斯大林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阶级斗争会更加尖锐的论点，是在1928年，而不是在1937年提出的。首次谈及这一问题是在七月全会（1928年）上。那次全会上，在涉及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反抗加剧时，斯大林做了重要解释：“这里所谈的是什么？完全不是说，我们越向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得越强大，资本家的反抗似乎就会更加厉害。所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资本家的反抗会加强。”（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③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9.

② И.В.Сталин. О недостатках партийной работы и мерах ликвидации троцкистских и иных двурушников. Доклад на Пленуме ЦК ВКП(б) 3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29 марта.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20.html>.

③ Неправленная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лина на объединённом Пленуме ЦК и ЦКК ВКП(б) 22 апреля 1929 г. //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В 5 томах. Том 4. Объединённый Пленум ЦК и ЦКК ВКП(б) 16—23 апреля 1929 г. — М.: МФД, 2000, с.655.

根·阿·博尔久戈夫和弗·亚·科兹洛夫指出，在1928年中央九月全会上，瓦列里安·古比雪夫的讲话对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激化的论题加以扩展。历史学家补充说：在四月全会上（1929年），布哈林对此是反对的，但他的讲话为两种解释留下了空间。他承认，在某些阶段，阶级斗争可能激化，他甚至同意，1929年正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又指出，这一原理本身不具有普遍性。

1937年3月5日，斯大林在二—三月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而这一讲话也不能被称为“大规模镇压的理论根据”。在该讲话中，斯大林毫不含糊地表示“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再次讲到同样的问题，公开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理问题的立场。他坚持认为，最多有几千名党员可以说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者，或者说，“大约有12000名党员不同程度地同情托洛茨基主义。这就是你们，托洛茨基分子先生们的全部人马”。^①

与号召搞“大规模镇压活动”相反，斯大林提出了一些反对这一政策的重要理由。尤里·茹科夫同意，斯大林的讲话非常温和。^② 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准备了一项决议案，该决议案被一致通过。但决议最终并没有成为公开的果实。

要求搞政治教育，而不是搞大规模镇压，这才是斯大林讲话的真谛。与赫鲁晓夫关于“大规模镇压”的捏造说法相反，斯大林要求扩大党内政治教育机关的网点，至少要能够对那些类似于可以参加中央全会的党的领袖们进行极为必要的培训。

斯大林坚持要求，每一个党的书记在其参加四个月的学习班培训——更多党的领导人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学习班——期间，应当为自己挑选能够承担领导责任的两名副手。

许多或大多数参加全会的人是联共（布）州、边疆区或共和国组织的第一书记。他们可能将这一计划理解为对自己地位的一种威胁。他们实际

^① И.В.Сталин.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Пленум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КП(б). 5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1 апреля.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8.html>.

^② Ю.Н.Жуков. *Иной Стал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СССР в 1933-1937 гг.* — М.: Вагриус, 2003, с.360 и далее.

上面临着未来接自己班的人。这种如同竞争高层党的职务的“赛事”，似乎为期不远。如果党的书记到学习班学习，谁能保证在培训结束时他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呢？

实际上，恰恰是第一书记们，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如我们所看到的，请求实行“大规模镇压”的政策。

而政治教育机关的学习班始终也未能办成。取而代之的是在之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第一书记们以惊心动魄的实例向斯大林诉说来自反革命分子和流放返回的富农们的威胁。书记们要求为他们提供判处极刑和将成千上万人发配到劳改营的特权。对此，以下还将详谈。

在二—三月全会期间，斯大林于1937年2月27日在布哈林和雷科夫案件调查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发言。但即使在这次发言中，斯大林也建议，判决要极为慎重。格蒂和瑙莫夫在研究了委员会的表决后指出，斯大林的建议是行政措施——流放。这是所有判决中最轻的。^①就所审理的案件做主报告的叶若夫以及布琼尼、马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和亚基尔都赞成“将布哈林和雷科夫送交法庭并处决”。

关于这一问题请详见弗·博布罗夫和伊·佩哈洛夫文章中对该问题的讨论，该文章对布哈林的遗孀安·米·拉琳娜回忆中的说法进行了研究，根据该说法，似乎是斯大林要求判处布哈林死刑，亚基尔坚决反对，即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完全相反。这一说法成为一篇反斯大林的“民间作品”，只要后苏联时代相应的文件不予公开，它就不会具有历史“事实”的地位。

总而言之，斯大林的三次讲话——比任何在其他全会上讲话的次数都多，没有一次提到赫鲁晓夫所说的“大规模镇压”，甚至连间接的提及也没有。

“许多中央委员怀疑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 特别是波斯特舍夫

赫鲁晓夫：在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

^① Getty, Naumov. PP.411-416.

中，实际上已经对在与“两面派”斗争的借口下所确定的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

这些怀疑最清楚地体现在波斯特舍夫同志的发言中。他说：“我曾认为，尖锐斗争的年代已经过去，腐化堕落的党员已被击败或转向敌方，健康的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年代、集体化年代，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这样的严峻时期之后，卡尔波夫及诸如此类的人会跑到敌人的阵营（卡尔波夫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波斯特舍夫对他很了解）。而根据口供，似乎自1934年他就被托洛茨基分子吸收为其组织的成员。我个人认为，一个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经历了长期的与敌人残酷斗争的正常的党员，在1934年进入敌人营垒是难以置信的。对此我不能相信……我无法想象，和党一起度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靠托洛茨基分子。这有点奇怪……”（会场骚动）^①

1990年代中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二—三月全会（1937年）的速记记录终于出版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亲眼看到和确信，摘录的波斯特舍夫的发言是真的，而赫鲁晓夫评论却是谎言。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他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似乎“在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中，实际上已经对……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但实际上，在全会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发言。甚至波斯特舍夫也没有发表类似的想法！在赫鲁晓夫引用的段落之后，波斯特舍夫要求将卡尔波夫和所有他认为已加入敌人行列的人送交法庭。

事实上，波斯特舍夫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最心狠手辣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将大量党员开除党籍，在1938年的一月全会上，波斯特舍夫被免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格蒂与瑙莫夫详细地描述了波斯特舍夫在全会上如何因其搞过度镇压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警惕性超乎寻常的波斯特舍夫成为为结束党内镇压而采取措施的牺牲品”。^②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9-140.

② Getty, Naumov. P.517; cf 533ff. Документ,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й исключение Постышева и его арест см.: там же. PP.514-516.

尤里·茹科夫在自己的分析中同意，在一月全会上（1938年），为制止第一书记们领导下进行的非法镇压，斯大林领导层又采取了一次尝试。证明波斯特舍夫由于大规模镇压无辜者而被赶出政治局和被抓捕的文件，已在格蒂和瑙莫夫的书日公布。^①

赫鲁晓夫参加了一月全会（1938年）的工作，当然，他对波斯特舍夫此后的命运和解除他职务的真正原因一清二楚。赫鲁晓夫不可能不知道，“许多中央委员”根本没有对“……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提出怀疑”。在二—三月全会上（1937年），赫鲁晓夫本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表示真诚地拥护镇压政策。

不仅如此，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自己在波斯特舍夫之后占据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空缺位置。^② 根据格蒂和瑙莫夫的看法，赫鲁晓夫是“最激烈反对波斯特舍夫”的人之一。^③

当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撒谎了。因为，波斯特舍夫不仅没有对大镇压政策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而且是该政策最无耻的执行者。恰恰是波斯特舍夫成为因实行大镇压政策而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很快被开除党籍，而后又被抓捕的第一人。现在可以接触到的一月全会（1938年）的部分速记记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一月全会不久，波斯特舍夫被逮捕；他对参与“右派”阴谋活动供认不讳，还说出了许多参与阴谋的人，包括其他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

根据作家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的话，波斯特舍夫在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场的情况下承认自己的供词是真实的。

以上引用的文件，虽只是至今尚没有全部解密的文献资料中已公开的一小部分，但已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对波斯特舍夫进行逮捕和审判是正确的。

波斯特舍夫被捕一年多之后，被处决。已经知道，对波斯特舍夫的侦查档案有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有整理成文的该案审判速记记录。实际上，至今俄罗斯政府还没有对这一切解密。

① Getty, Naumov. P.517; cf 533ff. Документ,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й исключение Постышева и его арест см.: там же. PP.514-516.

②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М.: АИРО - XX, 1995, с.167.

③ Getty, Naumov. PP.512.

文献资料

叶努基泽 1934 年 12 月 1 日签署的指示

官方出版的“秘密报告”（1989 年）在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这个指示进行了歪曲解释：

“这里所说的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4 年 12 月 1 日‘关于对策划或执行恐怖行动案件的管辖制度’决议，后来该决议被称为‘1934 年 12 月 1 日决定’，在 1956 年之前是有效的。该决定没有如宪法要求的那样提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①

赫鲁晓夫暗示斯大林参与杀害基洛夫

多数作者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杀害谢·米·基洛夫案件的解释。比如，我们在帕·阿·苏多普拉多夫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

“没有文件和证据证实斯大林或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参与了谋杀基洛夫……基洛夫不是取代斯大林的不可或缺的人选。他是坚定的斯大林分子之一。赫鲁晓夫的说法后来被戈尔巴乔夫赞同和接受，并成为反斯大林运动的一部分。”^②

当代俄罗斯关于基洛夫谋杀案的最权威的研究人员阿拉·基里林娜证实：

“今天，在所谓多元化放任自流的条件下，出现了一些文章，其作者随意地找来一些资料，而不愿下功夫去弄清 1934 年 12 月 1 日发生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目的是再次宣称，‘斯大林是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而与此同时，他们既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间接证据，他们利用的只是些无稽之谈、臆想和编造。”^③

约翰·阿奇·格蒂曾参加了关于杀害基洛夫问题的辩论，他在 H-RUSSIA 科学院论坛（2000 年 8 月 24 日）上指出：

“几十年中对杀害基洛夫的事件进行了三次，或可以说是四次标志性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прим.11 на с.167.

② П.А.Судоплатов.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 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 М.: 1996, с. 60-61.

③ А.Кирилин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Киров.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с.304.

（‘蓝丝带’）的侦查，每一次都是根据总书记的委托，并都是按地道的苏联传统，即要求从做出的结论入手：斯大林试图将罪责嫁祸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而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则想嫁祸于斯大林。他们所有的人，都相应地挑选合适的研究人员。从我有幸接触到的有着这类目的的档案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得到所要求的结论。比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位时采取的一些做法，包括彻底梳理档案和采访记录，但这些对于做出斯大林参与谋杀的结论是不够的。斯大林努力的目标当然是想证实谋杀是反对派所为，而正是这些充当了莫斯科审判的依据。但如果不算被告本人不可信的供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加强此前提出的结论。”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 1936 年 9 月 25 日发给政治局的电报

以下是电报全文，而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只引用了一小段：

斯大林、日丹诺夫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1936 年 9 月 25 日

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第一，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显而易见，在执行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案件的任务中，亚戈达力不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所有党的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多数州的代表都在谈论这一问题。阿格拉诺夫可以留任叶若夫的副手。

第二，认为有必要立即撤销雷科夫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亚戈达担任邮电人民委员职务。我们认为，无须为这件事情寻找依据，因为它是清楚的。

第三，认为撤销洛博夫和任命北方边疆区委书记伊万诺夫同志为林业人民委员刻不容缓。伊万诺夫熟悉林业，他是一个干练的人。洛博夫作为人民委员，对其工作不能胜任，每年他的工作都是以失败告终。建议洛博夫留任林业人民委员伊万诺夫的第一副人民委员。

第四，至于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则可以让叶若夫兼任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主席，但其90%的时间应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中叶若夫的第一副主席，可推荐雅科夫列夫·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担任。

第五，叶若夫同意我们的提议。

斯大林 日丹诺夫

№ 44 1936年9月25日

第六，自然，叶若夫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①

在对所引用的文件进行评论时，罗伯特·特斯頓写道：

“所引用的‘四年’是指什么？西方作者通常的答复是‘留京行动纲领’。但在1936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中，叶若夫再次提到‘1932年末并形成以恐怖活动为基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②

叶若夫传的作者扬森和彼得罗夫指出：

“‘四年’是指，1932年已建立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而其被揭露，不会早于1936年的六七月……”^③

在波斯佩洛夫起草的“秘密报告”草案中，也引用了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电报，但电报原件中并没有“弥补所耽搁的时间”这句话。

“大规模镇压始于1936年秋，即当叶若夫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和斯大林下达指示，即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方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应该通过大镇压‘弥补所耽搁的时间’。”^④

关于“弥补所耽搁的时间”的必要性，在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即在采取大镇压措施方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

① *Сталин и Каганович. Переписка 1931-1936 гг.* — М.: РОССПЭН, 2001, док. № 827, с. 682-683. См. также: <http://www.idf.ru/6/49.shtml>.

② Thurston. P.35. Цитата взята автором из архива, см. п.83 р.244. Близкий по смыслу отрывок из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Ежова, но без приведённой Тэрстоном цитаты,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 № 1. С.5-6.

③ Jansen, Petrov. P.54.

④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С.125.

延误了四年’，应当迅速‘弥补所耽搁的时间’，是在直接怂恿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进行大规模逮捕和处决。”^①

斯大林在二 - 三月联共（布）中央全会（1937年）上的讲话

列宁确实说过与斯大林在1928~1929年的某些讲话非常相似的话，即消灭阶级是一项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在资本家政权被推翻后，在资产阶级国家被粉碎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不会（如老牌社会主义和老社会民主党庸人所想象的那样）消失，而只是改变了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②

在二 - 三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1937年），斯大林做了报告，赫鲁晓夫曾提到了该报告的名字。但斯大林在其讲话中根本没有说过，“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迈进，阶级斗争会尖锐化”。理查德·科索拉波夫对“秘密报告”歪曲事实做了这样的评论：

“实际上，这一被无休止重复的所谓的‘斯大林的论点’，无论在斯大林的报告中，还是在闭幕词中，都没有出现过。正确的是，斯大林指出‘摧毁和摒弃下述腐朽的理论’的必要性，‘即我们每前进一步，阶级斗争似乎会越来越平息，由于我们取得的成就，阶级敌人会越来越温顺’。斯大林强调的是，‘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范围内有影响，那么它的另一端就会伸向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境内’。但在1930年代下半期，即当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占据了绝对优势和社会主义宪法通过后，他没有提出过‘尖锐化理论’……”^③

赫鲁晓夫在指责斯大林说“阶级斗争会尖锐化”时，所指的正是斯大林下面的这一段讲话：

有必要摧毁和摒弃下述腐朽的理论，即我们每前进一步，阶级斗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ВЧК-ГПУ-ОГПУ-НКВД. Январь 1922 — декабрь 1936. — М.: МФД, 2003, док. № 481 и 482, с.575-577.

② В.И.Ленин. Привет венгерским рабочим. 27 мая 1919 г. // Ленин. ЛСС. Т. 38, с.387.

③ Р.И.Косолапов. Уверенно торить тропу в будущее. Доклад «О решениях XX и XXII съездов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2003). См.: <http://www.cca.ru/~shenin/news/news20.htm>.

争似乎会越来越平息，由于我们取得的成就，阶级敌人会越来越温顺。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会麻痹我们的人们，让他们陷入套圈，为阶级敌人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提供东山再起的机会。

相反，我们向前迈进的步伐越大，我们的成就越大，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就会越加凶狠，他们更可能使用更加激烈的斗争方式，他们会更加祸害苏维埃国家，他们会更多地采取最冒险的斗争手段，即注定要灭亡的人的最后手段。……

历史这样教导我们。列宁主义这样教导我们。^①

斯大林坚持，每一个党的书记在他参加政治教育学习班期间，应该为自己挑选能够承担领导责任的两名副手，提高这些指挥干部思想水平和在政治上锻炼他们，为这一队伍注入有待于提升的新生力量，从而扩充领导干部成员——这就是任务。

为此要求做什么？

首先有必要建议我们党的领导人——从支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党组织书记，在一定的时期内为自己挑选两个人，两个能成为他们的副手的党的工作人员。有人会说，从哪里找这样的人，每一个人挑两个副手，而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没有适合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同志们。我们拥有成千上万有能力的人、有才干的人。只是要了解他们和及时提拔他们，不要让他们待在老地方不动和得过且过。要找肯定会找到的。

为了对党的支部书记组织学习和培训，必须在每一个州的中心开办四个月的“党的学习班”，应派遣所有基层的党组织（支部）书记到学习班学习，而之后，在学习班结束和返回工作岗位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和最有能力的基层党组织成员参加学习班。

这之后，为对区党组织进行政治培训，有必要在全苏十个最重要

^① И.В.Сталин. О недостатках партийной работы и мерах ликвидации троцкистских и иных двурушников. Доклад на Пленуме ЦК ВКП(б) 3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29 марта.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20.html>.

的中心开办为期八个月的“列宁学习班”，派遣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参加这样的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和返回工作岗位后，再让他们的副职和最有能力的区党组织成员参加学习班。

接着，为对市党组织书记进行思想培训和政治进修，应在联共（布）中央开办为期六个月的“历史和政党学习班”。应派遣市党组织第一书记或第二书记参加学习班，学习班结业和返回工作岗位后，再派最有能力的市党组织成员参加学习班。

最后，有必要在联共（布）中央举办为期六个月的“内外政策问题讨论会议”。应派遣州、边疆区党组织和民族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参加该会议。这些同志应提出几个而不是一个可以替换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接班人。这是必要的，而且这也应该能做到。^①

3月5日，斯大林做了另一个报告，再次回到同一个问题，反对笼而统之和大规模解决问题的态度：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党的某些同志对党的个别成员的命运、对党员被开除党籍问题或恢复被开除党籍者的党员权利问题的形式主义和冷若冰霜的官僚主义态度。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某些领导人，缺乏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的关怀。不仅如此，他们对党员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是怎样成长的，完全不了解党的工作人员。正是由于在评价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时没有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通常盲目行动：或不加区别、没有分寸地夸奖他们；或同样不加区别地随意对他们进行迫害，将成千上万的人开除党籍。这样的领导人总是在努力考虑几万人的事情，而不关注“个别人”，不关注“个别党员”，不关注他们的命运。他们认为，将成千上万的人开除党籍是小事一桩，并自我安慰：我们的党有200万人，几万人被开除党籍对我们党的状况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实

^① И.В.Сталин. О недостатках партийной работы и мерах ликвидации троцкистских и иных двурушников. Доклад на Пленуме ЦК ВКП(б) 3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29 марта.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20.html>.

际上，只有骨子里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①

在《鲜为人知的斯大林》一书中，尤·茹科夫引用了二—三月全会（1937年）决议并进行了评论：

“与闭幕词一样，对斯大林报告的决议也与号召‘迫害异己’毫不相干。全会参加者一致通过了决议，如多年习以为常的那样没有任何意见和补充。‘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的叛徒和间谍破坏活动’的说法，仅出现过一次，而且是在序言中，是作为查清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工作中存在严重缺点的依据。

决议突出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1）党组织全神贯注于经济工作，脱离了党的政治领导，‘压制地方农业人民委员部机关，越俎代庖，变成了狭隘的经济工作人员’。

（2）‘从党的政治工作转向经济运动，首先是农业生产运动。我们的党的领导人开始不知不觉地将其工作的基础从市转向州。他们开始不是将城市及其工人阶级视为一个州的政治、文化领导力量，而是一个州的许多部分之一。’

（3）‘我们的党的领导人开始丧失对思想工作、对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和非党群众的兴趣。’

（4）‘开始对批评我们的缺点以及党的领导人的自我批评失去兴趣……’

（5）‘同样，也开始脱离对党员群众理应承担的责任……竟然用增补取代选举制……因此形成了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6）决议强调说，在人事工作中‘不应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方式对待工作人员，而要实事求是，即首先从政治角度看（他们是否值得在政治方面得到信任）；其次，是从工作角度考虑（他们是否适合为他们安排的工作）’。

（7）党组织领导人‘缺乏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应有的关怀……由于对人、对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的这种冷酷无情的态度，人为地在党的一部分人员中制造了不满和愤恨’。

（8）最后，决议指出，尽管缺乏修养，党的领导人却不愿意为提高自

^① И.В.Сталин.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Пленум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КП(б). 5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1 апреля.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4-8.html>.

己的水平而学习和参加再培训。

所以，很自然，决议中提出，要求立即消除党的工作中真正的缺点。第1点至第8点，谴责党对经济机构越俎代庖的做法；立即恢复专门的党的政治工作，首先是将工作转向城市；对报刊予以特别的关注。第9点至第14点，坚决摒弃‘将州委、边疆区委、市委全会和党的代表会议和市积极分子会议等变为装点门面的聚会和大张旗鼓地对领袖的歌颂’；恢复党的机关向全会的报告制度，制止党组织增补的做法。第15点至第18点，谈到了原则上新的干部工作的方式，而第19点至第25点是关于党的领导人的学习和培训问题。”^①

1937年2月27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布哈林和雷科夫案件委员会的工作做了总结发言。^②格蒂和瑙莫夫就该发言写道：

“对于斯大林来说，由他自己发言做类似专题讲话非常不同寻常；在历史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样做。讲话的文本实际上暗含着对速记记录的解读：文本的任何速记报告版本都没有公布过，也没有随全会其他材料转交党的档案馆……在大幅度修改的专门为小范围人员准备的速记报告中，对这一充满疑问和矛盾的关于布哈林的决议也没有任何反映。该速记报告指出，全会是从2月27日开始工作，即比实际上召开的时间晚了四天。”^③

“许多中央委员怀疑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特别是波斯特舍夫

以下是波斯特舍夫在二—三月全会（1937年）讲话的真实内容，在他的发言中，没有对斯大林提出任何怀疑，更不要说进行含沙射影的批评了。

“我已经几次谈到自己在基辅州党委工作中的错误。我本人是怎样未能发现与我非常亲近的一些人……为什么与他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我却

没有发现他们？

……比如卡尔波夫，我非常信任他。在十年中，卡尔波夫一直在做党

^① Юрий Жуков. *Иной Стал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СССР в 1933-1937 гг.* — М.: Вагриус, 2003, с.360-363 и прим. на с. 506 со ссылкой на архив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2 Д. 612. Вып. III. Л. 49 об.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талина с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 1. С.12-13.

^③ Getty, Naumov. P.411.

的工作。我把他带到乌克兰是因为他是一个老的乌克兰工作人员，掌握乌克兰语，了解乌克兰。他出生在乌克兰并曾一直生活在乌克兰。不仅我，还有其他很多同志都知道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是什么让我误入歧途？1923~1924年，我亲眼看到卡尔波夫与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在基辅他也进行了斗争……我曾认为：尖锐斗争的年代已经过去，有这样的一些转折，在这些转折时刻，一些人或面目全非，或站稳了脚跟，或转向敌方。这是工业化年代，集体化年代，不管怎么说，在那样的时期，党与敌人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经历了所有这些时期之后却加入了敌人的营垒。而现在已经清楚，他自1934年就落入敌人的魔掌，成为敌人。当然，对此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我个人认为，一个坚定不移地经历了长期与敌人残酷斗争道路的人，在1934年进入敌人营垒是难以置信的。对此我不能相信（莫洛托夫：很难相信，他只是在1934年才成为敌人？大概，在这之前他已经是敌人了）。当然，以前已经是敌人。我无法想象，和党一起度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靠托洛茨基分子。这有点奇怪。一直存在着令他不安的某种理念。而这一理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1926年，还是1924年，1930年，很难说。但显而易见，存在着某种使他不安的理念，并对他产生了某种影响，使他落入敌人的营垒。”（所标出的部分，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作了引证——作者注）^①

波斯特舍夫的表现，证明他是最心狠手辣的党的领导人之一。由于毫无根据地将大量党员开除党籍，1938年一月全会解除了波斯特舍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对此，格蒂和瑙莫夫是这样写的：

“在1938年一月全会上，马林科夫做了主旨报告。他说，第一书记们匆匆签字的甚至不是‘三人小组’定罪的人员名单，而仅仅是一个指出犯罪人员数量的两行字清单。他公开指控古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帕·彼·波斯特舍夫：您把整个党和苏维埃机构都关了起来！对此，波斯特舍夫以同

^① Речь Постышева на Пленум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 № 5-6. С.3-8. См. также: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postyshevspmar0437.pdf>. Довольно жёсткая речь Хрущёва на том же Пленуме: *там же*. 1995, №8. С.19-25. См. также: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khrushchevspmar0537.pdf>.

样的语气予以答复：只要所有敌人和间谍没有被消灭干净，我过去抓人，现在抓人，今后还要抓人！但他陷入了危险的孤立处境：这场辩论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解除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会议参加者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辩护。”^①

瓦吉姆·罗戈温，是对一月全会（1938年）速记记录摘要进行分析的研究人员之一，他这样写道：

“波斯特舍夫：那里（古比雪夫州）的党和苏维埃领导，从州领导到区领导都是敌人。

米高扬：都是？

波斯特舍夫：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计算过，看来，敌人已隐藏了12年。在苏维埃系统也一样：隐藏着敌对的领导人。他们藏而不露并挑选了自己的干部队伍。比如，我们的州执委会连技术人员都是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承认自己进行破坏工作，而且恬不知耻。从州执委会主席到他的副职、顾问和秘书，都是敌人。州执委会所有的科室绝对都被敌人占据了……现在再看区执委会主席，也都是敌人。60个区执委会主席，全部是敌人。绝大多数第二书记，我还没有说第一书记，是敌人，不单单是敌人，那里还隐藏着间谍：波兰人，拉脱维亚人，不管什么乌七八糟的坏蛋，他们都要……

布尔加宁：那里至少还会有诚实的人吧？……这么说，一个诚实的人也没有。

波斯特舍夫：我说的是领导人。领导人中，区委书记和区执委会主席中几乎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你们为什么感到惊讶？

莫洛托夫：您是否夸大其词了，波斯特舍夫同志？

波斯特舍夫：不是，我没有夸大。现在再看看州执委会。人已经在牢狱中。有材料，他们认罪，是他们自己交代了他们的敌对活动和间谍活动。

莫洛托夫：对材料应进行核实。

米高扬：这么说，在基层，所有区委里的人都是敌人……

贝利亚：区委全体成员都是敌人？

^① Жупел Сталина. Беседа журналис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абова с историком Юрием Жуковым. Часть 7.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19 ноября.

卡冈诺维奇：没有这样的道理：所有人都是骗子。”^①

以下是斯大林对波斯特舍夫行为的评价：

“这是在处决组织。他们对自己是宽容的，而却要处决区级组织……这意味着发动党员群众反对中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②

根据作家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的说法，波斯特舍夫曾向莫洛托夫证实了自己的供词：

“我（指卡尔波夫——译者注）与莫洛托夫在他的别墅进行的交谈中，话题曾涉及镇压问题。有一次我问：

——难道您没有产生过疑问，要知道，对逮捕的那些人的工作情况，在革命前，之后是在国内战争中，您都有很好的了解？

——产生过疑问。有一次，我对斯大林讲了自己的怀疑。他的答复是：‘请您到卢比扬卡去看看，自己核查一次，与伏罗希洛夫一块儿去。’此时，伏罗希洛夫正好在办公室。我们立即出发了。那些日子，正好我们对逮捕波斯特舍夫有一些新的困惑不解。我们到了叶若夫那里。他指示拿出波斯特舍夫的案件卷宗。我们看了审讯记录。波斯特舍夫承认自己犯罪。我对叶若夫说：‘我想与波斯特舍夫本人谈谈。’于是他被带了出来。他面色苍白，消瘦了，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沮丧的样子。我问他，审讯记录上关于他的供词写的是否正确？他回答说，正确。我又问：‘这意味着，您承认自己有罪？’他沉默了一会儿，有点儿不乐意地回答说：‘既然签字了，就意味着承认，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自己亲口说了，我们还怎么能不相信呢？”^③

1938年1月31日，安德烈耶夫就波斯特舍夫目无法纪的问题写信给斯大林：

“……

(2) 8月以来，约3000人被开除党籍，相当一部分人被没有任何根据

① В.З.Роговин.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 М.: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97, гл. 2, см.: <http://trst.narod.ru/rogovin/t5/iii.htm>. Более полная версия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postyshev0138.pdf>.

②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С.164.

③ В.В.Карпов. *Маршал Жуков, его соратники и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и мира*. Книга I. Гл. 6,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См.: <http://militera.lib.ru/bio/karpov/06.html>

地以人民公敌，或敌人的共犯被开除党籍。在州委会全体会议上，区委书记列举事实说明，波斯特舍夫如何直接为镇压行为推波助澜，并要求他们开除和逮捕诚实的共产党人：或因为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对州委领导进行了轻微的批评，或没有任何根据。总而言之，整个基调由州委定。

(3) 因为所有这些案件看起来有相当大的挑衅性，不得不逮捕州委和市委中几个最可疑和肆无忌惮搞过火行动的人，包括原第二书记非利蒙诺夫、州委工作人员西罗京斯基、阿拉京、福缅科等。在前几次审讯中，他们都承认，在此之前，他们是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组织的参与者。他们聚集在波斯特舍夫周围并得到他的充分信任，进行了解散党组织和大批开除党员的对组织的破坏和挑衅行动。不得不逮捕帕什科夫斯基——波斯特舍夫的助理。他承认，他隐瞒了过去曾是社会党人以及1933年在基辅曾被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组织招募的事实，而且，显而易见，他是波兰间谍。他是波斯特舍夫圈子中的人，是积极参与在古比雪夫对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人之一。为揭露该反革命集团，我们正在加速审理这些案件。

(4) 自6月选举后没有举行一次州委全体会议，州委干脆禁止古比雪夫区委举行全体会议，也没有举行积极分子会议。”^①

^①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8-1941 гг.* / Сост. А.В.Квашонкин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387.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исьма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andreevpostyshev0138.pdf>.

第四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的“案件” 和与此有关的问题

罗·因·埃赫案

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一系列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伪造案件。

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之一、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就是无耻挑拨、恶意伪造、对革命法制不可容忍的破坏的例证。^①（会场骚动）

接着，赫鲁晓夫引用了一系列有关埃赫案件的文件，其中包括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件片断。这一信件确实存在（实际上是申诉声明）。埃赫在信中谈到了自己亲身体会到的非法侦讯手段。^②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埃赫说法的真实性，即侦查人员为了让他承认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拷打了他；但同时也没有理由只“听其言”就完全相信他所写的一切。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0.

② Письмо Р.И.Эйхе И.В.Сталину от 27 октября 1939 год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225-229.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也引证了埃赫的信。但没有列举任何证据证明他所做的辩解或他无罪的真实性的。委员会将所做的全部“调查”总结为一句不容置疑的话：“现在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是伪造的。”^①

这里正好应提一提某些真实情况，它们是人所共知的，或应该是人所共知的。

如果对某个人进行了拷打和刑讯，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一定无罪；如果通过刑讯逼迫某个人提供了假供词，也不意味着，他没有其他的犯罪活动；最后，如果某个人断言，为了骗取假口供，殴打、折磨和恐吓了他，这也不意味着，用刑后的口供，即这个人真的被残酷拷打和通过这一方式取得的供词就一定是伪造的。当然，这类供词存在的可能性完全不意味着，我们要使用谎言。

一句话，不能用某个人某些说法代替历史证据。只利用埃赫的一封信，还远远不能确定某种东西的真实性，其中包括，他实际上是否真的被拷打过。

比如在1940年法庭速记记录的一段文字中叶若夫称，为了从他那得到假供，他曾被残酷折磨。尽管如此，叶若夫在制造假供词、殴打、刑讯、制造假案和判处许多无辜的人死刑方面的罪行则无可置疑。

写给斯大林的信件只是有关埃赫真实情况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清楚整体情况。这是因为，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而之后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都认为公开埃赫案件材料或哪怕只让研究人员接触这些材料，都是不合适的。

有可靠证据证明，恰恰是埃赫，为其他第一书记（首先是为自己）获得将成千上万的人处决，或把他们中的多数发配到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缩略语——译者注）的镇压特权开了“绿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向二十大代表讲述的令他义愤填膺的大规模镇压，实际上正是埃赫发动的。恰好应在这里说的是，事情发展的方案之一（既符合尤里·茹科夫的研究结论，也与不久前公布的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一致）是，如果有朝一日斯大林突然拒绝满足书记们提出的要求，那么在工作上与第一书记们有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Март 1953 — февраль 1956.* — М.: МФД, 2000, с.328.

密切联系的叶若夫，甚至能够做出逮捕和枪杀斯大林的举措。

2006年初出版了一本很厚的文件汇编，其中公布了对叶若夫和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副职米·彼·弗里诺夫斯基侦讯案的档案材料（每个案件一份文件）。^① 根据这些材料，他们都承认参与了右派阴谋活动，参与者还有尼·伊·布哈林，阿·伊·雷科夫和叶若夫的前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亨·格·亚戈达。比如，弗里诺夫斯基向贝利亚递交的声明中，在主要的右派阴谋者之中，他提到了叶·格·叶夫多基莫夫、叶若夫以及亚戈达。他还专门提到了埃赫，说有一天埃赫曾到叶夫多基莫夫那里；在声明的另一处，还写了埃赫与叶夫多基莫夫和叶若夫的会见。^② 这里我们请大家注意的是，叶夫多基莫夫与叶若夫关系极为密切；1940年2月，他们一起被起诉、判罪和处决。显而易见，弗里诺夫斯基怀疑埃赫与叶若夫、叶夫多基莫夫和其他人参与了右派阴谋集团。

甚至在没有公布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时，尤里·茹科夫的猜测就以最好的方式解释了已知的事实，而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补充了一系列细节。

弗里诺夫斯基在声明中确认存在着遍布全苏联的大规模的右派阴谋集团。比如，向弗里诺夫斯基描绘了1934年这一阴谋轮廓的叶夫多基莫夫曾说，当时，右派组织已在全苏联范围内发展了大量党的领导人。^③ 而正是这些人后来被送交法庭审判并被处决。但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们都是根据斯大林编造的指控而被处决的。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有助于说明，指控并非凭空编造。

叶夫多基莫夫强调，现在有必要开始吸收层次较低的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农庄庄员，以便掌控不断壮大的起义队伍，而根据右派的意图，起义应成为有组织的运动，并在国家政变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④

从扬森和彼得罗夫掌握的文件——这些文件后来又被重新定为密件，可以得出结论，埃赫干预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案件，要求逮捕该“机关”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1939 — март 1946.* — М.: МФД, 2006, док. № 37 на с.52-72 и док. № 33 на с.33-50.

② Один из таких визитов к Ежову вместе с Евдокимовым Эйхе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в своём письме к Сталину от 27 октября 1938 года. См.: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С.228.

③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38.

④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38.

还没有掌握任何罪证的一些人员。^① 而叶若夫自己则指示其下属不要妨碍埃赫，而是与他合作。所有这些情况与弗里诺夫斯基在其声明中谈到的自己的工作 and 叶若夫的工作是相符合的：杀害无辜的人，编造反对他们的假罪状，其唯一目的是，在与臆造的阴谋斗争的幌子下，掩盖他们自己真实的阴谋计划。

茹科夫认为，埃赫和其他第一书记的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地阻碍拟于1937年12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有竞争性的差额选举，^② 包括利用关于存在着特别危险的反对派阴谋的声明。他们自己对此是否相信，并不重要，但在十月中央全会上（1937年），他们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施压成功，迫使他们放弃了实行差额选举的念头。

对斯大林的壓力还来自另一方。主管宪法工作和选举问题并与斯大林关系最密切的人员之一雅·阿·雅科夫列夫于1937年10月12日被抓捕。直到2004年^③才公开的雅科夫列夫坦白材料中，他承认，自列宁逝世后，他就参与了托洛茨基的地下活动，并通过德国间谍中介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④

看到如此大量的证据证明存在着苏联政府、党和武装力量高层人员参与的、现实的和特别危险的阴谋活动，斯大林和政治局无论如何也不能对第一书记们的强烈要求，即应该对威胁国家和他们所有人的危险展开全方位斗争的要求置之不理。

有意思的是，埃赫与叶若夫及其助手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判刑和处决的。产生了一个问题，情况是否会是这样：在法庭上提出的对埃赫指控的基础是他与前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暗中勾结，其目的是诋毁，可能还包括残酷拷打和消灭无辜的人？如飞机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在其回忆录中所指出的：斯大林说过，叶若夫被处决是因为他“杀害了许多无辜的

① M.Jansen, N.Petrov. *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5-1940*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91. См.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лаве, где процитирова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книги.

② 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一个代表的名额应有两三个候选人，候选人不仅应从联共（布）中推举，也应从全苏社会组织中推举。如茹科夫公布的1937年选票样票所证实的，样票是这样写的：“选票只留下您赞成的候选人的姓氏，勾掉其余人。”

③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1937-1938.* — М.: МФД, 2004, док. №226, с.387-395.

④ 同上，第394-395页。

人”。^① 而根据其他文件，对他做出的判决是因为他参与了反政府的阴谋和策划“反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② 不能排除埃赫是因为同样的罪行被送上法庭的。

1939年10月27日埃赫写给斯大林信件全文被附在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中。从信件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埃赫既被指控组织阴谋活动，又被指控与叶若夫密切合作。^③ 早些时候，扬森和彼得罗夫接触到的文献资料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埃赫与叶若夫的大镇压有高度的关联。

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埃赫关于为从他那里得到口供而利用侮辱和刑讯的说法，多半是可信的，因为在折磨他的人中，他提到了济·马·乌沙科夫和尼·加·尼古拉耶夫-茹里德。从独立的资料来源得知，所提到的这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人员参与了对被调查人员的残酷拷打，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他们在贝利亚时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尼古拉耶夫-茹里德于1939年10月25日被捕。埃赫写给斯大林的信件日期也是10月。根据法院的判决，尼古拉耶夫-茹里德于1940年2月4日被处决，即与叶若夫和埃赫在同一天被处决，乌沙科夫也是一样。

以上所述意味着，叶若夫和他的走卒企图相互转嫁罪责以逃避责任。这与弗里诺夫斯基在其报告中提到的叶若夫的活动情况相吻合，该报告对要求立即处决扎科夫斯基的那件事有详细的描述，其目的是消灭罪证和不让贝利亚有机会提审扎科夫斯基并从他那里了解，叶若夫在进行非法大规模镇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他积极参与右派阴谋活动的情况。^④

埃赫于1938年4月29日被捕，即距贝利亚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职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自然，也是在叶若夫担心贝利亚提审埃赫之前。根据已知的扬森和彼得罗夫手中掌握的文件判断，埃赫和叶若夫之间发生了某种争吵。根据从弗里诺夫斯基和其他来源得到的材料我们知道，叶若夫及其走卒通常是对他们自己逮捕的人搞刑讯，以便迫使他们提供自我揭发的供词，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罪。可惜，我们还不能查阅埃赫案中的其他文件，包括

① А.С.Яковлев. *Цель жизни*.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9, с.509.

② Б.Б.Брюханов, Е.Н.Шошков. *Оправданию не подлежит. Ежов и ежовщина. 1935-1938*. — СПб.: Петровский фонд, 1998, с.145.

③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С.229.

④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45.

1940年2月法庭对他审判的材料以及证人证词、物证、起诉书和关于他的案件的判决书。完全可以相信，埃赫侦讯案的档案是存在的，至少在赫鲁晓夫时代还保存着，因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附件引用过该案件中的资料。^①

所有侦讯材料中，只有唯一的一份文件解密，那就是埃赫写给斯大林的信。对这一案件的其余材料则守口如瓶，而且，无论赫鲁晓夫的讲话，还是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所引用的埃赫写给斯大林的信都不是完整的。埃赫在信中特别写道：“又一次因为被捕和被揭发的反革命分子叶若夫而遭到了毒打，叶若夫害了从来没有进行犯罪活动的我，我没有力气了。”^②

以上提到的内容，以及埃赫以下的话——“我的关于与叶若夫有反革命联系的供词，是我良心上的最不光彩的事”，被波斯佩洛夫报告删除了。

毫无疑问，埃赫深信叶若夫是反革命分子；在自己最初的供词中，他承认，在反革命活动方面与叶若夫有联系，但之后又翻供，将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叶若夫而非贝利亚。

而赫鲁晓夫则相反，企图将所有罪行加在贝利亚身上。由于埃赫揭露了叶若夫，所以，在“秘密报告”中，所有提到叶若夫的地方都被赫鲁晓夫删掉。如果在报告中出现了埃赫关于叶若夫是反革命分子的声明，那将会引发来自中央委员们的一些问题。而这里要指出，这些问题对于赫鲁晓夫将非常尴尬。不久前出版的审讯叶若夫的材料和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详细地谈到了叶若夫的阴谋活动和他针对完全无辜的人编造的指控材料。赫鲁晓夫和波斯佩洛夫隐瞒这些材料只是为了将所有罪恶嫁祸于斯大林和贝利亚。

当然，我们希望更好和更深入地了解埃赫案的情况，不过，我们现在从弗里诺夫斯基和叶若夫交代材料中找到的东西，与其他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

尼·伊·叶若夫

虽然我们打乱了“秘密报告”中提出问题的顺序，但恰恰在此处应

^①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С.229

^② 原文如此。

对赫鲁晓夫有关叶若夫的看法进行研究，因为这一题目与埃赫有密切联系。

赫鲁晓夫：我们指控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指控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比如，难道叶若夫可以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逮捕柯秀尔吗？关于这一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或有没有政治局的决议呢？不，如同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可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什么也不可能做。^①

2006年初出版的审讯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的材料，完全证实了叶若夫是在搞恶意刑讯，并杀害了许多完全没有任何犯罪活动的人。

他策划的这些大规模暴行，是为了掩盖其参与右派阴谋、充当德国军界间谍、策划谋杀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通过发动国家政变篡夺政权等活动。

这些交代材料是最近几年公开的文献中涉及我们感兴趣的题目的最具说服力的文件。就其内容而言，它们与赫鲁晓夫报告中的每一条看法都是矛盾的：叶若夫单独行动，并非受斯大林的“指使”；对军事领导的指控绝非虚构，而莫斯科的大审判完全不是场面动人的伪造（当然，赫鲁晓夫对此只是做了暗示）。

赫鲁晓夫及对他溜须拍马的波斯佩洛夫报告的撰写人和“平反”证明材料的作者们，掌握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但为什么在他们当时签署的文件中没有这样的材料呢？解释这一问题并不难：这些材料用不上，因为，只有隐瞒这些材料，才可以为“秘密报告”中提出的与真实情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结论制造根据。

产生了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叶若夫为什么要这么干？尤里·茹科夫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4.

认为，看来，叶若夫与许多第一书记（的观点）一致并与他们一起参与了阴谋活动。在地方上与第一书记密切合作的是叶若夫的同伙。

扬森和彼得罗夫在 1990 年代初得到的文件——他们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了这些文件——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局局长谢·瑙·米罗诺夫从叶若夫那里得到了指示，而根据这些指示，禁止他为埃赫设置障碍，甚至在埃赫坚持无根据地抓人和对侦查进行个人干预之时。^① 目前，那些与叶若夫同时被判刑的人的诉讼案审理速记记录还没有被解密，很可能，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其中包括埃赫）坐在被告席上和与叶若夫一同被判有罪，是由于他们杀害无辜。

不久前出版的弗里诺夫斯基和叶若夫的供词证实，叶若夫领导了右派阴谋活动，与德国军界勾结，其个人企图篡夺苏联政权。

所有这些情况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情况，赫鲁晓夫及其“研究人员”都可以接触到。在二十大开幕前两周，赫鲁晓夫还一直认为，叶若夫对其犯罪活动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只有斯大林一个人！^②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稍稍修正了自己的意见，但依然将叶若夫行为的责任归咎于斯大林。但斯大林认为，叶若夫应承担铸成错误的主要责任，而斯大林的结论与扬森和彼得罗夫在其书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完全符合。至少，俄罗斯人对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非常熟悉（以上刚刚引用过）。他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说过，叶若夫对剥夺许多无辜人的生命负有责任。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对费利克斯·丘耶夫说过类似的话。

解除叶若夫所担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的职务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39 年 4 月，叶若夫被捕并很快承认了自己在进行侦查活动中滥用权力的情况：严刑拷打、假造供词记录和非法处决。扬森和彼得罗夫依据研究人员再也无法接触到的文件，部分是 2006 年公布的材料，证明了滥用职权的规模和描绘了叶若夫及其下属犯罪的方法。没有一项证据证明，斯大林或中央领导企图将叶若夫的行径纳入指定的轨道，恰恰相反，有足够的证据使人相信，叶若夫的行为是预谋犯罪。

^① 见本章附件。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08-309. См. также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лаве.*

扬·埃·鲁祖塔克案

赫鲁晓夫：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做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他是1905年的党员，在沙皇时代曾服过十年苦役……他甚至没有被召唤到政治局见面，斯大林不愿意与他谈话……1955年进行的仔细核查表明，鲁祖塔克的案件是捏造的。对他判刑依据的是诬陷材料。鲁祖塔克已得到身后平反。^①

根据罗·安·鲁坚科出具的平反证明，鲁祖塔克实际上留下了其犯罪的书面供词。^②毫无疑问，这里指的是非常详细的供词，因为他交代的与他有阴谋活动联系的人“超过60个”（其中两次提到埃赫）。但在法庭上他否认了自己的供词，并称这些供词是“强迫”他做出的，因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还有没被根除的脓疮”。不过，鲁祖塔克只字未提刑讯问题，否则，签署平反证明书的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不会不指出这一情况。尽管有以上所讲的情况，在多年之后，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说，鲁祖塔克被迫亲身感受残酷拷打。^③

另一方面，已经知道许多指控鲁祖塔克的供词。而且，甚至在鲁坚科1955年12月24日的平反报告中，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无罪。相反，报告列举了其他许多受侦讯人的供词中揭发鲁祖塔克的一些事实证据。

非常清楚，如果证明犯罪的根据只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本人的坦白材料，那么认定某人对犯罪活动承担责任是存在很大疑问的。但是，由不同的侦查人员从不同被告得到的多次和独立的指控材料，在任何司法系统都会被认为是分量相当有力的证明。比如，在当代美国，对被告进行秘密勾结的指控，只能建立在可能是其同伙者供词的基础上。如果有勾结，对犯罪团伙其他成员进行的犯罪活动，他们所有人都应承担责任的。

与赫鲁晓夫的说法相反，在“平反”材料中缺乏任何证据证明鲁祖塔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2.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294-295.

③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9, с.484.

克无罪。那里提出的唯一“证据”是揭发他的供词相互矛盾。

知道的还有，鲁祖塔克不承认他此前的供词。但尚不能以任何方式肯定，他否认此前预审中所说的一切。

鲁坚科 1955 年做出的平反报告，是最完整地反映对鲁祖塔克所提出指控情况的文件。至于波斯佩洛夫的报告，仅仅谈及鲁祖塔克“领导了反苏的拉脱维亚民族主义组织，进行了破坏活动，是外国情报部门的间谍”。^①

“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不愿意听鲁祖塔克的解释。但无论鲁坚科的报告，还是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对斯大林不愿与鲁祖塔克谈话的事都只字未提。显而易见，这只是赫鲁晓夫自己臆造的。

大量事实被删除。比如，在平反材料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图哈切夫斯基，虽然，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同一个决议，鲁祖塔克因被怀疑参加“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活动”而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党籍。^②

所以，赫鲁晓夫撒谎了。如果连“平反”材料都不能拿出无罪指控的证据，赫鲁晓夫又能从何处得知鲁祖塔克是否有罪呢？显然，赫鲁晓夫之说是真相无法容忍的藐视：对自己实际并不了解的事情，他却如同了如指掌似地妄下断言。

我们现在已确切地知道，叶若夫如何与按他的指挥棒行动的下属一起，捏造了对成千上万人的指控。很可能，在鲁祖塔克案件中也有捏造的材料。即使叶若夫及其下属的侦查人员捏造了对鲁祖塔克的指控，即使鲁祖塔克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许多其他的侦查材料依然可以证明他确实有罪。

必须仔细研究那些年苏联侦查和司法机关掌握的所有证据和罪证，这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但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无法做到的。自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开始——显然这意味着更自由地接触档案，到今天为止，关于在 1936 年、1937 年和 1938 年著名的莫斯科公开诉讼中被指控犯罪人员的案件材料，只有很少一部分被解密。

^① 参：《*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с.328.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С.294-295.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Сост. О.Хлевнюк и др. — М.: АИРО - XX, с.156.

鲁祖塔克的案件也一样：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现在，还没有一份有关文件被公开。这本身就非常可疑，因为逮捕鲁祖塔克与图哈切夫斯基有直接关系。

鲁祖塔克是斯大林在 1937 年 6 月 2 日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中指控的参与军事-政治阴谋的人员之一。^① 但对鲁祖塔克的处决不会早于 1938 年 7 月 28 日，即在对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人集团进行审判一年多之后。这很可能是因为对所发生的事件做了长时间和认真的调查。可惜历史学家至今依然不被允许接触这一侦查案件的档案。

虽然没有本人的供词，但其他人的供词提出了对鲁祖塔克的指控。其名字经常出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文件中，即已经出版的《卢比扬卡：斯大林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文集中。

当然，这些并不能证明鲁祖塔克有罪，因为这些“叶若夫文件”都是在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职务时产生的供词，而我们有幸能够确认，这些材料的确出自那个年代，而且这些材料似乎与鲁祖塔克无罪的看法相矛盾，即不适合为他“恢复名誉”。

斯大林在这些文件^② 和其他文件上所做的个人批注表明，对呈送给他的通报，他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搞清楚一些事情，而绝没打算捏造些什么。很难想象，某个人会专门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留下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批注。

被告格·费·格林科、阿·帕·罗森果尔茨、尼·尼·克列斯京斯基在 1938 年的莫斯科诉讼中，多次提到了鲁祖塔克，并提供了许多关于他的详细可靠的供词。在 2006 年公布的其他供词中，塔马尔金交代了罗森果尔茨是右派托洛茨基阴谋活动的参与者，而罗森果尔茨则称，是鲁祖塔克将他吸收到该集团中的。^③ 根据克列斯京斯基的供词，鲁祖塔克是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莫洛托夫证实，鲁祖塔克曾抱怨受到嘲弄和拷打，但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不过，仍有不少指控他的证据。^④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 92, с. 202 и далее. О Рудзутаке см. с. 204-205.*

② 同上，第 537 页。

③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 84-90, 92-93.*

④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С. 483-485.*

亚·莫·罗森布吕姆的供词

赫鲁晓夫：罗森布吕姆是1906年入党的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逮捕。从他的供词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如何用人为了挑拨性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在1955年对科马罗夫案进行核实时，罗森布吕姆告知了以下事实：当他，罗森布吕姆1937年被捕后，遭到了残酷拷打，在此期间，从他那里诈取了关于他本人和其他人的假口供。之后将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扎科夫斯基提出可以释放他，条件是让他在法庭上提供关于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捏造的“列宁格勒破坏、间谍、颠覆、恐怖中心案”的假证。（会场骚动）扎科夫斯基以不可思议的无耻暴露了人为制造所谓“反苏阴谋”的卑鄙“方法”。

罗森布吕姆称：“为了看得更清楚，扎科夫斯基向我展示了该中心及其分支机构几个可能的活动方案图解。让我了解了这些示意图之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准备这个案件的材料，而且诉讼将是公开的。

将被送交法庭的‘中心’头目有四五个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泽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每一个分支机构还有两三个人……

列宁格勒中心案将相当可观，而这里证人是关键。其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以及证人的党龄亦有重要的作用。扎科夫斯基说，至于你本人，不用臆造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每一个分支机构撰写了一份现成的提纲，你的事情是背会和记住在法庭上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及答复。这一案件将准备四五个月，甚至半年。所有这段时间你都要准备，以便既不坑侦查人员，也不坑自己。而你今后的命运将取决于法庭审判的进程和结果。胆小或捅出篓子，只能怨自己；承受住了也就保住了脑袋瓜，我们将用公家的钱管你吃穿到死。”

请看，这就是当时的卑劣行径！（会场骚动）^①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2-143.

赫鲁晓夫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直接说，而是借助于暗示，固执地要造成一种斯大林参与了所说的一切的印象。实际上，今天已有的证据和赫鲁晓夫很久以前所掌握的证据都可以证明，扎科夫斯基是“与尼·伊·叶若夫关系最密切的助手之一”。^①

罗森布吕姆^②提交了扎科夫斯基假造侦查案的供词。1938年4月30日扎科夫斯基被捕，1938年8月29日被判处死刑。同年8月22日，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的第一副职。

如果罗森布吕姆讲的是真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扎科夫斯基未必敢在叶若夫不知道的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很清楚，后者曾卷入某个大的阴谋活动，而为了掩盖自己，以极秘密的方式制造了假案。所有这些都与扬森和彼得罗夫在他们的书中提供的有关叶若夫阴谋的资料是一致的，对此，以上已经提到。

第二，贝利亚，也可以说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的最亲密战友们，参与了侦查，最终揭穿和粉碎了这一阴谋。对于叶若夫的阴谋，斯大林和贝利亚进行了干预，但不是扩大阴谋活动的范围，而是消灭它。这与茹科夫的结论一致。

扬森和彼得罗夫列举了叶若夫1938年8月所说的话，即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在1938年8月处决扎科夫斯基。其目的就是不让任何人有机会与他见面，从而得到不利于叶若夫的证词。不久前（2006年2月）公布的弗里诺夫斯基1939年4月11日的声明，完全确认了这些资料。根据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和其他证据，扎科夫斯基与叶若夫属于同一个阴谋集团。在声明的另一部分，弗里诺夫斯基描述了他在1937年10月与叶若夫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叶若夫谈到扎科夫斯基时说，他“完全是我们的人”。而后，在1938年8月27~28日，叶若夫的“右手”叶夫多基莫夫曾请弗里诺夫

^① См. биографию Заковского в: К.А.Залесский. *Империя Сталина.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М.: Вече, 2000. См.: <http://www.hrono.ru/biograf/zakovski.html>

^② 关于亚·莫·罗森布吕姆：1937年被逮捕时任十月铁路局政治部主任。赫鲁晓夫报告中引用的不是刑事侦查材料，而是他1955年向苏共中央下属委员会提交的证词。

Речь идёт об А.М.Розенблюме. На дату ареста в 1937 году он занимал должность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итотдела Октябрьск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В докладе Хрущёв ссылается не на уголовно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а на показания Розенблюма, которые последний дал комиссии ЦК КПСС в 1955 году. См.: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С. 865.

斯基核查，扎科夫斯基是否还活着，亚戈达的人是否已被全部处决，因为在贝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后“对这些案件的侦查可能恢复，而这些案件对我们不利”。^①

对扎科夫斯基的直接指控是，他把体罚变成了“规则”，如1939年1月10日斯大林密电所说的。甚至，即使没有不久前公布的叶若夫、弗里诺夫斯基和其他人的声明和交代材料，密电电文也已证实，斯大林反对这类“方法”。

但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恰恰删掉了斯大林电报中关于扎科夫斯基的那一部分，因为这部分内容与赫鲁晓夫所指望产生的印象有矛盾。他企图将叶若夫的阴谋嫁祸斯大林，尽管，恰恰是由于这一原因，斯大林提出逮捕、审判和处决叶若夫。

伊·德·卡巴科夫案

赫鲁晓夫：制造假案的做法在各个州更为流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揭发”了一个似乎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1914年的党员卡巴科夫领导的所谓“乌拉尔起义司令部”，即由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宗教界人士组成的集团。根据当时的侦查材料，原来，几乎所有边疆区、州、共和国似乎都广泛存在着有分支机构的“右派托洛茨基间谍—恐怖、颠覆—破坏组织和中心”，而且，不知为什么，通常这些“组织”和“中心”都是由州委、边疆区党委、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领导的。（会场骚动）^②

尽管俄罗斯当局拒绝公开1930年代的侦查材料，但仍有相当多的证据指控卡巴科夫犯罪。

美国矿山工程师约翰·利特尔佩奇在大萧条时期曾来苏联工作，参与

^① Jansen, Petrov. P.151.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и»*. С.45.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frinovskyyu.pdf>.

^②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3.

发展苏联矿山开采工业的工作，回到美国后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在书名为《苏联黄金勘探》^①的回忆录中，利特尔佩奇叙述了乌拉尔怠工的情况。根据他的说法，卡巴科夫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利用该州丰富的矿藏，于是利特尔佩奇开始怀疑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因此，对在皮亚塔科夫审判一段时间后卡巴科夫被逮捕，他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示，因为，如他已经指出的那样，卡巴科夫与皮亚塔科夫两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根据1937年5月17-1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卡巴科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和被开除党籍，之后在党的七月全会上（1937年）再次确认了这点。这一切可能与图哈切夫斯基案和那些日子正在调查的军事阴谋案或范围更广的右派阴谋案有关，因为正是那些日子，对亚戈达的审讯开始加快。

在哈萨克前共产党第一书记列·伊·米尔佐扬的供词中，卡巴科夫被认为是右派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②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叶若夫七月全会（1937年）所做的报告中，该报告的内容是分析遍布各地的阴谋活动的特点。^③

1938年3月莫斯科举行的公开诉讼中的被告普·季·祖巴列夫交代，早在1929年，他就知道卡巴科夫是乌拉尔右派阴谋的参与者。祖巴列夫证实，从那时起，他与卡巴科夫的阴谋活动联系密切。在那次诉讼中，与布哈林同为主要被告人之一的雷科夫指出，卡巴科夫是右派阴谋的重要参与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雷科夫或这里已经提到的1938年诉讼中的其他被告遭受过刑讯。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阿·雅·斯托利亚尔写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卡巴科夫被称为乌拉尔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局长德·马·德米特里耶夫——后来也作为阴谋者而被判罪，认为斯托利亚尔是阴谋的共同参与者。但在谈及乌拉尔“铲除卡巴科夫之流”时，他这样说：卡巴科夫只不过是被迫离开的第一人，而其他

① John D. Littlepage, Demaree Bess. *In Search of Soviet Gold*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39).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Док. №52, с.280; об том же говорится и в докладе Поспелова: там же, с.323.*

③ Jansen, Petrov. P.75.

人，包括德米特里耶夫和斯托利亚尔还在。

斯大林在斯托利亚尔报告上所做的批注证明，他只研究了类似通报，但并没有把他们“串在一起”。^①

赫鲁晓夫大张旗鼓地为卡巴科夫恢复名誉，并以此来加深人们对1938年公开诉讼材料的怀疑，同时他宣称，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似乎也惩处过严，这对1936年诉讼评价的影响，与前者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但他在“秘密报告”中所说的并不是实话。

斯·维·柯秀尔、弗·雅·丘巴尔、 帕·彼·波斯特舍夫、亚·瓦·科萨列夫

赫鲁晓夫：由于类似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由于相信各种诽谤“供词”以及被迫做出的对自己的诽谤和对他人的诬告，致使成千上万正直的、完全无辜的共产党员牺牲。同样，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及其他人的“案件”也是伪造的。^②

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③和科萨列夫，这些人以同样的次序排列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瓦·乌尔里希向斯大林呈送的报告中，报告强调，他们所有人“在军事审判庭开庭时完全认罪”。

但是正如乌尔里希所指出的，在法庭审讯中，“某些被告”最终否认了自己的供词，虽然他们“被其他案件的材料揭露无余”。与“某些被告”不同，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和科萨列夫没有否认此前的供词，而是在法庭上予以确认。

柯秀尔与丘巴尔

叶若夫在其1939年4月26日的供词中谈及柯秀尔和丘巴尔时，说他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 276, с.463.

②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3.

③ 关于波斯特舍夫，见第三章和第九章。

们是向德国情报部门输送情报的两个苏联高层官员，即指控他们充当了德国的间谍。^① 叶若夫强调，德国间谍诺登与“许多苏联领导人”有联系。^②

从为赫鲁晓夫准备的平反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柯秀尔一开始指控波斯特舍夫犯罪，之后又否认了自己的供词，后来又再次确认。^③ 在波斯特舍夫的供词中，谈到了他与柯秀尔以及亚基尔、丘巴尔和其他人的犯罪活动的联系。^④ 丘巴尔被指控与安季波夫、柯秀尔、普拉姆奈克、苏霍姆林、波斯特舍夫、博尔德列夫等人同属托洛茨基右派阴谋组织。^⑤

已是耄耋老人的拉·莫·卡冈诺维奇在与费利克斯·丘耶夫的谈话中回忆说，开始，他试图保护柯秀尔和丘巴尔，但之后，当为便于他了解情况而向他提供了丘巴尔亲笔所写的大量交代材料之后，他放弃了所有的类似尝试。^⑥ 莫洛托夫向丘耶夫讲述了他对对质的印象。在对质时，被认为是丘巴尔好友的安季波夫对丘巴尔进行了激烈的指控。丘巴尔对所有指控予以坚决否认并对安季波夫大发雷霆。由于同在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关系，莫洛托夫对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⑦

如波斯佩洛夫报告所指出的那样，1938年5月3日，即叶若夫在位时，柯秀尔就已被逮捕，之后遭受刑讯和14个小时不间断审问的折磨。在案件审理期间的54次审问中，只有四次保留了记录。^⑧ 给人的感觉是，叶若夫造假的所有特征在这里全都具备。

1939年2月26日，即将叶若夫清除出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个月之后，对柯秀尔做出了判决。这一时期对刑事案件开始重新审查，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叶若夫及其帮凶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了刑讯。

从以上引用的乌尔里希的报告可以得出结论，柯秀尔和丘巴尔在法庭上均承认自己有罪，虽然某些被告的表现与他们不同。但开庭的详细情况仍不为人知，无论波斯佩洛夫的报告，还是为他们平反的证明材料，对此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57

② 同上，第53页。

③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I*. С.219.

④ 同上，第218页。

⑤ 同上，第251页。

⑥ Ф.И.Чуев. *Каганович. Шепилов*.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с.117.

⑦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С.486-487.

⑧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I*. С.326.

都只字未提。有必要再次指出：赫鲁晓夫时代对档案材料的选择并非本着对侦讯档案不带偏见的态度，而是以巧妙的手段加以伪造，借助于这一手段，本来以合法方式认罪的人，都能以“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出现。

在1938年10月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局长德米特里耶夫审问的速记记录中，谈到了“柯秀尔领导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它是在乌克兰保密最严格的秘密组织之一。^①

从叶若夫的供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丘巴尔和柯秀尔的罪行是参加右派地下组织。即使没有叶若夫的证词，也还有其他不少反对他们的证据。赫鲁晓夫没有解密这些材料，至今，它们依然没有被公开。

科萨列夫

在乌尔里希的报告中，科萨列夫是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犯罪的人之一。我们还知道，对科萨列夫的指控是波斯特舍夫提出的。

可惜，在公布的平反材料中，关于科萨列夫的情况极少。^②但这些材料确认，科萨列夫确实承认自己有罪，材料列举了其供词的一些片断，虽然在1954年的平反报告中称，这些供词是由于贝利亚批准搞刑讯而得到的。^③科萨列夫的侦查档案文件——审讯记录、开庭记录等，从来没有让研究人员看过。

从平反材料中还可以得出结论，在贝利亚领导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时，科萨列夫对他怀有敌意。材料中还宣布说，科萨列夫的供词是通过刑讯而获取的，对他的指控带有假造性质。平反报告的解释是，科萨列夫纯属上当受骗，因为他本指望认罪可以拯救自己的性命。有这样的情况，即在审问中借助于刑讯从受侦讯人那里搞出了供词，但在法庭上他们又翻供。但很难理解，科萨列夫想怎样挽救自己的性命，如果在法庭上承认可以被判死刑的罪行？

为科萨列夫平反的材料有一种倾向，即把所有的罪恶都加在贝利亚身上。比如，1953年12月科萨列夫的遗孀所写的信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④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590.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79-80, 166-168, 219.

③ 同上，第167页。

④ 同上，第79-80页。

自1953年6月23日后，^①赫鲁晓夫就开始讲，在贝利亚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时，几乎每一个被逮捕和被审判的人都是被编造指控的牺牲品。

科萨列夫是在1937年11月29日被捕的，他曾与叶若夫保持着某种关系，因为当时他是共青团报纸的编辑，叶若夫的夫人也在该报工作。扬森和彼得罗夫觉得，科萨列夫和叶若夫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他们自己又认为，这不大可信。^②

不过，不久前（2006年2月）出版了对叶若夫外甥阿·尼·巴布林的审问记录。巴布林与叶若夫参加了同一个阴谋活动。在审问中，他就叶若夫及其妻子“道德堕落”所提供的供词说明，科萨列夫与皮亚塔科夫、乌里茨基、米·科利佐夫、格林金娜、亚戈达、弗里诺夫斯基、米罗诺夫、阿格拉诺夫及其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是“叶若夫家最常来的客人”，后来他们与叶若夫一起被判刑和处决。^③对于“完全无辜的”共青团领袖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交际圈子！在自己的交代中，叶若夫称科利佐夫和格林金娜——正是这两个人被巴布林列入了“叶若夫家最常来的客人”名单，是英国间谍，他们正是以这样的身份与其已故妻子叶甫盖尼娅进行联系。

正如瓦季姆·罗戈温所指出的，科萨列夫被解除了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④，并在共青团工作人员遭到无端镇压期间被捕。^⑤最近几年的大众出版物中，出现了一系列文章，而且一部分是由科萨列夫的家庭成员签字刊载的。文章翻来覆去地试图重复一个观念，即对科萨列夫所提出的指控是不公正的，而共青团中央的教员奥·彼·米沙科娃的信件，似乎是科萨列夫案件的开始，米沙科娃对科萨列夫的谴责是不公正的。

某些文章断言，科萨列夫在审讯中表现坚强，任何事情都没有承认。但是，与此相反，乌尔里希的报告证实，科萨列夫完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① День, когда Л.П.Берия был снят со всех постов и арестован.

② Jansen, Petrov. P.185.

③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75.

④ ВЛКСМ — Всесоюзный ленински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ёжи.

⑤ В.З.Роговин.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 М.: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97, глава «Комсомол». См.: <http://trst.narod.ru/rogovin/t5/xxvi.htm>.

赫鲁晓夫时代的平反材料，也谈到了他承认犯罪的问题，区别只是，该材料指出，供词是通过“欺骗”手段从他那里获取的。这就是为什么大众出版物刊登关于科萨列夫的文章所列举的其他“事实”可信度很小。没有直接来自侦查机构和法院的材料，很难谈更多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阿·伊·姆格拉泽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上述米沙科娃的信是逮捕科萨列夫的真正原因。但在1954年的平反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米沙科娃的名字。在那里，一切都被解释为是贝利亚对科萨列夫怀有恶感，因为科萨列夫默许其他人在私下谈话中对贝利亚进行不讲情面的评价。

1953年6月逮捕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开始挑唆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企图将贝利亚妖魔化，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不提逮捕科萨列夫的真正原因，是纯粹为政治目的而撰写平反证明材料以及不对现有的关于被镇压者犯罪证据进行认真研究的又一证明。

我们没有足够可靠的（即不是以编造和道听途说为基础的）材料谈更多的东西。只知道，科萨列夫与叶若夫、其夫人和他们的拥护者保持着非常可疑的联系，而他们都是叶若夫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右派阴谋的同案犯。

平反材料还说，科萨列夫遭到了残酷的拷打。^① 既然根据弗里诺夫斯基的说法，为了掩盖本人的阴谋活动痕迹，叶若夫既对无辜的，也对犯罪者——其中也有他个人的朋友，采取了肉体摧残的方法，那就不排除他对科萨列夫也使用了这样的方法。^②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伪造对科萨列夫的指控是斯大林提出的，甚至在报纸转登的流言中，也把科萨列夫的全部罪过归结于他过分轻信。不过，确切知道的是，赫鲁晓夫和他的“平反委员会”隐藏了大量关于科萨列夫和许多其他“无辜受害人”的材料。

就科萨列夫而言，所有他与叶若夫的联系都被隐瞒了。而这种联系，看来是他被处死的原因。可以做出的最谨慎的推理是：赫鲁晓夫在没有对有罪或无罪进行任何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宣布科萨列夫无罪，这是公然地藐视真相。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79-80, 166-168, 219.*

^② О Ежове см. выше.

阿卡基·姆格拉泽是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代共青团主要人物之一。当科萨列夫担任共青团中央领导时，他很喜欢和尊重科萨列夫。在不久前出版，但写于1960年代的回忆录中，姆格拉泽写道，他怎样在1947年与斯大林讨论了科萨列夫问题。仔细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斯大林非常平静地解释说，对科萨列夫的犯罪活动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被安·亚·日丹诺夫和安·安·安德烈耶夫认定是正确的。^①

以上所说的，与我们从其他资料来源得到的情况相符合：通常政治局的某个委员会被委托对“机关”采取的逮捕行动以及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提出的指控是否有根据进行检查。^②

开始，姆格拉泽不愿相信科萨列夫有罪，大概，他宁可认为科萨列夫完全无罪，或是由于个人恩怨而遭贝利亚诽谤，或是其成了某种过错的牺牲品。姆格拉泽不客气地（当然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非常耐心地对他说了日丹诺夫和安德烈耶夫对科萨列夫案件的检查结果。姆格拉泽自己也想起了该小组的汇报以及什基里亚托夫关于科萨列夫案件的报告，当年他也认为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

根据姆格拉泽的说法，斯大林当时称，每个人都会犯错误，1937年犯的错误特别多。但斯大林指出，这与科萨列夫案件无关。

这一证明的重要性在于，所取得的反科萨列夫的证据，即使对像姆格拉泽那样对科萨列夫极有好感的人，也是令其信服的。还有，姆格拉泽证实了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对科萨列夫的犯罪指控。

“处决名单”

赫鲁晓夫：形成了恶性循环，先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拟订人员名单，名单上所列人员的案件由军事审判庭审理，实际上委员部早已确定了对这些人的处罚措施。这些名单由叶若夫送交斯大林本人，并提

① А.И.Мгеладзе. *Сталин. Каким я его знал. Страницы недавнего прошлого.* — Б /м., 2001, с.172.

② См.: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8-1941 гг.* / Сост. А.В.Квашонкин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1999, где изда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писем Андреева и Жданова.

请他批准所提议的处罚措施。1937~1938年送交斯大林的这类名单共383份，并得到了他的批准。名单涉及成千上万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①

确实存在着这类名单的原件；准备出版这些名单，首先出版数字光盘，而后以“斯大林的处决名单”为题，放在互联网上。^②可惜，名称本身不准确，且带有倾向性，因为这些名单本来并不是“处决名单”。

这些编辑，即追随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分子将名单描绘成预先准备好的“判决书”。但他们自己的调查和研究表明，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的确，名单中写有在被告认罪的情况下法庭可能做出的最严厉的判决，也就是说，指出了司法判决时被允许采取的最严厉处罚措施，但这种判决并不是最终的。

有这样一些例子，对名单中的某些人，根本没有确定处罚措施，或所做出的判决比名单中提出的强制处罚要轻，而最终使这些人免于被处决。比如，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提到的直到二十大还健在的阿·弗·斯涅戈夫。他曾两次被列入这样的名单，即列宁格勒州1937年12月7日的名单^③和1940年9月6日的名单。^④

在上述两个名单中，斯涅戈夫都属于“第一类人”。对“第一类人”可以使用的最高处罚判决是枪决。但斯涅戈夫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取而代之的是劳改营长期监禁。

所以，不是由斯大林“判决”，他只是对可能有异议的人员名单进行研究。对此，赫鲁晓夫完全了解，因为保存着苏联内务部部长谢·尼·科鲁格洛夫1954年2月3日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其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有什么“事先准备的判决”，但那里直接写着：

“在苏联内务部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判的383份人员名单。这些名单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37年和1938年拟订的，并在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3.

② *Жерт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ССР. На 2-х дисках. Диск 2. Сталинские расстрельные списки.* - М.: Звенья, 2004. См. также: <http://www.memo.ru/history/vkvs/>

③ См.: <http://stalin.memo.ru/spiski/pg05245.htm>

④ См.: <http://stalin.memo.ru/spiski/pg13026.htm>

当时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研究。”（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①

毫不奇怪，公诉人走上法庭，其手中不仅有被告犯罪的证据，还有执行强制处罚的建议。在被告认罪的情况下，法官可以利用这些建议。

赫鲁晓夫隐瞒了一个事实，不是斯大林，而恰恰是他自己参与了拟订建议处罚类别的名单。赫鲁晓夫用内务人民委员部为自己解脱，说什么名单正是在那里拟订的。但对另一个事实，他则设法保持沉默，即内务人民委员部与联共（布）地方领导是协同一致的，这些名单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可能比苏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的人，正是来自赫鲁晓夫主管的地区。

1938年1月之前，赫鲁晓夫曾是莫斯科州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之后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他写给斯大林的要求处决6500人的信签署的日期是1937年7月10日^②；同样，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处决名单”也是在这一天签署的。^③

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赫鲁晓夫确认他参与了“三人小组”，该小组有权选择应被镇压的人。该小组成员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局局长斯·弗·雷德斯、莫斯科州副检察长康·伊·马斯洛夫（赫鲁晓夫认为，如有必要，马斯洛夫可以由第二书记阿·阿·沃尔科夫取而代之）。

沃尔科夫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至1937年8月初，此后已不在赫鲁晓夫领导之下，很可能因此而拯救了他的性命。^④ 1937年11月之前，马斯洛夫任莫斯科州检察长，他1938年被捕，1939年3月因被指控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而被处决^⑤。康·伊·马莫诺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⑥ 起初，他接替了马斯洛夫的职位，后来又与他在同一天被处决。

① См.: www.memo.ru/history/vkvs/images/introl.htm.

② См. главу 5.

③ <http://www.memo.ru/history/vkvs/spiski/pg02049.htm>.

④ Волков 11 августа 1937 г. был избран первым секретарём ЦК КП(б) Белоруссии, а с октября 1938 по февраль 1940 г. занимал должность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Чувашского обкома ВКП(б).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умер своей смертью в 1941 или 1942 году. Подробный рассказ о Волков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газете «Советская Белоруссия» 21 апреля 2001 г., см. также: <http://sb.by/article.php?articleID=4039>.

⑤ См.: <http://www.mosoblproc.ru/history/prokurors/7/> и <http://www.memo.ru/memory/donskoe/d39.htm>.

⑥ См.: <http://www.mosoblproc.ru/history/prokurors/8/> и <http://mos.memo.ru/shot-63.htm>.

雷德斯也未能逃脱惩罚：1938年11月，他作为“波兰反革命破坏-间谍集团”的成员而被捕，对他进行了审判并根据法庭判决于1940年1月21日被处决。

扬森和彼得罗夫在其书中提到了雷德斯，说他是“叶若夫的人”。^①在“解冻”年代，由于赫鲁晓夫的坚持，雷德斯被平反，但他如此粗暴地违反了法律，以至于在1988年对雷德斯的平反又被撤销了。^②

换句话说，除了沃尔科夫外，所有与赫鲁晓夫关系最密切的战友，都参与了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镇压，并为他们的行为而受到了严厉的惩处。但赫鲁晓夫本人如何成功地逃脱了惩罚？这一切的答案依然被无法探知的秘密覆盖着……

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年）决议

赫鲁晓夫：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年）使党组织状况得到了众所周知的改善。但即使在1938年，大范围的镇压仍在继续。^③

这里，赫鲁晓夫仅仅是暗示（而之后则使自己的想法更加明朗），正是斯大林在加快转动镇压的飞轮。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文件证据雄辩地说明，大镇压是叶若夫和一群第一书记，其中包括主要“镇压人”之一的赫鲁晓夫，煽动起来的。斯大林和没有参与阴谋活动的联共（布）中央领导的其他人员试图缩小镇压的规模并使其得到控制。最终，他们使那些有据可查的参与制造假案和消灭无辜者的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格蒂和瑙莫夫对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④

从他们详尽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斯大林和党中央的领导人对失控的镇

① Jansen, Petrov, p.56, 165.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3. 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одов — 1991.* — М.: МФД, 2004, с.660.

③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4.*

④ J. Arch Getty and Oleg V.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98-512.

压问题极为关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上被撤职。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的罗伯特·特斯頓的著作证实，斯大林试图控制第一书记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的这类镇压活动。^①

在中央一月全会上（1938年），马林科夫做了发言——显而易见是在附和斯大林的意见。他报告了古比雪夫州大规模地和随心所欲地将党员开除出党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在发言中认定，这些行为的主要责任应由波斯特舍夫承担。联共（布）中央1938年1月9日做出的决议，指责波斯特舍夫犯了“错误”，他受到了警告处分，并被解除了古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38~1958年一直工作在苏联农业部门领导关键岗位（农业人民委员，之后是农业部部长）和经常出席中央和政治局会议的伊·亚·贝内迪克托夫指出，在一月全会上，开始纠正镇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

1938年1月，亚·伊·乌斯片斯基领导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但年底莫斯科已经得知他进行了违法活动。受到叶若夫警告的乌斯片斯基于1938年11月14日伪装自杀，从而逃脱了对他构成威胁的逮捕，并转入非法状态。在全苏范围内宣布了对他的通缉令，直到1939年4月14日他才被抓捕归案。某些资料称，叶若夫窃听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通话，之后对乌斯片斯基提出警告。

不管乌斯片斯基本人犯了什么罪，他应与赫鲁晓夫共同承担对无辜的人捏造指控的责任，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②对许多被捕人进行审讯的材料说明，为执行叶若夫的指示，乌斯片斯基制造了大批假案。^③

“贝利亚反革命集团”

赫鲁晓夫：当斯大林说应该逮捕某某人，那么就应该相信，他是

① R.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1934-1941*.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9, 112; см. его же часть 4.

②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Кн. 1. Часть 1.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с.172-173.

③ Jansen & Petrov. P.84, 148.

“人民公敌”。在国家安全机关中为所欲为的贝利亚反革命集团就会竭尽全力地去证明被捕的人有罪和对他们捏造的材料是正确的。^①

这是谎言。罗伯特·特斯顿详细描述了赫鲁晓夫是怎样歪曲贝利亚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② 根据罗伯特·特斯顿的说法，贝利亚的上任，立即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自由主义”时期：刑讯停止了，被监禁的人恢复了合法的权利，叶若夫的同谋失去了自己的岗位，其中不少人被移交法庭并认定他们在搞非法镇压方面有罪。

根据波斯佩洛夫的报告，那一时期被逮捕人数急剧减少：与1937~1938年相比，1939~1940年被逮捕人数下降了90%多。1939~1940年被处决的人甚至不及1937~1938年的1%。^③ 贝利亚是在1938年1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职务的，以上指出的那段时间，正好是管理“机关”的权力集中在他手中的时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利用了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因此，他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事实，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对此避而不谈，以便不为听众提供任何理由来怀疑他对历史事件做出的解释。

正是在贝利亚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后，对那些被指控进行非法镇压、搞刑讯逼供、制造假案的人进行了司法审理。对此，赫鲁晓夫是清楚的，但他故意隐瞒了。

“关于刑讯的密电”

赫鲁晓夫：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之时，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体罚之时，斯大林于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局局长发了一份密电，密电中说：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自1937年起使用体罚是联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4.

② Robert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pp.118-119.

③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17. См. также: <http://www.idf.ru/2/7.shtml>.

共（布）中央允许的。众所周知，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是极其卑劣的体罚方式。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死不悔改的间谍，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法，今后肯定会继续使用，即专门对那些显然是人民的敌人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使用。”

因此，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搞刑讯，进行严刑拷打，导致他们诬告别人和自我揭发，如以上所表明的那样，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①

至少，赫鲁晓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甚至是四个方面蓄意将听众引入歧途：

——电文极为重要的部分被删除，因为它们不符合“秘密报告”要达到的目的；

——赫鲁晓夫隐瞒了一点，即他所掌握的这份电文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人援引过，事实上，这份文件本身给人的印象是，它似乎不是在1939年（如电报所写明的那样），而是在1956年写的；

——赫鲁晓夫对所谓“密电”文本的其他可疑特征只字未提，我们是从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速记记录得知这些疑点的，在这次全会上审理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案件；

——不能排除，所谓“密电”正是在赫鲁晓夫亲自参与之下伪造的。

直到1990年代才公布的“密电”全文，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大有问题。为了解开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之谜，有必要写一篇长篇的研究论文。但其中某些问题将在以下部分澄清。

“密电”的真实性，从头几行就令人生疑，因为第一书记们几乎是以天使的形象出现的。看来，赫鲁晓夫不会随便放弃在其讲话中谈及下述内容的机会：党组织领导人对刑讯表示不满，他们说，这应当指责斯大林和他的走狗贝利亚！他们两人都是“坏人”，而与此同时，第一书记们为抵制他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5.

们的血腥计划，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但我们已经提到尤·尼·茹科夫以文献雄辩证明的研究成果《你所不知道的斯大林》一书，书中说，实际上恰恰是第一书记们坚持发动大规模镇压。而斯大林和政治局主要领导人（茹科夫将他们说成是所谓“小范围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抵制。茹科夫断言，他看到了一份文件，在该文件中，赫鲁晓夫请求将“第一类”人员名单扩大到20000人，但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姓名。^① 格蒂引证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两类人数字是41000人。^②

所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要精心掩盖像他那样的第一书记们的血腥暴行。赫鲁晓夫也对叶若夫进行了某种指控并几次提到了他。但赫鲁晓夫将其揭发的全部矛头指向他憎恨的贝利亚，实际上正是贝利亚消除了“叶若夫式镇压”，扭转了形势，自然也是贝利亚结束了叶若夫式的滥用职权。赫鲁晓夫将主要罪责加在斯大林头上，而恰恰是斯大林在结束镇压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重要的是应该指出：赫鲁晓夫删除了所谓“密电”中很大的一个段落^③，在该段落中第一是对使用“体罚方法”的条件进行了评价和划分；第二是指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层中与叶若夫同谋者的名字并强调他们因自己的犯罪活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些同谋者中提到了扎科夫斯基的名字，即赫鲁晓夫引证罗森布吕姆时提到的那个人，他是最主要的假案制造人之一（详见以上）。如果赫鲁晓夫敢于宣读电报的这部分，必将引发对其报告的基本论调的怀疑，即所谓斯大林煽动并进行了大规模镇压。不久前出版了关于“叶若夫案”的材料，那里说，叶若夫认为扎科夫斯基是其最忠诚的同谋者之一，而扎科夫斯基被捕后，叶若夫急于查清他是否已被处决，因为他可能“招供”和告诉贝利亚关于叶若夫的人参与的假造侦查案和杀害无辜的内幕。

赫鲁晓夫关于刑讯“密电”之说，是他以假乱真的突出事例。为解释清楚这一问题，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以下是该文件最重要的一些特

①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3 декабря.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читателей газеты перепечатаны в: <http://www.nomad.su/?a=15-200212030006>.

② J. Arch Getty. Excesses are not permitted.: Mass Terror and Stalinist Governance in the Late 1930s. // *The Russian Review*. Vol.61 (January 2002), p.127.

③ В приложении к главе выпущенные Хрущёвым места показаны полужирным шрифтом.

点，对这些特点进行研究与我们提出的目标并不矛盾。

第一，文件的日期是1939年1月10日，充其量它也只是电报草稿的副本。它是在打字机上用普通纸张打印的。上面没有任何签字，既没有斯大林的签字，也没有其他什么人的签字。近期的出版物（半官方的），已经不再说文件是斯大林“签署”的，不过近来又有一种说法，说那里有斯大林亲笔写的批语。^①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投机，因为编辑们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情况如他们所写的那样。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非常想说服读者，让人相信这是1939年文件的真本。

第二，如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报”不是假造的，那么也没有足够的根据认定“电报”是真实的草稿，只是还没有发出去而已。总而言之，“电报”的文稿非常像是在1956年打印的，因为关于该电报正是那时开始知道的。而且，1956年打字机打的字体，与文件主要部分的字体，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完全不清楚的是，有什么理由会让1956年的文书在1939年的秘密档案文件上留下标注。为什么在1956年将这样的标注留在“密电”的原件上，而不是写在单独的一张卡片上，而当时拓印下来的1939年电报的副本上^②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自然，对所有这一切与“密电”相关的其他情况应客观地和以科学的观点进行查核。但俄罗斯当局不想进行这类调查，无论是对我们感兴趣的电报，还是对其他在苏联解体后突然发现的任何真实性可疑的文件。如果我们只使用看似真实的副本，那么，用以复制的文件真本在哪里呢？

第三，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1957年），为回击“推翻”赫鲁晓夫的企图，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提出了所谓组织“反党集团”的指控。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声明，确实有过对某些类别的被捕人使用“体罚”的决议，而且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该决议上签了字。当时赫鲁晓夫反驳说，有两个这样的决议，他指的不是“密电”，而完全是另一个文件。但之后对“另一个文件”，赫鲁晓夫没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再次提及。他指的到底是什么文件呢？我们已永远都不会知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Док. № 8, с.14-15 и прим. на с.15.

^② 这里所指的是约翰·格蒂发现的“密电”文本，关于该文本，以下还将谈到。

道了……

根据参与讨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说法，文件的真本已经被销毁，其唯一的一份副本，奇迹般地被达吉斯坦共和国党委所保存。但我们手中掌握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副本。它不是印在特殊的格式纸上，而是印在最普通的纸张上。充其量它也只像是在1956年之前不久重新打印的一份草稿，或纯粹是水平不高的一个赝品。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副本，而“达吉斯坦共和国党委”那儿的“密电”，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给任何人看过。

自然，如果证据中没有会丑化赫鲁晓夫本人的材料，赫鲁晓夫不会销毁如此珍贵的反斯大林的证据。或者，这一电报根本就不存在，而这一情况比其他所有情况都重要！在这一情况下提出“达吉斯坦共和国党委”的副本应视为是蒙骗“反党集团”的诡计。

在档案馆中，格蒂发现了同一份“密电”，但标注的却是另一个日期——1939年7月27日。^①如果这是真本（其文本还没有公布），或如果1957年7月莫洛托夫讲的是实话，即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电报上签了字，那么，电报上应该有赫鲁晓夫的签字：因为一月全会（1938年）之后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取代波斯特舍夫的空缺），而自1939年3月22日起他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应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承担同等的责任。

而如果这份电报发出去的时间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所说的那样是1939年1月10日，那么该电报就不会有他的确认签字。当然，在电报写于1939年7月27日的情况下，可以认为：①赫鲁晓夫看到了电报；②他也应对执行电报中所包含的指示，即对被逮捕的人使用“体罚”手段，承担全部责任，正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的岗位上，主使了对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镇压。

所以，不能排除赫鲁晓夫设法找到了1939年7月27日电报的真本，之后清除了在档案中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在此之前，复制了该文件（并划掉了格蒂发现的文件版本中叶若夫的名字），并填上了一个赫鲁晓夫还没有进入政治局的日期。

^① J. Arch Getty. Excesses are not permitted. P.114 n.4.

各行各业的许多作者，其中包括职业历史学家都令人信服地以诸多文献证明，在赫鲁晓夫时期，大量的文件被销毁。尤里·茹科夫的访谈录^①、尼基塔·彼得罗夫的书^②、马克·琼格和罗尔夫·宾涅尔的著作^③都提到过，赫鲁晓夫比任何人都多地销毁过文件。苏联前农业部部长贝内迪克托夫在1989年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为了使听众产生错觉，赫鲁晓夫故意断章取义地引用了这份文件。

根据贝利亚的指示， 罗多斯残酷殴打了柯秀尔和丘巴尔

赫鲁晓夫：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我们把当时审讯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的侦查员罗多斯召到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他进行了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和鼠目寸光的人，在道德方面，简直是一个败类。就是这个人，决定了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从而提供了导致做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料。

请问，难道这样的一个人，凭他自己的智慧能够领导侦查工作，以证明像柯秀尔和其他类似的人有罪吗？不可能，没有相关的指示，他不可能做很多事情。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柯秀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会场群情激愤）

他只能通过长时间的残酷拷打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详细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这里应指出，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声称：“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囚禁者采用体罚方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在实践中得到贯彻的。

① Жупел Сталина. Беседа журналис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абова с историком Юрием Жуковым. Часть 3.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12 ноября.

② Н.Петров. *Перв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ГБ Иван Серов*. — М.: Материк, 2005, с. 157-162.

③ М.Юнге, Р.Биннер. *Как террор стал «Большим». Секретный приказ №00447 и технология е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 М.: АИРО-XX, 2003, с.16.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事实说明，党的正确解决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一笔勾销了，一切都屈从于一个人的专横。^①

在这里，赫鲁晓夫的欺骗被暗示所掩盖，似乎鲍·韦·罗多斯通过刑讯得到的供词，是判决和处死柯秀尔和丘巴尔的唯一根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指控他们的这类证据，特别是叶若夫1939年4月26日的供词，与“体罚方法”不相干。叶若夫的供词称，他们二人是右派阴谋活动的参加人和德国的间谍。

赫鲁晓夫暗示，罗多斯是“贝利亚”的人。^②但正如平反材料所指出的，侦查员罗多斯是在叶若夫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那些年里得到升迁的。^③

也许，罗多斯如他自己在中央主席团声明的那样，只是“执行了委托”。如果刑讯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和罗多斯得到对被告使用刑讯的指示（对此他似乎没有否认），那么，当时他的确可能不得不服从这样的指示，在这一情况下，他并没有进行强加在他头上的犯罪活动。可能他的真正罪状是：他一直在搞侦查工作，无论在贝利亚时期，还是在叶若夫时期。赫鲁晓夫竭尽全力，几乎将世界的所有罪恶都嫁祸于贝利亚。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2月1日的特别决议，罗多斯被送交法庭，并于2月21~26日被判处死刑，即恰逢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的日子。^④为什么要这么急？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对罗多斯的镇压，纯粹是为了尽快消灭犯罪证据。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部门的领导，罗多斯积极参与了对叶若夫活动的侦查，办理了那些加入叶若夫夫人最亲密圈子的人的案件，他们是伊·埃·巴贝尔，弗·埃·梅耶尔霍尔德，以及其他很多人。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是走运的，他成功地找到了像贝利亚和罗多斯这样的人，可以将镇压的所有责任，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某些“失误”，转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45.

② Петров у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Родос был арестован 5 октября 1953 года, т.е.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банды Берии». См.: Н.Петров. *Перв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ГБ Иван Серов*. С.393.

③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176.

④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411, прим. 13. 作为“贝利亚反革命集团”的一员，罗多斯的被捕不会晚于1954年，但他的案件材料至今没有解密。在“1953年：过去与未来之间”展览会上（2003年），莫斯科联邦档案展厅展出了涉及罗多斯的两个文件。

嫁到他们身上。

赫鲁晓夫极其匆忙地除掉罗多斯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他和叶若夫之间存在着某种源于其任第一书记时不为人知的联系。

文献资料

罗·因·埃赫案

2002年，埃赫1939年10月27日写给斯大林的信被全文公布，而在此之前只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引用的该信件的部分内容。^①

今天，历史学家还拥有另外一项重要证据，即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的副职米·彼·弗里诺夫斯基于1939年4月所写的声明。在该声明中，他两次提到埃赫，而根据上下文，两次都表明，联共（布）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前第一书记（1930~1937年）与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属于同一个右派阴谋活动集团，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1935年叶夫多基莫夫在其住宅的一次会见中，对我谈到了被他吸引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工作的一批人。他提到了皮沃瓦罗夫和一大批肃反人员：博亚尔、佳特金以及沙茨基。这里他对我谈了他与埃赫的联系……”

在一次全会会议之后，晚上，在叶若夫的别墅，有叶夫多基莫夫、我和叶若夫。当我们到达那里后，埃赫已在那里，但埃赫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谈话。在我们来之前叶若夫与埃赫在做什么，叶若夫也没有说。晚餐之后埃赫离开，我们一直在交谈，几乎谈到早晨。”^②

根据传记百科全书作者和编者康·亚·扎列斯基的说法，埃赫“在1936~1937年负责党和经济机关的清洗工作，西伯利亚史无前例的逮捕浪潮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③

历史学家尤·尼·茹科夫指出：

“在全会闭幕前一天，罗伯特·埃赫——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充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26-328. См. также: <http://www.idf.ru/2/7.shtml>.*

②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40 и 44.*

③ *К.А.Залесский. Империя Сталина.. См.: <http://www.hrono.ru/biograf/eihe.html>.*

满激情的拉脱维亚革命者、几年之前曾在粮食采购期间对农村进行了可怕的镇压的人，向政治局递交了报告。报告称，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该州的工作很糟糕。契卡人员揭露了反苏维埃的富农起义组织，却没有彻底粉碎该组织，只是逮捕了组织的头目。在已确定的12月选举前，有必要对所有反苏维埃组织进行镇压，逮捕和审判他们。为了加快这一进程，他请求允许他组织“三人小组”，该小组已经在对付农民时初露锋芒。他将领导该小组，再加上州检察长和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有理由认为，埃赫的行动不仅代表他自己，也表达了相当大一批第一书记的要求。很难否定这样的假设，即埃赫的倡议是试探气球，是检验自己的力量和‘小范围领导人’决心的方式……”^①

尤·茹科夫还说：

“第一次任命（提前通知——作者注），叶若夫幸福地接受了：1938年4月任命他‘兼职’水运人民委员。第二次任命是在8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整整用了四个小时劝说他同意拉·帕·贝利亚作为他的第一副职人选。^②而第三次则是这一漫长程序中最后的一次行动：11月23日^③叶若夫再次被召到斯大林那里，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已经在那里。恰好，我手中有一份文件——一份显然是叶若夫根据他们口授而写的文件。文件写在三页纸上，三页纸大小不一，也就是说，是顺手拿了几张卷起的纸，递给了叶若夫，为的是不让他停止书写。免去其职务的措辞两次修改：看来他进行了反抗，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又需要从他口中得到‘根据本人愿望’而离职的决定！立即写了决议草案，该草案听起来像是一个保障：‘保留叶若夫同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水运人民委员的职务。’最终声明写完并签字：‘尼·叶若夫’。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对‘叶若夫非法行为’进行清理。政治局向各地发了电报，电文内容直截了当：立即停止镇压和解散‘三人小组’。重新争得主动后，斯大林得以在1938年年底将某些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送交司法审理，他们被指控虚

^① Юрий Жуков. Сталин: иной взгляд. Беседа с автором книги «Иной Сталин».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04, №12. См: <http://nashsovr.aihs.net/p.php?y=2004&n=12&id=4>.

^②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335, с.545.

^③ В сборнике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вместо 23 ноября ошибочно приводится дата 23 сентября, см.: там же, с.552 и далее.

构和臆造案件，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对这些案件进行审理，被告根据这些虚构的案件，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了流放和处决。这样，大恐怖才得以制止。”^①

马·扬森和尼·彼得罗夫在他们所写的叶若夫传记中，也没有让埃赫默默无闻：

“让我们来研究内务人民委员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局局长米罗诺夫 1937 年 7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期间对叶若夫提出的反对意见。米罗诺夫被捕后的供词表明，他曾向叶若夫报告，埃赫‘干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他曾向库兹巴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市局领导人下达逮捕某些党员的指示，虽然多数情况下缺乏证据。米罗诺夫认为自己的处境困难：他或者解放被监禁的一部分人并因此与埃赫冲突；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当‘臆造案件’（粗体字为作者所标）。当米罗诺夫提议让叶若夫口头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以便让他们仅执行由他本人证实的指示时，叶若夫回答说：‘埃赫知道做什么。他负责党的组织，与他斗争有害无益。最好向我报告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而我将予以解决……请执行埃赫的指示，不要损害与他的关系。’米罗诺夫补充说，埃赫有一个习惯，即‘突然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来听审讯，干预侦查工作，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施加压力，从而把侦查工作搞乱’。但叶若夫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②

还有：

“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阶级敌人利用选举所提供的自由。在六月全会上（1937 年），哈萨克人民委员会主席乌·贾·伊萨耶夫警告说：‘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直接交火的阶级斗争形势。现在，甚至毛拉、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都在准备选举。’在十月全会上（1937 年），莫斯科党的书记亚·伊·乌加罗夫再次指出，出现了敌对分子活动加剧的趋势。当时，他的西西伯利亚同行罗·因·埃赫却能确定，相反，由于消灭了有组织的反革命基地，形势大大好转了。斯大林同意：‘人们对不再受反革命

^① Жупел Сталина. Беседа журналис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абова с историком Юрием Жуковым. Часть 8.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20 ноября.

^② M.Jansen, N.Petrov. P.91-92. Здесь и далее цитаты из книги Янсена и Петрова даны в обратном переводе.

分子的束缚是满意的。’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在那个月禁止差额选举，并建议举行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

尼·伊·叶若夫

弗里诺夫斯基 1939 年 4 月 11 日的声明，详细讲述了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时的犯罪活动：

“我成为罪犯是因为盲目地信任自己的领导人亚戈达、叶夫多基莫夫和叶若夫的权威。而成为罪犯后，我与他们一起进行了反对党的卑鄙的反革命活动……”

在布哈林和雷科夫被捕前，叶若夫与我的谈话是开诚布公的。他开始谈及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肃反人员的工作计划以及即将实施的对布哈林和雷科夫的逮捕。叶若夫说，这对右派力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与我们的愿望不同，这之后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可能将对右派干部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与此相关，他和我的任务是：进行侦查时，尽可能保护右派干部。他立即展开谈了这方面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如下：‘需要安置自己的人，主要是在秘密政治处（СПО^①）。应挑选那些或完全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人，或存在某些不良行为，也知道自己有不良行为的人，以这些不良行为作为把柄，将他们控制在我们手中。自己也要参与侦查和领导侦查。’叶若夫说：‘这是为了不记录被捕人员所说的一切情况；让侦查员将所有添加的东西和草稿交给处领导；对被逮捕的地位很高的人和右派组织中占据主要位置的人，记录要经过我的同意。’如果被捕的人交代了组织的参与成员，那么应将他们记录在一个单独的名单上，并每次都要向他报告。而如果能抓到本来就参加了组织的人，也是不错的。‘比如，叶夫多基莫夫对你谈到了一些人，某些人我是知道的。应当首先将他们吸收到中央机构。总而言之，应当挑选有能力的人和从业务角度看已经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人，设法接近他们，然后招募他们，因为，没有这些人，我们无法进行工作，而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让中央看到我们所进行的工作。’

① СПО，即秘密政治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该处负责与反苏分子斗争和阐述国家的政治理念。СМ.: Н.В.Петров, К.В.Скоркин. *Кто руководил НКВД. 1934-1941: Справочник.* М.: Звенья, 1999, с.31.

为了执行叶若夫的这一提议，我们坚定地执行了下述方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上保留亚戈达的干部。需要指出，我们这样做有难度，因为，来自各个地方机关的材料，都表明他们中的多数参与了阴谋，一般也都参与了反苏维埃活动……

1937年中央十月全会后，我和叶夫多基莫夫一起第一次在叶若夫的别墅参加聚会，并且是叶夫多基莫夫首先开始谈话。他问叶若夫：

‘你这里有些不顺利，承诺要改善亚戈达时的状况，而结果却是越陷越深，现在已搞到我们头上了。看来，你领导的这一工作不顺利。’开始叶若夫默不作声，之后他声称：‘的确，形势非常困难，我们这就采取措施，缩减行动规模，但看来，对右派的头目不得不镇压。’叶夫多基莫夫骂了几句，表示不满，他说：‘能不能让我来内务人民委员部，我提供的帮助会比其他人多些。’叶若夫说：‘那样就好了，但中央未必会把你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我认为，情况并非完全没有希望，但你也应当和达金谈谈，你对他有影响力，应当让他在业务部^①开展工作，而我们准备进行恐怖行动……’”

在这里，叶夫多基莫夫和叶若夫已经在谈论对行动规模的削减问题，但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商定转移对自己干部打击的视线和设法打击忠于中央的诚实的干部。这就是叶若夫的方针……

在右派核心成员被逮捕后，叶若夫和叶夫多基莫夫实际上成为下述活动的组织中心：①尽可能保护反苏维埃的右派干部，以免他们被消灭；②打击诚实的忠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干部；③保护北高加索和苏联其他边疆区和州的起义干部，以便在国际形势复杂化时利用他们；④加强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准备工作；⑤为以尼·叶若夫为首的右派政权上台进行准备……

侦查工作

弗里诺夫斯基还描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工作：

“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部门的侦查机构都有三类人：一是搞‘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二是‘用刑’的侦查人员；三是‘普通’的侦查人员。

^① 业务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对外监督、搜查、逮捕、暗中检查来往信件、对警察机关进行监督等。

这几类人代表什么，他们又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搞‘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主要从阴谋者或名誉受到损害的人中选拔，他们肆无忌惮地殴打被逮捕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供词’，并善于撰写合乎要求和富有说服力的审讯记录……

由于使用这样的审讯方法，认罪的被捕者的数量与日俱增，对善于做记录的侦查人员的需求非常大，所谓‘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开始建立自己所属的小组，简单地叫作‘用刑’组。‘用刑’组由技术人员组成。这些人并不知道受侦查人员的材料，他们被派到列福尔托沃，把被捕者叫出来并开始殴打，直到被侦查人同意坦白问题。

其余侦查人员对不很重要的被捕者进行审讯，他们自行其是，不受任何人领导。

侦查的下一步工作是：侦查员进行审讯，用简单的记号代替笔录。经过几次这样的审讯后，侦查员撰写一份记录草稿送交相关部门的领导‘修改’，但不用他们签字，因还要呈送前人民委员叶若夫‘审阅’，个别情况还送到我这里。叶若夫看过笔录之后进行修改和补充。多数情况下，被捕者不同意对记录的修改并称，他们在审讯中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并拒绝签字。

在这一情况下，侦查员便向被捕者提及‘用刑’侦查员，于是受侦查人员就在记录上签字。叶若夫要浏览记录和对记录进行‘修’和‘改’。多数情况下，他连被捕的人都没有见到过，而如果见过，也是在匆匆路过牢房时，或在审讯室。

一些名字就是用这样的侦查方法搞出来的。

说句实话，如果让我来总结，我会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供词是侦查人员说的，而不是受侦查人员说的。

对此，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即我和叶若夫是否知道？知道。

如何反应？说实话，没什么反应，而叶若夫甚至还进行鼓励。谁也不会仔细考究，对谁进行了体罚。因为多数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者，所以他们很清楚：就是要进行诬告，使用编造的证词，逮捕和处决无辜的人，这些人是被敌人和侦查员诬陷的人。真正的侦查不见

了……”^①

对雷科夫、布哈林、克列斯京斯基、亚戈达等人诉讼案的准备

整体上积极参与侦讯的叶若夫，自行离开了对该诉讼案的准备工作。在审判之前，对被捕者进行了对质，进行了预审，对问题进行了澄清，但叶若夫没有参与上述活动。他与亚戈达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是让亚戈达相信，他不会处决。

叶若夫几次与布哈林和雷科夫谈话，同样是对他们进行安慰和保证，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被处决……

毫无疑问，在这里，叶若夫遵循的是：必须掩盖自己与即将受到公审的被逮捕的右派领袖的关系……

欺骗党和政府

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职后，叶若夫在各种会议上和在与业务人员的座谈中，公正地批评契卡人员中存在的本位主义和与党脱离的情况，他强调将会加强工作人员的党性，并声称他对党、对斯大林从没有隐瞒过，将来也不会隐瞒任何东西。实际上，他欺骗了党，不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而且也在一些小事情上。叶若夫进行这些谈话，只不过是为了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失去警惕性，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在审讯叶若夫本人的记录中，他更多的犯罪活动被揭露：

“答：应当承认，在如实交代自己为波兰进行间谍活动时，向侦查部门隐瞒了自己与德国间谍活动的联系……”

在与叶戈罗夫讨论业已形成的形势时，我们得出结论，党和人民大众是追随联共（布）领导人的，进行政变的基础还没有奠定。所以我们决定，应在某个其他反苏维埃组织的旗号下搞掉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即制造我可以接下来掌握政权的条件。这之后，占据更高的领导地位，创造机会，以便继续更坚决地将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改变为符合德国利益的政策。

我请叶戈罗夫通过凯斯特林格将我们的设想转达给德国人并询问德国有关部门对此的意见。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34-49. См также: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frinovskiyru.pdf>.

问：你们得到什么答复了吗？

答：此后不久，叶戈罗夫将凯斯特林格的话告诉了我，说德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同意我们的提议。

问：为实现你们的叛变阴谋，你们采取了什么行动？

答：我决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组织阴谋活动，吸收那些我可以利用他们对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搞恐怖活动的人员参加。

问：难道只是在与叶戈罗夫谈话之后您才决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组建阴谋组织吗？

答：不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与叶戈罗夫谈话之前很久，在任命我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时，我就将一批与我在反革命活动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人员带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以，我的关于着手组建阴谋组织的供词，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即由于与哈默尔什泰因谈判和与军界阴谋者建立联系，应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全面准备和加速组建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阴谋组织……

至于叶夫多基莫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我让他们完全了解关于阴谋活动的情况，他们绝对知道全部情况，包括我与工农红军军人阴谋集团和德国军界的联系……

我向凯斯特林格通报了关于在军人中继续实施逮捕的情况，并称，没有能力阻止这样的逮捕，特别告诉他，叶戈罗夫已被捕，而这可能导致整个阴谋活动的失败。

所有这些情况使凯斯特林格极为不安。他对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或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夺取政权，或你们将被逐个歼灭……

我自己从此再也没有与凯斯特林格见面。后来我们之间通过霍兹亚伊诺夫进行联系。

问：霍兹亚伊诺夫是否知道您准备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

答：是的，他知道。不仅我，而且德国情报机关也让霍兹亚伊诺夫知道了这一情况，因为在我们建立联系的第一次会面时，霍兹亚伊诺夫就向我转交了德国人的指令：无论如何要加速执行恐怖行动。

除此之外，霍兹亚伊诺夫向我转达了德国情报机关的指示：由于我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和任命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德国情报机关认为有必要实施对某个政治局委员的谋杀，并以此挑战内务人民委

员部新的领导人。

在这一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开始逮捕由我领导的阴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们立刻得出结论：必须在1938年11月7日采取行动。

问：这里的‘我们’指谁？

答：我——叶若夫，弗里诺夫斯基，达金，叶夫多基莫夫……

在水运人民委员部我的办公室的一次会见中，我告知拉泽布内，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于他的黑材料，近日可能对他实施逮捕，他面临死亡的威胁。我对拉泽布内说：‘您已经没有出路，反正您会牺牲，不过牺牲自己，您就能够拯救一大批人。’对拉泽布内的有关追问，我回答他，谋杀斯大林能挽救国家的形势。拉泽布内同意了我的意见。”^①

逮捕叶若夫和之后对他进行审判的原因，从扬森和彼得罗夫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无视法律。1939年1月，即在叶若夫辞职后，由安德烈耶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指责叶若夫使用了违背法律的侦查方法：‘侦查方式被肆无忌惮地扭曲，不加区别地大规模采用殴打的手段，以便让被侦查者认罪，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假的供词。’在24个小时中，侦查员常常需要获取几十份供词，侦查人员相互通报所取得的供词，以便有关的事实、情况或名字对其他被关押的人产生影响。其结果，这样的侦查常导致有组织地诬陷完全无罪的人。”

“很多情况下证词是靠‘直接的挑拨离间’而获取的；说服被关押的人做出承认进行‘间谍活动’的假口供，以便协助党和政府‘败坏外国的名声’或换取释放的承诺。根据安德烈耶夫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说法，‘以叶若夫同志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不仅没有制止这类在逮捕和侦讯中的肆意妄为和极端行为，有时候甚至予以鼓励’。契卡共产党员们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对专横行为的抵制，都被平息了。”^②

“‘三人小组’的工作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安德烈耶夫和其他委员会成员通报了‘三人小组’和所谓‘大委员会’工作的‘严重失误’：在一个

^①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ezhovru.pdf>.

^② Jansen, Petrov. P.108. Докумен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ые в данном отрывке (ЦА ФСБ. Ф.3-ос. Оп.6. Д.1. Л.1-2) повторно засекречены и недоступны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

晚间会议上常常要研究 600~2000 个案件（委员会引用的是在莫斯科对‘国家战役’名册的检查材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长批准之前，名册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的部门进行研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地区‘三人小组’的工作完全失去控制。大约 20 万人是由所谓‘三人小组’判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合法成员‘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

正如晚些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秋明业务局领导人所证明的那样，实施逮捕常常没有足够的根据：对人们进行羁押是因为他们属于根本不存在的团伙，‘三人小组’通常是与行动小组协同行动的：‘在“三人小组”会议上并不对被告的犯罪活动进行研究。几天之后，我在一个小时内向“三人小组”报告了由 50~60 人参与的案件。’在更晚些时候的谈话中，秋明领导人还详细报告了行动小组如何执行‘三人小组’对‘第一类人’的判决。处决被判死刑的人是在有隐蔽墙的特殊房间的地下室进行的，第一枪打后脑勺，第二枪是打太阳穴，尸体则运往城市的火葬场。在托博尔斯克——事件参与者本人 1938 年调任的地方，处决直接在监狱进行，尸体也掩埋在那里；由于地方不够，尸体堆在了一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萨拉托夫州局局长助理提交了类似的供词：‘主要指示是如何多立案，如何可以尽快研究处理和进行形式最简化的侦查。至于案件数量，（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要求（算上）所有已经判刑的和所有在押的人，甚至在被捕时没有任何犯罪活动的人。’”

叶若夫的副职弗里诺夫斯基在被捕后解释说，进行“刑讯逼供”者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侦查人员，他们基本上是从“阴谋者或名誉受到损害的人中”选拔的，他们“肆无忌惮地殴打被逮捕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供词’”。恰恰是侦查员，而不是被侦查人员，在争得叶若夫同意后决定供词中写什么内容。最后，记录由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审定”。通常不会与被关押的人打招呼，有时或许只是顺便告诉他们。根据弗里诺夫斯基的说法，叶若夫鼓励在审讯中使用体罚措施：他亲自监督审讯和指示侦查员利用“体罚施压方法”，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在审讯中，他有时处于醉酒状态。

正如后来一位侦查员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某个人是根据叶若夫的指示而被捕的，那么他提前就已被确认有罪，即使没有拿到任何证据。他们“努力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从这样的人那里获取供词”。被捕的前内务人民

委员部莫斯科局副局长亚·帕·拉济维洛夫斯基提到，叶若夫曾说：如果没有证据，“有必要从被监禁的人那里搞到供词”。根据拉济维洛夫斯基的说法，供词“通常是通过对被捕者进行拷打后取得的，而这样的做法，无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还是在地方，都非常流行”。

列福尔托沃的监狱长以及副监狱长被捕后均交代，在审讯中，叶若夫曾亲自参与殴打被捕者；他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所作所为也一样。谢皮洛夫回忆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对其同事说，有一次他到中央委员会叶若夫的办公室，看到地板上和他的军便服翻边处有发黑的血斑。对怎么回事情的询问，他激动地回答，应为这些血斑骄傲，因为这是革命敌人的血。”^①

叶若夫被捕不久，斯大林对他进行了谴责。在航空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下述对话：

“——喂，巴兰金怎么样（巴兰金是苏联航空工业奠基人之一，曾任苏联航空工业副人民委员，1941年夏被捕，卫国战争开始后被释放——译者注）？

——仍在工作，斯大林同志，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是的，不应该关起来。

显然，斯大林看到了我目光中的疑惑不解。在我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的情况下他说：

——怎么能将无辜的人关进大牢？！是的，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一个工作很好的人，会有人嫉妒他、讥讽他。而如果他还是一个勇敢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会引起不满和多疑的契卡人员的注意，而这些人自己什么也不懂，但喜欢利用各种流言蜚语……叶若夫是一个坏蛋！一个腐化堕落的人。你打电话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找他，说他到中央委员会去了；而往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说他工作去了。派人到他家，原来他躺在床上，烂醉如泥。他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为此我们把他处决了。”^②

在对这一段话进行评论时，扬森和彼得罗夫写道：

“既然特别提到了1938年，斯大林暗示，根据他的意见，与1937年不

^① Jansen, Petrov. P.108. Докумен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ые в данном отрывке (ЦА ФСБ. Ф.3-ос. Оп.6. Д.1. Л.1-2) повторно засекречены и недоступны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с.108-110.

^② А.С.Яковлев. *Цель жизни*. Глава «Москва в обороне», с.509. См. также: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yakovlev-as/20.html>.

同的是，正是在这一年，恐怖失去了控制并已开始威胁国家的稳定。在生命之路的终点，斯大林对警卫说，‘醉鬼叶若夫’是马林科夫推荐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在醉酒状态下，他签署了塞给他的逮捕名单，所逮捕的常常是一些完全无辜的人’。

在1970年代的访谈中，莫洛托夫做了类似的评论。根据他的意见，在道德‘沦丧’之前，叶若夫享有很好的声誉。斯大林指示他‘加大压力’，为叶若夫‘下达了强劲有力的指示’。他‘开始按计划砍杀’，但‘过头了’：‘已无法遏制’。从莫洛托夫精心选择的回忆中得出一种印象：叶若夫自己确定‘限额’，因此他被处决。莫洛托夫不同意关于叶若夫只是根据斯大林指示行动的说法：‘说斯大林对此一无所知是荒谬的；但说他应对所有这些案件负责，当然也是不正确的。’另一位为清洗辩解的是斯大林的前战友卡冈诺维奇。如他所承认的那样，暗中抵制等情况是有的，但‘当时不可能与社会舆论背道而驰’。只是叶若夫‘搞过头了’；他甚至‘举行了竞赛活动，比谁揭发的人民公敌更多’。其结果，‘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了，谁也不能为此辩解’。”^①

重要的是，恰恰是在苏共二十大前夕，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两次谈到了叶若夫无罪。先看看会议工作记录中赫鲁晓夫是怎么说的：

“叶若夫，大概，没有犯罪，他是一个诚实的人。”^②

将一切嫁祸于斯大林的同时，赫鲁晓夫紧接着将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包括亚戈达，都补加到“诚实人”的行列之中：

“亚戈达，大概，是一个清白的人。叶若夫大概也是清白的人。”^③

扬·埃·鲁祖塔克案

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是根据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的同一个决议被逮捕的：

^① Jansen, Petrov. P.210.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08.

^③ 同上，第309页。

第 309 号

关于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

提交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对下述提议进行表决：

联共（布）中央得到了揭露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与反苏托洛茨基右派阴谋集团和为法西斯德国进行反苏间谍活动的材料。鉴此，联共中央政治局特将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开除党籍以及将他们的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交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表决。^①

1937年6月2日，斯大林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点了鲁祖塔克的名字：

“托洛茨基、雷科夫、布哈林，这些人可以说是政治领导人。我也把鲁祖塔克列入这些人之中，这个人也是个头目，他非常机敏地进行工作，把所有事情搞乱，原来，他也不过是一个德国间谍……”

我数了 13 个人。我再重复一次：托洛茨基，雷科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加马尔尼克……

布哈林。我们没有他本人提供情报的材料，但无论叶努基泽、卡拉汉，还是鲁祖塔克，都与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为他出谋划策：您可以提供情报，但不要自己送……

鲁祖塔克。我已经说过，他不承认他是间谍，但我们拥有全部材料。我们知道他将情报交给了谁。在德国柏林，有一个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而也许当你们有机会去柏林时，也许你们中有谁认识她——若捷菲娜·根济。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个老情报人员。她招募了卡拉汉，利用女人的躯体招募了他。她招募了叶努基泽，她协助招募了图哈切夫斯基，是她把鲁祖塔克控制在手中……

下面是核心，核心是谁？他们是否投票拥护托洛茨基？鲁祖塔克从来没有投过托洛茨基的票，原来他是一个间谍。叶努基泽也从来没有投过托洛

^①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С. 156.

茨基的票，原来，他也是个间谍。现在看看你们的观点，谁投了谁的票。”^①

1938年在莫斯科对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审判中，被告格林科、罗森果尔茨和克列斯京斯基都几十次提到了鲁祖塔克。根据克列斯京斯基的供词，鲁祖塔克是反政府阴谋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克列斯京斯基：我从皮亚塔科夫口中得知，已成立了联合右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军人的组织，其目的是准备搞军事政变。他是在1935年2月告诉我的。我还知道，来自右派的领导核心成员有雷科夫、布哈林、鲁祖塔克和亚戈达，来自军人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托洛茨基分子的代表是皮亚塔科夫……”

1935年年初，皮亚塔科夫告知，已达成协议，并提到了核心成员——我已于昨天列举了这些人员，还告知，我和罗森果尔茨不进入核心组，而是在他的领导下，主要任务是拟订和筹备未来的政府机构，这是劳动分工。还指示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将与右派鲁祖塔克及图哈切夫斯基联系。但罗森果尔茨积极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他转告我他与雷科夫会面的情况。总体上说，雷科夫和鲁祖塔克代表右派，图哈切夫斯基代表军方。这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我知道与图哈切夫斯基联系的有关情况，而罗森果尔茨不知道。但根据分工，他主要负责与右派的联络，虽然我也曾与鲁祖塔克会见；而我主要负责与图哈切夫斯基的联系，但他与图哈切夫斯基也有联系。”^②

鲁希莫维奇在1938年1月31日的供词中也交代了鲁祖塔克：

“问：您知道拉脱维亚这个组织的活动吗？”

答：我已经交代过，鲍曼和梅日劳克负责与拉脱维亚人联系，所以，关于该组织的成员和活动的详细情况，应该让他们说。我只知道，领导该组织的人是鲁祖塔克和阿尔克斯尼斯。该组织与拉脱维亚和德国情报机关

① И.В.Стал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и наркомате обороны. 2 июня 1937 года. (Неправленная стенограмма.) // *Источник*. 1994, № 3, с.72-78. См.: http://stalin.newmail.ru/stalin_sobr/14-5.htm,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stalin/14-5.htm>, а также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stalinju0237.html>.

② *Судебный отчёт*. —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емья, 1997, с.164-165 и 245. Вечернее заседание 3 марта и вечернее заседание 4 марта 1938 года, см.: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trotsky/trotsud.htm>.

有密切的联系，并拥有相当大数量的反革命骨干。包括在实施‘宫廷政变’计划时应利用拉脱维亚的武装组织。”^①

已是耄耋老人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曾与作家丘耶夫谈到了鲁祖塔克。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所讲的一切，从内容看，与以上历史学家引用的材料非常相似。比如，几十年之后，莫洛托夫是这样回忆鲁祖塔克的：

“很难说他为什么倒霉，但我认为，问题出在聚集在他那里的一帮人身上，一些非党人士，天晓得那是些什么人。看来契卡人员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并进行了汇报。在这一问题上，草率行事的可能性很小。具体到他，草率行事的可能性更小。但应该说，他在契卡人员面前表现坚定，表现了他的性格。我们来到国家安全部门。我在场，还有米高扬。我觉得，还有几个政治局委员……

他抱怨契卡人员对他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方法。但他没有交代任何问题。

‘对强加给我的不实之词，我什么都不承认。’这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鲁祖塔克说，打他非常狠，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傲然屹立。看来确实打得不轻。

——这样做经过贝利亚同意了吗？

——并非没有他的参与。

——如果您对他那么了解，难道您不能为他鸣不平吗？

——要知道，不能仅仅是因为个人印象这样做！我们有材料。

——如果您坚信……

——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怎么会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了，如果听说……我与他并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他曾是我的副职，因工作而见面。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聪明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他为自己的私事非常忙碌，在那里和某个人鬼混，鬼才晓得，与女人……作为政治局委员和我在人民委员会运输部门的副职，他越过了界限。

——第一副职？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290, с.484.

——不，那时候还没有第一副职。鲁祖塔克是第四位副手。

——指控他什么？

——我现在已不记得。他说：‘不，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正确的。我坚决否认。于是在这里对我进行折磨，搞强迫。我什么也不签。’

——这事向斯大林报告了吗？

——报告了。他也能说他无罪。斯大林说：‘就按你们那里的规定做吧。’实际上斯大林对鲁祖塔克很好。

——可是，还是处决了他？

——处决了。

——也许，他无罪？

——但我不能百分之百地担保他的表现是诚实的。他与安季波夫、丘巴尔关系很好。

——《真理报》现在把他写得很好……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写得也不错，甚至为他恢复了名誉并夸奖他……

如果根据诉讼中已澄清的问题进行判断，则鲁祖塔克是右派执行恐怖计划和推翻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的积极参与者。因此我认为，他是有罪的人，而且他的表现非常固执和怀有抵触情绪。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不想和契卡人员说话。而既然已经落入这样的境地，他还想和谁说话呢？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提出了某些怀疑，对他的判决是否正确。但当我读了以前读过的东西……在审判中他作为右派积极参与者的面目确实被揭露无余。而他确实与雷科夫和托姆斯基有私人联系。”^①

与莫洛托夫不同，卡冈诺维奇的话不多，但他的话与斯大林谈到的关于鲁祖塔克及其乱七八糟的联系非常相似：

“至于鲁祖塔克，他被指责与一些小女孩儿有联系，我不知道，从法律角度讲，这算什么。”^②

亚·莫·罗森布吕姆的供词

扬森与彼得罗夫引用了弗里诺夫斯基的报告，那里谈到了有关立即处

^①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С.484-485.

^② Ф.И.Чуев. *Каганович. Шепилов*. С.117.

决扎科夫斯基的任务，以便不让贝利亚得到真实情况：

“1938年8月27~28日，叶夫多基莫夫给我打电话并请我到他的住处。我们谈完话后，叶夫多基莫夫总结说，如果有导致我们参与犯罪活动暴露的某种疏漏，必须在贝利亚来之前，将这些疏漏弥补好。他当即对我说：‘你去查一下，扎科夫斯基是否已经被处决，亚戈达的人是否已全部被处决。’我进行了检查并查清，扎科夫斯基、米罗诺夫和一批其他契卡人员已于8月26~27日被处决。”^①

扎科夫斯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阴谋集团成员，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也是该集团成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中，扎科夫斯基在1939年1月10日的密电中被点名，说他是将对肉体残酷折磨“从例外变成规则”的人（关于密电见以下段落）。赫鲁晓夫了解密电的整个内容，但在“秘密报告”中，他没有引用提到扎科夫斯基的段落，因为这可能导致对他的说法产生怀疑，赫鲁晓夫试图把情况描绘成：扎科夫斯基的行动是与斯大林协调一致的。

伊·德·卡巴科夫案

我们发现，在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米尔佐扬的平反材料中，提到了卡巴科夫：

“米尔佐扬继续交代说，1930~1933年在乌拉尔时，他好像与右派领导人之一的卡巴科夫有过联系，那时卡巴科夫正在进行反革命活动，而在1933~1938年，似乎正是他根据雷科夫和布哈林布置的任务，领导了哈萨克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活动。”^②

在弗·皮亚特尼茨基所著的《反斯大林阴谋》一书中公开了以下的一份中央决议：

1937年5月17~19日以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询问的方式通过

^① Jansen, Petrov. P.151. Цит. по: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45. См. также: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frinovskiyru.pdf>.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Док. №52, с.280.*

.....

2. 关于卡巴科夫

批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下述提议：

“根据现有的有关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被指控参与右派反革命中心材料，将卡巴科夫清除出党中央，开除党籍，将他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①

叶若夫在中央六月全会（1937年）上所做的关于揭露大型阴谋活动的报告中提到了卡巴科夫。

“叶若夫在其报告中，概括地描述了大规模的反斯大林阴谋活动。据推测，早在1933年，根据各地反对派的提议，成立了联合的‘中心中的中心’，包括右派代表雷科夫、托姆斯基、布哈林，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分子、红军代表叶努基泽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分子以及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代表加米涅夫和索科尔尼科夫、托洛茨基分子的代表皮亚塔科夫。‘中心中的中心’，或称‘联盟中心’的基本任务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和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如已通报的，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界阴谋分子和亚戈达及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也服从于‘中心中的中心’领导。根据叶若夫的描绘，阴谋者中包括每一个共和国和州的领导人。他点了以下一些地区的领导人：库尔斯克的舍博尔达耶夫，伊尔库茨克的拉祖莫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卡巴科夫，斯摩棱斯克的鲁缅采夫，他们都是中央委员，并在全会前被捕。”^②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阿·雅·斯托利亚尔的报告中，卡巴科夫被称为乌拉尔反革命组织的头目：

“根据州委现有的材料和州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授权机构五个被捕的工作人员的供词，监察机关委员会特派员布哈林和党的委员会秘书诺索夫被揭发出是人民的敌人，并且是卡巴科夫领导的乌拉尔反革命组织的积极参与者。”^③

① В.И.Пятницкий. *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 —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8, с.58. То же решение цитирует Роговин в: В.З.Роговин. 1937. — М., 1996, глава «Июньский Пленум ЦК»: http://trst.narod.ru/rogovin/t4/1v.htm#ftnref_05.

② Jansen, Petrov. P.75, 233.

③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 276, с.463.

在右派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诉讼案中（1938年），被告祖巴列夫称卡巴科夫早在1929年就已是在乌拉尔建立的阴谋集团的参与者之一：

“祖巴列夫：当我对此同意之后，他（亚·彼·斯米尔诺夫——作者注）当时对我说，我在乌拉尔并非孤军奋战，在乌拉尔反革命组织中有积极的非常有影响的成员，他通过雷科夫与‘联盟中心’有直接的联系。他说的是卡巴科夫……”

雷科夫用亚·彼·斯米尔诺夫的话说，他是从他那儿知道，我是右派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我向他概述了乌拉尔地区总的形势，我们组织的一些情况，并指出早在1929年年底，即12月，我们与卡巴科夫组织了州的领导小组，该小组负责整个工作的联络。我对他说了该小组的成员有卡巴科夫、我、索韦特尼科夫等。我还向他谈了我根据斯米尔诺夫布置的任务，也就是通过卡巴科夫和他——雷科夫所要进行的工作。”^①

被告阿·伊·雷科夫证实了祖巴列夫在审判中的供词：

“雷科夫：我们的组织在各个地方都有一批参与者，如已经列举的那样，包括像卡巴科夫这样的人……”^②

在波斯佩洛夫的报告中提到了卡巴科夫的名字。该报告称，“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揭露了’一个所谓的‘乌拉尔起义司令部’——由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宗教界人士和俄罗斯全军联盟代理机构组成的机构，司令部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卡巴科夫领导，他是191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这一司令部按军事组织的方式将200个分支组织、15个起义组织和56个集团联合在一起。”^③

美国矿山工程师约翰·利特尔佩奇在其书中有几页是这样描写卡巴科夫的：

“当时我已经清楚，该委员会成员及其在卡拉塔（基洛夫格勒的旧称——译者注）^④的行为直接源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共产党当局的指示，他们应

① Судебный отчёт. —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емья, 1997, с. 125-126. Утреннее и вечернее заседания 3 марта 1938 года, см.: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trotsky/trotsud.htm>.

② Там же, с.144. Вечернее заседания 3 марта 1938 года, см.: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trotsky/trotsud.htm>.

③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23;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С.192.

④ 卡拉塔，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卡拉塔铜厂开采石英的工人的居住地。

该为自己犯罪性的玩忽职守以及直接参与这些煤矿发生的那些事件，而被诉诸法院。

其实，一个姓氏为卡巴科夫的人，自1922年直至乌拉尔矿山和工业发展的整个鼎盛时期，一直担任乌拉尔共产党第一书记。根据某些我完全不清楚的原因，他得到了克里姆林宫充分的信任，他无所不能，被非正式地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乌拉尔国王’。

如果考察一下他的人品，则找不到任何能与他的威望名实相符的东西。在他长期管理期间，乌拉尔，这一俄罗斯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被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进行了开发，却从来没有生产出它理应提供的东西。

……我对我的某些俄罗斯熟人说过，乌拉尔现在做的这些事，很明显是来自某个上层的旨意。

如果这曾使我不安，那么，在1937年1月对皮亚塔科夫和许多其他同谋的阴谋案审判后，所有这些事件变得容易理解了。公审中他们承认，自1931年，他们参与了在矿山、铁路和其他工业企业组织怠工的行动。在审判和判处皮亚塔科夫死刑之后几个星期，乌拉尔第一书记和与皮亚塔科夫关系最密切的同谋卡巴科夫因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也被逮捕。”^①

斯·维·柯秀尔、弗·雅·丘巴尔、帕·彼·波斯特舍夫

直到2006年才公布的叶若夫1939年4月26日的供词，提到了柯秀尔和丘巴尔，他们曾“造访”间谍诺登，而诺登曾招募叶若夫：

“在诺登曾指导过的许多人中，我准确记着的有加马尔尼克、亚基尔、丘巴尔、彼得罗夫斯基、柯秀尔、魏因贝格和梅塔利科夫。诺登也曾指导过我。”^②

在波斯特舍夫的平反材料中，我们读到了有关柯秀尔和丘巴尔的以下情况：

“柯秀尔在侦查开始时曾交代波斯特舍夫是乌克兰军人阴谋活动的参与者，之后又否认了这些供词，但后来又再次对其供词予以确认。

^① John D. Littlepage, Demaree Bess. *In Search of Soviet Gold*. P.100-101.

^②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57. С 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ezhovru.pdf>.

在柯秀尔的案卷中，有一份安季波夫的声明。声明中他确认，柯秀尔与波斯特舍夫之间存在着非常不正常的个人关系，波斯特舍夫并没有加入乌克兰反革命组织的总中心。在这一情况下，柯秀尔关于波斯特舍夫供词的真实性引起了很大的怀疑。”^①

但波斯特舍夫本人进行了报复，他同样揭发了柯秀尔：

“波斯特舍夫承认以下犯罪活动：他自 1934 年成为在乌克兰行动的反革命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中心成员，并与柯秀尔和其他组织者参与了反革命破坏活动。

波斯特舍夫还承认，他自 1920 年起就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被捕前，提供了涉及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

在预审和法庭上，波斯特舍夫均承认自己有罪，在审讯波斯特舍夫的记录中阐明的事实，检查中没有得到证实。

比如，波斯特舍夫的‘供词’称，在反革命活动中，他自己与弗·阿·巴利茨基、斯·维·柯秀尔、约·埃·亚基尔、弗·雅·丘巴尔、尼·尼·波波夫、伊·安·穆斯利巴斯及其他乌克兰反苏组织参加者有联系。”（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②

同样，波斯特舍夫和柯秀尔也在弗·雅·丘巴尔和基·瓦·苏霍姆林的平反材料中被提及：

“指控丘巴尔参与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组织的根据是被捕的安季波夫、柯秀尔、普拉姆奈克、苏霍姆林、波斯特舍夫、博尔德列夫等人的间接证词。他们称他是反革命组织成员，与此同时还引证了雷科夫、格林科、布勃诺夫的证词，而根据他们的证词，丘巴尔不可能逃脱惩罚……”

指控苏霍姆林参加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组织和充当日本情报机关间谍的依据是被捕的佳格尼别达、马尔恰克、舒米亚茨基、叶尔莫连科等人的证词，他们引证了柯秀尔、波斯特舍夫、亚基尔和其他人的话。”（黑体字为作者所标）^③

关于丘巴尔，卡冈诺维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了以下几句话：

“总的情绪和社会舆论是这样的：这是不可能的。我曾为柯秀尔、丘巴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219.*

^② 同上，第 218 页。

^③ 同上，第 251~252 页。

尔辩解，但当给我看了丘巴尔所写的一大本东西，他亲笔所写的供词，我只能两手一摊！

……组织了一次当面对质。斯大林说：‘去检查一次吧。’检查了柯秀尔、丘巴尔的案卷，但他们未能得救。”^①

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说，在一次当面对质中他本人在场。被逮捕的安季波夫——丘巴尔的朋友，提交了反对后者的供词，而丘巴尔则坚决否认对自己的指控。由于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关系，莫洛托夫对他们两人都很了解。^②

从1938年6月16日政治局的决议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之前，已收集了相当多的反对丘巴尔的指控材料，但只是罢免了他的职务，并没有逮捕他：

……

60 —关于弗·雅·丘巴尔同志

(1) 鉴于柯秀尔、埃赫、特·丘巴尔以及鲁祖塔克和安季波夫的供词都对弗·雅·丘巴尔提出疑问（粗体字为作者所标），中央政治局不认为他可以继续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并认为，让他到省里工作并接受考验是可能的。

(2) 关于丘巴尔同志的具体工作将在最近两天内予以解决。^③

根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柯秀尔于1938年5月3日被捕，即在贝利亚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前几个月。报告说：“从被关押到列福尔托沃监狱一开始，就对他进行了最野蛮的拷打，进行连续不断的超过14个小时的审讯，夜间也不让他睡觉，剥夺了他最低限度的休息权利。”^④ 1956年发现，对柯秀尔案进行的54次审讯中，只有四次有审讯记录。以上所说只能证实上述弗里诺夫斯基声明中的许多说法是正确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前局长德·马·德米特里耶夫的供词证实：

① Ф.И.Чуев. *Каганович. Шенилов*. С.117.

②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С.486-487.

③ Вслед за этим Чубарь был назначен начальник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ликамского целлюлозного комбината.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С. 167-168.

④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26.

“柳什科夫告诉我，列普列夫斯基到乌克兰后，大张旗鼓地清洗巴利茨基的人。他逮捕了一大批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指控他们根据巴利茨基下达的任务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隐藏了一批根据此任务进行活动的阴谋者。

列普列夫斯基与右派的斗争是按照下述方式进行的：设法保障组织的头目免遭揭发。这里具体指的是斯·维·柯秀尔，而根据柳什科夫的说法，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柯秀尔指挥的……

同时，我有一个印象，巴利茨基和列普列夫斯基相互干架，他们的私人关系势不两立。列普列夫斯基告知，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他和巴利茨基共同参与了由柯秀尔领导的反革命地下活动，而柯秀尔是乌克兰隐藏最深的右派人物之一。”（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①

亚·瓦·科萨列夫

叶若夫的外甥、与他参加了同一个阴谋集团的阿纳托利·巴布林，提交了关于叶若夫及其妻子叶夫根尼娅·所罗门诺夫娜“道德堕落”的证词。他告诉侦查人员，科萨列夫与皮亚塔科夫等人一样，是“叶若夫家最常来客人”之一：

“叶若夫及其妻子叶夫根尼娅·所罗门诺夫娜有一个很大的熟人圈子，他们与这些人保持着朋友关系并经常在自己家接待他们。最常到叶若夫家的人有：皮亚塔科夫、苏联前国家银行行长马利亚辛、国家银行外国部前主管斯瓦尼泽、前驻英国商务代表博戈莫洛夫、《农民报》编辑谢苗·乌里茨基、米哈伊尔·科利佐夫、亚·瓦·科萨列夫、雷若夫及其妻子季娜伊达·格利金娜，还有季娜伊达·科里曼。”^②

根据维克多·巴布林（阿纳托利·巴布林的兄弟）的供词，扬森和彼得罗夫试图对科萨列夫与叶若夫夫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维克多·巴布林将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和工业学院大学生尼古拉·巴雷什尼科夫列入与她（叶夫根尼娅·所罗门诺夫娜——作者注）有暧昧关系的人之中。前共青团领袖科萨列夫（叶夫根尼娅所供职的《苏联在建设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 356, с. 590-591.

^②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С.75.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babulinru.pdf>.

中》杂志的主编)于1938年11月28日被羁押,在次年2月23日被处决。他是因参与所谓‘共青团阴谋’而被捕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案件与叶若夫有什么关联。”^①

瓦季姆·罗戈温强调:在1938年11月19~22日的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科萨列夫的活动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科萨列夫试图为自己辩护,“将‘不少情况下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前面’归功于自己,并列举了大量‘根据我们的材料’和‘在我们调查之后’逮捕共青团人员的例子”。尽管他为自己辩护,但“全会解除了科萨列夫和四名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职务,因为他们‘对试图揭发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中存在缺点的诚实的共青团工作人员抱冷漠的官僚主义的敌视态度,对一位最优秀的共青团工作人员进行了镇压(即米沙科娃同志的案件)’。”^②

正如1930年代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阿卡基·姆格拉泽在其回忆录中所指出的,他曾在一次与斯大林的私人交谈中提到了关于科萨列夫的问题,在谈话中斯大林说:

“关于科萨列夫的问题,在政治局进行了两次讨论。委托日丹诺夫和安德烈耶夫对材料进行核查,他们确认米沙科娃和其他人的声明符合事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也没有疑问。”^③

姆格拉泽曾认为,科萨列夫无罪,或是因个人恩怨遭到了贝利亚的诬陷,或者是成了错误判决的牺牲品。尽管如此,他承认:

“我看了撤销科萨列夫职务的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无论日丹诺夫和安德烈耶夫的讲话,还是什基里亚托夫的报告,依据都很充分,不可能提出任何怀疑。”^④

正如姆格拉泽所指出的,斯大林之后强调,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在不少诚实的人蒙难的1937年,犯的错误特别多。但在谈论这些错误时,斯大林并不认为,这与科萨列夫案件有什么关系。

① Jansen and Petrov. P.185.

② В.З.Роговин.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 М.: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97, глава «Комсомол». См.: <http://trst.narod.ru/rogovin/t5/xxvi.htm>.

③ А.И.Мгеладзе. *Сталин. Каким я его знал*. С.172.

④ 同上。

“处决名单”

阿·弗·斯涅戈夫曾两次被列入“处决名单”，而且两次都是被列入“第一类”判决（死刑），即被列入列宁格勒州 1937 年 12 月 7 日的名单^①和 1940 年 9 月 6 日的名单^②。尽管如此，斯涅戈夫活了下来，他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之一，最后死于 1970 年代。

在互联网上公布“处决名单”的文章前言中指出：

“列入我们公布的 1938 年名单（这些名单列在第十一卷中）中的许多人，不仅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刑^③，而且也被其他司法机构（具有普通审判权的法庭和法院）判决（但已相当晚）。且常常没有按名单确定的判决执行枪决，而是给予其他处罚措施，有时甚至将人释放。比如对 1938 年 9 月 29 日签署的古比雪夫州名单的抽查研究表明，名单中没有一个人是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决的，相当一部分案件已完全终止。”^④

还有：

“……在这 346 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枪决了。比如，契卡人员格·亚·萨拉莫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弗·米·库尔斯基的秘书，也是与其关系最密切的工作人员）曾被判发配到劳改营，到 1989~1990 年他依然健在，《真理报》说他是‘斯大林镇压的无辜牺牲品’。而这是否意味着乌尔里希在量刑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甚至在政治局批准了处决人员的名单之后，或在名单批准和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之间他得到了新的指示，这只能进行猜想了。”^⑤

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 年）决议

在对 1938 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决议进行评论时，约翰·格蒂和奥·瑙莫夫指出：

“比如，对党的大规模破坏（并非没有某些根据）的罪责由许多党的第

① См.: <http://stalin.memo.ru/spiski/pg05245.htm>

② См.: <http://stalin.memo.ru/spiski/pg13026.htm> и справку <http://stalin.memo.ru/spravki/13-383.HTM>.

③ ВК ВС — Вое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④ См.: <http://www.memo.ru/history/vkvs/images/intro.htm>.

⑤ 同上，注 12。

一书记承担，他们大部分已被解除职务……

之后的岁月（1938年一月全会之后——作者注）大规模开除党员的情况停止了，多数被开除党籍的人恢复了党籍，并自1933年中止发展党员之后首次开始吸收新的党员。”^①

罗伯特·特斯顿指出了1938年镇压政策的其他特点：

“维辛斯基‘对整个恐怖方针提出怀疑’。‘没有总书记（指斯大林——作者注）的批准，检察院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行采取措施反对和制止恐怖行动。’

丘亚诺夫的证明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已经失控，如果不说是在全苏范围内……但这里收集的所有证据说明，恐怖活动留下了两种情况的痕迹：一种情况是斯大林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准备了公开审判，并且在1937年要求不按程序地抓捕成千上万的人；另一种情况是，一些机关并没有按斯大林的指示行动，制造了假案，对人们进行拷打，让自己的机构变成了独立王国。”（粗体字为作者所标）^②

伊·亚·贝内迪克托夫也高度评价了中央一月全会决议对制止恐怖活动的意义：

“毫无疑问，斯大林知道在镇压中出现了为所欲为和目无法纪的情况，他受到这一问题的折磨，并采取了纠正过火行为的具体措施，释放了被监禁的诚实的人。顺便提一下，对那一时期的诬陷者和告密者，也没有特别客气。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揭发后，被关进了曾被他们残害的人住过的集中营。一个荒谬的现象是，当他们中的某些人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获得自由后，开始大喊大嚷斯大林目无法纪，调子比任何人都高，甚至还挖空心思地要出版这方面的回忆录！

……联共（布）中央1938年一月全会公开承认在对待诚实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方面有违法行为，并就此通过了专门的决议，而且将这一决议公布在所有的中央报纸上。同样开诚布公的是，在1939年举行的联共（布）

^① J.Getty, O.V.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PP.496-497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главу 12). См. также: Ю.Н.Жуков.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нков.* — М.: ТЕРРА, 2000, глава 2, с.33-55.

^② R.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P. 109, 112.

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谈到了无根据镇压带来的危害。1938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成千上万遭到非法镇压的人从监禁地返回，其中包括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他们都被正式恢复名誉，对于某些人，斯大林还亲自道歉。”^①

列夫·巴拉扬在其《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一书中强调，恐怖活动不是自行终止的，而是被中央领导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决议制止的：

“鉴于存在违背社会主义法治的事实，1938年总共通过了六个联共（布）中央决议。除了以上已经列举的外，它们是：《关于改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机构》的决议（3月28日）；《关于改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决议（9月13日）；《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决议（9月23日）；《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登记、核查和批准》的决议（11月14日）；《关于逮捕协商办法》的决议（与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决议，12月1日）。1938年11月2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部负责人（拉·帕·贝利亚——作者注）下令撤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②

巴拉扬接着说：

“1939年2月1日，苏联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报告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根据沃洛格达州委书记的请求，军事检察院查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沃洛格达州局一批工作人员进行的特别危险的犯罪活动事实。如已经查明的那样，刑事案造假者撰写了对被告的虚假的审讯记录，似乎被告承认自己进行了极其重大的犯罪活动……审讯惨无人道，对被审讯人进行了各种可能的殴打。以至于在审讯期间有四名受审的人被活活打死。”^③

① И.А.Бенедиктов. О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ёве.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9, № 4. См.: <http://stalinism.newmail.ru/benedikt.htm>.

② Л.А.Балаян. *Сталин и Хрущёв*. См. глава «"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 Никиты Хрущёва»: <http://www.stalin.ru/book.php?action=header&id=6>.

在谈及撤销“三人小组”时，巴拉扬引用了来自《镇压：检察官们的命运》一书中的资料，但1938年11月26日的日期是错误的，实际上决议的日期是1938年11月17日。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Лб 362. С. 607-611. 除了3月12日的决议外，该书公布了所有其他决议。

③ Документ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8-1941 гг.* / Сост. А.В.Квашонкин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1999, док. 239, с.398-400.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vyshinsky_stalinfeb0139.html.

“在吸收内务人民委员部沃洛格达局和沃洛格达检察院小范围业务人员参加的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审判庭秘密庭审中，听取了这起最严重的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的犯罪案件。作为这一滔天犯罪活动的策划人和组织人，被告弗拉索夫、列别杰夫和罗斯库利亚托夫被判处极刑——处决，其他七名同伙被判剥夺自由，长期监禁。全国有 11842 名像弗拉索夫、列别杰夫和罗斯库利亚托夫这样的坏蛋被镇压，甚至在不计后果和‘一面倒’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委员会，也不认为这些人平反是可能的。恰恰是这些被指控无根据进行大规模逮捕和采用非法侦查手段的刑事案件造假者，甚至半个世纪过后，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 1989 年 1 月 16 日命令仍拒绝为他们平反的人，应对‘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镇压’承担罪责。但赫鲁晓夫，而之后是被提拔起来的他的门徒戈尔巴乔夫却成功地将这一罪责‘安在’已去世的约·维·斯大林身上。”^①

扬森和彼得罗夫写了假案制造者中的另一个人物——亚·伊·乌斯片斯基，他自 1938 年 1 月成为赫鲁晓夫在乌克兰进行镇压活动的“右手”：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领导人以沉默方式抵制叶若夫，叶若夫只有以逮捕相威胁才能迫使他们进行大规模行动的观点，与会议的另一个参加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奥伦堡局局长亚·伊·乌斯片斯基的供词（1939 年 4 月对他审讯时得到的）相矛盾。根据他的话，他们‘相互赶超攀比，看谁的报告中逮捕人的数量大’。当然，在谈及已抓捕的人时，他错了，因为在会议上谈的是每一个州未来的抓人数字。乌斯片斯基证实，在叶若夫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打击吧，消灭吧，不必瞻前顾后！’乌斯片斯基引证了叶若夫关于消灭敌人的话，即‘部分无辜的人也将被消灭’，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在另外两个文献资料中列举了相似的说法：叶若夫宣布，‘如果在行动中有 1000 个无关的人被枪杀，将不会出现大的不幸’。”

“会议（指 1937 年 7 月 16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会议——作者注）期间，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与每一个到会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座谈，

^① Л.А.Балаян. *Цит. соч.* См.: <http://www.stalin.su/book.php?action=header&id=6>.

讨论他们要求逮捕和处决的人数，向他们下达与准备和采取行动有关的措施。米罗诺夫向叶若夫报告了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领导层揭露的‘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集团’。当他谈及拘留某些人的证据说服力不强时，叶若夫反驳说：‘你为什么不逮捕他们？我们不想为你工作，把他们关进监狱，然后进行分类，把那些证据不足的人分出来。大胆行动吧，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你说了。’他还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争得米罗诺夫的同意，处长们可以采取‘体罚措施’。当乌斯片斯基问叶若夫，对70岁的被捕者怎么办时，他的指示是枪毙……乌斯片斯基为他（指叶若夫——作者注）餐桌上的醉话感到吃惊和不安。在出差（到乌克兰——作者注）期间，叶若夫一直在喝酒，并向乌斯片斯基炫耀，政治局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可以真正做任何事，逮捕任何人，包括政治局委员。”^①

阿列克谢·纳谢德金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局前局长，1938年5月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他用以下方式描述了1938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部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

“叶若夫赞同那些提出了‘天文’镇压数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行动，比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西西伯利亚局局长汇报的逮捕数字是55000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德米特里耶夫汇报的是40000人；白俄罗斯的贝尔曼：60000人；奥伦堡的乌斯片斯基：40000人；远东的柳什科夫：70000人；莫斯科州的雷德斯：50000人。”^②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局的每一位领导人汇报的数字均为30000~40000人。听了这些数字，叶若夫在自己最后的意见中，夸奖了所有表现‘优秀者’，并宣称，毫无疑问，在哪儿都会有过火行为，比如，在古比雪夫根据波斯特舍夫的指示，茹拉夫廖夫把州里全部的积极分子都关进了监狱。但他立即补充说：‘在这样的大规模行动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③

“贝利亚反革命集团”

罗伯特·特斯顿详细描写了赫鲁晓夫如何歪曲贝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

^① Jansen, Petrov. PP.84-85, 133.

^② 提请注意：雷德斯与赫鲁晓夫在同一个“三人小组”。

^③ Jansen, Petrov. P.131

员部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

“赫鲁晓夫当时断言，在贝利亚时期，内务部机关随意使用刑讯，其规模比以前更大了。不能认为这样的说法值得相信，因为赫鲁晓夫报告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贝利亚描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和斯大林去世后最坏的政治对手。

以负面色彩表现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罔顾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后所发生情况的第一手证据而有意为之的。根据斯摩棱斯克律师鲍里斯·梅尼沙金的评论，贝利亚‘立即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自由主义’，如当地居民亚历山大·魏斯伯格所指出的，‘抓人数量几乎降至零’……取而代之的是开始执行新的、更好的政策。在1939~1941年，政治镇压活动急剧下降……

1938年末，在监狱和劳改营被监禁的人恢复了亚戈达时期曾拥有和在叶若夫时期被剥夺的可以看书、下象棋和进行其他娱乐活动的权利……现在，侦查人员开始彬彬有礼地用‘您’来称呼，而不再是粗鲁地称呼‘你’了……与赫鲁晓夫的说法相反，刑讯再次成为例外手段……拉·瓦·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玛丽亚·约费、阿卜杜拉赫曼·阿夫托尔汉诺夫，如同其他被关押的人一样，都指出，在贝利亚掌控‘机关’后，那里原先存在的体罚方法不再被使用。

贝利亚时期，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了清洗，这导致叶若夫的大多数副职和较低层的领导人被罢免。”^①

如波斯佩洛夫报告所指出的，1939~1940年与1937~1938年相比，被捕人员数量下降了近90%：

年份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逮捕人数	114456	88873	918671	629695	41627	127313
其中处决人数	1229	1118	353074	328618	2601	1863

从上表得出结论，在1939~1940年被处决的人数不及1937~1938年被处决人数的1%。^②

^① R.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P.118.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17. См. также: <http://www.idf.ru/2/7.shtml>.

在1938年11月下半月叶若夫辞职后，^① 内务人民委员部由贝利亚领导。因此，从1939年开始的一个时间段，是“机关”所有管理权力集中在贝利亚手中的一个时期。

“关于刑讯的密电”

约翰·阿奇·格蒂发现了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读的电报非常相似的原件：

“在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斯大林1939年关于审讯时采用‘体罚方法’的著名指示，赫鲁晓夫曾在其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提到了该指示（见《平反：1930~1950年代的政治进程》）。这份日期为7月27日的电报（而不是赫鲁晓夫所说的1月10日）是斯大林发给所有州委书记的。电报中引用了直还没有找到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体罚方法的许可。有意思的是，电报写于尼·伊·叶若夫被免去职务之后，而在赫鲁晓夫删除的一个段落中，指控叶若夫的下属肆无忌惮地使用刑讯手段，把刑讯‘由例外变为规则’。”^②

以下是1939年1月10日密电的全文（赫鲁晓夫报告中引用的段落用粗体标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密电

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局局长：

联共中央得知，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时，把对被捕的人进行体罚作为犯罪活动指责他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如下说明：自1937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实践中使用体罚措施是经联共中央批准允许的。与此同时指出，体罚是作为例外允许使用的，而且仅仅是针对那些公开的人民公敌，针对那些用人道的审讯方法则公然拒绝交代的阴谋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363, с.611.

② J.A.Getty. "Excesses Are Not Permitted." // *The Russian Review*. Vol. 61 (January 2002), p.114 n.45.

者，他们在监狱中继续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经验证明，这样的规定产生了效果，大大加快了对人民公敌的揭露。的确，在之后的实践中，体罚的方法被扎科夫斯基、利特温、乌斯片斯基等坏人玷污了，因为他们把这一方法由例外变为规则，对偶然被捕的诚实的人也开始进行体罚，为此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丝毫无损于这一方法本身，在实践中应正确地使用这一方法。众所周知，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是极其卑劣的体罚方式。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死不悔改的间谍、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中央认为，体罚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法，今后肯定会继续使用——是作为例外对那些显然是人民公敌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使用。联共中央要求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在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时遵循本说明。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①

关于允许“体罚方法”，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57年）上进行了讨论：

赫鲁晓夫：我想提供一个情况。显而易见，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不会拒绝确认，即我们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根据我的记忆，二十大前夕或代表大会之后，卡冈诺维奇说，有一个大家都签署的文件，即允许可以拷打被捕的人。卡冈诺维奇提议将这一文件废除和销毁。查找这一文件的任务交给了马林，但文件未能找到，它已经被销毁。有没有这样的谈话？

卡冈诺维奇：我确实想起来了，那是在讨论“个人崇拜”问题时，我想起了这一文件，自己还谈到了该文件，谁也没有强迫我：有这样的文件，应当找到该文件，但我没有使用“销毁”一词。

^① Цит. по: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С.223-224.

有人插话：为什么要找到它？

卡冈诺维奇：看一看。我说此话是为了证实“个人崇拜”的存在。回忆这一有我签字的文件有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你担心其他人会找到这一文件。

卡冈诺维奇：这样解释是不正确的。我讲话是为了证实我们曾有过反常行为。而“销毁”一词，是在添油加醋。

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讲的不是实话，他在撒谎。我什么话都没有加。我们布置了找到这一文件的任务，但没有找到，文件已经被销毁。

卡冈诺维奇：为什么我要惦记这个文件？

其他人插话：其他人可能会想起来。

卡冈诺维奇：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是我自己说的，有这样的文件，应该把它找到。

赫鲁晓夫：你当时甚至讲过，是在什么气氛中写了这一决议和有谁签了字。

卡冈诺维奇：是的，我说了。大家都坐在这里，都在会上，文件是手写的，所有人都签了字。

赫鲁晓夫：谁签了名？

伏罗希洛夫：我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文件，不仅如此，我还要说，如果有类似的东西建议让我签字，我会嗤之以鼻。我在监狱中挨过打，要我认罪。我没有认罪，我怎么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呢？可你说：我们都坐在这里，大家都签字了。不能这样，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掌声）

卡冈诺维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这样的文件正式发给了州委。让我们再找一找。

赫鲁晓夫：这样的电报确实发过。而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文件。你讲一讲，你们是怎么坐着的，是怎么写出来的。你说：我们大家都签字了。大家都是谁？我不知道。

卡冈诺维奇：记得不确切。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签字了吗？

卡冈诺维奇：签了。

赫鲁晓夫：文件是谁写的？

卡冈诺维奇：是斯大林亲笔写的。有文件，发给党的所有州委。

有人插话：这是另一个文件，我们大家都知道。

赫鲁晓夫：但原件已经被销毁？

莫洛托夫：关于现在所说的对间谍等可以采用体罚措施的电报，发给了所有中央委员和所有州委。

马林：中央委员会档案馆没有原件，原件已经被销毁。只有发往州委的电报的副本。

阿里斯托夫：只在达吉斯坦党委会找到了副本。

朱可夫：是谁签署的？

马林：斯大林。

赫鲁晓夫：所有人都记着这一文件，大家都收到了。

莫洛托夫：那里讲的是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体罚措施。

列别杰夫：这么说，所有被抓进监狱的党的工作人员都是间谍。

莫洛托夫：众所周知，我也曾被怀疑过。^①

伊·贝内迪克托夫确认，1950年代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大量文件被销毁：

“主管部门的人告诉我，赫鲁晓夫曾下达指示销毁一系列关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镇压情况的文件。当然，首先他要极力隐瞒他在莫斯科和乌克兰参与非法活动的情况，而在这两个地方，为了得到中央的赏识，他杀害了不少无辜的人。同时还销毁了另一类文件，即能证明1930年代末采取的针对某些著名党和军事活动家镇压行动是有充分根据的文件。战术是非常清楚的：把自己摘出来，把违法的责任全部嫁祸于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视这些人自己权力的主要威胁。”^②

^①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Под ред. акад. А.Н.Яковлева. — М.: МФД, 1998, с. 121-122.

^② И.А.Бенедиктов. О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ёве.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9, № 4. См.: <http://stalinism.newmail.ru/benedikt.htm>.

根据贝利亚的指示，罗多斯残酷殴打了柯秀尔和丘巴尔

从1956年2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可以看出，“关于罗多斯案件”问题被列入日程，赫鲁晓夫利用这一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个人崇拜”。

关于罗多斯案件

鲁坚科，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米高扬，马林科夫，波斯佩洛夫，苏斯洛夫，谢罗夫。

莫洛托夫：罗多斯现在表现怎么样？

赫鲁晓夫：罗多斯知道已经为许多人恢复了名誉。

赫鲁晓夫同志的问题（对罗多斯）：讲讲波斯特舍夫和柯秀尔同志，您是怎样宣布他们是敌人的。

赫鲁晓夫：责任在更高层。竟让刑事犯罪分子来办理这类案件。责任在斯大林。

阿里斯托夫：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讲真话？

阿里斯托夫：埃赫直到最后也拒绝认罪，但还是被处决了。

赫鲁晓夫：叶若夫也许无罪，是一个诚实的人……亚戈达，或许也是一个清白的人。可能叶若夫也是一个清白的人。基本上说得正确。应根据党的利益来决策。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的是野蛮方式。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粉碎了一个人最神圣的东西。他让一切屈从于自己的任性。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问题。应确定路线——给予斯大林应有的地位（对宣传画和书籍进行清理）。要宣传马列路线。

赫鲁晓夫：要加大对个人崇拜的抨击。^①

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08-309.

第 185 号

第一条 关于鲍·韦·罗多斯案件（赫鲁晓夫、鲁坚科、谢罗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弗、波斯佩洛夫等同志）

将鲍·韦·罗多斯移交法庭，其案件将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秘密审理……^①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I. С.310.

第五章 斯大林与战争

斯大林“没有重视”战争开始的预报

赫鲁晓夫：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

在战时期间和战后，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的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似乎是德国人对苏联搞“突然”袭击的结果……

但斯大林对这些警告不予重视。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指示：不要相信类似情报，以避免挑起战争行动。

……你们看，对一切都视而不见：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难道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千钧一发的历史时刻的洞察力吗？^①

德国的确对苏联采取了侵略行动，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大量证据驳斥了赫鲁晓夫有关战争的其他说法。

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一事进行思考的空军元帅、斯大林亲密战友之一的亚·叶·戈洛瓦诺夫认为，仅让一个人对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是不公正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5-146 и 148.

的。责任与胜利的荣誉，都应该由在那些年代处于国家和军队关键岗位上的所有人来共同承担和分享。

苏联解体后出版的文献表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预料到了德国人的进攻，但许多不同来源的情报表达得都很模糊，且相互矛盾。瓦·科日诺夫试图解释战争前夕苏联领导人失误的原因，他特别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大量的故意制造的假情报和苏联“高层”得到的情报本身相互矛盾。

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进攻前夕，为了迷惑苏联领导人，德国军队制订了散布假情报的计划。凯特尔为达到这一目的于1941年2月15日下达的详细指示现在已经被公之于众。^①

瓦吉姆·科日诺夫发现，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也有更令人吃惊的失误——未能预料到日本人会袭击珍珠港，与苏联领导人的情况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接着科日诺夫指出，历史学家从来连想都没想过因富·德·罗斯福总统没有预见到这次袭击而谴责他。就赫鲁晓夫指责的实质而言，其中的许多指责恰恰更合适针对报告人自己。比如，他指责斯大林未能预见到希特勒分子进攻的时间和主攻的方向，这意味着，他将“个人崇拜”奉为圭臬，即完全相信斯大林具有超人的能力，应该能够预见一切，只是由于某种讲不清的原因他未能利用这一能力。^②

苏联不能宣布动员令，因为这可能被理解为宣战。1914年，类似的动员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在1941年宣布动员令，希特勒便会有充分的理由宣战，而苏联则会因为存在德英条约而受害。在1940年制订的“东方”战役计划中，马尔克斯少将做了这样的解释：“俄罗斯绝不会以其对我们的进攻来为我们提供帮助。”^③

苏联也不能相信英国人的警告：英国人几乎是公开地挑动希特勒进攻苏联。如果他们不能与德国签订和约反对苏联，他们会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

① 1941 год. Документы. В 2-х кн. Кн. 1. — М.: МФД, 1998, с. 661–664. Документ: «Указание штаба 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КВ 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по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и».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germandisinfo.html>.

②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直接涉及这一问题，我们还是想提醒，现在已公开的一些文件证据证明：没有进行战备的西方面军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而德军在1941年6月22日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实际上，德·格·帕夫洛夫将军在策划失败和进行有利于德国人的阴谋活动方面罪责难逃。关于证明这一观点的引文，见本章附件。

③ 1941 год. Кн. 1. С.154.

以便至少能削弱这两个国家，这是英国执政集团中许多代表梦寐以求的事情。

远谈不上同情斯大林的基·阿·梅列茨科夫元帅在其1968年（即赫鲁晓夫辞职后）出版发行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战争爆发前几天形成的形势非常复杂和难以预测。1941年1月接替梅列茨科夫任总参谋长的格·康·朱可夫元帅，经历了战后失宠的羞辱，后来在赫鲁晓夫揭发“个人崇拜”时曾站在了赫鲁晓夫一边。但在其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元帅表达了以下坚定不移的意见：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为准备与希特勒武装力量的搏斗尽了最大的努力。

朱可夫元帅和另一位“二战”时期杰出的军事首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之间的间接争论表明，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对苏联武装力量究竟应该怎样应对可能的进攻，在意见和看法上并不完全一致。华西列夫斯基认为，要想避免苏联军队在战争初期的失败，只有在德国进攻之前红军主力就已沿边界线完成部署并进入战备状态才有可能。1965年，即赫鲁晓夫被驱逐后，朱可夫在他所做的评论中强调，他感到，华西列夫斯基对该问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还有一点虽然在“秘密报告”中没有涉及，但这里还是应该提一下来自德国驻日本使馆，即苏联最著名的谍报人员里哈德·佐尔格的预报。不久前已经得知，关于佐尔格提供了德国将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进攻的情报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伪造的文件。^①

沃龙佐夫的情报

赫鲁晓夫：应该说，此类关于苏联已面临德国军队入侵其领土威胁的情报，也从部队和外交途径得到了，但由于领导层业已形成的对这类情报的偏见，人们每一次发送这样的情报时总是胆战心惊，并加上不少说明。

比如，1941年5月6日驻柏林海军武官、海军上校沃龙佐夫报称：“苏联籍人波泽尔……通报我海军副武官，希特勒大本营的一名德国军

^① 22 июня 1941 года. Могло ли всё быть по-иному? //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2001, 16 июня. См.: http://www.redstar.ru/2001/06/16_06/4_01.html.

官说，德国人拟于5月14日通过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和拉脱维亚进攻苏联。同时还确定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强大的空袭，而伞兵将在一些边境地区的中心登陆……”^①

关于上述情况，我们准确地知道：赫鲁晓夫在有意识地搞欺骗，因为我们拥有海军上将尼·戈·库兹涅佐夫的报告文本。在报告中，他向斯大林通报了沃龙佐夫紧急电报的内容并补充了对该电报内容的评价。但库兹涅佐夫的意见在“秘密报告”中被删除了，这样便从根本上歪曲了这一情报的实质。赫鲁晓夫有意向听众隐瞒了下述事实：海军首长认为沃龙佐夫得到的是假情报，该情报的目的是让苏联领导人误入歧途！

以欺骗的方式引用沃龙佐夫紧急电报的做法，是赫鲁晓夫的独创。无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还是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日期为1956年2月18日的赫鲁晓夫发言草案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甚至在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本人的所谓“口授材料”中，也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如何及从哪里弄到这份情报的。

整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文件汇编的编辑们没有再次刊登库兹涅佐夫的报告，也没有引用该报告。无法想象他们会不知道信件的原件内容，因为该信曾刊登在最著名的军事历史杂志上。^② 还有，编辑们错误地将“波泽尔”和德国空军总参谋部中的苏联谍报人员哈·舒尔策-博伊森混为一谈，尽管，即使是赫鲁晓夫在谈及波泽尔时也说他是“苏联籍”。

显然，如果编辑们想掩盖赫鲁晓夫的谎言，他们只能使用此类含糊不清的话语。使用此类狡猾手段表明，他们是故意利用很有威望的出版物来掩盖真相。

赫鲁晓夫撒谎了。想必，像沃龙佐夫信件这样的情况，研究人员会特别感兴趣，因为它们提供了研究“秘密报告”中假造论据的动机和手法的绝妙机会。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6.

^②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2, № 2, с.39-40.

德国逃兵

随后，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再次提到了战争“预报”问题：

已知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德国军队侵入苏联领土前夕，一个德国人逃越我们的边界并报告，德国军队得到指示，将于6月22日深夜三点钟开始对苏联发动进攻。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但这一信号没有引起注意。^①

这一说法也与真实情况不符。但与沃龙佐夫的紧急电报不同，直到不久前沃龙佐夫的紧急电报还是属于密件，但关于德国逃兵的这件事，可以说许多出席二十大的代表都记忆犹新。

该逃兵名叫阿尔弗雷德·利斯科夫。必须指出的是，他的提醒并非没有引起注意。关于6月21日21点扣留从德国军队逃跑的利斯科夫的报告，是通过电话于6月22日深夜三点十分转告斯大林的，即在德国进攻苏联前不到一个小时。所以，应认为，赫鲁晓夫有关这一报告的两个说法都是不正确的：第一，他声称预报是提前和立即转告斯大林的；第二，“信号没有引起注意”。还有一点要说，即关于即将发动的进攻，利斯科夫是6月21日晚才从其连长舒尔茨中尉那里得知的。

逃越国境后，利斯科夫很快被送往莫斯科。1941年6月27日《真理报》以他讲述的内容刊载了一篇文章，附有照片和号召德国士兵向苏方投诚的传单。某些消息称，利斯科夫本人很快牺牲了。而第一时间抓获德国逃兵的边防军，利用从他口中得到的情报，炸毁了桥梁，并撤到了防御阵地。仅几个小时过后，这里的边防军已被德军消灭。

19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没有再重复关于从德国兵那里得到预告和这一预告似乎没有得到重视的观点。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48.

被处决的统帅们

赫鲁晓夫：1937~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诽谤指控产生的怀疑，大量军队指挥官和政治工作骨干被消灭，这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这些年中，几个层次的指挥干部，几乎从连、营到武装力量最高中央机构，都遭到了镇压，其中，那些在西班牙战争和远东战争中取得了某种经验的指挥干部，几乎全部被镇压。^①

在这里，赫鲁晓夫没有直接说，只是暗示（他和他的支持者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将会不断地谈到这些问题）：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八位在1937年6月11日与他同时被判刑的指挥官，是绝对无辜的，对他们的判刑根据的是显而易见的捏造指控，说他们搞阴谋，其目的是推翻苏联政府，以及与德国和日本有间谍活动联系等。

——处决或离开红军的人员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对苏联防御能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被镇压的统帅们与所有取代他们的人相比，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丰富的经验。

好吧，让我们尝试着根据最近几年已经解密的文件对这些观点进行研究。

从苏联解体后已知的并不很多的证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图哈切夫斯基和与他同时被判刑的指挥官们，确实犯有对他们指控的罪行。但是，类似资料来源，暂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被解密：控制着部门机关（如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总统档案馆——正是那里保存着1936~1938年军人案件的公开和内部诉讼的侦查档案材料）开放权的当局，并不急于公开保存在那里的文件。

甚至，尽管半官方的俄罗斯学界否认这些指挥官的某些罪行，但第一资料来源却有着相反的证据。比如，不久前公开的叶若夫供词记录证实，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8.

确实存在着三个独立而又相互竞争的军人阴谋集团：①以亚·伊·叶戈罗夫为首的“有影响力的军人”集团；②扬·鲍·加马尔尼克、约·埃·亚基尔和叶·彼·乌博列维奇的托洛茨基分子集团；③图哈切夫斯基的“军官-波拿巴主义分子集团”。^①

一个有代表性的细节是：1957年赫鲁晓夫坚持为图哈切夫斯基和多数其他指挥官平反。但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详细研究“军人案件”的材料，不会早于1962年。相关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直到1994年一直保密。实际上，该报告公布的只是军事领导人犯罪的一些补充证据。^②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镇压的军界领导人几乎像苏联英雄一样受到尊敬。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趋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继续存在。

常听人说，大镇压的规模“骇人听闻”。这也很容易解释：赫鲁晓夫和追随他的反共历史学家，将1937~1938年被处决的和转入预备役的红军军官夸大了许多倍。早在赫鲁晓夫的“十年”，已出现了对这一题目的理智研究，如今，这类著作大大增多了。比如，根据最近的研究，提拔新的干部取代被处决、逮捕和转入预备役的红军指挥官，既提高了苏军指挥官成员的军事教育水平，也增加了已积累了战斗经验的人员的数量，其中包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的人员。

最近几年关于这一题目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最好的俄文出版物有：根·伊·格拉西莫夫撰写的《1937~1938年镇压对工农红军军官团的实际影响》，刊登在《俄罗斯历史杂志》1999年第1期上；^③伊·瓦·佩哈洛夫的著作《被诋毁的伟大战争》第二章：“红军群龙无首了吗？”^④

最后要说的是，赫鲁晓夫应对消灭许多基辅军区军官承担个人责任。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将军曾引用过赫鲁晓夫签署的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决议。较完整的文件文本见本章附件。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1939 — март 1946. — М.: МФД: Материк, 2006, с.61.

② Вместе с В.Л.Бобровым автор готовит подроб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ов «дела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③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statii/2001/rkka_repr.html.

④ См. также: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pyhalov_i/02.html.

战争初期斯大林“丧失”指挥能力

赫鲁晓夫：不谈以下问题是不正确的：在前线遭受首次最沉重的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认为，末日已经来临。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

“列宁缔造的一切，被我们无可挽回地丢失了。”

在这之后，他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军事战役和完全谈不上干事……^①

以上所说，绝对不符合真实情况，而对此，赫鲁晓夫不可能不知道。

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星期（许多人则是晚些时候）与斯大林并肩工作的大多数人，当时都还健在并担任着国家高级职务，他们从来没有讲到过类似情况。赫鲁晓夫本人在战争初期一直在乌克兰，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证明斯大林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现在，历史学家都已非常熟知斯大林在其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待来访者的记事簿。记事簿所记录的内容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自战争开始第一时刻起，甚至更早一些，斯大林就以非凡的精力投入工作。赫鲁晓夫当然可以接触到这些文献。1941年6月21~28日来访者记事簿记录，已在《历史档案》杂志上发表，它以文件形式准确地证实了斯大林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在不间断地积极行动。^②

朱可夫元帅对斯大林从来没有特别的好感。但在他的回忆录中非常尊敬地描述了斯大林，驳斥了赫鲁晓夫的许多谎言，包括与卫国战争初期时日有关的那些谎言。

还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格·季米特洛夫的一个证明。他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下述内容：1941年6月22日早晨7点钟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后，他见到了约·维·斯大林、亚·尼·波斯克列贝舍夫、谢·康·铁木辛哥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8.

^② 《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第51~54页。很好介绍这方面情况的资料可见伊戈尔·佩哈洛夫的著作《被诋毁的伟大战争》第十章：“斯大林是否意志消沉”。另见：<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6-13.html>；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pyhalov_i/10.html。

元帅、尼·格·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扎·梅赫利斯和内务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之后，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斯大林和其他所有人都显得出奇的平静，坚定不移，充满信心。”

为了能使赫鲁晓夫制造的揭露斯大林在战争初期无所作为的谎言自圆其说，反共历史学家抓住斯大林办公室来访者记事簿中没有6月29日和6月30日记录的事实大做文章。他们企图以此为根据让人们相信，他们所指的斯大林意志消沉，正是指在那个时候。但甚至像罗伊·麦德维杰夫这样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铁杆反斯大林分子都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伪造的^①。他曾写过，赫鲁晓夫的说法，应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谎言”，虽然在很多看起来非常知名的出版物中这种论调被多次重复过，比如在刘易斯和怀特黑德所撰写的斯大林传记中（1990年），在巴洛克所著的斯大林传中（1991年），以及牛津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中。麦德维杰夫还扩展视野，用各种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及之后，包括6月29日和30日，都始终是一位有完全工作能力的人。6月29日，发生了那场斯大林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之间著名的争论。米高扬向格·亚·库马涅夫描述了争论的情况^②。同一天斯大林起草和签署了关于进行游击战的命令。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通过决议成立国防委员会。

虽然实际上沃尔科戈诺夫和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命运和信仰毫无共同之处，在1990年代撰写自己的著作时，他们都对斯大林怀有敌意，但这两个相互独立的人得出的结论都是：在谈及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表现时，赫鲁晓夫撒谎了。

斯大林是“毫无水平的”军事领导人

赫鲁晓夫：斯大林完全不想了解前线形成的实际形势。而这很自

① “彻头彻尾的谎言”的话，只出现在麦德维杰夫《鲜为人知的斯大林》一书的英文版中，参见：R. Medvedev, Z. Medvedev. *The Unknown Stalin*. – Woodstock, NY: The Overlook Press, 2003. P. 242. 看来，作者显然不想让俄语读者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部由半吞半吐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赤裸裸的谎言拼凑而成。

② Г.А.Куманев. *Рядом со Сталиным.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встречи, беседы, интервью,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Былина, 1999, с.28–29.

然，在整个卫国战争中，他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前线地区，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被解放的城市，如果不算在前线状况稳定的情况下闪电般地出行在莫扎伊斯克公路上的那一次。关于这次出行，不知有多少文学作品以形形色色的想象力进行了虚构，不知有多少色彩鲜艳的油画进行了描绘。此外，斯大林直接干预了作战进程和下达命令，不少情况下没有考虑该前线地区的实际形势，因此不可能不导致人员的巨大损失。^①

除了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人会讲这样的话！与此相反，在赫鲁晓夫被撤职后，朱可夫元帅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坚定地表示，斯大林是一位特别称职的军事首长。华西列夫斯基在其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之后表示坚决不同意。

空军元帅亚·叶·戈洛瓦诺夫则以最高的赞扬词语评价了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才能。

哈尔科夫，1942年

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个典型事实，它能说明斯大林是如何对前线进行领导的。这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巴格拉米扬元帅，他曾是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他可以证明现在我要对你们讲的是事实。

对于我们的军队来说，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形成了极为严峻的形势，我们通过了正确的决定：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行动……

……

由此出现了什么形势？出现了我们所能预想的最坏的形势。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军团，其结果，我们军队损失了数十万人。你们看，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他让我们付出的代价。^②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9.

^② 同上，第149~150页。

这一说法岂止是错误：多数军事领导人不认为斯大林应对哈尔科夫城下的失败负责，有些人则深信，这一责任恰恰应由赫鲁晓夫承担！

在关于“秘密报告”45周年的文章中，记者和历史学家谢尔盖·康斯坦丁诺夫总结了许多军事首长对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讲话的反应（详见本章附件）。根据亚·米·萨姆索诺夫院士的说法，朱可夫也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在回忆录中，元帅也批评斯大林，但绝没有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①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称赫鲁晓夫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说法是赤裸裸的谎言。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说：虽然已经将火箭炮图纸和样品转交给赫鲁晓夫和基尔波诺斯将军，以便在当地安排生产火箭弹、步枪和机枪，但是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行动。实际上华西列夫斯基谴责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斯大林。

正如科日诺夫所指出的，谈到民兵缺乏步枪和机枪一事，是为了丑化马林科夫。^②但赫鲁晓夫完全回避了一个事实，即提前储存武器这应该是赫鲁晓夫的分内之事，因为至战争开始，他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已经三年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赫鲁晓夫辞职后出版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将哈尔科夫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方面军指挥部，而不是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③这一认识与斯大林在1942年6月26日信件中阐述的内容一致，该信件被许多历史学家引用，包括铁木辛哥传的作者理·米·波图加尔斯基、阿·斯·多曼克和亚·彼·科瓦连科。他们认为，为此应该承担责任的不仅有巴格拉米扬，而且还有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本人。

同样是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在前面曾说：“如果有人对此抵制（即应无条件服从——作者注）或设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个人肯定会

① 朱可夫对斯大林的不满很容易解释：由于将从德国得到的珍贵战利品窃为己有，斯大林降低了他的职务，1993年《俄罗斯军事档案》第1期第175页及之后部分，刊登了揭开该案件内幕的文件，赫鲁晓夫对此是清楚的，但有意回避，极大的可能是为诱使朱可夫站在自己一边。

② Вадим Кожин. *Россия. Век XX (1939-1964)*. — М.: Алгоритм, 1999, с.75. Ту же мысль высказывал и 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 Ю.В.Емельянов. Миф XX съезда // Слово. 2000, №3. См.: <http://stalinism.newmail.ru/emelian2.htm>.

③ См.: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1-1945.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70, с.164-165.

被清除出领导集体，之后则是从精神和肉体上予以消灭。”^①

这不是实话。所以，赫鲁晓夫没有举出任何例子来证明他的话，这不是偶然的。铁木辛哥比斯大林多活了17年，比赫鲁晓夫多活了18年，比巴格拉米扬多活了29年。在有关哈尔科夫战役问题上，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更不要说“被肉体消灭”了。

虽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对斯大林怀有敌意，但仍认为，多年之后，赫鲁晓夫或是已经忘记了事实，或是在该报告的这一部分撒谎了，企图以“颠倒的方式为自己制造历史事件‘不在现场’的证据”。^②

斯大林“根据地球仪”拟订军事战役计划

赫鲁晓夫：我给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并央求他：“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请您拿一张地图给斯大林看看，告诉他现在的形势如何。”

应该说，斯大林是根据地球仪拟订战役计划的。（场内活跃）是的，同志们，他拿起地球仪，在地球仪上给人们指示战线。所以，我才对华西列夫斯基说，请在地图上看看形势……^③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最一目了然的谎话。对如此荒谬的想法，甚至都没有人想去稍稍加以证实。不过，还是有非常多的作者批判了这一说法，有些人甚至为此而愤怒。只要看看军界领导人的反应以及莫洛托夫的意见就足够了。

斯大林“贬低”朱可夫元帅的功勋

赫鲁晓夫：斯大林对如何评价朱可夫的统帅才能有很大的兴趣。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1-132.

② Д.А.Волгонов. Стал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В 2-х томах. — М.: Новости, 1992, т.2, гл.8, с.777. См.: http://militera.lib.ru/bio/volkogonov_dv/08.html.

③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9.

他不止一次征询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他，他是一个好将军、好指挥官。”

战后，斯大林开始散布关于朱可夫的各种无稽之谈，包括有一次他对我说：“瞧，您夸奖了朱可夫，可实际上他对此是受之有愧。我听说，在前线某个战役开始前，他总是先要抓起一把土闻闻，然后再下达命令，说可以开始进攻，或相反，说不能进行已经确定的战役。”

我当时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杜撰出来的，但这不是事实。”显然是斯大林杜撰了这些东西，以便贬低朱可夫元帅的作用和军事才能。^①

除了赫鲁晓夫以外，谁也没有听斯大林讲过类似的话。根据其他作者经常引用的朱可夫本人的意见，斯大林从来都没有侮辱过他，尽管朱可夫在1946年被斯大林降了职。朱可夫的话可以视为对赫鲁晓夫的谴责，因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会让朱可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下这样的结论。

战后，斯大林的确让朱可夫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那是因为当时已搞清楚，元帅并没有将从德国得到的战利品上交国家，以使用它们补偿在战争中德国对苏联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损失，而是相反，他参与了将这些财产窃为己有的活动。^② 战后朱可夫被降职是人所共知之事，但知道其真正原因的人很少，在这里赫鲁晓夫明显是在对朱可夫阿谀奉承，因为他很快就需要元帅鼎力相助了：1957年赫鲁晓夫为战胜“斯大林分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他们试图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需要得到朱可夫的支持。

文献资料

斯大林“没有重视”战争开始的预报

在思考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话题时，空军主帅亚·叶·戈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0.

② 该案件详情刊登在一本神秘的，但显然是半官方的杂志《俄罗斯军事档案》1993年第1期上，但该杂志没有发行第2期。

洛瓦诺夫认为，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一个人是不公正的：

“我们把没有预料到希特勒突然袭击我国时间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约·维·斯大林，说因为他是国家的领导人，尽管与此有直接关系的人还应包括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谢·康·铁木辛哥和苏军总参谋长格·康·朱可夫以及许多其他领导人。众所周知，对他们却从没有提出特别的指责。而在谈及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战略性胜利时，则合乎情理地将这些成就归功于在这些战役或战争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其他人。这是有道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党和军队取得了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胜利，而我们国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正是斯大林。”^①

瓦季姆·科日诺夫试图弄清苏联领导在战前所犯错误和失误的原因。他指出：

“如果公正地思考问题，无论对斯大林的失误，还是对罗斯福的失误，都可以做出完全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总会存在程度不同的相互矛盾之处，因为情报部门的情报来源是各式各样的，不少是假情报。不久前一部名为《希特勒的秘密在斯大林的桌上：关于为德国侵略苏联进行准备的情报机关与反间谍机关（1941年3~6月）》文件集出版，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包括假情报，尤其是这样的情报：德国在侵略苏联之前，拟占领英国（如斯大林认为的那样）。帕·阿·苏多普拉托夫——当时的情报机关领导人之一，后来指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来自德国的三个可靠的情报来源（斜体字为科日诺夫所标——作者注）的情报是：法西斯德国军队坚决反对将战争分为两个战线。’

不相信情报机关关于德国进攻的情报还因为，它们关于战争开始的日期各不相同：‘……提出的日期有5月14日和15日，5月20日和21日，6月15日，最后有6月22日……5月的第一批入侵日期未被证实后不久，斯大林……彻底相信，德国不会在1941年进攻苏联……’

1960年代及之后，许多作者极其愤怒地写道，谁也不相信战争开始前一周里哈德·佐尔格——后来闻名世界的情报人员，得到的情报，该情报指出了完全准确的德国进攻的日期，即6月22日。但是，在一系列被认为是‘可靠的’情报来源（顺便说一下，佐尔格本人也曾报告，将在5月进

^① Цит. по: Андрей Казанцев. 22 июня – два блицкрига. // *Nakanune.ru* 22.06.2005, см: http://www.nakanune.ru/articles/22_ijnja_dva_blickriga.

攻苏联)提出的日期都‘没有得到证实’后,对这样的报告是不可能相信的。现在的‘分析家们’,如全世界的人一样都知道,战争发生在1941年6月22日,因此,他们对斯大林无视佐尔格6月15日发回的情报感到愤怒,但这样的人至少可以说是幼稚的……”^①

苏联情报机关得到关于战争开始日期的多种不同版本的情报,不是偶然的:现在历史学家都知道由凯特尔签署的“德国武装力量司令部总参谋部关于假情报处理措施的指示”(ОКБ),^②该指示对散布各种不同的侵略日期以及德国军队的数量和主攻方向予以鼓励。至于佐尔格,他的著名的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的电报,原来是“赫鲁晓夫时代伪造的”。^③

总参谋长(1941年6月)基·阿·梅列茨科夫元帅,这样概括德国进攻前夕的形势:

“由于战争初期英国和美国才成为我们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友,大多数今天批评性评论对当时我们的领导人所做出的决定,仅是机械地从苏德战争方面进行评论,因而会犯错误。1941年春天时的形势极为复杂。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是否会结成反苏联盟并没有把握。1940年希特勒不允许军队登陆英国,这是为什么?是力量不够?是决定以后与英国平分秋色?抑或是在进行秘密的有关建立统一的反苏战线的谈判?不对所有这些可能的方案进行斟酌而轻举妄动,那是犯罪行为。因为苏联的利益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地选择政策。战线会出现在哪里?只是在西部边界?或战争可能出现在南部边界?远东将会出现什么形势?在没有十分把握能立即找到正确方案的情况下,各种行动方案选择的多样性,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④

① В.В.Кожин. *Россия. Век XX (1939–1964) Опыт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Алгоритм, 1999, с.73–74.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s.kn.ru/libris/kozh39_1_2.html.

② 1941 год. *Документы. В 2-х кн. Кн. 1.* — М.: МФД, 1998, с. 661–664. См. также: <http://history.tuad.nsk.ru/works/1941/voll/0241-1.html#doc279>.

③ 22 июня 1941 года. Могло ли всё быть по-иному? //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2001, 16 июня. См.: http://www.redstar.ru/2001/06/16_06/4_01.html. Анализ донесений Зорге см. в главке «Группа “Рамзай” информирует. 1941 год» в: Горбунов Е.А. *Схватка с Черным Драконом. Тайная вой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М.: Вече, 2002.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gorbunov_ea/05.html.

④ К.А.Мерецков. *На службе народу*.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meretskoy/16.html>.

按空军元帅戈洛瓦诺夫的说法，格·康·朱可夫元帅是应该对卫国战争开始阶段的失利承担责任的人之一。朱可夫试图批评性地思考所发生的事件：

“我想，国防事业的发展，从其基本的和主要的特点及方针看，是正确的。在许多年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做到了能够做的一切，或几乎是一切。尤其是自 1939 年至 1941 年这段时期，人民和党更是做了特别的努力，投入了全部的力量和资金来加强国防。”^①

关于苏联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失败的原因，1941 年 6 月之后的几十年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关于这一问题，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这样认为：

“如已经知道的那样，为了实施进攻苏联的计划，德国指挥部动用了 152 个师，其中包括 19 个坦克师和 14 个摩托化师，这占德国现役军队总量的 77%；德国的仆从国陈兵 29 个师对准苏联，因此在苏联边境共聚集了 181 个师和 18 个旅、48000 门大炮和迫击炮、约 2800 辆坦克和强击炮，以及 4950 架飞机。总人数达 550 万，其中德国人 460 万。

请问，我方在边界需要多大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击退具有上述力量的敌人的攻击和掩护国家主要武装力量在边境地区的集中和部署呢？看来，只有我们的武装力量主力能胜任这一任务，而且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及时将部队转入战备状态和在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开始进攻我们之前完成我们在边界地区的兵力部署。”

在 1965 年（即赫鲁晓夫被免职之后）的一篇评论中，朱可夫强调：

“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部署在边境，苏联必败无疑……还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如果我们的主力在边境地区被击溃，希特勒的部队将有机会更加顺利地进行战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会在 1941 年就被占领。”^②

总的来看，赫鲁晓夫的许多指责，实际上很容易转向反对报告人自己。

^① Г.К.Жу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В 2 тт.*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том 1, гл. 9.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zhukov1/09.html>

^② Цит. по: Ю.А.Горьков. *Кремль. Ставка. Генштаб.* — Тверь, 1995, гл. 4, с.68. См.: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gorkov2/04.html>.

以下请看科日诺夫对此是怎么写的：

“1956年为了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丑化对手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不自觉地丑化了他自己。要知道，自1938年1月到（1941年）6月22日，他作为在基辅和整个乌克兰（自1939年9月与德国接壤！）掌握全权的‘主人’已经三年半，竟然没有抽出时间进行战备，哪怕是准备些枪支！……所以，二者必居其一：赫鲁晓夫或是根本没有真正搞清1956年他提到的那些‘有很好说服力的证据’能说明什么；或是对如何在实际层面审视这些‘证据’一无所知（要知道，作为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本可以及时准备一些枪支的）。”^①

赫鲁晓夫所讲的关于应征服兵役者武器“不足”问题，也正好是反过来丑化“秘密报告”人自己的例子之一：

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应征加入作战部队的人们。我记得，在那些日子我从基辅给马林科夫同志打电话并告诉他：“群众来到了部队，需要武器。请为我们提供武器。”对此，马林科夫答复我说：

“我们没有可能提供武器。所有武器都交给列宁格勒了，请你们自行解决吧。”^②

但是，根据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这件事的描述并不正确：

“最高统帅说，他将采取一切措施为西南方面军提供支持，但同时，他请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多地依靠自己。他说：

——如果认为别人会为你们提供一切现成的东西，是缺乏理智的。学习自己为自己提供和补充所需物品。在军队组建备用部队，让某些工厂能够生产步枪、机枪。好好行动起来，你们会看到，乌克兰自己也可以为前线制造许多东西。目前，列宁格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已利用自

^① В.В.Кожин. *Россия. Век XX...* С.75.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libris/koz39_1_2.html.

^②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7.

己的机械制造基地，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乌克兰同样也可以这样做。列宁格勒已经组织好火箭弹的生产，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类似迫击炮，可以直接地大规模歼敌。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做这项工作呢？

基尔波诺斯和赫鲁晓夫托人转告：

——斯大林同志，您所有的指示我们都将贯彻执行。遗憾的是，我们不了解火箭弹装置。我们请您下令发给我们一枚火箭弹样品及图纸，我们将在本地组织生产。

得到的回复是：

——你们的人中有图纸，样品也早就有。错误在于你们对这一重大事情的怠慢态度。好吧，我给你们派一个火箭弹连，还有图纸及生产指导员……再见，祝成功。”^①

关于德·格·帕夫洛夫将军叛变的证明

摘自经苏联检察长维·米·博奇科夫批准和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正式核准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三局 1941 年 7 月 5 日关于逮捕德·格·帕夫洛夫的决定”：

“作为第四机械化旅司令，帕夫洛夫一直得到乌博列维奇的保护，其全部工作都在为他服务。

帕夫洛夫与人民的敌人乌博列维奇、鲁列夫（白俄罗斯军区前汽车装甲兵部队首长）、博布罗夫（白俄罗斯军区前参谋长）、卡尔普申（白俄罗斯军区前副参谋长）、马尔采夫（白俄罗斯军区所属前部门首长）关系密切。

被捕的反苏军事阴谋参与者，包括工农红军前侦查局局长乌里茨基、别尔津，前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别洛夫，前海军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和第 21 机械化旅参谋长罗任，都揭发帕夫洛夫是该阴谋的参与者。

被逮捕的乌里茨基交代：

‘乌博列维奇竭尽全力向西班牙派遣自己的人去参与阴谋活动，其目

^① 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3-е изд.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8, гл.11, см: <http://www.victory.mil.ru/lib/books/memo/vasilevsky/11.html>.

的除了在那里进行破坏活动外，还想拯救面临失败威胁的最积极的阴谋者，使他们免遭打击。

根据乌博列维奇的提议并在我的积极参与下，积极参与阴谋者中的帕夫洛夫被派遣到西班牙。我给他的指示是在西班牙建立由西班牙人参加的坦克部队，由阴谋参与者领导他们，目的是利用该部队推翻共和国政府。

帕夫洛夫团伙中，有几个阴谋者来自白俄罗斯军区，而帕夫洛夫应依靠他们进行自己的工作。

帕夫洛夫在西班牙时，与乌博列维奇保持着经常的书信往来，通过我给他发信，也有一些信件是通过信使转交的。

1937年3月，我从帕夫洛夫那里得到了有关阴谋活动的情报，他在该情报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叛变活动：他利用国外的托洛茨基分子和部分无政府主义分子，组建了一个坦克连。此外，在其他西班牙营的分队中也有他自己的人，与中部战线旅团的支队建立了阴谋联系，其中有作为共产党员的指挥人员。

帕夫洛夫坚持派人发送新的物资以组建由阴谋者控制的新的部队，为此他要求从苏联增派阴谋人员。

……我通过阴谋者沃罗比约夫转去对该信的答复，赞同他进行的背叛活动，并建议扩大阴谋活动联系的范围，不限于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可吸收社会主义者。’

被捕的别尔津供认：

‘1936年我离开莫斯科时，费尔德曼和乌里茨基在谈到作为坦克部队系统的顾问被派往西班牙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时，提到了克里沃舍因，但立即指示我，坦克军群将扩大，对于如此重要的工作他已不大合适，可能，将由白俄罗斯军区的帕夫洛夫取代。帕夫洛夫是反革命组织成员乌博列维奇推荐的。还立即指示，在西班牙的白俄罗斯人顾问团，包括梅列茨科夫，都很了解帕夫洛夫，通过梅列茨科夫与帕夫洛夫保持联络对我有利。

……帕夫洛夫到西班牙后，梅列茨科夫介绍我与他认识，说他是我们的作战指挥员，是白俄罗斯人，毕业于很优秀的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学校。我问帕夫洛夫，在莫斯科，费尔德曼和乌里茨基是否

对他有指示，他对自己负责的事情是否熟悉。他回答说，无论是莫斯科的人，还是这里的梅列茨科夫和克里沃舍因，都向他详细通报了情况，他对一切都清楚。

于是我便说，今后，他将与梅列茨科夫保持联系。

此后，我通过梅列茨科夫对帕夫洛夫下达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指示，他也执行了。而这样的破坏活动以前由克里沃舍因负责，既在对未经培训就来到前线的机乘人员进行培训时，也在利用坦克部队进行战斗时搞破坏活动。’

被捕的别洛夫交代：

‘在与布林谈及他和乌博列维奇在白俄罗斯军区招募的参与军事阴谋的人员时，在很多人中，提到了帕夫洛夫的名字。我认为有必要与帕夫洛夫建立私人的政治联系，于是请他在第一时间到白俄罗斯军区来一次……’

我们在学习班中相遇，这使我与帕夫洛夫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广泛的交谈。在谈话中我对帕夫洛夫说，我知道他参与军人阴谋活动的事。帕夫洛夫对此予以确认。我对帕夫洛夫谈了参与阴谋活动的军人所面临的形势，强调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遭到逮捕，并请帕夫洛夫在自己的权限内，支持某些工作人员，其中包括鲁列夫（白俄罗斯军区前装甲兵司令）。对此，帕夫洛夫向我做了承诺。”^①

尼古拉·多布留哈和尤里·穆辛引用了基·阿·梅列茨科夫的解释（1941年7月12日），他曾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参加西班牙内战。这位未来的元帅告知：

“……乌博列维奇向我通报称，他准备向西班牙派遣一个坦克旅并通过决议，委托帕夫洛夫指挥该旅。

同时，乌博列维奇给予帕夫洛夫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他在西班牙出名，希望经过七八个月后，可以使他成为有很高知名度的坦克部队首长。帕夫洛夫于1936年12月到西班牙后，我与他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采取了所有措施为他树立能打仗的威望。他被任命为共和国坦克部队的将军。我努力让他成为出类拔萃的指挥官，并总是

^① 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3-е изд. — М.: Политгиздат, 1978, гл.11, см: <http://www.victory.mil.ru/lib/books/memo/vasilevsky/11.html>.

把他放在战线中可以最好展现自己的关键地段以便他充分地展现自己的能力……”^①

1941年7月22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德·格·帕夫洛夫、弗·叶·克利莫夫斯基赫、A.T.格里戈里耶夫、亚·安·科罗布科夫案件庭审记录”如下：

庭长（指瓦·瓦·乌尔里希——作者注）：在1941年7月21日同一天的供词（案卷页，86）中您说：“我一直与梅列茨科夫保持着经常性联系，而他在与我的多次谈话中，不断地诉说自己失败主义的情绪，指出未来在与德国人的战争中红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自德国在西方的战争行动开始后，梅列茨科夫说，现在德国人无暇顾及我们了，不过，在德军进攻苏联后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不会因此而更差。”您和梅列茨科夫有过这样谈话吗？

被告（指德·格·帕夫洛夫——作者注）：是的，1940年1月我和他在拉伊沃尔有过这样的谈话。

庭长：我们不会更差，我们指谁？

被告：我理解，这是指我和他。

庭长：您同意他吗？

被告：我没有反驳他，因为谈话是在喝酒时说的。对此，我有责任……

庭长：在预审中您提供了这样的供词（第一卷，案卷页，88）：“我确切地知道，为了欺骗党和政府，总参谋部制订的战时对坦克、汽车和拖拉机的订货计划夸大了十倍左右。

总参谋部对提高订货理由的解释是：有这样的生产能力。而与此同时，工业的实际生产能力要低得多……梅列茨科夫在战时利用这样的计划，意图是搞乱向部队供应坦克、拖拉机和汽车的设想。您确认这一供词吗？

被告：大体上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计划。计划中写有这样的荒唐想法。

^①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второй. Книга I. Начало. 22 июня — 31 августа 1941 года.* — М.: Русь, 2000, с.211–212.

据此我得出了结论，制订战时订货计划的目的是欺骗党和政府。^①

沃龙佐夫的情报

1992年《军事历史杂志》刊登的《军事情报人员报告了……》一文，引用了沃龙佐夫情报的全文。在赫鲁晓夫引用这一文件时被删除的最重要部分用粗体字标出：

绝密

1941年5月6日

秘工 48582 号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驻柏林海军武官，海军上校沃龙佐夫报称：苏联籍人波泽尔（犹太人，前立陶宛人）通报我海军副武官，根据希特勒大本营一名德国军官的话，德国人拟于5月14日通过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罗马尼亚进攻苏联。同时，拟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强大的空袭，而伞兵将在一些边境地区的中心登陆。查清情报第一来源和扩大该情报线索的尝试尚没有结果，因为波泽尔对此是回避的。仍在继续对他做工作和对情报进行核实。我认为，情报是假的，专门通过这一渠道放出，是为了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并试探对此苏联将做出什么反应。

海军上将尼·格·库兹涅佐夫^②

德国逃兵

“乌克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利沃夫州局关于扣留提供德国将于1941

^① Ю.И.Мухин. *Убийство Сталина и Берия: Науч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 М.: Крымский мост, 2002. См. также: http://www.sovnarkom.ru/BOOKS/MUHIN/STALIN_1/muhin_st_05.htm. Н.Добрюха. К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ойна. История невыполненных приказов.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Субботник НГ. 2001, 30 июня. См.: http://saturday.ng.ru/time/2000-06-17/1_how-the-war-begun.html.

^②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Док. №437, с.383–384.

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供词的德国逃兵的报告”中说：

1941年6月22日

越过索卡利区边境的德国上等兵交代了如下情况：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格尔马诺维奇·利斯科夫，30岁，工人，科尔姆堡市（巴伐利亚）家具厂细木工，妻儿父母均留在科尔姆堡市。

上等兵在15师第221工兵团服役。团部驻扎在索卡利以北五公里处的采林扎村。1939年从预备役应征入伍。

他自称是共产党人，是红色前线战士联盟成员。他说，在德国，士兵和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

傍晚前，他的连长舒尔茨中尉宣布，今天夜里在炮兵准备好之后，他们的部队将开始使用木筏、小船和浮桥渡过布格河。

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他决定逃到我们这里并报告情况。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①

边防军第90支队支队长米·斯·贝奇科夫斯基少校关于阿·利斯科夫供词的报告（1941年6月）摘录如下：

“6月21日21点，在索卡利警备司令部所在地，拘留了德国军队逃兵阿尔弗雷德·利斯科夫。由于警备司令部没有翻译，我指示该地段警卫长别尔沙茨基大尉用载重车将该士兵送到弗拉基米尔市支队指挥部。

1941年6月22日零点30分，该战士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克市。大约深夜一点钟，士兵利斯科夫通过翻译交代，6月22日拂晓，德国人将会越过边境。关于这一情况，我立即报告了部队司令部负责值班的旅政委马斯洛夫斯基。同时通过电话向第五军司令波塔波夫少将本人做了报告。他对我的报告持怀疑态度，没有予以重视。我本人也并不坚信士兵利斯科夫所说之事的真实性，但仍召集了各个地段的警卫长，指示他们加强国家边界的警卫，如果德国人过河，就开火消灭他们，我还专门在布格河附近

^①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2, № 2, с.39–40. Документ цитируется и подробно исследуется в: И.В.Пыхалов. *Великая обоганная война*. —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5, с.234–239. См. также: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pyhalov_i/08.html.

布置了无线电监听员。同时指示，如果出现可疑现象（在边界一带发现某种调动），必须立即向我报告。我一直在指挥部。6月22日深夜一点，警备长向我报告，边界一带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现象，一切都很平静。由于部队译员水平不高，我从市内叫来了熟练掌握德语的老师，而利斯科夫再次重复了他已讲过的内容，即德国人将在6月22日拂晓进攻苏联。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称，是他个人主动专门来这里提醒我们的。对他的审问还没有结束，我已听到乌斯季卢格（第一警备区）方向强大的炮火声。我知道，这是德国对我们的领土开火了，被审问的士兵对此立即予以证实。我立即开始通过电话召唤警备长，但联系已经被破坏。

边防军第90支队支队长米·斯·贝奇科夫斯基少校

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文献库，32880；目录，5；案卷，279；案卷页码，2；副本”^①

米·伊·布尔采夫的书补充了该事件的某些细节：

“21时，在索卡利区，德意志第三帝国74步兵师222步兵团士兵阿尔弗雷德·利斯科夫越境到我方。他自称是共产党员，慕尼黑的工人。他的第一句话是：‘战争！战争！’而之后，他借用其连长舒尔茨中尉的话告诉边防军支队长，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凌晨四点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该情报立即通过电话自下而上地做了汇报。在没有得到命令，但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的情况下，边防军支队长米·斯·贝奇科夫斯基少校发布了准备炸毁索卡利市桥梁和加强对西布格河其他桥梁警卫的指示。一切都从清晨开始了。第11哨所是最先受到希特勒所有兵种打击的部队之一。关于该哨所战士们进行战斗的情况，边防部队档案保存的简短的指挥部资料做出了证明：‘第11哨所的战士和指挥官无一人出现在警备司令部和部队中。哨所的全部人员都牺牲了……’”^②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重复了越境士兵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忘记”说，越境士兵的报告没有被重视。如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经常出现的情

^①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Док. № 287, с.38. В примечании к документу редакторы отмечают, что дан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было передано по телефону 22 июня 1941 г. в 3 час. 10 мин.*

^② 同上，342号文件，132-133页。

况那样，其回忆总是为作者某种个人目的服务的。他对此事的回忆片断也因回忆录作者有意对事件进行歪曲，或由于记忆错误而不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并非事件的见证人，他报告的“事实”是第二三手资料：

“战士是从前线逃跑的。对他进行了审问，他所谈到的所有征兆，即他说在次日三点开始进攻的依据及他的描述合乎逻辑，值得信任。首先，为什么恰恰是次日？战士说，他们得到了三天的干粮。为什么是在三点钟？因为在这类事件中，德国人总是选择在清早。不记得，他是否说过，对战士说的正是三点，还是他们从‘士兵电台’得知了这一消息，该电台总是非常准确地发布进攻开始的时间。我们该怎么办？”^①

被处决的统帅们

在与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座谈中，伊·斯·科涅夫元帅（1965年）就被处决的统帅们谈了自己的意见：

“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如果这10个、12个、5个或7个人在1937~1938年没有牺牲，在战争初期他们又处在军队领导的位置上，那么整个战争将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夸张。”^②

西蒙诺夫本人似乎赞同科涅夫的观点：

“当时牺牲的人中谁会与德国人打仗，如果这些人还活着的话，我们会怎样和在什么时候能够战胜德国人这样的问题，很遗憾的是，这是一些非常抽象的问题。同时，却存在着无可争辩的事实，即那些留下来的人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并处在军队的领导位置。正是他们，在自己逐渐升迁的岗位上，赢得了战争。”^③

赫鲁晓夫自己应对基辅军区消灭许多指挥官承担责任。以下是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引用的赫鲁晓夫在1938年3月签署的文件之一：

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关于军区指挥和政治干部人员状况的决议

- ① М.И.Бурцев. *Прозрение*.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81. Глава 2 «Кто он, наш враг?». См. также: http://victory.mil.ru/lib/books/memo/burtsev_mi/02.html.
- ②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4-х книгах. Книга 1. Часть II.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с.299.
- ③ К.М.Симонов.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 М.: Новости, 1988, с.393.

(1) 由于对工农红军队伍中敌对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清除工作和从基层提拔无限忠于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的指挥官、政治工作人员、首长，指挥官和政治领导干部磐石般地团结在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周围，在提升工农红军战斗力的事业中，保障了政治堡垒，并取得了成就。

.....

(3) 人民的敌人在安置干部方面也干了不少坏事。军事委员会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根除残余的敌人，在提拔干部时要深入研究每一个指挥官、首长、政工人员，大胆提拔经过考验的忠诚和上进的干部。

.....

基辅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司令 铁木辛哥

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 斯米尔诺夫

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联共（布）书记 赫鲁晓夫。

根据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铁木辛哥、斯米尔诺夫和赫鲁晓夫之后通报，“由于无情地根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1938年3月25日对军区领导成员进行了下述更新”^①：

分别为定员与更换人员数量（名）

定员与更换人员数量

军长	9	9
师长	25	24
旅长	9	5
团长	135	87
设防区司令	4	4
军参谋长	9	6
师参谋长	25	18
设防区参谋长	4	3
团参谋长	135	78
军区司令部下属处长	24	19

^① К.М.Симонов.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 М.: Новости, 1988, с.401.

战争初期斯大林“丧失”指挥能力

在驳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台发出的无聊的凭空揣测的讲话时，朱可夫元帅是这样写的：

“有人说，在战争第一周约·维·斯大林似乎惊慌失措，甚至不能在电台上发表讲话，因而委托维·米·莫洛托夫讲话。这种意见与事实不符。当然，前几个小时约·维·斯大林曾有些慌张，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并精神焕发地投入工作，尽管，表现过分激动，常使我们的工作无所适从。”^①

伊·瓦·佩哈洛夫在其《被诋毁的伟大战争》一书中，用专门一章（“斯大林是否意志消沉？”）分析各种流言。他证明：没有任何客观的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斯大林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中意志消沉。^②

如《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决定》一书所指出的：

“1941年6月29日，即入侵开始后一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向靠近前线州的党和苏维埃组织下达了指示（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作者注）。”^③

1941年6月30日通过关于建立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41年6月30日决议

鉴于业已形成的特别形势和为了尽快动员苏联各民族所有力量对背信弃义进攻我们祖国的敌人进行反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有必要：

（1）成立国家国防委员会，成员包括：

约·维·斯大林同志（主席）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副主席）

① Г.К.Жу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Т.1, гл.10, с.265–266,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zhukov1/10.html>.

② И.В.Пыхалов. *Великая оболганная война*. Гл.10, с. 284–303. См.: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pyhalov_i/10.html.

③ *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 Т.6.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1. Цит. по: <http://www.galaxy.com.ua/publications/library/spets/2.htm>.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拉·帕·贝利亚同志；

(2) 国家全部权力集中在国家国防委员会手中；

(3) 全体公民和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和军事机关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米·伊·加里宁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维·斯大林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41年6月30日^①

尤·茹科夫在其英文版《鲜为人知的斯大林》一书中指出：

“斯大林星期天没有到自己的办公室。虽然他的传记的两个作者，拉津斯基和沃尔科戈诺夫都据此确认，似乎正是在这一天他溜走了，把自己锁在别墅，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两个作者仅从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记录簿没有6月29日和30日记录而得出结论是非常不可靠的。根据朱可夫元帅的话，‘6月29日，约·维·斯大林两次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到总指挥部大本营，两次都对西部战略方向所形成的形势反应极其强烈’。6月30日，斯大林在别墅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国家国防委员会（ГКО）的决议。”^②

在只谈1941年6月22日这一天时，甚至沃尔科戈诺夫也确认，“第一天，斯大林并没有太大的沮丧”。^③ 苏多普拉托夫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表述了大体上同样的意思，但从更开阔的层面写了这一问题：

“在各类书中，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谈到了斯大林在战争初期惊慌失措的情况。就我自己来讲，我没有观察到任何类似情况……所公布的克里姆林宫来访者记录簿记录表明，他不断接待来访者和直接关注着每天都在恶化的形势。”^④

① Цитируется во многих источниках, в т.ч.: <http://www.hrono.ru/libris/stalin/15-21.html>.

② Roy and Zhores Medvedev. *The Unknown Stalin*. PP.242-243.

③ Д.А.Волкогонов. *Сталин*. Т.2. Гл.8, с.700. См.: http://militera.lib.ru/bio/volkogonov_dv/08.html.

④ П.А.Судоплатов.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 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 М., 1996, с.159-160.

斯大林是“毫无水平的”军事领导人

与斯大林肩并肩工作过的统帅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确信，最高统帅是有绝对权威的军事首长。

朱可夫元帅：

“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天生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丰富的直觉、渊博的知识帮助了斯大林。他善于发现战略形势的主要环节并抓住它，确定对付敌人的方法，成功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除此之外，在战役保障、建立战略储备资源、组织生产战斗器械，总之，在创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一切方面，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而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给予他应有的评价，那是不公正的。”^①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战后头几年，我与尼·谢·赫鲁晓夫的关系是好的。但当我不支持他关于约·维·斯大林弄不清战术—战略问题和作为最高统帅对部队行动的领导没有专业水平的说法后，我们的关系急剧变化。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看法。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前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尼·谢·赫鲁晓夫不可能不知道，大本营和斯大林在进行战争行动中的威望是多么高。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方面军和部队的司令们非常尊重大本营和斯大林，对他们领导武装斗争所具有的罕见的知识水平予以很高的评价。”^②

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

“在卫国战争年代，因为军事问题与最高统帅见面，格·康·朱可夫比任何人都多，未必有谁能比他更好地评价斯大林，而他称斯大林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据我所知，所有有幸与斯大林见面和相识的军事首长，

① Г.К.Жу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Т.1. Гл.11, с.342,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zhukov1/11.html>.

② 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Гл.11, с.246, см.: <http://victory.mil.ru/lib/books/memo/vasilevsky/16.html>.

都同意这种意见。”^①

空军元帅戈洛瓦诺夫：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威望，无论在红军领导人员中，还是在全体战士和军官中都极高。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有幸与伟大的，最伟大的人在一起工作，对于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整个人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而是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这是我，一个在1937年没有幸免的人说的话！”^②

巴格拉米扬元帅：

“我知道，斯大林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是一个真正的铁腕人物，他的领导风格让我吃惊。他可以简短地发一道命令：‘给一个军’——再没有别的话了。但斯大林做得非常得体和有耐心，以便使执行者自己得出结论：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后来，我本人曾作为方面军司令与最高统帅谈话，而我确信，他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如果执行人固执己见并提出有分量的论据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斯大林几乎总是会让步。”^③

哈尔科夫，1942年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休克疗法》一文中，谢尔盖·康斯坦丁诺夫指出：

“赫鲁晓夫把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城下的惨败归罪于斯大林一人，这是在公开撒谎。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格奥尔吉·朱可夫、谢苗·什捷缅科在其回忆录中都详细列举了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证明，对这次灾难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是赫鲁晓夫、西南方面军司令谢苗·铁木辛哥和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伊万·巴格拉米扬。多数与斯大林一起经历了卫国战

① Н.Г.Кузнецов. *Крутые повороты: Из записок адмирала*.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издание. Испр. и доп. Сост., ред., прим.: к.и.н. Р.В.Кузнецовой. — М.: Фонд памяти Адмирала флот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Г.Кузнецова (admiral.centro.ru), 1997. См: http://www.victory.mil.ru/lib/books/memo/kuznetsov_ng3/01.html. См. такж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3, № 4, с.51.

② Цит. по: Ф.И.Чуев. Несписочный маршал. // *Слово*. 1994, № 9–10, с.44–51. См.: http://www.pseudology.org/Chuev/Golovanov_01.htm.

③ И.Х.Баграмян. *Т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ойна*. — Киев: Политиздат Украины, 1977, часть 4,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bagramyan1/index.html>.

争的最高军事首长，毫无疑问，对赫鲁晓夫所搞的非斯大林化持否定立场，这首先是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事实。此外，他们中的一些军事首长，对斯大林单纯作为一个人怀有真挚的感情。空军主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对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谈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次赫鲁晓夫请罗科索夫斯基根据二十大决议精神写一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而赫鲁晓夫却听到了以下回答：‘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同志对于我是神圣的！’还有一次，罗科索夫斯基和戈洛瓦诺夫在某一次宴会上拒绝同赫鲁晓夫碰杯……”^①

根据亚·米·萨姆索诺夫的说法，朱可夫元帅不同意赫鲁晓夫对一些事件的看法：

“关于这方面的形势，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写道：约·维·斯大林根据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有必要继续进攻的报告，拒绝了总参谋部的设想。‘目前的似乎有来自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大本营发出警报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可以证明，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关于此问题的商谈。’”^②

赫鲁晓夫被罢黜后，卫国战争简史对这次失败原因做了如下描述：

“哈尔科夫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西南战线司令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而当西南方面军部队陷入复杂形势之时，未能及时停止进攻。不仅如此，还向大本营表示要坚持进攻。5月19日采取的关于停止进攻的决定，为时已晚。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使用突击集团保障翼侧，对敌人研究不够，特别是对其在战斗中机动能力估计不足。方面军司令部对敌人的实力低估了30%。”^③

以上所说的一切都与斯大林1942年6月26日的信件相吻合，许多作者，包括谢·康·铁木辛哥传的作者引用了该信件。在信中，最高统帅不仅对

① С.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Шоковая терапия Никиты Хрущёва.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 14 февраля. См.: http://www.ng.ru/style/2001-02-14/16_therapy.html.

② А.М.Самсонов. *Сталинградская битва. 4-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М.: Наука, 1989. См.: <http://militera.lib.ru/h/samsonov1/02.html>.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 своих мемуарах Жуков всё-таки перекладывает часть вины на Сталина, что, по-видимому, связано с понижением маршала в должности после войны (см. «Сталин принижал Жукова» ниже).

③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70, с.164–165.

巴格拉米扬，也对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对巴格拉米扬惩罚最狠。因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作为一个单纯的消息报告员，都不能让大本营满意’，大本营下令撤销了他所担任的职务。斯大林指出：‘甚至，巴格拉米扬同志没有能力从西南方面军突然遭到的灾难中汲取教训。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中，由于自己的草率，西南方面军不仅输掉了已经赢得一半的哈尔科夫战役，而且将 18~20 个师拱手送给敌人。’在通报巴格拉米扬被任命为第 28 军参谋长和给他改过自新的情况后，最高统帅严厉地强调：‘当然，这不只是巴格拉米扬的错误。这里也有全体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错误，首先是铁木辛哥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的错误。如果我们把前线遭受并将继续遭受损失的 18~20 个师的灾难原原本本地通报全国，我担心，不会轻饶你们。因此，你们应反思你们所犯的错误，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今后出现类似错误。’”^①

对斯大林绝对没有好感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撒谎了：

“时任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用了一整段话谈及哈尔科夫事件。根据他的说法，他曾从前线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在别墅。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坚持要亲自与斯大林通话。虽然最高统帅‘距电话机只有几步远’，但他还是没有接电话，而是通过马林科夫转告，让他与马林科夫谈。之后，他对二十大代表们讲，他转达了方面军要求停止进攻的请求，斯大林说：‘一切维持现状！’换句话说，这等同于赫鲁晓夫宣布，恰恰是斯大林应对哈尔科夫的惨败负责。格·康·朱可夫提出了另外的说法，他认为，应对失败承担责任的是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在其《回忆与思考》一书中，朱可夫写道：总参谋部比前线更早地感到了危险。5月18日，总参谋部再次提出了在哈尔科夫停止我们的进攻战役……5月18日傍晚就该问题与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进行了谈话，赫鲁晓夫谈了与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同样的意图：

^① Р.М.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А.С.Доманк, А.П.Коваленко. *Маршал С.К.Тимошенко*.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Ф “Победа — 1945 год”, 1994, гл.5, с.249; см.: <http://militera.lib.ru/bio/domank/05.html>. То же самое письмо цитируется в: В.В.Бешанов. *Год 1942 — учебный*. — Мн.: Харвест, 2003, глава «Как один Баграмян два фронта загубил». См.: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beshanov_vv/14.html.

对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敌方军团的威胁过分夸大了，停止战役没有根据。根据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继续进攻的报告，最高统帅否决了总参谋部的意见。目前的似乎大本营有来自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警报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可以证明，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关于此问题的商谈。

我想，在这一情况下，元帅更接近真实。尼·谢·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了自己的回忆，这更像是经过许多年，在大家都清楚灾难逼近之后所表达的一种姗姗来迟的对失败的反应。朱可夫元帅不止一次强调，最高统帅决定的依据是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如果这仅仅是赫鲁晓夫的健忘，还有情有可原。而如果是企图事后为自己制造历史上不在现场的证据，这已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①

斯大林“根据地球仪”拟订军事战役计划

梅列茨科夫元帅：

“我们的某些书中有一个说法，似乎约·维·斯大林‘根据地球仪’领导军事战役。我从来没有读过比这更荒唐的说法。”^②

索洛维约夫和苏霍杰耶夫引用了另一位将军——阿·伊·格里布科夫的意见：

“关于‘地球仪’的谎言，作战文件已进行了批驳。战争期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的阿·伊·格里布科夫大将见证：‘尼·谢·赫鲁晓夫在揭露约·维·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断言，斯大林根据地球仪对战场进行指挥。显然，这是谎言。在军事档案馆中保存着各种比例的由最高统帅亲笔标注的地图。’”^③

列夫·巴拉扬搜集了其他统帅关于该问题的意见并将它们写在自己的书中：

“批驳赫鲁晓夫在‘地球仪’问题上的不良居心，可以在海军上将尼·

① Д.А.Волкогонов. *Сталин*. Т.2. Гл.8, с.777. См.: http://militera.lib.ru/bio/volkogonov_dv/08.html.

② К.А.Мерецков. *На службе народу*. Гл.29, с.380.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meretskov/29.html>.

③ Б.Г.Соловьёв, В.В.Суходеев. *Полководец Сталин*. — М.: ЭКСМО, 2003, гл.1. См.: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solovyov_suhodcev/01.html.

格·库兹涅佐夫的《前夕》一书中找到：‘恶意断言，似乎斯大林根据地球仪评价局势和采取决策，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斯大林如何与军事将领们一起澄清前线形势，如果需要，他甚至要了解一个团的位置。’在基·谢·莫斯卡连科的《西南战线》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当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瓦图京，方面军司令）对我们讲述了自己与最高统帅谈话的情况，我无法掩饰对大本营如此细致地分析形势的惊讶，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最高统帅是根据什么地图注视着我们行动的，他怎么能看得这么广、这么深呢？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笑了：根据两个地图——前线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和每一个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他之所以是最高统帅，主要的是，他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和纠正我们的错误……’

但大概空军主帅亚·诺维科夫提出了最公正的反驳：“比如，赫鲁晓夫说，似乎斯大林在战争时期是根据在他的办公室的一个大型地球仪制订战役计划和领导战役的，这真是满嘴的胡说八道。仅报告人的这一断言，在当时就引起了范围相当大的抗议（虽然没有公开），特别是军事活动家和许许多多普通的卫国战争老战士。”^①

朱可夫元帅对“地球仪”之说也提出了非常怀疑的看法：

“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是，最高统帅根据地球仪研究形势和采取决策，这不符合实际。当然，他在工作中也没有使用战术地图，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对标有形势的作战图，他有很好的分析判断。”^②

莫洛托夫虽然不是军人，也注意到赫鲁晓夫关于地球仪的谎言：

“在休息室墙上全是地图。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根据地球仪指挥作战，恰恰相反，他非常喜欢使用地图……”^③

甚至赫鲁晓夫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无法不提及其关于“地球仪”的谎言。^④

① Л.А.Балаян. *Сталин и Хрущёв*. Гл. 22: «Полководец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См.: <http://stalin.su/book.php?action=header&id=20>.

② Г.К.Жу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Т.1. Гл.11, с.342. См.: <http://militera.lib.ru/memo/russian/zhukov1/11.html>.

③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9, с.361.

④ А.И.Микоян. *Так было*. — М.: Вагриус, 1999, гл. 49, с.607.

斯大林“贬低”朱可夫元帅的功勋

摘自国家安全部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的报告：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

约·维·斯大林同志

……今年1月8-9日夜，对位于莫斯科近郊鲁布廖沃别墅区朱可夫的别墅进行了不公开的搜查（此处和以下的斜体字为文件起草人所标——作者注）。

搜查结果发现，别墅的两个房间已成为仓库，那里存放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和贵重物品。如：

——毛料、丝绸、锦缎、丝绒和其他布料，总计超过4000米；

——毛皮：貂皮、猴皮、狐狸皮、海狗皮、卡拉库利羊羔皮共323件；

——高级软山羊皮革：35件；

——从波茨坦和其他德国宫殿和博物馆运回的昂贵的地毯和巨幅郭伯廉花毯共44条，其中一部分铺、挂在各个房间，其余的放在仓库；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铺在别墅一个房间的大尺寸地毯；

——珍贵的带有画框的巨幅古典写生画55幅，分挂在别墅的各个房间，部分储存在仓库；

——昂贵的餐具和茶具（艺术加工瓷器，水晶玻璃器皿）七大箱；

——整套的银质餐具和茶具两箱；

——带有丰富艺术造型的键盘式手风琴八台；

——哥德兰公司独一无二的哥德兰猎枪和其他猎枪20支。

这些东西放在51个大箱子和手提箱中，或堆放在那里。

除此之外，在别墅所有房间里的地上、窗台、格架、小桌、床头小柜上，都放置了大量的青铜和瓷制花瓶及艺术雕塑，以及各式各样外国制造的小摆设。

值得注意的是搜查人员所做的如下声明：朱可夫的别墅实际上成了一个古董商店和博物馆，内部挂满了价值昂贵的艺术画作……

有一些非常珍贵的画作，完全不适合放在住宅，而应转交国家基金组织或放在博物馆。

超过20条大地毯铺在几乎所有房间的地板上。

所有陈设，从家具、地毯、器皿、装饰品到窗帘，全是外国的，主要是德国的。在别墅，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苏联制造的……

别墅里没有一本苏联图书，但在书架上却有大量精美硬装帧和压有金色花纹的纯德文书籍。

走进房屋后，很难想象自己处在莫斯科近郊，而不是在德国……

随函提交一些在朱可夫的住宅和别墅发现的珍贵物品、材料的照片。

阿巴库莫夫

1948年1月10日”^①

根据索洛维约夫和苏霍杰耶夫的说法：“格·康·朱可夫不止一次强调，‘斯大林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我一句坏话。如果有谁想尝试在他面前欺负我，斯大林会为我让他的脑袋搬家。’”^②

①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1993, 1 вып., с.189–191.

② Б.Г.Соловьев, В.В.Суходеев. *Полководец Сталин*. См.: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solovyov_suhodeev/01.html.

第六章

“践踏列宁民族政策原则”

强制性大规模民族外迁

赫鲁晓夫：由斯大林倡议的粗暴践踏基本的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原则的行动令人发指。这里所指的是，将整个民族强行从他们的家园外迁，无一例外，包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而且，这种搬迁与军事考虑没有任何关系……

不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在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的意识中，都不会容忍这样的观点，即应该由整个民族，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承担个别人或个别团伙敌对行动的罪责，对他们进行大规模镇压，使他们遭受困苦和煎熬。^①

在谈及大规模民族外迁时，赫鲁晓夫提到了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忘记”说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了。

需要指出，谈及强行外迁问题时赫鲁晓夫没有隐瞒任何特别的“秘密”：这一切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都已相当清楚。对斯大林提出的指控，只有三点应视为“新发现”：①强行外迁，且“没有任何例外”；②外迁“与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1-152.

军事考虑没有任何关系”；③“整个民族”因“个别人或个别团伙的敌对行动”而受到了惩罚。以下将对上述这些“揭发”进行研究。

成为强行外迁原因的事件、外迁行动的实施及其后果，在苏联档案文件中均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虽然苏联解体前关于该问题的全部档案信息是保密的，但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可以接触这些材料。他本人或他的助理应该知道，“秘密报告”中抨击的每一条，都与真实情况毫无共同之处。

请大家自己判断吧。

(1) 伊戈尔·佩哈洛夫在其书中列举了外迁人员名单例外的例子，他引用的是俄罗斯有关该问题的顶级专家尼·费·布加伊在其著作中公布的文件。①

(2) 从军事角度看，强行外迁保障了红军后方的安全。从每一个被迁移的民族看，其大部分民众或积极，或消极，但都支持了德国，参与了反苏联政府的起义行动，对苏联武装力量构成了威胁。加之，当时还不能完全确定，1944年德国是否会再次如战争前三年那样将它的军队调动至东方。

虽然尼·费·布加伊和阿·穆·戈诺夫对搬迁公开表示不赞成，但他们还是指出：“总的来说，苏联政府选择了正确的轻重次序，在确定轻重缓急次序时，利用了其保持前线秩序，特别是北高加索秩序的权力……”②

正是在这里值得提及赫鲁晓夫在做“秘密报告”时幽默地说：“乌克兰人没有遭受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太多，无处可迁。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的。”③（笑声，会场活跃）

当然，这是在开玩笑，因为赫鲁晓夫并没有郑重其事地证实，斯大林打算将所有乌克兰人外迁。其实，赫鲁晓夫提到乌克兰人可能是因为，该共和国居民中参与支持纳粹分子和反苏起义的人数不是很多。尽管如此，随着苏军1944~1945年向西方的波兰和德国领土挺进，这一切仍在红军后方引发了严重问题。④ 考虑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车臣-印古什居民中发生的大规模反苏起义，国家当局有充分理由认为，类似情况也有可能在乌

① 见本章附件。

② N.F.Bugai, A.M.Gonov. "The Forced Evacuation of the Chechens and the Ingush." // *Russian Studies in History*. Vol.41, No. 2, Fall 2002, p.59.

③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2.

④ Ю.Н.Жуков. *Сталин: Тайны власти*. — М.: Вагриус, 2005, с.432-433.

克兰发生。

(3) 关于是否应将整个民族外迁问题，应分两部分谈。

第一，这些民族中，起义活动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真的有那么大吗，即多数居民参与了起义？以下将拿出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就我们作为例子来讲的两个民族，起义具有群众性，即该民族不少于一半的居民参加了起义。

第二，关于种族灭绝问题。将一些在语言、历史、文化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不大的族群分散，实际上将会导致这一部族的灭亡。

至于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因为他们与纳粹分子合作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只对犯罪人”进行隔离和惩罚，将会使整个民族消亡。将整个民族迁移反而使少数民族保住了自己民族的统一，而最终，其人口数量增长了。

克里米亚鞑靼人

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大规模外迁。相当多关于这一强行外迁的文件，以前是保密的，现在已经公开。当然，它们是由反共派别的研究人员出版的，他们的评论带有很大的倾向性。但文件本身非常有意思！

让我们看看从那里得到的某些资料。

1939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共有21.8万，这意味着大约有22000人，或10%的居民是到了应征入伍年龄的男性。根据最新公开的苏联文献资料数据，1941年有20000应征入伍的鞑靼人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逃兵；至1944年，有同样数量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持武器转入德国纳粹一方并进行反对红军的活动。由此看来，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希特勒分子合作的规模的确很大。因此在这里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该怎么办？

可以把20000名逃兵处决，也可以把所有符合应征入伍年龄的男性关进监狱，但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消灭整个克里米亚鞑靼部族。

苏联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将所有鞑靼人整体迁移到中亚，这是在1944年实施的。他们在那里分到了土地并在几年内免缴税负。克里米亚鞑靼部族保存了下来，到1950年年末，人口开始增长。

车臣人和印古什人

1943年，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居住着大约45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这意味着，他们之中的4万~5万人是应征年龄的公民。1942年，即纳粹德国战绩达到鼎盛之时，有14567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应征入伍，其中13560人，即约93%的人成为苏军的逃兵，他们或隐藏起来，或加入了在山区活动的起义者行列及匪帮团伙之中。

车臣和印古什居民与德国武装力量的大规模合作是毋庸置疑的。2000年2月23日，“自由”无线电台转播了对车臣民族主义分子的访谈录，在访谈中他们以1943年2月发动的亲德反苏武装起义感到自豪，而这正是德国加紧向高加索纵深推进的时刻。这个访谈恰恰证实了赫鲁晓夫竭力想隐瞒的真相：确实爆发了起义，而且起义是在纳粹的旗帜下进行的，其目的是与纳粹德国联合。

正如布加伊和戈诺夫所指出的，在被迁移的人群中死亡的人数并不多，只占总数的0.25%：“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报告证实，共发出180次军列，运送了493269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及当时在监禁中的其他部族的人。在这次行动中有50人被击毙，1272人途中死亡。”^①

鉴于搬迁是在冬季进行的，而且当时正在进行着欧洲史上，可能也是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这样的损失数字不算太高。

可以说，最后一点并不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范围之内。我们只是想找到证实或驳斥赫鲁晓夫提出的指控。这里我们提请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称，^①整个民族被外迁，“没有任何例外”；^②进行此类迁移缺乏依据；^③与占领军合作和叛变的事实是“个别人或个别团伙的行为”。如以上已经表明的那样，赫鲁晓夫的三个看法均与事实不符：^①例外还是有的；^②搬迁的理由重大，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③叛变实际上并非个人的行为，而是具有群体性。赫鲁晓夫再次撒谎了。

“列宁格勒案”

赫鲁晓夫：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骄傲地庆祝以巨大的牺牲

^① Bugai, Gonov. P.56.

代价和难以想象的努力而取得的光辉胜利。国家政治热情高涨……

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突然发生了所谓的“列宁格勒案”。如现在已经证明的那样，这是伪造的案件。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无辜牺牲……

究竟为什么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并被消灭呢？

事实表明，“列宁格勒案”也是斯大林专横地对待党的干部的结果。^①

“列宁格勒案”作为要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有许多理由认为，有关这一“案件”，要讨论的还不只是假案问题，而是这里是否有重大犯罪的问题。

所幸的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澄清，我们的任务要简单得多：只是要证明赫鲁晓夫的断言即仿佛整个案件是“斯大林为所欲为的结果”是谎言。因为，这恰恰是“秘密报告”作者所表现出的触目惊心的藐视真相的案例之一。

多年来，赫鲁晓夫总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应该对“列宁格勒案”承担责任，但每一次他都有不同的说法，显而易见，每一次都要看当时的需要而定。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6月25日，拉·帕·贝利亚在其被捕（很可能是赫鲁晓夫对他搞的谋杀）前一天最先提出该“案件”问题。他发给中央主席团一份关于前安全部副部长米·德·留明案件侦查进程的报告。在报告中，贝利亚指责留明假造了“列宁格勒案”的侦查材料。这好像使赫鲁晓夫陷入某种窘境，因为报告中，斯大林生前已被解职的苏联国家安全部前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受到直接的指控。

一年之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关于“列宁格勒案”的决议。主犯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的前任维·谢·阿巴库莫夫。而仅仅过了几天，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就刚刚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列宁格勒案”决议案发表讲话时称，除阿巴库莫夫外，应当承担责任的还有贝利亚！但在该案侦查时期，贝利亚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2.

与国家安全部、内务部以及对它们进行监督的中央委员会机构，均没有任何关系。

又过了两年之后，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又将所有罪责归咎于斯大林。但又过了一年多后，1957年6月，赫鲁晓夫突然称，斯大林是反对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及其他“列宁格勒人”的，挑动对他们实施逮捕和处决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究竟该相信哪种说法呢？有一点是清楚的：不管马林科夫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贝利亚，毫无疑问，与此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实，赫鲁晓夫1957年讲的是实话，其他任何时间所讲的同样不是实话。

“梅格列尔案”

赫鲁晓夫：在这方面，关于格鲁吉亚存在梅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也是一个教训。众所周知，关于这一问题，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的通过，没有在政治局讨论，斯大林本人口授了这些决议。决议对许多诚实的共产党人提出了重大犯罪指控。根据捏造的材料断定，格鲁吉亚似乎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借助于帝国主义国家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这一原因，逮捕了格鲁吉亚一批党的和苏维埃的负责人。如后来已经查明的那样，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诽谤。^①

在这里，赫鲁晓夫提出的唯一的具體指控是，斯大林亲自口授了1951年11月9日和1952年3月27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我们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1951年11月9日的政治局决议连同一些评论，已在一本学术文集中发表。文集的编辑们记下了所有斯大林所做的修改情况：很多情况下是修改措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3.

辞，其他则是减缓相当激烈的指控他们搞民族主义的调子。^① 与1952年3月27日决议一起，^② 两个决议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③ 再说，关于1952年3月27日的决议，斯大林亲自在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上写了其名称，问题本身已经被列入议事日程。

但主要问题是，赫鲁晓夫断言，斯大林应对“梅格列尔案”造假承担责任，称该案是在斯大林——“格鲁吉亚人民的伟大儿子”“格鲁吉亚人喜欢这样称呼自己的老乡”“这位‘天才’的领导干下的”。但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谎言。尼·彼得罗夫引用的文件证明，这一案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格鲁吉亚领导层中的反宗派斗争”。^④

1953年4月10日，即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指责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假造侦查材料和殴打许多被捕的人；决议认为，伊格纳季耶夫至少应对没有对其下属留明、采普科夫等人进行应有的监督承担责任。1953年4月1日，贝利亚向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指控伊格纳季耶夫犯有制造“医生反革命分子案”（简称“医生案”）罪。而4月5日，因玩忽职守问题，以对中央委员询问的表决方式（即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表决）解除了伊格纳季耶夫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最后，4月28日，又是在赫鲁晓夫知道的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贝利亚1953年6月25日向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指控在伊格纳季耶夫知道和默许的情况下，留明和他的其他下属使用了刑讯逼供，包括对那些在“列宁格勒案”中被指控的人。

尽管如此，恰恰是赫鲁晓夫在逮捕贝利亚之后，再次让伊格纳季耶夫担任了党的领导职务。伊格纳季耶夫是二十大代表，在讲话涉及“医生案”时，正好用他作为证人，而关于“医生案”，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对伊格纳季耶夫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并为此免除了他的书记职务！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对《新领袖》杂志刊登的“秘密报告”的评论中写道，“关于梅格列尔阴谋案”的发生，伊格纳季耶夫负有责任。

①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гг. / Сост. О.В.Хлевнюк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350–352.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mingrelianres.pdf>.*

② 同上，第352–354页。

③ 同上，第351页、第354页。

④ Н.Петров. *Перв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ГБ Иван Серов*. — М.: Материк, 2005, с.114.

与南斯拉夫的相互关系

赫鲁晓夫：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详细讨论了与南斯拉夫产生冲突的原因，并指出了斯大林的负面作用。要知道，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没有通过同志党式的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出现这样的事件，没有充分的理由，不与该国断绝外交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领导没有错误和缺点，但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无限夸大了，以至于和与我们友好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①

这又是一个谎言。1953年7月，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攻击贝利亚有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计划。当时，他们将铁托和兰克维奇称为“资本家的代理人”，说“他们的表现，就是苏联的敌人”。但在二十大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已将他们称为“同志”！换句话说，他和其他中央主席团成员曾尖锐地批判贝利亚企图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和对待南斯拉夫人像“同志”一样；而当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赫鲁晓夫在该问题上出尔反尔地改变观点时，他竟然指责斯大林没有照此办理！

“医生反革命分子案”

赫鲁晓夫：同样也应该谈谈“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会场骚动）说句实话，不存在任何“案件”，除了季马舒克医生的声明外。她也许受了某个人的影响，或根据某人的指示（要知道，她是国家安全机关不对外公开的人员）向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声明，医生们似乎采取了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收到这封信后，斯大林立即得出结论：苏联有医生反革命分子，并下达了逮捕苏联医学界一批著名专家的指示。他还亲自对如何进行侦讯和审问被逮捕的人下达了指示。他说：给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戴上镣铐，殴打某某。这里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代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4.

表，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斯大林直接对他说：如果医生们不招供，那就要了你的脑袋！（会场群情激愤）斯大林亲自把侦查员找来，给他指示和告诉他侦讯的方法，而唯一的方法：除了殴打，还是殴打。

在医生被捕一段时间后，我们，政治局委员们，得到了医生的口供笔录。将这些笔录发给大家后，斯大林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瞎子、公猫，没有我会发生什么？会亡国。因为你们不会识别敌人。”

情况就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对侦查的事实进行检查，也没有可能通过与提交这些供词的人接触来对事实进行检查。

但我们感到，医生被捕案是一个齜齜的案件。其中的许多医生我们自己也了解，因为他们为我们治过病。当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查了查这个“案子”是怎样制造的，我们看到，该案是彻头彻尾的假案。

这一无耻的“案件”是斯大林制造的，但他没有来得及（按自己的意见）结案，所以医生们才活了下来。现在他们都恢复了名誉，工作在原先的岗位上，为领导人员包括政府领导人员治病。我们完全信任他们，而他们也一如既往地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策划各种各样的肮脏和可耻案件中，我们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外国情报机构的奸细、骗取了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扮演了可耻的角色。^①

赫鲁晓夫关于“医生案”的通报，是一派胡言。

国家安全部自1952年开始“处理”“医生案”，而利·费·季马舒克的信写于1948年。信件涉及的是在安·亚·日丹诺夫猝然逝世之前不久的治疗方法。

在这些信件中，没有提到犹太医生。总而言之，季马舒克与“医生阴谋”和直到四年之后出现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赫鲁晓夫纯粹是在对一个无辜的妇女进行诽谤。

所叙述的事件发生之时，领导苏联国家安全部的是伊格纳季耶夫，而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4-155.

不是贝利亚。如以上已经指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赫鲁晓夫是主席团成员，于1953年4月5日解除了伊格纳季耶夫中央书记的职务，4月28日他又因假造“医生案”侦查材料而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如果把不惜任何代价、想方设法逃避责任的伊格纳季耶夫本人排除在外，再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指控。

恰恰是贝利亚结束了对“医生案”侦查材料的造假行为，解放了医生，并抓捕了犯罪人员，包括伊格纳季耶夫。而在1953年6月下旬处决贝利亚后，伊格纳季耶夫被立即释放。

根据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他的父亲不相信医生有罪。

由于年迈和多病，斯大林几乎脱离了工作和未能跟踪事件的发展。他认为，国家安全部的状况不佳。^①看来，为了改善国家安全部的状况，斯大林计划任命贝利亚为国家安全部部长，虽然，他的脑子里可能还装着“梅格列尔案”。

还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中央报纸已不再刊登关于“医生阴谋”的文章。著名反斯大林分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确信，这一事实和其他一系列事实说明，正是斯大林下令停止在报刊上发表攻击“医生反革命分子”的文章。^②麦德维杰夫提请注意，斯大林反对伴随整个揭发医生运动中的反犹太主义。研究者承认：总体上看，斯大林与反犹太主义格格不入，他一生都在与反犹太主义进行斗争。

文献资料

强制性大规模民族外迁

伊·瓦·佩哈洛夫引用尼·费·布加伊编辑的文集公布的文件时指出：“通常认为，所有克里米亚鞑靼人，包括那些在红军或游击队中诚实

^① См. дневниковую запись В.А.Малышев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1 декабря 1952 года: «Пройдёт десяток лет, и эти встречи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шь уже в памяти». Дневник наркома.// «Вестник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 *Источник*. 1997, № 5, с.141.

^② Жорес Медведев. *Сталин и ев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анализ*. — М.: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2003, с.208 и далее, 216.

地进行过战斗的人，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强制性外迁。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没有按特别移民规定移民的有敌后克里米亚地下活动的参加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没有搬迁的有乌谢伊诺夫的家庭。在克里米亚被占领期间，乌谢伊诺夫在辛菲罗波尔，自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是地下爱国小组成员，之后被希特勒分子逮捕和处决。其家庭成员被允许在辛菲罗波尔居住。’

‘……在前线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立即请求让他们的亲属免除特别搬迁。提出这些请求的有高等空战军官学校第一航空歼击机团第二航空大队副指挥官埃米尔-乌谢因·恰尔巴什，装甲坦克部队少校恰尔巴什，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这类请求通常都得到满足，包括埃·恰尔巴什的家庭，允许居住在赫尔松州。’^①

1949年4月1日，苏联内务部特别移民部拥有569个鞑靼人的资料，他们没有被迫外迁，而是作为自由公民居住在国家的各个地区。^②

在对“自由”电台发表的谈话中，一名车臣民族主义分子确认，1943年的武装起义带有亲德国性质，其目标是让高加索脱离苏联：

“车臣人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为自由和自决而战斗，并于1943年2月在山区爆发了由律师梅尔别克·舍里波夫和著名作家哈桑·伊斯拉伊洛夫领导的起义。利用德国人和俄罗斯人打仗的机会，车臣人努力以武力方式脱离苏联和宣布独立。他们最终目的是实现高加索民族的联合，以便他们能自由地生活在脱离苏维埃帝国的邦联国家中。这样做的重大理由是基于以下考虑：斯大林首先盯着的肯定不是他不喜欢的人，而是像他的前辈俄罗斯沙皇一样，首先看到的是车臣人的桀骜不驯，想脱离苏联和建立自己的独立共和国。很清楚，这就是惩罚车臣人民、对他们进行最残酷的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而这一切一直持续到今天。”^③

① И.В.Пыхалов. Время Сталина: Факты против мифов. 2-е изд. — СПб.: Неотек Электро, 2001, с.84, где цитируется книга: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 «Их надо депортировать ...»: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 Сост. Н.Ф.Бугай. — М.: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92, с.156-157.

②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 М.: Наука, 2003, с.188.

③ Из программы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посвящённой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цев в 1944 году, см.: <http://archive.svoboda.org/programs/11/2000/11.022300-3.asp>.

“列宁格勒案”

1953年6月25日拉·帕·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所做的报告谈到了留明参与假造“列宁格勒案”问题：

“留明参与了假造关于由洛佐夫斯基、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等人领导的所谓‘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间谍中心案’和‘列宁格勒案’的侦查材料。众所周知，在‘列宁格勒案’中被逮捕和审判的列宁格勒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员有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等。1950年11月，根据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委托留明对被逮捕的埃廷格尔教授进行侦查。当得知埃廷格尔作为顾问参与了对亚·谢·谢尔巴科夫的治疗后，留明采取了非法的侦讯手段迫使埃廷格尔提交了关于对亚·谢·谢尔巴科夫治疗错误的供词，似乎是治疗错误导致了谢尔巴科夫的死亡。”^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年5月3日关于“列宁格勒案”的决议，继续指控阿巴库莫夫的造假行为：

№ 63 第 53 条——关于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案件

苏联检察院根据苏共中央委托进行的侦查查清，控告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背叛祖国、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参与反苏集团的案件，是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部长，现已被捕的阿巴库莫夫及其同谋为达到敌人的冒险主义目标而假造的。

利用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违反国家纪律和个别失误——为此他们已经被撤销职务和受到党纪处分，阿巴库莫夫及其同谋蓄意把这些行为视为有组织的反苏集团的行为，并通过拷打和威逼取得被逮捕者关于似乎建立了阴谋组织的假供词。

根据阿巴库莫夫的这些假造材料，1950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卡普斯京和拉祖京死刑，判处图尔科15年监禁，扎克热夫斯卡娅和米赫耶夫15年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с. 65

监禁。^①

但仅仅过了几天之后，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不仅对阿巴库莫夫，也对贝利亚提出了指控：

“从向你们宣读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和鲁坚科同志的报告可以看出，所谓的‘列宁格勒案’是贝利亚反革命集团编造的。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是贝利亚最亲密的同谋之一，检察长鲁坚科同志对其罪行进行了很好的揭露并向你们做了报告。”^②

虽然曾指控斯大林在“列宁格勒案”中的作用是“为所欲为”，但1957年6月赫鲁晓夫又突然称，斯大林反对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和他的其他同谋者：

赫鲁晓夫：斯大林曾反对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粗体字为作者所标）。但狡诈的衣冠禽兽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劝斯大林同意。这导致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波普科夫被逮捕和处决。马林科夫，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你没有良心，你是个卑鄙的人！（掌声）

马林科夫：你是在诬陷。

赫鲁晓夫：斯大林当着我的面说，而其他同志也听到了：为什么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到国家银行任职，为什么没有提出意见？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却这样向斯大林谈该案：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是犯罪分子。为什么？不管是否正确，斯大林曾提拔库兹涅佐夫取代马林科夫，并想让沃兹涅先斯基成为部长会议主席。为此他们丢了脑袋。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阴谋家，他们有意欺骗了斯大林。^③

“梅格列尔案”

在刊登有1951年11月9日政治局关于格鲁吉亚贿赂案和“巴拉米亚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Март 1953 – февраль 1956.* — М.: МФД, с.115.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Март 1953 – февраль 1956.* — М.: МФД, с.135.

③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8, с.201–202.

反党集团案”决议的学术版文集中有这样的注释：

“在政治局会议记录正本中，保留着一份波斯克列贝舍夫签字的决议以及经斯大林修改的打印文本草案，之后对于修改做了附带说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文献库，17；目录，164；案卷，1604；案卷页码，57~70……）。”^①

在同一出版物公布的政治局 1952 年 3 月 27 日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状况决议的注释称：

“在政治局会议记录正本中，斯大林将决议名称写进了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文献库，17；目录，163；案卷，1615；案卷页码，134）。决议是政治局 1952 年 3 月 25 日和 27 日会议的结果。”^②

《俄罗斯报》在《历史上的这一天：4 月 10 日》栏目中写道：

“1953 年，‘苏共中央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前国家安全部违反苏联法律’的决议通过。这一决议撤销了此前的中央 1951 年 11 月 9 日和 1952 年 3 月 27 日关于格鲁吉亚存在梅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的决议。此前逮捕的格鲁吉亚领导人被释放。但是，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很快再次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与贝利亚有联系。”^③（粗体字为作者所标）

刊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所做的注释指出：

“这里所说的是 1951 年 11 月 9 日和 1952 年 3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揭发由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米·巴拉米亚领导的梅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的决议。1953 年 4 月 10 日‘苏共中央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前国家安全部违反苏联法律’的决议取消了这些决议。”^④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新领袖》杂志刊登的“秘密报告”的注释中提请人们注意的是：

“赫鲁晓夫关于‘梅格列尔阴谋’的声明旨在解释 1952 年在格鲁吉亚

①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Сост. Хлевнюк О.В.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прим.1 на с.351.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mingrelianres.pdf>.

② 同上。第 354 页注①。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mingrelianres.pdf>.

③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3, 10 апреля. См. также: http://www.rg.ru/Anons/arc_2002/0410/hist.shtml. Само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 10 апреля 1953 год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37–40.

④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прим. 51 на с.169.

进行清洗的原因。虽然赫鲁晓夫在声明中只是暗示，‘梅格列尔案’与‘列宁格勒案’一样，都是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挑起的，但这一说法是蓄意歪曲。贝利亚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之一谢·杰·伊格纳季耶夫恰恰是在1951年11月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部长；所以，制造‘梅格列尔案’是为了打击贝利亚。这一情况和之后在格鲁吉亚进行的清洗（1952年4月、9月和11月）动摇了贝利亚的地位，并为十九大（1952年）之后自‘医生案’人员被逮捕而开始的有计划的‘第二次叶若夫式镇压’开启了道路。”^①

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知道，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之后又因其对“梅格列尔案”“医生阴谋案”侦查材料造假等而受到一系列指控，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的一系列报告都对伊格纳季耶夫的角色进行了揭露，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梅格列尔案”。^②

与南斯拉夫的相互关系

1953年7月，赫鲁晓夫与主席团其他委员猛烈抨击贝利亚企图修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请看以下七月全会（1953年）速记记录中的一个段落：

莫洛托夫：同志们，我认为，这是事实，即马林科夫读了致“兰科维奇同志”“铁托同志”的信件的草案，叛徒因这一事实而人赃俱获。信是他亲手写的，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一问题。这算什么人？

当然，我们互派过大使。

马林科夫：我们只是希望关系能够正常化。

莫洛托夫：我们希望关系正常化，可在中央委员会已有书面的说法，表明了目前我们应如何对待南斯拉夫。很清楚，如果不发生正面冲突，我们的决定也会不一样。我们决定与南斯拉夫建立如同其他资

^①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Special Report to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Annotated Especially for this Edition by Boris I. Nicolaevsky.* (NY: The New Leader, 1962), note 51.

^② *Ласперный Берия. 1953, с.29-37.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mingrelianaff.pdf>.*

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关系：大使级、电报往来、务实的会晤等。而你这是什么：“借此机会，代表贝利亚同志，向您，兰科维奇同志，转达崇高的敬意，并请通报铁托同志；如果铁托同志同意这一观点，那么……将是适宜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叫什么事儿？

……他会得到外国资本家——铁托—兰科维奇的支持，这是个资本家的奸细，他们在他们那里受了培训。他从那里突然跑了出来并潜入了我们的队伍……

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贝利亚企图与兰科维奇和铁托勾结意味着什么？兰科维奇和铁托的所作所为就是苏联的敌人。这很清楚，贝利亚背着本国政府撰写的信件是又一次在苏联背后捅刀子，是肆无忌惮地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直接服务，仅凭这一个事实就足以得出结论：贝利亚是异己阵营的间谍、是阶级敌人的间谍。^①

“医生反革命分子案”

不排除贝利亚是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终止了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

以下是贝利亚1953年4月1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为涉及“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人员恢复名誉报告的摘要：

“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未能胜任其职务，未能保障对侦查工作进行应有的监督，任由留明和国家安全部其他工作人员，而他们利用了这一点，对被逮捕的人员严刑拷打，并不受惩罚地假造侦讯材料。

……

(4) 审核了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同志的责任问题。苏联内务部已采取措施，避免今后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中再次出现类似的对苏联法律的歪曲。”^②

根据这一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3年4月3日通过决议，决议指出：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103-104 и 246.*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22-23,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doctorsplot.html>.*

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关于国家安全部粗暴违反苏联法律和制造假侦讯材料的解释。^①

根据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的说法，正是斯大林通过媒体结束了对“医生反革命分子”的迫害。

“可以得出的这样的初步看法：或是在2月27日晚，或是在2月28日早晨，斯大林给《真理报》打电话，命令停止发表反犹太人的材料和其他与‘医生案’有关的所有文章……在苏联的这一时期，只有一个人可以仅凭给《真理报》编辑部或给苏共中央宣传部打一个电话就改变官方的政策。能够这样做的只有斯大林一人……”^②

麦德维杰夫强调：

“几乎在斯大林的所有传记中都可以读到他的反犹太主义观点，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道德和日常生活中的。它是政治方面的，其表现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反犹太人。”^③

根据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回忆录，斯大林不相信医生有罪：

“‘医生案’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父亲对事件的转折非常伤心……父亲说，他不相信他们‘不诚实’，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季马舒克的告发成为‘证据’……”^④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23-24,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doctorsplot.html>.*

② *Ж.А.Медведев. Сталин и ев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анализ. — М.: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2003, с.216-217.*

③ 同上，第98页。

④ *С.И.Аллилуева. Двадцать писем другу. — М.: Вся Москва, 1989, письмо 18, с.192.*

第七章

贝利亚，其“阴谋”与“罪行”

贝利亚——“外国情报机关的奸细”

赫鲁晓夫：在策划各种各样的肮脏和可耻案件中，我们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外国情报机构的奸细、骗取了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扮演了可耻的角色。^①

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人再重复赫鲁晓夫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奸细贝利亚”的说法了，这些说法已经被现有的证据驳得体无完肤。而且，无论是莫洛托夫，还是卡冈诺维奇，对此都不相信，虽然他们自己曾在1953年提出过对贝利亚的类似指控。

尽管在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上众多攻击之箭射向贝利亚，但1920年代初贝利亚在巴库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见证人米高扬被迫承认，中央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为外国特工机关工作过。^②

赫鲁晓夫将贝利亚关于建立统一和中立的德国的建议，视为“对西方的让步”，仅仅根据这一理由就给他扣上了“帝国主义奸细”的帽子。但斯大林也曾在1952年向盟国建议着手两个德国联合的进程，必须遵循的条件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5.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с.315.

是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斯大林逝世后，《真理报》两次（1953年4月和5月）公布了该建议的各种方案。

也许，贝利亚从来都不拥有可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管的报刊上自作主张地发表个人意见的大权。他是一名中央委员，他对未来德国的考虑只是他的一种建议。在这一问题上他无可指责之处还在于：一般说来这种问题谁都可以谈论，但说到底，没有集体批准的决议，有关德国问题的任何想法都不可能得到落实。

实际上，赫鲁晓夫关于“对西方让步”之说，也是谎言。苏联反希特勒联盟盟友持完全对立的意见，并拒绝研究德国统一的问题。如果苏联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西方将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因为联合的思想非常接近多数德国居民的想法。如果西方大国继续反对这一建议，那么就会清楚：是西方，而不是苏联对战后德国实行了不友好的政策。

在与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座谈中，已是耄耋老人的莫洛托夫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也认为贝利亚关于建立中立德国的建议是“帝国主义奸细”的行为。但对贝利亚是否真的是外国情报机构的奸细和有没有文件可以证实对他的指控，莫洛托夫的回答是否定的。^① 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上，对贝利亚间谍活动的指控大体上也是这样讨论的。

卡明斯基谈贝利亚为木沙瓦特党工作

赫鲁晓夫：有没有关于贝利亚与党为敌的信号？是的，有这样的信号。早在193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就曾说过，贝利亚曾为木沙瓦特党的情报机构工作。中央全会还没有结束，卡明斯基已经被逮捕，而后被处决。斯大林对卡明斯基的声明是否进行了核实？没有，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这一点对于他已经足够了。^②

① Феликс 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9, с. 409; Он же. *Так говорил Каганович. Исповедь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апостола*. — М., 1992, с. 66.

②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5.

苏联解体后涌现了相当多的文件材料驳斥赫鲁晓夫的这一谎言。比如，不久前刚刚得知的伊·彼·帕夫卢诺夫斯基 1937 年 6 月 25 日的信件，就证实了贝利亚在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分子（即木沙瓦特党）中从事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的事实。

在 1923 年的“自传”中，贝利亚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在木沙瓦特党内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内进行地下工作的情况。事实也足以证明，若不是在为党工作，他是不会做许多事的。^①

其他文献资料也证实：贝利亚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进行这一地下工作的。的确，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贝利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绝对没有争议，谢·米·基洛夫会保护贝利亚；贝利亚与奥尔忠尼启则的家庭也不会保持如此亲密的同志式关系——如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之子谢尔戈所证实的那样。

很清楚，赫鲁晓夫利用了贝利亚处于地下工作时的状况大放厥词。地下工作是非常危险的；贝利亚需要有这样的掩护，以便躲过木沙瓦特党领袖们的眼睛，并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忠诚。毫不奇怪，许多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对此也产生了错觉。贝利亚 1933 年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件表明，在这一时期，他一直在努力与丑化他的流言进行斗争。在一切都要守口如瓶的情况下，他未必会想到向某一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写信告知此事。

赫鲁晓夫可以得到我们今天拥有的任何材料，甚至得到比今天更多的材料。他应该清楚，卡明斯基的声明是捏造的，他所说的关于贝利亚为木沙瓦特党工作的话都是谎言。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 - 拉夫连季耶夫案

赫鲁晓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和贝利亚之间多年来的敌对关系人所共知；二者的敌对关系源于谢尔戈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时期，因为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是与谢尔戈关系最密切的助理。这成为贝利亚制造“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案”的理由。^②

^①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Сост. В. Ф. Некрасов.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 320–325; 323.

^②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56.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更为人们熟悉的是其俄罗斯化名拉夫连季耶夫）于1937年6月22日，即联共（布）中央六月全会（1937年）期间，被开除党籍，并被逮捕。1938年8月22日，他在叶若夫而不是贝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被处决。

有一份贝利亚呈送斯大林的报告，该报告通报，在格鲁吉亚揭露了一个“右派”地下集团，其中有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但它的日期是1937年7月20日，即该报告几乎是在逮捕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一个月之后才出现的。^①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逮捕之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② 贝利亚当时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然，他既不可能影响对拉夫连季耶夫的逮捕，也不可能影响对拉夫连季耶夫的释放，因为他的权力还没有扩大到克里米亚。

关于拉夫连季耶夫，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

叶若夫的走卒亨·萨·柳什科夫，而不是贝利亚，拟定和签署的几个文件提到了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名字。^③ 柳什科夫参与了叶若夫的阴谋活动，参与了对许多人的拷打和处决。而叶若夫本人，众所周知，与贝利亚的关系绝对是势不两立的。

在为波斯特舍夫平反的材料中提到，波斯特舍夫曾提交了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是阴谋者之一的供词。^④

在雅·阿·雅科夫列夫的供词中，也有关于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材料。雅科夫列夫是斯大林制定宪法（1936年）时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联共（布）中央委员，曾担任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10月10日，雅科夫列夫突然被捕，在其10月15~18日的详细供词供出的许多边疆区参加阴谋的领导人中，包括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从斯大林的批注和亲笔写的对文件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雅科夫列夫的供词使斯大林深感意外。

①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1937–1938.* — М.: МФД, 2004, док. № 142, с.252.

②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С. 840;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УГБ НКВД*, с. 672. См. также: <http://www.hrono.ru/biograf/kvartveli.html>.

③ Там же, док. № 196 от 11 сентября 1937 года (с.347 и далее); № 207 от 19 сентября 1937 года (с.368 и далее); № 309 от 29 марта 1938 года (с.507).

④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Март 1953 — февраль 1956.* — М.: МФД, 2000, с.219.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在谈及关于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情况时，把所有罪责归咎于贝利亚。^①但这与真实情况不符，甚至，即使对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所提出的指控是伪造的，那么这些假造的材料，也主要是出现在“柳什科夫文件”中和雅科夫列夫的证词中（要少得多），而这些假造材料与贝利亚没有丝毫关系。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于1937年被捕，即在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手之前很久。现在，很难查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耶夫准确的死亡日期。

“往事记忆”协会互联网页上指出，拉夫连季耶夫被法院判决后于1938年8月22日被处决。^②如果相信这些材料，就可以得出结论，贝利亚不可能参与对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耶夫的审讯和拷打，即使他想这么干也做不到，因为正是在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执行极刑的当天，贝利亚被批准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的副职。实际上，直到1938年8月31日，贝利亚一直待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布）第一书记的岗位上。^③

如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那样，^④借助于刑讯和残酷折磨，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迫诬陷自己 and 他人。这像是真话，因为从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叶若夫和他的走卒，包括弗里诺夫斯基本人，不断地采取此类“方法”。

对比日期和事实，可以认为，贝利亚绝对没有参与决定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命运的可能性。赫鲁晓夫对此应该知道。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专门为赫鲁晓夫准备的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中才没有指出拉夫连季耶夫的死亡日期，以便为赫鲁晓夫对贝利亚最荒唐的指控理由成立提供最大限度的协助。

对米·谢·克德罗夫的“残暴镇压”

赫鲁晓夫：以下是老共产党员克德罗夫同志写给安德烈耶夫的信：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 331–332.

② С м.: http://www.memo.ru/memory/communarka/Chapt10.htm#_KMi_2450.

③ Н.В.Петров, К.В.Скоркин. *Кто руководил НКВД. 1934–1941: Справочник*. – М.: Звенья, 1999, с.107; См.: <http://www.memo.ru/history/NKVD/kto/biogt/gb42.htm>.

④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32.

“我从列福尔托沃监狱阴暗的牢房里请求你们的帮助。当你们听到可怕的呼叫声时，请不要从旁边走过，为他们辩护吧，帮助废除可怕的审讯和揭开错误吧。我在无辜地承受折磨……”^①

我们对米·谢·克德罗夫案件的详情并不清楚，因为所有与该案有关的侦查档案材料，研究人员还没有可能查阅。但这对于我们的目标并不特别重要。

不久前，联邦安全局学院和“罗斯”出版社将一些文件的汇编交付出版。根据该文件汇编，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贝利亚没有参与制定必须处决米·谢·克德罗夫的决定。

这一主动请求“苏联行政机关”批准的文件，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部领导人列·叶·弗洛济米尔斯基签署、副内务人民委员波·扎·科布洛夫批准并与苏联检察长维·米·博奇科夫商定的。之后，交贝利亚执行。^② 实际上，他这么执行了。

处决克德罗夫不是根据贝利亚的提议——具体到所涉及的这一问题，这才是主要的。

当然，关于克德罗夫人们知道的更多些。比如，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对他的死刑判决是法院做出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篇幅非常有限，无法从各个角度去研究这一案件。只讲一点就足够了：以上所列举的所有材料，赫鲁晓夫都掌握，但在谈及贝利亚在克德罗夫案件中的作用时，他还是撒谎了。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利亚

赫鲁晓夫：贝利亚也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家庭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则妨碍他实现自己的阴谋图谋。贝利亚搞掉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6.

^②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Т.2. Начало. Кн. 2. 1 сентяб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41 года. — М.: Русь, 2000, с.215–216 и прим. на с.215. Факты, изложенные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бы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ы Влодзимирским и Кобуловым в 1953 году в ходе следствия по «делу Берии», см: А.В.Сухомлинов. Кто вы,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 М.: Детектив-Пресс, 1993, с. 153 и 219–220.

了所有可能妨碍他的人，从而为自己扫清了道路。奥尔忠尼启则一直是反对贝利亚的，关于这一点他已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弄清事实，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他容忍对奥尔忠尼启则兄弟的杀害，而将奥尔忠尼启则本人弄到被迫自杀的地步。^①

正如奥·维·赫列夫纽克在其研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②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自杀近乎情理的原因与他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谢尔戈长时间受到疾病的折磨，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工作仍然处在“相当习惯的轨道”上。^③

无论如何，奥尔忠尼启则的死亡既与斯大林，也与他的兄弟帕普利亚（帕维尔）和贝利亚无关。相反，“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奥尔忠尼启则积极保护贝利亚并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到1930年代中期。”^④

1936年10月24日，在自己50岁生日那一天，或这一日子的前后，谢尔戈得知他的兄弟帕普利亚在格鲁吉亚被捕。^⑤谢尔戈的另一个兄弟瓦利科（伊万）试图在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为帕普利亚辩护，但结果自己也失去了工作。当时，贝利亚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布）的领导，所以，1936年12月中旬，谢尔戈给贝利亚打电话请他帮助。根据赫列夫纽克的话，“贝利亚对此格外上心”，他弄清了案情，帮助瓦利科恢复了工作，并写了一封非常有礼貌的便函回复了谢尔戈。^⑥

谢尔戈于1937年2月17~18日夜自杀身亡。^⑦对斯大林有很大敌意的赫列夫纽克曾试图找到斯大林与谢尔戈死亡有关的证据，甚至采取措施对他们在通电话时的小争执进行某种“复原”，但最终，这些尝试都是枉费心机。

1937年11月，帕普利亚被处决。赫列夫纽克没有提到关于帕普利亚被处决的任何详情，显而易见，他不掌握情况。很清楚，说谢尔戈离世与帕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7.

② Oleg Khlevniuk. *In Stalin's Shadow: the Career of 'Sergo' Ordzhonikidze*. (NY: Sharpe, 1995).

③ Khlevniuk. См. гл. 12-13; О.В.Хлевнюк. *Сталин и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Политбюро в 1930-е годы*. — М.: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3, с.115.

④ Khlevniuk, p.106.

⑤ Khlevniuk, p.105; Хлевнюк, с.77.

⑥ Khlevniuk, p.105; Хлевнюк, с.80.

⑦ Khlevniuk, p.147; Хлевнюк, с.116-129.

普利亚被处决有关很不靠谱。所以，毫无疑问，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身亡，仅与其健康状况有关。

根据拉·帕·贝利亚儿子的说法，谢尔戈与兄弟帕普利亚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而且，帕普利亚对苏联持敌对立场，所以当谢尔戈到第比利斯时，他总是设法住在贝利亚的家里。

赫鲁晓夫时代，然后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广泛流传着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他似乎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公开诉讼等说法。应当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相反，如约翰·阿奇·格蒂所指出：“奥尔忠尼启则，看来，完全不会反对使用恐怖手段，包括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恐怖手段；实际上，斯大林正是请求他准备在中央二月全会（1937年）上做关于工业部门破坏活动的报告……奥尔忠尼启则作为主报告人准备的在1937年二月全会关于工业部门破坏活动的发言草案，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也与当时的强硬路线一致……”^①

最后，我们做一个小结：赫鲁晓夫关于贝利亚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第一，奥尔忠尼启则从不认为自己与贝利亚互为政敌。相反，每当他到第比利斯时，谢尔戈更愿意在贝利亚那里留宿，而不想与其兄弟帕普利亚见面。

第二，如赫列夫纽克所讲，帕普利亚在1937年11月被处决，即在谢尔戈自杀（1937年2月）几个月之后，因此，将“消灭”帕普利亚作为导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死亡的原因，可以排除。

第三，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与贝利亚没有任何关系。反斯大林分子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得出结论，谢尔戈自杀是因为健康状况的恶化。

文献资料

贝利亚——“外国情报机关的奸细”

七月全会（1953年）期间，许多中央委员指控贝利亚为外国情报机关

^① J. Arch Getty, *The Politics of Repression Revisited*. P. 131, n.64 p.140. In Ward, Chris, ed. *The Stalinist Dictatorship*. London, New York: Arnold, 1998. Гетти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документ из РЦИХИДНИ (ныне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 Д.3350. Л.1-16.

工作。但没有一个发言人找到过这一指控的根据。以下是全会速记记录中某些有代表性的段落：

米高扬：

“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是不是间谍，他有没有得到外国的指示。而主要的问题在于，他执行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代理人的指示……”^①

赫鲁晓夫：

“在讨论德国问题时，他提出了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向西方让步的问题，这最清楚地表明了贝利亚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奸细和帝国主义的间谍。这意味着将 1800 万德国人交给美帝国主义者统治。他说：‘应建立一个中立的、民主的德国。’”^②

尽管如此，在审判贝利亚及其同伙的官方通报中仍确认：

“法庭查明，早在国内战争时期，拉·帕·贝利亚已开始了他的背叛活动和与外国情报机关建立秘密联系，即当拉·帕·贝利亚 1919 年在巴库时，已进行了背叛活动。他在阿塞边疆反革命的木沙瓦特政府情报机构担任秘密间谍职务，该间谍机构在英国情报机关的控制之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查清了拉·帕·贝利亚在积极参与反对巴库 1919 年革命工人运动方面的罪行。当时，贝利亚在阿塞边疆反革命的木沙瓦特情报机构担任秘密间谍职务，与外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联系，之后，保持和扩大了他与外国情报机关的秘密联系，直到被揭发和逮捕。即他所犯下的罪行在俄罗斯刑法典 58-1 ‘6’、58-13、58-11 等条中都有规定。”^③

许多年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向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介绍了关于贝利亚是“外国情报机关间谍”的想法：

“没有向我们出示关于贝利亚与帝国主义国家有联系、他是间谍等方面的文件。这样的文件无论我（卡冈诺维奇），还是莫洛托夫，都没有看到过。”

“我（丘耶夫——作者注）问莫洛托夫：‘他是不是间谍呢？’他说：‘代理人不一定是间谍。’

卡冈诺维奇说：‘我问莫洛托夫，你手中有没有关于他（贝利亚——作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174.

^② 同上，第 238 页。

^③ 同上，第 388~390 页。

者注)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文件呢?他说:没有。这样的文件没有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文件。情况就是这样。据说,法院里有文件。”^①

以下是莫洛托夫夫人对丘耶夫所谈的内容:

“关于贝利亚至今还在争论:他究竟是不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

我认为不是……他所做的事有利于帝国主义,他发挥的是帝国主义间谍的作用,这是问题的实质。而他的作用是:他建议放弃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将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最好方式……

我认为贝利亚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代理人并不意味着是间谍。”^②

没有任何指控贝利亚从事反国家活动的证据。赫鲁晓夫对此也予以证实:

“……没有对他(贝利亚——作者注)直接的犯罪指控。我可以想象,他是木沙瓦特党的间谍,如卡明斯基所说的那样。但对这样的事实谁也没有进行过核查……”^③

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言的记录草稿更加意味深长,他以对贝利亚活动无法掩饰的愤怒做出了对他的下述处罚提议:

“免去苏联部长会议副职(副主席——作者注),任命他为石油工业部部长。”^④

彼得·瓦格纳在世界历史网站发表的文章证实,在逮捕贝利亚前夕,他的政敌没有任何证明他犯罪的证据:

“没有提出任何反对贝利亚的具体指控。他的政敌对此是清楚的。开始,甚至赫鲁晓夫也只讲‘拘留’,以便下一步进行侦查:‘我讲拘留是因为,我们没有他直接犯罪的证据。我可以想象,他是木沙瓦特党的间谍,如卡明斯基对此所说的那样。但对这样的事实谁也没有进行过核查。’开始仅考虑免除他担任的职务。但似乎莫洛托夫反对这样的提议,他对让贝利亚自由非常担心:‘贝利亚非常危险,而我认为,应采取非常措施。’”^⑤

① Ф.И.Чуев. Каганович. Шепилов.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с.83–84.

②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9, с.409–410.

③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Кн. 2. Часть 3.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Гл.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 с.168.

④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70.

⑤ См.: http://history.machaon.ru/all/number_14/analiti4/vagner_print/index.html.

卡明斯基谈贝利亚为木沙瓦特党工作

在1923年的“自转”中，贝利亚详尽地和毫不隐瞒地写了关于自己在木沙瓦特党的反间谍机构和非布尔什维克组织内工作和活动的情况。根据作者的意见，他对此的评价是正面的。请看其中的一段话：

“自1919年2月至1920年4月，作为技术学校学生共产主义支部主席，在老同志的领导下，执行了区委的部分委托，我还作为教导员在其他支部工作。1919年秋天，代表‘穆斯林社会民主党’到反间谍情报机关工作，在那里与穆谢维一起活动。大约在1920年3月，在穆谢维被杀害后，我离开了反间谍机关的工作并在巴库海关工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①

贝利亚1933年3月2日致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列万·戈戈别里泽正在苏呼米休息。根据拉科布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的讲述，戈戈别里泽对我乃至新的外高加索整个领导层散布最卑鄙的流言蜚语。特别是关于我过去在木沙瓦特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他断言，党对此情况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清楚。然而您最了解，我是由党派遣到木沙瓦特情报机关的，1920年阿塞拜疆共产党（布）在您、斯塔索娃同志、卡明斯基、米尔扎·达武得·侯赛因诺夫、纳里马诺夫、萨尔基相、鲁胡拉·阿洪多夫、布尼阿特-扎杰等人在场的情况下研究了这一问题。1925年我向您转交了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就此问题所做决议的正式摘要，根据该决议，我完全恢复了名誉，因为我在反间谍机构的工作是知道的（斜体字为贝利亚所标——作者注），米尔扎·达武得·侯赛因诺夫、卡苏姆·伊斯梅洛夫等人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向您转交这封信的达季科同志会给您讲述更多的细节。

您的拉夫连季·贝利亚

1933年3月2日”^②

在写于1937年6月的一封信中，帕夫卢诺夫斯基确认了一个事实，在民族主义分子中工作时，贝利亚执行了布尔什维克的任务：

“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同志

^①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 Сост. и общ. ред. В.Ф.Некрасова.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323. См. также: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beriaautobiog.pdf>.

^②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8–1941 гг.* / Сост. А.В.Квашонкин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204.

代表贝利亚

1926年我被任命为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在临赴梯弗里斯（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旧称——译者注）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捷尔任斯基同志把我叫到他那里并向我详细介绍了外高加索的形势。也就是在这里，捷尔任斯基告诉我，我在外高加索的助理之一贝利亚同志曾在木沙瓦特反间谍机构中对木沙瓦特分子进行工作。贝利亚同志的这一情况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犹豫和不安，因为贝利亚同志在反间谍机关的工作，是经外高加索有关负责同志同意的，对此，他，捷尔任斯基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是知道的。

到梯弗里斯两个月之后，我到谢尔戈同志那里转达了捷尔任斯基关于贝利亚告知我的一切。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告诉我，贝利亚同志确实曾在木沙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他是根据党的委托进行这一工作的，对此，他，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基洛夫同志、米高扬同志以及纳扎列强，都非常清楚。所以，我应充分相信贝利亚同志，而他，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完全信任贝利亚同志。

在外高加索工作的两年中（原文如此——作者注），奥尔忠尼启则不止一次对我说，他对贝利亚同志作为不断进步的工作人员有着非常高的评价，贝利亚正在锻炼成为具有高水平的工作人员，他，谢尔戈还把他对贝利亚同志的这一评价，报告了斯大林同志。

在外高加索工作的两年中我很清楚，谢尔戈同志器重贝利亚同志并支持他。两年之前，在一次谈话中，谢尔戈同志对我说，知道吗，右倾分子和其他坏蛋们在与贝利亚同志的斗争中企图利用他曾在木沙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过的事实，但他们从中什么也捞不到。

我问谢尔戈同志，此事斯大林同志是否知道。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回答说，斯大林同志知道此事，关于此事他对斯大林同志讲过。

联共（布）后补中央委员 帕夫卢诺夫斯基

1937年6月25日”^①

^① Цит. по: А.В.Сухомлинов. *Кто Вы,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 М.: Детектив-Пресс, 2003, с. 419 и 421. Документ такж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А.Топтыгин.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5, с.11-12.

康·亚·扎列斯基关于贝利亚的简历提供了如下情况：

“1920年4~5月，第11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加索前线登记处特派员，之后被派往格鲁吉亚进行地下工作。1920年6月被捕，但根据苏联全权代表谢·米·基洛夫的要求而获释并被派往阿塞拜疆。”^①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 - 拉夫连季耶夫案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开除党籍并与1937年6月22日被捕。一个月之后贝利亚寄给斯大林一封信：

“1937年7月20日

№ 1716/с

亲爱的柯巴！

对格鲁吉亚反革命分子案件的侦查正在继续进行，揭发了反对党和苏维埃最无耻的犯罪活动的新的参与者。逮捕了格·姆加洛布利什维利、拉·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沙·埃利阿瓦……他们作为反革命右派组织成员进行的叛变活动暴露无遗。

……参加外高加索反革命右派中心的人有：

格鲁吉亚：沙·埃利阿瓦，马·奥拉赫拉什维利，拉·拉夫连季耶夫，阿·叶努基泽。”^②

还公布了其他提到拉夫连季耶夫的文件（主要是“柳什科夫文件”）：

“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方面，谢尔盖耶夫在莫斯科与穆克列维奇和斯特列尔科夫联系；在远东边疆区与边疆区中心联系，他交代的中心成员有拉夫连季耶夫、杰里巴斯、克鲁托夫、柯秀尔。”^③

还有：

“柳克尤森称，在拉夫连季耶夫住宅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还对部长职位进行了分配等。”^④

还有：

① К.А.Залесский *Империя Сталина.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Вече, 2000. См.: <http://www.hrono.ru/biograf/beria.html>.

②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УГБ НКВД. Док. № 142, с.252.*

③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УГБ НКВД. Док. № 142, с.252.*

④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УГБ НКВД. Док. № 207 (от 19 сент. 1937), с.370.*

“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捕的前边疆区检察长切尔宁承认自己参与阴谋活动，与拉夫连季耶夫、克鲁托夫和其他搞阴谋的积极分子有联系。”^①

拉夫连季耶夫还与卡巴科夫及其他人一起，出现在雅科夫列夫的供词中：

“……我们通过瓦列伊基斯—鲍曼与莫斯科的右派集团卡明斯基、布勃诺夫联系……在地方，我们与州和边疆区党组织领导人员——领导反苏组织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舍博尔达耶夫、哈塔耶维奇、卡巴科夫、伊万诺夫、拉夫连季耶夫、舒布里科夫、普图哈、克里尼茨基联系。”^②

对米·谢·克德罗夫的“残暴镇压”

贝利亚不是提议处决米·谢·克德罗夫的人。《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文件汇编刊登的关于对在古比雪夫市处决囚犯指示的注释称：

“1941年10月17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苏联最高决策机关’的指示，做出关于有必要处决25个囚犯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重大案件侦查部部长列·弗洛济米尔斯基签署、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波·科布洛夫批准，并与苏联检察长维·博奇科夫商定的。根据鉴定意见，1941年10月18日贝利亚签署了处决上述人员的命令。”^③

贝利亚签署处决的命令是在执行已经做出的判决（粗体字为作者所标），这从指示本身可以清楚地看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小组特别委托人员
下达的关于在古比雪夫市处决25名囚犯的2756/B号指示

1941年10月18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小组特别委托人员、国家安全上尉杰·
埃·谢梅尼欣

收到本件后，提议您赴古比雪夫市执行极刑判决（粗体字为作者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УГБ НКВД. Док. № 309 (от 29 марта 1938), с.507.

②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УГБ НКВД. Док. № 392 (от 15-18 окт. 1937), с.392.

③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Т.2. Начало. Кн. 2. 1 сентяб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41 года. — М.: Русь, 2000, прим. на с.215.

所标)，枪决下列囚犯（以下附 25 名被判决的人员名单）。

.....

25.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

报告执行情况。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国家安全总委员 贝利亚^①

安·维·苏霍姆利诺夫发表了为预审准备的关于米·谢·克德罗夫案件的部分起诉书影印件：

“被判决的阿丰斯基、伊·米·克德罗夫和希尔金，无论在预审中，还是在法庭上，都完全确认了他们关于米·谢·克德罗夫的供词。

根据以上所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1878 年出生，莫斯科人，俄罗斯族，苏联公民，大学文化，前贵族，联共（布）党员，被捕前已经退休，被指控：他是反苏组织的参与者，赞成右派的反革命思想，并不止一次散布反苏和挑拨性言论。1918 年在北海舰队从事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背叛活动，即进行了苏联刑法典 58-1a、58-10 和 58-11 条认定的犯罪活动。

认为关于米·谢·克德罗夫案件的预审已经结束和他提出的指控已经证实，遵循苏联最高决策机关的特别指示，

我想：应对 1878 年生人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执行处决。

签字：弗洛济米尔斯基^②

关于米·谢·克德罗夫的材料附在一份“斯大林的名单”上（1941 年 3 月 28 日）：

“他是以莫斯科‘北方同乡会’为掩护的反苏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与参与领导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的格·萨法罗夫有联系并赞同其与党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反革命方式。根据以下材料，怀疑克德罗夫曾与沙皇暗探局进行秘密合作：1912 年，在多次被暗探局逮捕后，他在受怀疑的情况下

^① В.В.Карпов.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е маршалы*. — М.: Вече, 1999, с.232.

^② А.В.Сухомятинов. *Кто Вы,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 216; Цит. по: Е.А.Прудникова. *Берия.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х не было*. — СПб.: Нева, 2005, с.386.

前往瑞士，在那里与孟什维克组织建立联系，并在1914年作为‘政治上可以信任的人’而返回俄罗斯。

克德罗夫与内务人民委员部阴谋组织领导成员、为德国情报部门积极活动的间谍阿尔图佐夫（被判极刑）关系密切，曾把他推荐到全俄肃反委员会（后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作。

常住美国的克德罗夫的妻弟麦泽尔，多次回苏联与克德罗夫联系。

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麦泽尔是以美国情报机关间谍而为人所知。

除此之外还查清，1918年克德罗夫指挥北海舰队，在遭到英国人进攻时他擅自离开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打乱了战斗行动并为武装干涉者的侵入开辟了通道。

水运人民委员部前工作人员希尔金（被判处极刑）、弗·亚·阿丰斯基（被判处极刑）、格·伊·萨法罗夫等人的供词，与萨法罗夫和阿丰斯基的对质，以及见证人塔古诺娃的证词和克德罗夫在北方前线叛变活动的官方文件，都揭露了他的敌对行动。”^①

但在学术版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生平注释”中指出：

“1941年7月9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证明克德罗夫无罪，审判庭下令释放他，但他没有被释放，而是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的命令，在1941年11月1日，即奥尔洛夫监狱向国家东部地区疏散时被处决。”^②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利亚

贝利亚1933年3月2日致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关于帕普利亚我再说两句。与他谈了几次，甚至派人到他那里对他施加影响。提议他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外高加索铁路建设局担任独立的工作。

也许，对他所做的工作有些生硬，但情况就是这样。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劝说，但毫无效果：他拒绝任何工作，摆架子，骂人，并威胁说要宣

① 参： <http://stalin.memo.ru/spravki/13-184.htm>。

②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841.

布绝食。

今天我再次与他谈话，并与铁路部门（罗森茨韦格同志）达成协议，帕普利亚同意担任外高加索铁路局监督和执行处处长。

我想，问题到此已经结束。

您的拉夫连季·贝利亚

1933年3月2日”^①

谢尔戈·贝利亚（拉夫连季·贝利亚之子——译者注）回忆道：

“我对帕普利亚·奥尔忠尼启则非常了解，因为我们居住在同一栋楼中。他总是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更有名的是整天饮酒、打猎，总而言之，是一个生活放荡的人。他，对谢尔戈，对不起，除了臭狗屎外，不会说更好听的话。他对社会主义骂得很凶……”

对帕普利亚的横行霸道，谢尔戈一清二楚。他对帕普利亚不满，到第比利斯后故意住在我们家。也许从今天的观点看，帕普利亚可以算是民主派，但在当时，大骂现行制度，即使是自己的兄弟，谢尔戈作为这一制度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也是不能饶恕他的……”^②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站在反共立场撰写的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书，为贝利亚做了充分的辩护：

“瓦利科（伊万）·奥尔忠尼启则曾任第比利斯财政司财政预算检察机关检察员。1936年11月初，他的一位同事向党委写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指责伊万·康斯坦丁诺维奇散布了帕普利亚·奥尔忠尼启则无罪和对托洛茨基分子友好的言论。第比利斯党的委员会对这一告密采取了措施，将瓦利科叫来进行‘训斥’，他不仅证实了声明中所说的一切，还补充说：‘帕普利亚·奥尔忠尼启则不可能反对自己的兄弟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而且他本人也了解斯大林同志……不能容许对帕普利亚·奥尔忠尼启则进行类似的指责，这不是事实。’针对党委成员的反对意见，瓦利科回答说：‘你们最终会确信不仅我的兄弟无罪，而且其他的人也无罪，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由于此类放肆表现，瓦利科被同情联

^①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8–1941 гг.* С.203–204.

^② Цит. по: Р.Чилачава. *Сын Лаврентия Берия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 Киев: КИЦ Инкопресс, 1992, с. 17.

共（布）的团体开除并被免职。

当时，谢尔戈过问了此事。1936年12月中旬他打电话给贝利亚并请求他予以帮助。在办理此事时，贝利亚有意表现了自己的高效率：与被告进行了谈话，请第比利斯委员会主席进行解释。大约一个星期后，谢尔戈收到了一封公函，其中有第比利斯委员会主席尼奥拉泽的解释信和贝利亚的便函。贝利亚在便函中写道：‘亲爱的谢尔戈同志！您打电话后我立即叫来了瓦利科，他向我讲述了被解职的过程，他所证实的与所附第比利斯委员会主席尼奥拉泽解释的内容相近。当天，瓦利科已经恢复了工作。您的拉·贝利亚。’”^①

^① О.В.Хлевнюк. Сталин и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 М.: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3. с.80.

第八章 意识形态与文化

“约·维·斯大林传略”

赫鲁晓夫：同志们！个人崇拜形成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规模，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歌颂他个人。斯大林自我吹捧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在1948年出版了他的“传略”。该书是无度阿谀奉承的表现，是搞个人崇拜的典范。书中将斯大林描写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智者、最“伟大的领袖”和“有史以来各族人民的无与伦比的统帅”。对斯大林的赞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没有必要连篇累牍地引用该书中大量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评价。只需强调一点，所有这些都是经斯大林赞同并亲自修改过的，其中一些，是他亲笔写在该书清样上的。

斯大林认为必须将什么内容写进该书呢？也许，他想为其“传略”的作者们阿谀奉承的激情泼点冷水？不是。他要加强的是他感觉到对他的功劳歌颂不够的地方。以下是斯大林亲笔写入的对斯大林活动的某些评语：

“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苏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1〕}

这是斯大林自己写的！接着他补充说：

“斯大林出色地执行着党和人民领袖的任务，得到了全苏联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骄傲自满和自我陶醉的影子。”〔2〕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某个活动家可以如此吹嘘自己？难道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相称吗？不！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坚决反对这样做。对此做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总是进行严厉的谴责。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感到这句话还远远不够，于是亲笔修改如下：

“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如我党所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3〕

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可以举出斯大林亲手在该书清样上添加的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自我吹嘘的话。他特别热衷和超乎寻常的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赞扬自己的统帅才干。让我再举一个斯大林对自己军事天才所做的补充。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维埃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确立了那些经常能够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斗技术装备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以及关于最强的兵种——炮兵的运用等方面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都天才地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4〕（会场骚动）

接着斯大林自己写道：

“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既表现在防御方面，也表现在进攻方面。斯大林同志以其天才的洞察力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苏军所进行的战斗，是卓越的作战艺术典范的体现。”〔5〕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统帅的。谁颂扬他？斯大林自己。然而，这时斯大林的角色已不是统帅，而是作者兼编辑，一部自我吹嘘的传记的主要撰写人之一的角色。①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7-158.

关于斯大林对其“传略”修改的特点，首先是从《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刊登的材料中得知的，之后，许多其他刊物对此进行了转载。该材料的刊登有助于澄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对其传记进行修改的说法与真实的情况相距何等遥远。要知道，即使该出版物序言的作者和编辑、反斯大林分子别里亚诺夫也承认，斯大林的许多修改，可以也应该被认为是斯大林的谦虚，因为这些修改旨在删除该书作者对斯大林的过度颂扬。赫鲁晓夫有意歪曲了他所使用的内容片断。比如，他在引用某一段落时只摘录他需要的那些内容。赫鲁晓夫在提供其他引证材料时，也都借助于这一不声不响的手法来歪曲事实。请看赫鲁晓夫在段落〔2〕中删除的一段话：“在其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中，他指出了天才列宁在重塑我们祖国的事业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而关于自己他只是这样说：‘至于说到我，我只是列宁的学生，而我的目标是无愧于他。’”

〔1〕，有一个省略号，赫鲁晓夫删除了斯大林写进的许多党的著名领导人的名字。请看整个这一段文字是怎么写的（粗斜体字是被赫鲁晓夫删除的名字）：“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其成员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龙芝、捷尔仁斯基、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及其他人……”

至于第〔3〕段，即使不借助于原始材料，一切都已非常清楚：斯大林对将自己的功劳与列宁相提并论的文字做了修改，以便所有人都清楚：他只不过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

赫鲁晓夫将斯大林视为第〔4〕和第〔5〕段文字的作者，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两段文字都出自少将米·罗·加拉克季奥诺夫之手，他是这部传记整个战争部分的真正作者。在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事实时，列·马克西缅科夫强调：“与赫鲁晓夫提出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在对文字修改时，不断地降低传记中盛气凌人和不可一世的特点。比如，将原来的‘大元帅斯大林’改为‘斯大林同志’——一个官场通用和看似民主的称谓；‘学说’（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斯大林改为‘原理’；‘永不磨灭的作战艺术

典范的体现’改为‘卓越的作战艺术典范的体现’。”^①

列昂尼德·马克西缅科夫根据所公布的斯大林与战后“传略”第二版作者的座谈记录，非常详细地研究了已经发表的所有批评意见。从原始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斯大林指示中，首先强调的是要筹备撰写新的和详细的列宁传记，这是事实，而对这一事实，无论在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还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时期，都无人提及。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即斯大林批评“传略”的作者们对他过度歌颂时表现出的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他指责他们在进行“偶像崇拜教育”。斯大林批驳了所有加在他头上的与学说有关的赞颂，取而代之的是对列宁的理论功劳给予应有的评价。

马克西缅科夫得出结论，赫鲁晓夫粗暴地歪曲了斯大林对“传略”修改的性质，并提请注意，“解冻”时期以及以后年代的许多作者，没有对“秘密报告”中阐述的观点进行应有的修正。在斯大林坚持之下进行修改的其他段落，涉及妇女在苏维埃社会革命和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理·伊·科索拉波夫于1998年浏览了“传略”撰写人之一弗·德·莫恰洛夫的个人文件，发现了他两次与斯大林会见时的手写记录，会见是讨论斯大林的“传略”。所找到的材料，已收入科索拉波夫准备的文集《让斯大林讲话》。^②

理查德·科索拉波夫是斯大林的崇拜者，当代俄罗斯共产党党员。正因为如此，在不久前出版的由罗伯特·瑟维斯撰写的斯大林传记的脚注中多次引用他的著作。总之，我们也将引用科索拉波夫文件汇编中的文献。莫恰洛夫关于斯大林谴责对他个人作用吹捧的记录摘要，可见本章附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赫鲁晓夫：众所周知，党中央有一个委员会负责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这一状况也以下述措辞反映在斯大林的“传略”中：

① Л.В.Максименков. Культ. Заметки о словах-символах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3, № 10. См. также: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r_677.htm.

② Слово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Сост. Р.И.Косолапов. — М.: ЭКСМО, 2002, с.451-47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和亲自积极参与下，制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这一措辞已经不能使斯大林满意。在“传略”出版时，这个地方已经被以下内容替换：

“1938年，斯大林撰写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问世。”

这里，还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呢？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集体创造性劳动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写的一部书。用不着再谈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写自己，可以这样把自己捧上天吗？^①

大概，除了赫鲁晓夫以外，再不会有一个人敢断言，斯大林本人把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功劳归功于自己。比如，莫洛托夫曾回忆说，他觉得其中的一章应该是斯大林写的。可他坚定地表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自己撰写的。

但不管怎么说，首次提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者团体的确实是在斯大林“传略”最早的版本中（1940年）。但如以上马克西缅科夫引证的文献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斯大林与该书的作者或编辑有直接的关系。

马克西缅科夫解释说：“忙于领导苏-芬‘冬季’战争，他（斯大林——作者注）不再审定该书……1939年12月14日，在斯大林60寿辰纪念日之前一周，清样传记-1（即第一次出版的“传略”——作者注）发给斯大林并附有米京和波斯佩洛夫的一封信：‘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现把马恩列研究院^②与宣传和鼓动局共同撰写的您的传略草稿发去。请您过目并就其出版的可能性做出您的指示。’斯大林在整个附函文本上打了着重号并用铅笔在信纸上横着写下：‘没有时间看。送回马恩列研究院。约·斯大林。’”^③

关于斯大林在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作用的句子，不是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8-159.

^②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 — Энгельса — 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б).

^③ Л.Максименков. Культ. Заметки... См.: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p_677.htm.

斯大林自己添加的，它是出自编写该书的众多作者和编辑的手笔。

赫鲁晓夫在这里又撒谎了。

这里还有一件事需要弄清楚，即在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远不能说同情斯大林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一篇评述中，将斯大林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主要作者之一”。^① 历史学家指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几乎是在“欺世盗名”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而为证明自己的说法，麦德维杰夫引用了《历史问题》杂志刊登的附有斯大林修改的打字机打印文本以及其他一系列材料。^②

尽管所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完整，但根据麦德维杰夫的意见，所有这些材料并不会引发对以下事实的怀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是在作为教科书主要作者之一的斯大林领导和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赫鲁晓夫确信，斯大林没有权力把自己写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因为他从来不是作者。而实际上，可以有充分理由说斯大林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之一，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面前强调过这一点。甚至他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莫洛托夫也不准确地知道，斯大林究竟写了多少，认为起码关于辩证法的章节出于他的手笔，因为他们曾在某个时候讨论过辩证法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情况下，赫鲁晓夫在散布谎言方面，实现了自我超越：他不单单是撒谎，而且将谎言的水流喷射到不幸聆听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代表们头上。

斯大林在关于建造自己塑像的 1951年7月2日决议上签字

赫鲁晓夫：有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亲自在1951年苏联部长会议

①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Что читал Сталин? Люди и книги. Писатель и книга в тоталитарном обществе.* — М.: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2005, с.217-232. Фрагмент из книги помещён в приложении к главе.

② И.В.Сталин в работе над «Кратким курсом истории ВКП(б)». Публикация,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и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М.В.Зеленов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11, 12; 2003, № 3, 4.

决议上签字，该决议确定在伏尔加河—顿河河畔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当年9月4日，他颁布了批准使用33吨铜建造该纪念体的命令。^①

不，这不是事实，因为人们知道的这些，即赫鲁晓夫所说的一切，仅仅出自赫鲁晓夫之口。关于该事件的材料，任何时候都没有公开过。没有证据证明，某个人对这一情况进行过认真的核实。事实上，赫鲁晓夫自己也没有说过正是斯大林建议或是将相应的决议草案提交研究的。显然可以肯定，斯大林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正如1951年7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记录簿中所显示的那样，1951年7月2日他的确工作了1小时45分钟。中央主席团是在6月26日开会的，而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本人参加的这次苏联部长会议委员会会议，是在晚21点30分~23点15分举行的，斯大林也参加了该会。^②因此，也许他签署了部长会议决议，当然，如果该决议的确是在那一天进行研究的话。

但在此重要的是应指出：那些年代，斯大林签字的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1951年2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由苏联部长会议的三位副主席轮流主持，而确认国家首脑（部长会议主席）签字无误的，自然是利用斯大林真迹复制的橡皮图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真本和图章曾于2003年在“1953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展览会上展出过。

总之，斯大林多半没有签署过“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和命令”，但它们的颁布依然使用他的批准签字，甚至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这一做法自1951年2月后盛行。所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合乎逻辑的：1951年7月，这种做法还没有成为过去时。不管怎么说，在没有看到文件的真本之前，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斯大林是否真正签署了这些文件。

至于1951年9月4日的命令，斯大林亲自拟定该文件的可能性不大。自1951年8月1日至1952年2月11日，斯大林不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处于“休假”状态，大概与健康状况有关。直到2月12日才重新开始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9.

^②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 1, с.24.

履行自己的职务。^①

而最主要的是，赫鲁晓夫非常清楚，斯大林当时对政治的积极性只是偶尔才有。1953年6月，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许多政治局委员指出，最近几年，斯大林已不能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工作。^②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1952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表示：“我已经老了，不能看文件了。”^③

如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访者记录簿所表明的那样，自1950年2月，他的工作量开始减少。根据文献资料，1950年斯大林工作了73天，1951年仅工作了48天，1952年只有45天。^④

所以，斯大林本人签署了1951年9月4日命令的说法非常可疑。至于他在1951年7月2日决议上的签字，我们也是一无所知。

即使文件上真有斯大林的签字，而不是根据政治局决议盖上的斯大林真迹复制的橡皮图章，这一切仍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为，甚至赫鲁晓夫也没有胆量断言，建造这一纪念体是斯大林本人的提议。

苏维埃宫

赫鲁晓夫：与此同时，斯大林对纪念列宁却缺乏敬重之情。30年前通过决议建造纪念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苏维埃宫没有建成，这不是偶然的，其建造经常被推迟或被遗忘。应当纠正这一状况并把怀念列宁的纪念体建成。^⑤

①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1, с.25. 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страницами журнала посетителей можно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в: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istarkh197.pdf>.

② См.: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с.170 (Микоян), с. 236 (Хрущёв), с. 274 (Каганович), с. 334 (Ворошилов).

③ «В чьи руки вручим эстафет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дела?»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ая речь И.В.Сталина на Пленум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16 октября 1952 года (по записи Л.Н.Ефремова). //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000, 13 января.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stalinoct1652.pdf>, а также <http://www.kprf.ru/analytics/10828.shtml>.

④ Ю.Н.Жуков.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а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нков*. — М.: ТЕРРА, 2000, с.549. См.: 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В.Сталин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 1, с.24-25. См также: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istarkh197.pdf>.

⑤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9.

马·沃尔琴科夫在其不久前发表的关于苏维埃宫建设计划、招标过程和最终放弃建造的前因后果的文章引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说明：赫鲁晓夫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与事实明显不符。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维埃宫也没有建成，而在巨大的基坑位置，最后“冒出了”一个名为“莫斯科”的游泳池。负责建设的委员会，很快改为建造其他建筑物。

换句话说，放弃建造苏维埃宫的不是斯大林，而是他的继承人。

列宁和斯大林奖金

赫鲁晓夫：让我们再以斯大林奖金问题为例。（会场骚动）甚至沙皇也没有设立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金……

不能不让人想起苏联政府1925年8月14日“关于设立弗·伊·列宁科学奖金”的决议。该决议在报刊上发表，但至今也没有列宁奖金。这一状况也应该纠正。^①

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多数代表知道，赫鲁晓夫在这里讲的不是实话。自1925年至1934年，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建筑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人士都被授予列宁奖金。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一奖金后来停止颁发了。^②但没有任何人为此而责怪过斯大林。

自1930年起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的最高国家奖励一直是列宁勋章，它授予那些在各个领域功绩特别卓越的人。曾有人提议设立斯大林勋章，但这一尝试两次被斯大林本人制止（见第一章附件）。当然，赫鲁晓夫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至于斯大林奖金，那么，“以斯大林的名字设立奖金”的思想最初是由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33年的一封信里提出的，当时斯大林本人对这一建议激烈反对，虽然他支持了著名作家的其他所有设想。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59.

^② 看来，暂停而后则停止颁发列宁奖金或许与共产主义学院停止活动有关，因为在共产主义学院曾设立相应的列宁奖金委员会。自1935年初对“鉴于同时存在科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两个学院不合适”而撤销共产主义学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正好是停止颁发列宁奖金的时间。

重新考虑设立斯大林奖金是在1939年12月庆祝他60寿辰之时。^①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以自己的名字设立奖金是斯大林的倡议。而另一个情况则很好地为人所知，即斯大林奖金不是取代列宁奖金；设立该奖金是因为当时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年度奖金。自然，将列宁奖金和斯大林奖金对立起来，本来就是不正确的。

文献资料

“约·维·斯大林传略”

有关斯大林修改“传略”材料的发表人别里亚诺夫强调：

“他（斯大林——作者注）的崇拜者甚至可以找到领袖谦虚的证明。他删除了大量善于谄媚取宠的起草人添加的歌颂词语（诸如‘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天才的’等）。”^②

斯大林对“传略”做了大量的修改，包括在一个段落中强调了妇女的巨大作用：“以下事实应认为是斯大林的巨大功勋：在这一时期，即工业化和集体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党需要动员人民的全部劳动力来解决伟大的任务。斯大林明确地提出了妇女问题，提出了妇女地位、妇女劳动、妇女、女员工和女农民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作用问题，把它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并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③

正如列·马克西缅科夫所指出的，赫鲁晓夫歪曲了斯大林对“传略”修改的性质：“与赫鲁晓夫的论点相反……显而易见，斯大林本人通过提高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наркома СССР от 20 декабря 1939 года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премии и стипендии им. Сталина подписан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СНК В.М.Молотовым и управляющим делами СНК М.Д.Хломовым (*Правда*. 1939, 21 декабря). Поскольку вручение премий в обла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ритики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не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лось, в начале 1940 года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премий имени Сталина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также подписанное Молотовым и Хломовым (*Правда*. 1940, 2 февраля). См.: <http://feb-web.ru/feb/sholokh/critics/nos/nos-486-.htm>.

② Сталин сам о себе.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правка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биографи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9, с.113-129. См.: <http://www.analysisclub.ru/index.php?page=stalin&art=1907> или <http://www.geocities.com/CapitolHill/Parliament/7345/stalin/16-52.htm>.

③ 同上。

列宁原理的地位而大大降低了鼓吹个人崇拜思想的调门。所有关于‘斯大林学说’的措辞都被删除……1950年列宁传的样本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撰写的。领袖本人不断降低样本中将‘列宁-斯大林’并列描述的宣传调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尼·谢·赫鲁晓夫、彼·尼·波斯佩洛夫、米·安·苏斯洛夫、列·费·伊利切夫和其他‘解冻’的思想家没有在自己的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援引这一修改的样本。作者并不清楚，或许涉及此事的第一手资料，是在改革时期出现的。”^①

弗·德·莫恰洛夫是“传略”的撰写人之一，他留下了自己两次与斯大林会面时的简短记录。会见中，该书的第一版受到了斯大林激烈的批评：

“错误非常多。基调不好，像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腔调。我的学说名目繁多，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学说。闹半天，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看到了吗？似乎列宁只谈到了社会主义，而关于共产主义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我，你们看，讲了共产主义。再往下看，似乎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学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提出工业化问题以及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恰恰应归功于列宁。

传记中有很多赞扬的话，对个人的作用大加吹捧。读者在读完这本传记后应该做什么？是下跪和面对着我画十字吗……

再看看关于巴库是怎么说的。什么在我到来之前，布尔什维克没做什么，而我一出现，一切焕然一新。信不信由你！而真实情况是什么？需要建立干部队伍。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干部队伍在巴库已经形成。在相应的地方，我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涉及另一个时期。要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像捷尔仁斯基、伏龙芝和古比雪夫，他们当时还健在和进行工作，但没有写他们，没有他们……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国战争时期。当时起用了有才华的人，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锻炼他们。正是这样的一批人聚集在红军最高司令部周围。

没有一个地方清楚地说出，我是列宁的学生。实际上，我过去认为，现在依然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对此，在众所周知的与路德维希的谈话

^① Л.Максименков. Культ. Заметки... См.: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p_677.htm.

中我已明确讲到……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相反。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在已开辟的道路上前进。”^①

在另一个地方，科索拉波夫讲述了一个也许不足凭信，但又被其他作者大量引用的事例，它证明斯大林对自己肖像的态度是鄙视的：

“想到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与儿子瓦西里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对儿子的不谦虚感到不快，他问：‘你以为你是斯大林？你以为我是斯大林？瞧，他才是斯大林！’他指着仪态凛然的肖像说。”^②

与其有相似描述的作者之一，《消息报》评论员尤里·博戈莫洛夫这样写道：

“……传说爸爸约瑟夫和儿子瓦夏有这样一次谈话。‘你以为你是斯大林？你以为我是斯大林？瞧，他才是斯大林！’领袖指着自己的肖像，愤怒地结束了自己的训话。”^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对丘耶夫提出的问题：叶·雅罗斯拉夫斯基是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真正作者，莫洛托夫的回答是：

“不可能。但也不是斯大林所写。他也没有说过是他写的。他只是给我们读了一章，关于哲学的一章……”^④

真实情况如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在起草这本教科书中的作用非常大。在标题具有象征意义的“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主要作者”文章中麦德维杰夫指出：

“斯大林……修改并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许多页，不仅该书的总体规划，而且所有章节和每章内的标题都是出自斯大林的手笔。他撰写了该书所有属于理论问题的章节……”

1938年11月28日，国家革命博物馆馆长费奥多尔·萨莫伊洛夫……致函斯大林办公室主任亚·尼·波斯克列贝舍夫：

① *Слово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С.470-472.

② См.: <http://www.cprf.ru/analytics/10828.shtml>.

③ Юрий Богомолов. Сталин и ТВ. См.: <http://www.politcom.ru/2003/pvz74.php>.

④ Ф.И.Чуев.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9, с.302.

‘联共（布）中央，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鉴于在苏联革命博物馆展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需要，能否请求斯大林允许将他撰写或修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几页，或斯大林同志亲手校对的条样转给我们。如果不能得到以上材料的原件，能否向博物馆提供材料的影印件。展示该材料对博物馆的来访者将弥足珍贵和饶有兴趣。’几天之后，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斯大林看了这封信，斯大林在革命博物馆的公文用纸上直接写了回函：‘萨莫伊洛夫同志：我没有想到，人到老年了还搞这些小事。如果书籍已经出版了几百万册，为什么您还需要手稿呢？致敬，1938年12月6日，约·维·斯大林。’该信及批示是在1955年末准备苏共二十大时从档案馆找出来的。而根据这一文件，尼·谢·赫鲁晓夫竟然指控斯大林在搞剽窃，赫鲁晓夫如同见证人一样地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集撰写，而在1948年出版的《约·维·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却亲笔写了这样的句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是斯大林同志所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赞同。’在二十大秘密会议上，尼·谢·赫鲁晓夫在做‘秘密报告’时声嘶力竭地说：‘你们瞧，集体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了斯大林撰写的一部书！’

具体到这一情况，尼·谢·赫鲁晓夫错了。如已经知道的，并非所有手稿都被焚烧。保留着部分附有各种各样斯大林亲手修改和补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打印稿，这些材料已于2002~2003年由《历史问题》杂志刊登。”^①

斯大林在关于建造自己塑像的1951年7月2日决议上签字

1951年2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以下决议：

联共（布）中央决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问题。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轮流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委员会会议主席，委托他们研究和解决目前的问题。

^① P.A.Медведев. *Что читал Сталин?* С.216-217.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和命令的颁发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签字。^①

七月全会（1953年）期间，许多发言人谈到了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中的健康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大家都尊敬斯大林同志，但年岁不饶人。最近一个时期，斯大林不看文件，不接见人，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②

卡冈诺维奇：……如已经正确谈到的那样，最近一个时期斯大林已不能积极工作和参加政治局的工作。^③

伏罗希洛夫：与我们大家一样，他（拉·贝利亚——作者注）知道，由于紧张的工作，斯大林最近几年开始经常闹点小病。^④

米高扬：在这些机关建立初期，斯大林同志非常积极地参与工作，而最近两年他对它们已失去兴趣。^⑤

苏维埃宫

马克西姆·沃尔琴科夫发表的关于苏维埃宫建造史的文章称：

“虽然建设开始时搞得轰轰烈烈，但后来不得不停止了项目的实施。而且，苏维埃宫的金属构架已在战争期间被拆散：当时首都需要为国防提供钢材以抵御法西斯德国。

战争胜利后，并没有恢复该建筑工程的建设，虽然直到斯大林逝世，始终没有放弃建设这一宏伟建筑物的想法。领袖想以这一建筑强调苏联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

① Документ цитируется в: Ю.Н.Жуков.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544-545. Документ, а также резиновые штампы с факсимиле подписи Сталина в 2003 году экспон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выставке «1953 год.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 в Выставочном зал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архивов в Москве. См. фото документа в каталоге выставки: http://www.rusarchives.ru/evants/exhibitions/stalin_exb/29.shtml.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236.

③ 同上，第274页。

④ 同上，第334页。

⑤ 同上，第170页。

为建设苏维埃宫划拨的资金被用于残酷战争之后国家的恢复工作。而且，‘冷战’已经开始，为制造原子弹，需要投入不少的力量和资金。如果拥有原子弹的敌人可以让整个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什么意义？又有谁来欣赏苏维埃建筑精品？很清楚，宏伟工程的建设要被无限期地推后。尽管如此，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苏维埃宫建设局依然保留了几十年。之后，利用多年积累的苏维埃宫设计的经验，转为建设其他高层建筑物。又过了一段时间，该局着手建设奥斯坦基诺电视塔。”^①

沃尔琴科夫在文章中引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立即做了保留性声明：

“尽管对旧的设计及其组织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任何像样的竞争活动最终也没有举行。无论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他之后，国家均未能看到这一建筑。”^②

列宁和斯大林奖金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学术版的“注释”中，编辑们没有谈及取消列宁奖金和设立斯大林奖金之间的关系：

“列宁奖金授予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1925年设立。1935~1957年没有颁发过。1940~1952年颁发斯大林奖金。”^③

在文学领域设奖金，首先是高尔基提出的。从报纸上读了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1933年1月7~12日）上的发言后，作家以充满激情的信件予以响应。

1933年1月16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国内战争史》秘书处完成了对前四卷材料的选择。现在有必要让总

① М.Волченков. 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 См.: http://www.4ygesa.com/dv_sovetov.html.

② 同上。

③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прим.89 на с.161.

编辑尽快确定能对材料进行处理的作者。为此，我恳切地请求您予以协助。作者们应在3月31日之前交手稿。恳求您推动一下该事。我有一个印象，总编辑消极地对待这一工作。

我以十分满意和赞赏的心情读完了您在全会上充满力量和智慧的讲话。我深信，讲话必将引发世界各地劳动人民的强烈反响。在那层层递进、互为联系、表面平静的话语中，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响彻云霄的雷鸣，仿佛您将过去年代里建筑工地上的全部轰隆声都嵌入话语之中。我知道，您不需要溢美之词，但我认为，我有权力对您讲实话。您是大人物，是真正的领袖。苏联无产阶级是幸运的，因为它的首领，就其逻辑的精神力量和无穷的精力而言，是第二个伊里奇。紧握您的手，亲爱的和尊敬的同志。

阿·佩什科夫

在这张书写纸的背面，高尔基亲笔做了两个补充，其中第二个补充谈及以下内容：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曾打算在全苏范围内组织喜剧剧本的竞争，随信附上竞争决议草案。

在文学界已能感觉到认真工作的强烈冲动和愿望，所以，组织竞争可能产生不错的效果。但对于全苏范围内的竞争，七个奖项显得少了，应增加奖项，哪怕增加至15个，而一等奖的金额提高到25000（卢布）——就这样吧！**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奖金**（黑体字为作者所标），因为这首先是您想到的。

此外，为什么只是喜剧剧本呢？应该将其他戏剧作品也包括在内……对不起，麻烦您了。

阿·佩·

1933年2月3日，斯大林回答了高尔基：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1933年1月6日函收悉。谢谢热情的话语和“赞扬”。不管人们如何

自吹自擂，他们依然不可能对“赞扬”漠然视之。自然，我也不例外，因为我也还是人……

(3) 近日我们将结束关于喜剧（及戏剧）作品的竞赛活动。我们不会把托尔斯泰撵走。我们会为您要求的一切提供保障。关于“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奖金”问题，我坚决（坚决！）反对（粗体字为作者所标）。

顺致敬意！握手！

P.S. 请保重身体。

约·斯大林^①

《真理报》于1939年12月21日刊登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设立斯大林奖金和奖学金的决议。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局长赫洛莫夫签署的协议内容如下：

为庆祝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60寿辰，苏联人民委员会确定：

1. 设立16项斯大林奖金（每一项奖金的数额为10万卢布），每年授予在以下领域取得卓越成果的科学家和艺术活动家：

- (1) 数学物理学；
- (2) 技术科学；
- (3) 化学；
- (4) 生物学；
- (5) 农业科学；
- (6) 医学；
- (7) 哲学；
- (8) 经济学；
- (9) 历史语文学；
- (10) 法学；

^① Цит. по: Василий Сойма. *Запрещённый Ста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5, с.20-21. См.: http://zapravdu.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9&Itemid=51&limit=1&limitstart=1.

- (11) 音乐；
- (12) 彩色写生艺术；
- (13) 雕塑艺术；
- (14) 建筑艺术；
- (15) 舞台艺术；
- (16) 电影艺术。

2. 设立斯大林发明奖金，每年授予最杰出的发明家：

- 10个一等奖，一等奖奖金为10万卢布；
- 20个二等奖，二等奖奖金为5万卢布；
- 30个三等奖，三等奖奖金为2.5万卢布。

3. 设立斯大林军事科学奖金，每年授予在军事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者：

- 3个一等奖，一等奖奖金为10万卢布；
- 5个二等奖，二等奖奖金为5万卢布；
- 10个三等奖，三等奖奖金为2.5万卢布。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维·莫洛托夫

苏联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局长 米·赫洛莫夫

1939年12月20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①

此后又颁布了一项决议，关于斯大林奖金问题有了进一步发展：

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1939年12月20日决议的补充……

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增设奖金：

诗歌：一项

散文：一项

剧作理论：一项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оюза ССР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премии и стипендии им. Сталина // *Правда*. 1939, 21 декабря. Текс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м.: http://www.kommersant.ru/k-money/print_page.asp?m_id=30222.

文学评论：一项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维·莫洛托夫

苏联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局长 米·赫洛莫夫

1940年2月1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①

自1930年至1991年，最高的苏联国家奖励是列宁勋章，而不是斯大林勋章（而且由于斯大林本人的反对，斯大林勋章最终也未能设立）：

关于设立两个新的苏联勋章：“列宁勋章”和“红星勋章”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30年4月6日决议

1. 设立两个新的苏联勋章：“列宁勋章”和“红星勋章”。

.....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

批准以下“列宁勋章”条例.....^②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оюза ССР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премий имени Сталина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 *Правда*. 1940, 2 февраля.

② См.: <http://glory.rin.ru/cgi-bin/article.pl?id=99>.

第九章 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

斯大林提议对集体农庄增加征税

赫鲁晓夫：在研究该草案（关于提高畜牧业产品采购价格——作者注）时，斯大林提出对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再增加征税400亿卢布，因为根据他的意见，农民生活富裕，仅靠出售家禽，农庄庄员就可以完全支付国税。

你们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民上交的全部产品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上交的全部产品价值才262.8亿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这一建议有什么数据依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对事实和数字没有兴趣。^①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明，斯大林是在1953年2月，即在领袖逝世前不久研究税收问题的。但谁也没有记下斯大林对该问题的意见。只有赫鲁晓夫听到了其他任何人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意见……

赫鲁晓夫首次提到关于斯大林增加税收的建议是在专门解决“贝利亚案”的中央七月全会上（1953年）。当时，米高扬和莫洛托夫也曾提到了400亿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 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61.

卢布的数字，但是在赫鲁晓夫提到之后。而且，从这两个人提及这一数字时所表达的意思看，在赫鲁晓夫讲话之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央十月全会上（1952年），米高扬反对加大农民的税负，他只回忆了这样的情况，即有一次斯大林提到上交“多余的家禽”问题。但他自己承认，他没有听到过更多的东西，因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不在场。而关于400亿卢布的问题，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①

斯大林对波斯特舍夫不满

赫鲁晓夫：试图对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提出反对意见，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在这方面，波斯特舍夫同志的不幸就是典型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对波斯特舍夫表示不满，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您究竟是什么人？”

波斯特舍夫带着他的俄国北部方言的重音坚定地声明：

“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布尔什维克！”

开始，这句话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敬，后来则被视为恶意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特舍夫是“人民公敌”，并处决了他。^②

如已经指出的，波斯特舍夫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和被开除党籍，之后被逮捕并最终因对完全无辜的党员进行大规模镇压而被判处极刑。

赫鲁晓夫出席了那次全会（1938年1月），因此不可能不知道，对波斯特舍夫指责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所以，当赫鲁晓夫断言对波斯特舍夫的判决“毫无根据”时，显然是在撒谎。

或许对究竟有没有过这样的谈话，赫鲁晓夫也撒谎了。关于波斯特舍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口角，我们只有一个材料来源，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他为二十大讲话准备的“口授材料”，仅此而已。

似乎，再也没有谁有幸成为此类谈话的见证人。在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录中，也再没有提到过这件事，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波斯特舍夫写

^① См.: А.И.Микоян. *Так было*. — М.: Вагриус, 1999, гл. 46, с.559-568.

^②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62-163.

了不少页。

正如格蒂和瑙莫夫所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在1938年一月全会前，斯大林和波斯特舍夫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此前已经谈到的，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波斯特舍夫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在此之后很快被逮捕。因此，如果斯大林与波斯特舍夫之间真的有语言尖刻的“意见交流”，那么，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中央一月全会期间。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其他许多对“秘密报告”进行评论的人认为，赫鲁晓夫提到的那一次谈话，应该发生在之前一年，即中央二—三月全会（1937年）期间。这种意见的根据依然是该报告的一种看法，那里说，波斯特舍夫公开与斯大林作对。不过，内容丰富并且没有遗漏和删节的全会速记记录已于1992~1995年公开。如不止一次出现的情况，赫鲁晓夫在这里又撒谎了：波斯特舍夫在二—三月全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甚至没有对斯大林批评的暗示。在那次全会上，也没有出现耸人听闻的尖刻的话语交锋。

至于一月全会（1938年）速记记录，人们知道的只是其中的片断，虽然某些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全会会议速记记录的全文。尽管如此，没有一个档案研究专家发现，赫鲁晓夫描绘的那段对话发生在一月全会期间。因此，很大的可能是，赫鲁晓夫说的不是实情。只是这一点还无法彻底确认。

甚至，即使斯大林讲了类似的话，那么他的话自然也不能成为逮捕波斯特舍夫以及之后对他审判并判处死刑的原因。波斯特舍夫受到严厉的惩罚并非由于与斯大林争吵，而是由于他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残害党的干部。

不管斯大林是否讲了诸如此类的对波斯特舍夫不满的话，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除了“秘密报告”外，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点。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提出似乎是决定波斯特舍夫命运的原因时撒谎了。

但究竟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呢？可以认为，作为那么多年来与斯大林在一起工作的人，他特别需要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大概，许多代表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不曾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指控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谴责？为什么他们了解一切，却没有为制止斯大林的行为做任何事情？虽然赫鲁晓夫提出的解释明显不

能令人信服，但他不可能做出其他的答复：“如果反抗，我们会被杀死。请看看波斯特舍夫的不幸，仅仅因为他强调，他是布尔什维克！”

政治局工作“瘫痪”

赫鲁晓夫：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由于在政治局内部建立各种委员会，成立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政治局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

斯大林建议：

(1) 委托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负责对外事务问题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问题。

(2) 增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为六人小组成员，今后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

这是什么牌迷用语？（笑声）显而易见，在政治局内成立这类委员会——“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在解决一些最重要问题时，一些政治局委员因此而被排除在外。^①

甚至像爱德华·拉津斯基这样对斯大林心怀敌意的作者也承认：在这里，赫鲁晓夫讲的不是实话。在政治局内部设立分委员会是在政治局委员中分配工作负担的方法之一。原则本身没有任何新意或不体面之处，政治局内部设“小范围成员”，也不是斯大林时代的发明。

自然而然，在这一情况下，更谈不上是斯大林“降低”了政治局的作用，或使政治局“瘫痪”了。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63.

斯大林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

赫鲁晓夫：由于极端多疑和猜疑，斯大林甚至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他竟然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笑声）是的，怀疑他是英国间谍……^①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讲述了很多传言，赫鲁晓夫保证，他所说的东西只有范围很小的人知道。

他需要把斯大林描绘为“极端多疑和猜疑”之人，类似的叙述正是这样的事例之一：除了赫鲁晓夫本人之外，他所讲的故事再也没有任何人和证据可以证实。

关于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甚至在米高扬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被提及过，精明细心的读者可以从米高扬的回忆录中找到许多捏造的“回忆”，换句话说，捏造的回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事件（例如说斯大林谈到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别涅什揭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叛变的信^②，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封信）。不管怎么说，即使在米高扬的回忆录中，也只字未提过关于伏罗希洛夫是“间谍”的事。

对安德烈耶夫“专横跋扈”

本章结尾部分描述的事件，与苏共十九大之后立即举行的1952年中央十月全会有直接关系。

赫鲁晓夫：斯大林一个人做出的决定，也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排除在政治局工作之外。这是肆无忌惮的专横。^③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63.

② А.И.Микоян. Так было. С.553.

③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64.

严格地说，我们的确不知道，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1952年）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正式的会议报告速记记录还没有公开（根据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和其他发言人在全会上的讲话都没有速记记录）。只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斯大林去世后，党的新领导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以便不仅修改这次全会的主要决议，而且还要彻底抹掉关于这些决议的记忆。

所以，的确不知道没有让安德烈耶夫参加新组建（在原政治局基础上）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正式原因。但我们有足够的其他证据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依然在撒谎。请看为什么这么说。

安德烈耶夫于1953年3月15日被免去在部长会议中的职务，即在斯大林逝世十天之后。^① 好吧，就算不让安德烈耶夫参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工作是“专横跋扈”的结果，那么如何评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通过的不让他重返中央主席团，还加上不让他参与部长会议工作的决定呢？

答案非常简单。从斯大林在1952年十月全会发言的非正式记录中得出的结论是：安德烈耶夫没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任职，是因为他已几乎完全失聪^②。出席全会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有过类似的说法^③。再没有其他什么有关安德烈耶夫的证据和有见证人证实的事件了。但从两个现有的证据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没有让安德烈耶夫进入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名单，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

因此，甚至在没有全会正式的速记记录的情况下，也不难相信，赫鲁晓夫撒谎了。安德烈耶夫被免去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绝不是因为斯大林的“专横跋扈”。

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无根据的”指控

赫鲁晓夫：以党的十九大之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在全会上斯

① См.: www.hrono.ru/biograf/andreev_aa.html.

② «В чьи руки вручим эстафет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дела?»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ая речь И.В.Сталина на Пленум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16 октября 1952 года (по записи Л.Н.Ефремова). //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000, 13 января.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stalinoct1652.pdf>, а также <http://www.kprf.ru/analytics/10828.shtml>.

③ К.М.Симонов.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 М.: Новости, 1988, с.246.

大林发言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做了评价，对我们党内这些最老的活动家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

不排除，如果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再多待几个月，可能在这次党代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就不可能讲话了。^①

关于十月全会（1952年），从为数不多的对这次全会有过书面描述的见证人所写的记录中看，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斯大林在讲话时确实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进行了批评。这些为数不多的证据是：阿·伊·米高扬的回忆录《情况是这样的》和德·特·谢皮洛夫的回忆录《没有追随者》；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回忆性政论著作《我这一代人所看到的》；以及列·尼·叶夫列莫夫对斯大林讲话所做的简短笔录。米高扬当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元老”，其他三人是新委员。除不知道叶夫列莫夫笔录的时间外，其他证据都是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才出现的。为了搞清楚赫鲁晓夫是否说的是真话，我们需要弄清以下几个情况。

第一，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提出的指控是否真的“毫无根据”。

第二，下述说法是否正确：如果斯大林继续掌权，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就不可能在二十大上讲话了。

几个消息来源对这件事是这么说的。

在谢皮洛夫的回忆录中，只有几句话提到了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批评，关于对米高扬的批评意见写得更少。而后者，正如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所指出的，在会上发言反驳，但忍不住把矛头指向了莫洛托夫，指责莫洛托夫与不久前被处决的沃兹涅先斯基关系密切，根据米高扬的说法，这应被视为“可怕的犯罪行为”。谢皮洛夫本人并不认为斯大林的指责没有根据或暗含着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生命和自由的威胁。在谈及斯大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时，谢皮洛夫的回忆只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在1952年某个人没有进入新的主席团委员会名单。

西蒙诺夫于1953年3月撰写的非常简短的全会见闻录，没有注意到斯大林讲话中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指责，他强调的是斯大林坚定不移地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64.

号召学习列宁的坚定和无畏精神。在1979年出版的内容更加全面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回忆说莫洛托夫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评，并介绍了他对这件事的模糊印象：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指控的理由是他们共同的“投降主义”倾向。如西蒙诺夫所说，米高扬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究竟批评了什么，作家已经记不清楚。根据西蒙诺夫的说法，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发言回答了对他们的批评。谈到这里，我们要指出，这也驳斥了赫鲁晓夫的另一个说法，即说斯大林要求所有人“无条件服从他个人的意见”。西蒙诺夫认为，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批评（不管是什么原因）是要说明，他们没有成为新的主席团委员会成员是正确的。

米高扬在多年之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斯大林谴责莫洛托夫是因为他在外交工作中的失误，还谴责莫洛托夫和回忆录作者自己在对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在米高扬的回忆录中，斯大林是一位严厉的，但令人敬重的批评者。因此，回忆录作者根本没有提到过自己听到斯大林的讲话后，曾因对自己的指控而感到恐惧。

根据叶夫列莫夫的笔录，斯大林批评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个别行为，但他的批评意见显然不像是威胁。

赫鲁晓夫在其极为冗长的回忆录中，仅仅用几行字谈及十月全会（1952年），也没有再说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在会上受到了威胁。

对赫鲁晓夫所言的真实性还可以说些什么呢？斯大林在讲话中指责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批评了他们，但不能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

批评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可能是斯大林和其他两个政治局委员在政治观点上存有分歧。

总之，赫鲁晓夫说，如果斯大林活得时间长一些，那么就“不排除”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将不再有机会在二十大上讲话的可能，对此，既不能证明，也无法驳斥。但有一点却很容易证明：赫鲁晓夫只是根据自己猜测提出这一说法的，而这并不符合斯大林在党的十九大上的说法和作为。

米高扬和莫洛托夫虽然没有被选进主席团小范围委员会，但还是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它的主席团（25位成员）。他们没有进入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当然绝不意味着他们会因此而失去在下一一次苏共代表大会上讲

话的机会。

可惜，现有的文献材料还无法让我们证明，赫鲁晓夫在此处又撒谎了，但同时也没有任何根据让我们对此类臆测信以为真。

扩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有一个迫害老政治局委员们的计划。他不止一次地说，应当更换政治局委员。十九大后他提议选举由2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追求的目标就是除掉老的政治局委员，让一些经验不足的人进入政治局，以便这些人竭尽全力地为他唱赞歌。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他设想的这一招，是为了以后消灭老的政治局委员，以便为斯大林所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即现在我们正在报告中说的这些事，消灭罪证。^①

在这里，赫鲁晓夫撒谎了，因为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的说法是确凿的。自然，那些事件见证人保留下来的书面材料，也都无法证实他的说法。比如，根据叶夫列莫夫的笔录，在全会讲话时，斯大林极其清楚地表达了选举扩大的主席团（与原政治局相比）的原因。斯大林关于应该以精力充沛和比较年轻的人员充实党的领导队伍的讲话，使40岁的叶夫列莫夫本人非常激动，所以在叶夫列莫夫的笔录中，有不少地方记录了这方面的内容也就不奇怪了。

文献资料

斯大林提议增加对集体农庄征税

似乎是在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赫鲁晓夫首次谈到，拟提高400亿卢布农业税的问题：

赫鲁晓夫：遗憾的是，当出现了第三个方案的时候，他立即顺便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64.

(粗体字为作者所标) 提议增加对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征税负，增加征税 400 亿卢布，而全部收入只有 420 亿卢布。

米高扬：是从目前的 150 亿卢布增至 400 亿卢布？

赫鲁晓夫：不，是再增加 400 亿卢布。这叫怎么回事？知道吗，我可弄不清这是要干啥！

米高扬：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①

晚些时候，马林科夫也提到了 400 亿卢布的事，但很清楚，在赫鲁晓夫谈及这一问题之前，他对此一无所知：

马林科夫：在本次全会工作期间，你们，同志们，开始了解到以下事实。为了完成提高畜牧业产量的任务，今年 2 月斯大林同志坚持(斜体字为作者所标) 提议对农村增加征税 400 亿卢布。要知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措施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我们已经说过，集体农庄的所有货币收入比这一数目稍多些。但是，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进行过讨论，领导的集体作用被如此贬低和践踏，以至于向斯大林提出的理由总是被他断然拒绝。^②

请注意：根据赫鲁晓夫的话，斯大林是“顺便”提议的，即似乎是顺便提了一下；而在马林科夫的发言中，所说的已是“坚持”这类提议。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又走了一步，以完善自己关于 400 亿卢布的说法。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米高扬根本没有提及关于增加“400 亿卢布”农业税的事：

“如以往一样，总是在晚上，当其他主席团委员在斯大林那里时，马林科夫阐述事情的要害，以便探寻斯大林的态度。我没有在场。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我，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并说，我们正在恢复雷科夫和弗鲁姆金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с.171. Тот же эпизод приводится в другом черновике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но слова Микояна там переделаны так, чтобы весь удар пришёлся по Берии; см.: там же. С.313.

^② 同上，第 351 页。

的计划，农民越来越肥，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差了。其他政治局委员则对我说，斯大林在十月全会期间也谈到了这一题目，激烈地谴责我有关提高畜牧业产品收购价的想法。听说，他显得非常凶，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走着，一边埋怨，这样说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弗鲁姆金！’实话实说，我没有亲自听到他说这话。但曾听他说过，应当对农民征收新的税种。他说：‘农民怎么了？交出多余的家禽，就算完事啦。’

就是在那一次讨论时，听到了斯大林关于对农民征收新税种的建议，赫鲁晓夫是这样摆脱两难处境的：他说，如果对农民增加征税，则需要让诸如马林科夫、贝利亚、兹韦列夫（财政部领导人）这样的人加入委员会。斯大林接受了这一提议。经过一段时间再开会时，的确参加者中已经有新的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发现，无论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都认为斯大林的指示没有可能执行。当然，这是在私下谈话时弄清的。委托兹韦列夫报告并阐明理由。总的说，是尽可能拖延这件事情。都认为不提高采购价格，斯大林关于对农民增加新税的委托是无法完成的。”^①

政治局工作“瘫痪”

对斯大林怀有敌意的爱·拉津斯基承认，赫鲁晓夫说的不是实话：

“斯大林去世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其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中义愤填膺地称，斯大林以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某些享有特权的‘六人小组’‘五人小组’做法使政治局的作用下降……赫鲁晓夫愤怒地质问：‘这算什么牌迷用语？’但他属于列宁后党的一代人，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他挥拳打击的是党的最老的传统做法之一。领袖在领导层内建立除领袖本人和参与者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三人小组’‘五人小组’和其他‘小范围成员’，这一做法出现在列宁时期。”^②

斯大林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

在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录中，关于这一问题只谈到了一句：“斯大林在

^① А.И.Микоян. *Так было*. С.578.

^② Э.Радзинский. *Сталин*. — М.: Вагриус, 1997, гл.4, см.: <http://www.radzinski.ru/books/stalin/1.shtml#4>.

小范围（黑体字为作者所标）内告诉我们，他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的间谍，当然，这是难以置信的一派胡言。”^①

对安德烈耶夫“专横跋扈”

根据列·尼·叶夫列莫夫的记录，斯大林是这样解释安德烈耶夫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原因：

“斯大林说，除了安·安·安德烈耶夫，所有老的政治局成员均在名单中。关于尊敬的安德烈耶夫，一切都是清楚的：他完全失聪，什么也听不到，无法工作。让他去治病吧。”^②

类似情况，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做了旁证：

“我只记得斯大林就安德烈耶夫没有成为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所做的插话，说他已离开了工作，实际上再也不可能积极地工作了。”^③

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无根据的”指控

列·尼·叶夫列莫夫所做的1952年十月全会斯大林讲话的非正式记录这样说：

“如果谈到我们事业中的团结，不能不涉及某些著名政治家的错误行为，我指的是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

莫洛托夫是忠于我们事业的人。我不怀疑，如果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入党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不能因此而不看到他有失体面的行为。莫洛托夫同志，我们的外交部长，在外交招待会上一杯沙尔特廖斯甜酒下肚之后，就同意了英国大使在我国出版资产阶级报刊的提议。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赞同这样做？难道不清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在苏联人中传播资产阶级的报刊有害无益吗？如果允许这种错误举措，将会对苏联人的思想和世界观产生有害和负面的影响，削弱我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加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一大政治错误。

^①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Кн. 2. Часть 3.*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с.128-129.

^②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000, 13 января.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stalinoct1652.pdf>, а также <http://www.kprf.ru/analytics/10828.shtml>.

^③ К.М.Симонов.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С.246.

莫洛托夫将克里米亚转归犹太人的提议价值何在？莫洛托夫的这个错误是不可容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怎么能容许这样做？莫洛托夫根据什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们有犹太自治区。难道这还不够？下一步，还可以发展为共和国。而莫洛托夫同志不应成为犹太人对我们苏维埃克里米亚非法要求的律师。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二大错误。莫洛托夫同志的行为，作为政治局委员，是错误的。而我们坚决拒绝他凭空想象的建议。

莫洛托夫对其夫人尊敬有加，以至于我们还没有就这样或那样重要的政治问题通过政治局决议，而热姆丘任娜很快就知道了。这么说，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政治局和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任娜及其朋友联系在一起。而她周围的朋友是不能信任的。很清楚，这样的行为对政治局委员是不能容许的。

现在谈谈米高扬。他，你们已经看到，反对提高对农民的农业税。他，我们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是什么人？这里，他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农民是我们的债务人。我们与农民有巩固的联盟。我们已将土地永久地归集体农庄使用。他们应偿还国家的债务。所以，不能同意米高扬同志的立场。”^①

谈及1952年十月全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仅指出：

“在全会上，斯大林讲话‘痛骂’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对他们的正派性提出质疑。在他的讲话中，直接流露出对他们政治上的不信任，怀疑他们政治方面的某种不诚实。怪哉！”^②

德·特·谢皮洛夫是为数不多的对十月全会所发生的事件留下书面描述的人之一：

“在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没有任何根据地表示对莫洛托夫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责他‘投降美帝国主义’，并提议不让莫洛托夫进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而且也这样做了。维·莫洛托夫接受了这一结果，没有说一句不满的话……

站在讲台上，斯大林面带鄙视的表情谈及莫洛托夫被美帝国主义吓倒

^①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000, 13 января.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stalinoc1652.pdf>, а также <http://www.kprf.ru/analytics/10828.shtml>.

^②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Кн. 2. Часть 3. С.98.*

了，在美国，他发回了惊慌失措的电报，这样的领导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不可能留在党的领导核心。斯大林还以同样的语气提出了对阿·米高扬和克·伏罗希洛夫政治上的不信任。

……莫洛托夫坐在主席团桌旁纹丝不动。他沉默无语，脸上没有任何一块肌肉颤动。通过夹鼻眼镜的镜片，他直接望着大厅，仅仅偶尔用右手的三个指头对主席团桌上的桌布做着似乎是在揉搓面包瓢那样的动作。阿·米高扬非常激动。他做了一个非常浅薄的和不体面的讲话。他就与实际不符的指控为自己辩护，但同样没有放过踢莫洛托夫一脚的机会，说什么莫洛托夫经常与沃兹涅先斯基来往，而这本身已经是可怕的犯罪行为了。”^①

扩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在列·尼·叶夫列莫夫所做的关于1952年十月全会斯大林讲话的记录中，许多地方谈及有必要用精力充沛和更加年轻的干部力量来补充党的领导队伍：

“总之，我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开得好，许多人觉得，我们是团结一致的。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团结。某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决议。

人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大大扩充中央委员会成员？但难道不清楚，中央委员会需要注入新的力量吗？我们，老头子们，都会去世，需要考虑我们伟大事业的接力棒交给谁，交到谁的手中，谁接过接力棒继续向前？为此需要更加年轻的、忠心耿耿的人和政治活动家。培养政治活动家、国务活动家意味着什么？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10年，不，为培养一个国务活动家，需要整整15年。

但为此仅靠愿望是不够的。培养一个思想坚定的国务活动家，只能是在实践中，在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日常工作中，在克服形形色色企图阻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机会主义分子的阻力中。我们党培养的拥有列宁主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面临的斗争，是粉碎敌人的这些企图和彻底胜利地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

难道不清楚，我们应该提高党的作用、党的委员会的作用吗？难道可以忘记，列宁如何教导我们改善党在群众中的工作？这一切都要求中央委

^① Д.Т.Шепилов. *Неприкнущивий*.— М.: Вагриус, 2001, с.19 и 229.

员会——领导我们党的司令部，充实年轻的、新的力量。遵循列宁的指示，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扩充了中央委员会成员。而且党本身也略有壮大。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解除了一些著名的党和国务活动家重要的部长职务？对此有什么可说呢？我们解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的部长职务，用一些新的工作人员代替了他们。为什么？有什么理由？部长的工作是男人的工作，需要强大的力量、具体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解除了一些建立了功勋的同志的职务，在他们的岗位上任命了一些新的、更具有专业水平和开创精神的人员。对他们在关键岗位上的工作，我们应予以支持。”^①

^①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000, 13 января. См.: <http://chss.montclair.edu/english/furr/research/stalinoct1652.pdf>, а также <http://www.kprf.ru/analytics/10828.shtml>.

第二部分

赫氏“揭发”探幽

第十章

赫鲁晓夫造假手段

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讲话中所采用的歪曲事实的具体手法讨论之前，首先应该点明的是，已出版的“秘密报告”版本本身就已然被掺假了。

《苏共中央通报》刊登的赫鲁晓夫报告是在1956年3月1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供的经过修改的文本基础上，于1956年3月7日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并向地区党组织下发的正式文本。这一文本与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讲台上宣读的并不完全一致。首先要指出的是，根据此次代表大会所有参加者的回忆，在赫鲁晓夫宣读报告时，全场鸦雀无声，人们都被惊呆了。而《苏共中央通报》刊登的文本，却加进了许多听众的反应：“会场活跃”“会场群情激愤”“暴风雨般的掌声”，等等，这当然根本不是秘密会议的真实气氛。（粗体字为作者所标）

因此，我们所研究的这份报告不仅本身内容就不真实，而且在其公开发表时，再次对会议的氛围掺假。在以上引用报告文本时，我们保留了所谓“会场内反应”的字句，是让读者注意到文本已被蓄意歪曲的事实。

新观点问题

作为学者的历史学家遇到的典型问题是：第一步，要为说明自己的主要论点收集必要的证据；第二步，要合乎逻辑和有条不紊地阐述所掌握的材料，最终证明自己的论点。但在着手这项研究后，笔者很快就明白了，自己面临的问题要重大得多，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

“秘密报告”不只是一系列顺序而排的各自孤立的论点，只要根据掌握的证据对每一个论点证明真伪即可，实际上，“秘密报告”的整体论调在当时为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奠定了某种新的基础观点。当然，所谓新是相对而言，这些新观点中的许多东西其实是借鉴而来的，部分来自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和移居国外的苏联侨民的著作。

由于得到国际共运的支持，也由于很快开始对斯大林时期被判刑者施行大规模“平反”运动，赫鲁晓夫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并成为解释苏联历史的权威观点。其结果就是，谁要是“对‘秘密报告’中各种论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就意味着你企图冒犯‘反斯大林模式’，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与‘反斯大林模式’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只要一提到‘秘密报告’，人们的头脑中就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斯大林的暴戾’。的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奠定‘反斯大林模式’的基础文件，是‘反斯大林模式’的柱石，为其主要观点提供事实来源。换句话说，试图证实‘秘密报告’这样或那样的论点是谎言（作者正是进行了这样的尝试），那就意味着力图证明，整个‘反斯大林模式’所提出的其他论点也很可能与真实情况不符。

我们有理由期望，任何科学论著所要证实的正是其研究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但指望研究相当狭窄问题的著作能对涉及范围相当大的历史观点体系中数不胜数的谬误都提出实证的论据，则是完全不恰当的。

而我们遇到的情况，恰恰是这种过高的要求。在这本著作中，没有谈及古拉格、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没有谈及卡廷事件和许许多多其他问题，因为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但既然整个“秘密报告”的事实依据都是由捏造拼凑而成的，那就很难反对以下看法，即揭露了“秘密报告”的虚假，很可能会影响“反斯大林模式”所有话语的可信度，并改写由其奠定的历史观点。

在着手研究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提出的各项指控，并力求以证据对此加以澄清时，尽管笔者发现几乎所有指控都是捏造的，但仍没有为自己提出动摇“反斯大林模式”的任务。但至少，其支柱之一已经倒塌。相信当人们清楚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完全是基于深思熟虑和精心策划的捏造，而不是铁证如山的事实时，任何一位稍微严肃

的研究人员就不会再将“秘密报告”提供的材料作为自己研究苏联历史的依据了。评价这样或那样的论据是否正确，只能以事实为准绳。

还有一点，赫鲁晓夫批判和咒骂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在实际中强化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这种做法与托洛茨基的手法很相似。托洛茨基曾将自己的许多负面特点和表现强加在自己的政治对手身上。托洛茨基将国家发生的一切，包括斯大林走向权力的顶峰、斯大林政治方针的形成和对他的抵制以及对反对派首领的镇压，都解释为出于斯大林的狡猾与残忍，再加上道德缺失。

马克·格里姆斯里在其有关评价诺阿姆·霍姆斯基大众传媒著作的提要中写道：

“根据世界公认的概念，证据不需要特别的解释，用几句话就可以表达清楚。但对于挑战世界公认观点的证据，则需要花费多得多的口舌，才能具有某种可信度。”这一意见同样适用于本书挑战“公认的”历史观点的研究。

事情并不仅仅因为，揭露谎言与编造谎言相比，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篇幅；对于挑战业已形成的观点的学者而言，其任务量要大得多。其研究，不仅自始至终需要满足方法论的要求，要把握鉴定证据真伪和推理原则的准则，即通常所有研究人员无一例外都必须坚持做到的东西外，还要进行很多超出要求之外的工作。首先，必须让读者对公认的观点产生怀疑，而此后还要用更多的实例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此前人所共知的历史观可能是错误的。

这里恰恰应再重复一下笔者的感受，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几乎全部由谎言拼凑而成，这一研究结果甚至让笔者本人都惊诧万分。

揭露论点造假并不等于查明了所有真实情况

对赫鲁晓夫骗术的分析表明，我们面临的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任务。其中较容易做的也是工作量较小的任务，是只需证明赫鲁晓夫撒谎了即可。

但善于思考的读者也许想要了解得更多，即在确认“秘密报告”中的各种论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之后，他想知道更多的真实情况，对事实进程

中的所有细节都饶有兴趣。

可惜，本书不可能满足这类读者的要求。因为这需要对“秘密报告”中的每一项“揭发”都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而考虑到谎言的数量之大，所需的科研工作量也非常之大。很多情况下，确实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包括相互矛盾的）材料，但要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分析、去伪存真、追根溯源，探知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超出了我们提出的任务范围，特别是还要考虑到今天获得文献来源的现状。

有许多研究暂时无法完成，因为历史学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他们利用，并据此做出某些最终的结论。无论如何，塑造斯大林实施“大规模镇压”形象的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的众多“揭发”中，给人留下最强烈印象的指控，就是指责斯大林参与了对上百名高层布尔什维克人员的蓄意杀害。

“秘密报告”之后，强加在斯大林头上的“犯罪活动”开始渐渐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把处决苏联著名军事将领的罪名也加在了斯大林身上。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一批半官方的作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扩大着所谓因不公正判决而牺牲者的名单，为其中的许多人“恢复了名誉”，即宣布他们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犯罪活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罢免。但此时，关于斯大林“大规模屠杀无辜者”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1970年代初期，西方出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英国苏联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鸿篇巨制。他们详细描述了斯大林的所谓“罪行”，他们依据的都是赫鲁晓夫时代出版的一些著作。而此类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历史”，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更是广为人知。

换句话说，研究“秘密报告”中所说的大规模镇压，可能比单纯挖掘越来越多的赫鲁晓夫的谎言效果更好。包括有可能搞清楚制造“斯大林是大规模杀人元凶”神话的根源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历史证据

法律实践和历史研究使用的证据之间有质的区别。

搞“平反”报告的目标通常是要从被判刑的人（一般是已经死去的人）的刑事案件中，挖掘那些在各个侦查阶段可能出现的某些违背诉讼准则的证据。所有这些事例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这些证据被认为足以撤销对被判刑之人的指控。其结果就是，因有个别瑕疵，即可认定整个判决都不合法。而在某些情况下，“平反”文件中所列举的这类证据，只是说说而已，并无任何事实材料可以作证。由于已没有可能在被判刑的人本人参与之下再次审理案件，所以被宣告无罪“平反”的人和事，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并没有多大实证的意义。历史学家无须探究诉讼细节，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收集历史资料，并对现有的证据做出评价，在这些证据的基础上得出一些结论。而澄清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审判是否“公正”，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中，被告可能有罪，但法庭对他做出的判决并不公正，惩罚过重。但历史学家关注的只是一个问题：有罪还是无罪。比如，如果以今天的诉讼程序标准观察问题，那么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没有一个非洲裔居民的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当然，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每个非洲裔被告一定无罪。

司法审理的“公正性”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法律制度的准则和规定是否一致的问题，本书并没有进行研究。对那些年代在特殊形势下实行的简化和快速诉讼的制度是否符合苏联法律问题，也没有进行阐述。本书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澄清被判刑的人是否有罪上。

请看以下有代表性的观点：对赫鲁晓夫报告中提到的所有被镇压的人，都有重要的依据证明他们有罪。准确地说，我们的论点如下：研究人员准确地掌握着赫鲁晓夫和他的助理们知道的那些文献，他们正是从这些文献中，抽取了为被镇压人撰写平反证明的材料。但没有一个平反证明能切实地提供这些人确实无罪的证据。

刑讯和与此相关的问题

没有任何人想否认，自斯大林时代开始，许多因政治原因被捕的人遭受了刑讯逼供。在赫鲁晓夫时期，正是使用刑讯的事实被司法机关用于为大镇压的受害者“平反”。即使在斯大林时代，法律也明确规定，通过刑讯

得到的供词不具有法律效力，将它们作为证据是违法的。

但被告遭到残酷拷打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被告一定无罪。对某人进行过刑讯，并不能成为他无罪的证据，虽然常常这样做（但这是错误的）。

的确，对事情发展的几种可能都应予以考虑：

一个可能有罪的人遭受了刑讯，从而提交了认罪供词；

一个可能有罪的人遭受了刑讯，但什么也没有承认；

一个可能无罪的人遭受了刑讯，从而提交了认罪供词（以免受残酷拷打）；

一个可能无罪的人遭受了刑讯，但拒绝提交任何认罪供词；

一个可能有罪的人没有受到残酷拷打，但提交了其进行犯罪活动的供词（这种情况的例子在平反材料中相当多）；

一个人可能遭受刑讯，但根据其他被告的供词和案件现有的证据认罪；这样的供词和证据常出现在现实案件的侦查中。

通常确定在侦查中是否进行过刑讯逼供非常困难。仅凭受讯人口说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有很多原因会促使人们否认过去的供词。声明供词是被“打出来的”，如此既可否认此前的供词，又能保持自己的尊严。

要证明有过严刑拷打，必须有利用了这种“方法”的其他证据，比如，实施拷打的人自己承认，或事件的其他见证人的“第一手”证词。

缺乏这些证据，一个持客观立场的研究人员没有权力认为，确实使用了刑讯。可惜，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缺少应有的重视。由此可见，下述观念对学者和读者的影响之深，即只要落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牢狱”并且从这里出来的人，都承受过“皮肉”之苦，当然，他们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

使用刑讯的理由是各式各样的。比如，如果侦查人员确信，受讯人是危险的犯罪分子或间谍，残酷拷打就成为从他口中得到可以保全财产、拯救生命或揭发其他犯罪活动等信息的手段。

但我们要再次强调，侦查人员有可能通过肉体摧残迫使犯罪嫌疑人承认从来没有实施的犯罪活动，并以此得到领导的好评。刑讯可能用于从被捕者口中得到指控其他人的供词，这些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受残酷拷打，从而凭空制造出重大阴谋案件被侦破的功绩。

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米·彼·弗里诺夫斯基在其悔过声明中指

出（该声明直到2006年才公开），叶若夫对其某些下属下达了指令，让他们进行此类造假。但弗里诺夫斯基的供词也表明，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制造了假案，绝不是所有侦查人员都在有意“造假”，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叶若夫为所欲为”时期被拘押。我们还知道，斯大林和他的高层战友，即研究违法事例委员会成员，采取了坚决的紧急措施，以结束大规模滥用职权的现象，并逮捕了滥用职权的犯罪人员，并把他们送交法庭。这些，从不久前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多数情况下我们简直无法得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侦查人员手中掌握的材料。绝大多数侦查档案文件，无论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都还没有公开。不管怎么说，如今已经为人所知的一切，是根据某种标准而被解密的。是什么标准？无人知晓。

但有时不难发现，文件是这样挑选的：借助于这些文件，可以让人们确信，斯大林领导层是依据捏造的指控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

不难推测，揭发斯大林及其战友的文献早已解密。赫鲁晓夫“那十年”、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年代，以及接下来的叶利钦时代，都动用了数不胜数的“文献资源”，唯一目的就是要将斯大林执政的整个年代抹黑。很难想象，在某个地方还保存着谁也不知道的，或未被重视的能够证明斯大林残害了无辜人们的文献证据。基于这一原因，认为那些现仍藏于密室的材料将能证明“反斯大林模式”正确的说法，令人生疑。至少，近来从这样或那样的档案库中得到的文件，越来越多的是能为斯大林辩护的证据。还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文件被公布了好几次，而较晚公布的版本中会突然发现与较前公开版本的不同之处，这些区别能有力地说明问题，这让人们清楚：某“第一手资料”是造假阶段的产品，随即还会出现经过润色的（“官方”的）版本，然后将这一版本放进档案馆保存。

还要说，我们的所有结论都是初步的（这是历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在这点上完全不能“自信过度”。总而言之，在历史学家这里很少有“毫无疑问的事实”。未来证据会越来越多，对过去的概念做重大修正的必要性或许也会越来越大。

必须做好对自己的观点和构想提出质疑的准备。听从这样的建议，当然并不容易。但如果对这样的建议充耳不闻，历史学家就很容易走极端，

即只以虔诚之心看待那些可以证实自己观点的事实，而对与此矛盾的事实，则完全缄口不言。这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在历史证据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偏见的反映，而对应得出的真实结论却视而不见。

赫鲁晓夫的骗术分类

对赫鲁晓夫的“揭发”和他针对每一件事情所使用的历史证据进行分类，旨在尝试分析赫鲁晓夫为迷惑“秘密报告”的听众而采取的各种歪曲事实的手法。

美国的《美国传统字典》中对“谎言”做了以下定义：

- (1) 故意将不正确的论点视为真实；说假话。
- (2) 某种意味着欺骗或制造不正确印象的东西。

由第一种解释得出结论，撒谎者事先知道自己的论点与真实情况不符。在科学历史论著中能成功证明这点的，可谓凤毛麟角。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使用更宽泛的解释，即与第二种定义相近的解释。换句话说，赫鲁晓夫的某一“揭发”被称为“谎言”或“伪造”，指的应是以下两种欺骗方式中的一种：

- (1) 赫鲁晓夫清楚地知道，他“秘密报告”中的那些指责是欺人之谈。
- (2) 赫鲁晓夫粗暴地藐视真相，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弄虚作假。

通常，学者会避免使用“谎言”一词，认为该词过分粗鲁，我们也想尽量少地使用该词。但重要的不是讲漂亮话，而是对问题本身的准确研究。类型学是通过将各种不同的客体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特征对它们进行归类的手段。具体到我们的情况，赫鲁晓夫伪造的所有“揭发”都是用于欺骗，区别只是骗术不同。

“揭发”清单

以下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和贝利亚提出指控的问题清单及使用的造假类型。

序号	“揭发”的标题	造假类别
1	“个人崇拜”	ЛІУ*
2	列宁“遗嘱”	ЛІУ
3	“不容忍”集体领导制	ЛІУ
4	斯大林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意见不同的人	ЛІУ
5	大规模镇压活动	ОС
6	专用语：“人民公敌”	ЛІУ
7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ОС
8	托洛茨基分子	ЛІУ
9	斯大林“践踏”党内生活准则	ЛІУ
10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	ОС
11	叶努基泽 1934 年 12 月 1 日签署的指示	ЛІУ
12	赫鲁晓夫暗示斯大林参与杀害基洛夫	ЛІУ
13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 1936 年 9 月 25 日发给政治局的电报	ЛІУ
14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1937 年）上的讲话	ЛІУ
15	“许多中央委员怀疑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特别是波斯特舍夫	ЛІУ
16	罗·因·埃赫案	ЛІЗ
17	尼·伊·叶若夫	ЛІЗ
18	扬·埃·鲁祖塔克案	ЛІЗ
19	亚·莫·罗森布吕姆的供词	ЛІЗ
20	伊·德·卡巴科夫案	ЛІЗ
21	斯·维·柯秀尔、弗·雅·丘巴尔、帕·彼·波斯特舍夫、亚·瓦·科萨列夫	ЛІЗ
22	“处决名单”	ЛІУ
23	联共（布）一月中央全会（1938 年）决议	ЛІУ
24	“贝利亚反革命集团”	ЛІУ
25	“关于刑讯的密电”	ЛІУ
26	根据贝利亚的指令，罗多斯残酷殴打柯秀尔和丘巴尔	ЛІЗ
27	斯大林“没有重视”战争开始的预报	ЛІУ
28	沃龙佐夫的情报	ЛІУ
29	德国逃兵	ЛІУ
30	被处决的统帅们	ЛІЗ
31	战争初期斯大林“丧失”指挥能力	ЛІУ
32	斯大林是“毫无水平的”军事领导人	ЛІУ
33	哈尔科夫，1942 年	ЛІУ
34	斯大林“根据地球仪”拟订军事战役计划	ЛІУ
35	斯大林“贬低”朱可夫元帅的功勋	ТС
36	强制性大规模民族外迁	ЛІУ
37	“列宁格勒案”	ЛІУ
38	“梅格列尔案”	ЛІУ

续表

序号	“揭发”的标题	造假类别
39	与南斯拉夫的相互关系	TC
40	“医生反革命分子案”	ЛП
41	贝利亚——“外国情报机关的奸细”	ЛП
42	卡明斯基谈贝利亚为木沙瓦特党工作	ЛП
43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 - 拉夫连季耶夫案	ЛП
44	对米·谢·克德罗夫的“残暴镇压”	ЛЗ
45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利亚	ЛП
46	“约·维·斯大林传略”	ЛП
4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ЛП
48	斯大林在关于建造自己塑像的 1951 年 7 月 2 日决议上签字	НН
49	苏维埃宫	ЛП
50	列宁和斯大林奖金	ЛП
51	斯大林提议对集体农庄增加征税	TC
52	斯大林对波斯特舍夫不满	TC
53	政治局工作“瘫痪”	ЛП
54	斯大林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	ЛП
55	对安德烈耶夫“专横跋扈”	ЛП
56	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无根据的”指控	ЛП
57	扩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ЛП

*：这里的字母均为俄文缩写，其含义见下文。

“揭发”类型

1. “НН”，即“不知”型：1例

“不知”型是指：不研究文件的原件就不可能知道，赫鲁晓夫说的是否符合实际。这里所说的斯大林似乎在建造自己塑像的决议上签了字。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歪曲了文献的意思，在这里隐瞒了重要的情况。所以（如第八章所解释的那样），为解决这一问题，仅凭一份文件的影印件显然是不够的。

2. “TC”，即“赫氏一家之言”型：4例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多次提到，斯大林对他说了什么什么……不过，这都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说的，因此这些话除了报告者本人外，再无第二人能对赫鲁晓夫说法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甚至，即使某个人不同意这一说法（比如朱可夫），其反驳依然不足以确定真相。其余三种情况，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在一起，而他们肯定可以证实赫鲁晓夫的声明，

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知名度。但至今我们不拥有这样的材料，即他们是否也在其他场合下做出过这样的证实。

3. “ЛЗ”，即“断章取义”型：9例

所引用的证据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没有上下文，显然对其中某些重要的材料避而不谈。

也许，赫鲁晓夫不掌握全部情况，但那些为他进行历史研究的人，准备了资料和撰写了“秘密报告”的第一稿，他们不仅拥有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且知道的肯定比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还要多得多。因为当时，赫鲁晓夫的走卒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今天的档案专家不可能看到的文件。正因为如此，情况多半是，他们向赫鲁晓夫本人介绍了这些材料，但赫鲁晓夫自己对此进行了取舍。

4. “ОС”，即“特殊情况”型：3例

声明提出的每一个论点，都非常含糊，而如果稍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对斯大林或贝利亚的具体指控。他们故意用一种“特殊情况”的词语来蒙混过关，实际上却没有公开谈及任何东西，这无非是想给听众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

5. “ЛТ”，即“谎证”型：40例

列入“谎证”型的，或是明显的欺骗性声明，或是赫鲁晓夫公然地对历史的真实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在后一种情况下，报告人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声明与真相距离何等遥远。借助于今天已知的材料和专门为赫鲁晓夫准备的材料，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

“揭发”类型例证

以下的一些例证不仅能对所提出的分类意见有一个概念，也可以对赫鲁晓夫报告中误导听众所使用的骗术有所了解。其中，唯一的一例，即列入“不知”型的例子，已在本节开始部分进行了研究，下面主要分析后四种手法。

1. “赫氏一家之言”型

(1) 在“秘密报告”中提到，有一次，在赫鲁晓夫在场的情况下斯大林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会完蛋，就会消失……”报告人这样说意味着，只有他是斯大林这段讲话的见证人。如此，就不存在任何对赫鲁晓夫讲话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的可能。因为，再无第二个证人。

(2) 赫鲁晓夫证实，斯大林曾提出要对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增加征税400亿卢布的建议。但这里也是说斯大林只与赫鲁晓夫一个人谈了自己的设想，有理由相信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也是赫鲁晓夫臆造的。

(3)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似乎曾多次“贬低”朱可夫元帅的功勋和才能，并对帕夫洛夫·波斯特舍夫表示不满。如果赫鲁晓夫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在所有事件中值得完全信赖的见证人，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依靠他无可指责的威信让人相信他所说的真实性。但总的来看，赫鲁晓夫说真话的时候少，他所说的话多半与真实情况不符。因而在这里，不可能做出绝对的判断。

2. “断章取义”型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讲述了对“著名党和国务活动家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等人的‘案件’造假”问题。

但一切远非赫鲁晓夫希望展现的那样清楚。现在已经知道的许多事实证实，对科萨列夫，特别是对柯秀尔、丘巴尔和波斯特舍夫提出的指控是有根据的。比如，波斯特舍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之后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最后因其参与“无根据的大规模镇压”而被逮捕。赫鲁晓夫出席了那次全会（1938年1月），会上波斯特舍夫本人发了言，并遭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严厉的批评。

赫鲁晓夫应该知道，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曾在卢比扬卡与波斯特舍夫会面，在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场的情况下，波斯特舍夫确认自己有罪，以及他此前交代的供词是正确的。赫鲁晓夫不可能不知道，正是波斯特舍夫，和与他一起的其他许多受侦讯人，对柯秀尔和丘巴尔提出了指控；而卡冈诺维奇，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在查阅了厚厚的一大本有关丘巴尔的自供词后，只能做出一个摊开双手的动作。

四个案例中都有足够的间接证据说明科萨列夫、柯秀尔、丘巴尔和波斯特舍夫有罪。但又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因为俄罗斯政府机关至今仍不公开对他们案件的侦查档案材料。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有罪，还是无罪。至少，在今天可以接触到的证据中，相当多的资料显示，以上四人均有罪。

第五个例子是罗森布吕姆的供词，他讲述了扎科夫斯基是如何制造假

供词的。赫鲁晓夫在这里企图暗示，所有造假背后的支持者都是斯大林。而实际上，有非常可靠的证据证明，扎科夫斯基当时服从叶若夫搞阴谋活动的指示，并按他的指挥棒行动。而斯大林的态度恰恰相反，坚决反对扎科夫斯基，谴责他在审判被告时采用殴打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断章取义”型案例有时与“谎证”型交叉。

例如在“被处决的统帅们”的指控中，赫鲁晓夫讲得如此含混不清，以至于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明白他究竟想要证明什么。从已经公开的材料得知，图哈切夫斯基和与他一起被判决的司令们，的确犯有对他们指控的罪行。赫鲁晓夫在“被处决的统帅们”的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指控手法可以划归“断章取义”型，虽然也不那么明确。

在指控对米·谢·克德罗夫的“残暴镇压”中不难看出，克德罗夫并不是根据“贝利亚的指令”被处决的，提出要求“苏联最高决策机关”批准的文件不是出自贝利亚。在同苏联检察长博奇科夫协商后，贝利亚得到了有必要对克德罗夫执行处决的结论，因为他是内务人民委员。换句话说，如果认为贝利亚与处死克德罗夫一事毫无关系，同样是不正确的。

在这两个事例中，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已解密的一小部分材料，但指望仅利用这些材料得到关于那一时期所发生事件的正确概念，简直是不可能的。不过，现有的材料足以让人们确信：赫鲁晓夫撒谎了，至少是某些部分（不排除是大部分）。所以，他的这两个“揭发”声明，都可归到“谎证”类型，虽然它们也与“断章取义”型有所交叉。

3. “特殊情况”型

在“秘密报告”的某些地方，赫鲁晓夫对大镇压一事大发评论，起初，既没有涉及细节，也没有涉及人物。但是，由于某种考虑，他“忘记”提及他自己在执行镇压政策中的作用，1935~1938年，他曾是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第一书记，之后（1938~1949年），他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书记。从最近几年发表的历史学术著作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大概除了埃赫之外，赫鲁晓夫镇压的人比党内任何其他领导人都多得多。毫无疑问，他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真正的“搞镇压的斯达汉诺夫”^①。

^① 斯达汉诺夫，苏联煤矿工人，曾创造一班采煤超额13倍的纪录。——译者注

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作用没有被纳入“秘密报告”。他在这方面的声明也没有被纳入对某些东西有意避而不谈的“断章取义”型（“ЛІЗ”），而被纳入“特殊情况”型（“ОС”）。这是因为，这里并没有对斯大林或贝利亚的明显指控，赫鲁晓夫只是企图让听众产生一种他所需要的印象。“秘密报告”公开出版的版本用词都经过了精挑细选，以便在那里找不到对某个人的直接指控。

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是赫鲁晓夫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明：

“在自己的‘遗嘱’中，列宁警告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更不要说提出处决他们的问题。”赫鲁晓夫完全绕过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旨在进行推翻苏联政府和间接参与杀害基洛夫的阴谋活动中的罪行。报告人手中掌握着认罪供词和案件中所有的其他材料。可惜，今天能接触到的只是那些文献资料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资料都非常可靠地证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犯下的罪行，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也不敢宣布他们“无罪”。他只是把处决他们的全部责任归罪于斯大林的“暴政”。但是，如果真如文件证明的那样，被告确实有罪，那么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为是“滥用职权”的后果。

“特殊情况”型（“ОС”）中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之事，该委员会受委托“仔细研究如何造成了对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的大规模镇压问题”。

赫鲁晓夫断言，委员会“查明了大量伪造的反共产党人案件、伪造的指控、令人发指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律等事实，其结果，造成无辜人们的死亡”。而真实情况是，委员会（其报告已经公布）对任何事实都没有“查清”。委员会仅宣布了它所提出的结论。有倾向性的研究是根据预先确定的结果，即最终提出赫鲁晓夫需要的结论而进行的，多数情况下，没有对这些结论提出什么证据予以支持。不仅如此，委员会也没有查清它提出的斯大林滥用职权的罪证。而且，赫鲁晓夫声明本身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为是“揭发性”声明，因为，早在那段时间（1939年和以后），关于许多受害者受到了不公正惩罚之事已广为人知。

4. “谎证”型

最大的一部分“揭发”属于“谎证”型。所有谎言都与事物的来龙去脉有关，换句话说，与其他一些情况有关：引用它们会让人们发现，论据与事实相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这方面的某些“揭发”声明与“断章取义”型交叉，而另一些，比如，“沃龙佐夫的情报”，则是彻头彻尾的造假。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刑讯的“密电”，赫鲁晓夫删除了该文件最重要的段落，只通报了关于批准对“没有缴械的”敌人使用“体罚方法”的说法。但被他删除的部分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说明不允许大规模使用刑讯，而内务人民委员部中那些将这一方法由例外变为规则的人，受到了应有的严厉处罚。第三个例子是所谓在战争的头几天和头几个星期，斯大林“意志消沉”的问题。实际上，所有在那一令人坐卧不安的时间段与斯大林在一起工作过和待在他身边的人，都对这一说法进行了驳斥。斯大林身边唯独没有赫鲁晓夫，而且在莫斯科也没有他的身影，因为那一时期他一直在乌克兰首府，哪里也没有去。

第十一章 平反造假

在二十大讲话中，赫鲁晓夫报告了“党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会”的工作。按照他的说法，该委员会澄清了以下情况：“1937~1938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人员真实情况是，他们从来都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实际上，他们一直是诚实的共产党员……”^①然后，报告人转入讨论具体的某些人的刑事案件，根据他的话，他们的案件已经被彻底查清，根本无罪。

以波斯佩洛夫为首的委员会的文件，在苏联解体后已经公开。几乎同时公开的还有苏联总检察长罗·安·鲁坚科签署的平反证明，波斯佩洛夫曾使用过这些材料。完全相同的引证和其他相互吻合之处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鲁坚科签署的平反证明是波斯佩洛夫报告的基础。

对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曾进行过多次讨论，但讨论的氛围并不是很认真的，所以，根本没有对某些捏造的问题加以澄清。报告中许多失实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报告的某一段中，作者们得出结论，所谓反对派活动的“集团”和“中心”，根本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人员虚构出来的。但现在已经很清楚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托洛茨基的个人档案中，已经发现可以证明在苏联确实存在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阴谋集团和组

^①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Хрущё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36-137.

织的文件。^①

不管怎么说，这类平反材料从来没有成为历史学研究的课题。有关上述题目的所有著作，比如瓦·扎·罗戈温和弗·彼·璠莫夫的著作，依据的都只是从“秘密报告”中摘出的段落，或是对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简要复述以及引自赫鲁晓夫无度自吹自擂的叙述。^②

下面将讨论对某些党的领导人的平反材料——他们的名字曾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被提及，我们还会将这些平反证明和有关决议的内容与后苏联时期公布的文献材料进行比较。

从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搞平反材料的目的并不是要澄清那些被镇压的人是否真的有罪。他们也不会有其他的做法，甚至对我们已知的证据，他们都不进行研究。谁知道，还有多些我们暂时尚不知道的材料仍隐匿在侦查档案之中呢！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准备这些平反证明呢？对报告中提到的中央委员们来说，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赫鲁晓夫需要以这些看起来似乎真实的材料来武装自己，以便其关于某某人无罪的说法不会显得毫无根据。

但对那些级别不高的职员、层次较低的党员，以及许多普通老百姓来说，为他们准备平反证明的原因则完全不同。大部分平反证明，如果不是所有的，是对被镇压者亲属请求的答复，而今天公开的只是这类书面请求的个别例子。

① J. Arch Getty, «Trotsky in Exile: The Foun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oviet Studies* 38, No. 1 (January 1986), p. 28 & notes 18-21, p. 34; Pierre Broué, «Trotsky et le bloc des oppositions de 1932», *Cahiers Léon Trotsky* 5 (January-March 1980), pp. 5-37.

② В.П.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 4, см. также: <http://vivovoco.nns.ru/VV/PAPERS/HISTORY/ANTIST.HTM>; «Приложение 1: Из истории разоблачения сталинск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в книге: В.З.Роговин.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 М., 1997. См. также: <http://web.mit.edu/people/fjk/Rogovin/volume5/pi.html>. Роговин наивно повторяет изложенную Хрущёвым версию событий, которая, как очевидно,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а для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Наумов чуть более критически настроен к заявлениям Хрущёва и мемуарам Микояна, но и он не подвергает сомнению правдивость того,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включая подготовку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但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是否对这些人究竟有罪还是无罪进行过稍微认真的调查，以下是能说明这一情况的很好的例子。

亚·尤·季维尔

美国研究员约翰·阿奇·格蒂得到许可（查阅）和公布了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季维尔—列维特本人简略的党员档案材料。季维尔于1937年根据法庭判决而被处决。1957年5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了对季维尔的判决，并恢复了他的党籍。然而，在其党员的档案中，任何可以研究季维尔刑事案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在那里只是写着，对他做出判决的依据都是些相互矛盾和令人怀疑的材料。

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关于季维尔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会使人立即清楚：不管怎么说，季维尔绝不是个“苏联的凡夫俗子”——由于某种原因，格蒂这样称呼他。^① 季维尔曾是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季维尔曾与他人合作写过一本书，该书是共产国际头十年正式的历史教科书；第二次（1937年1月）公开审判中的主要人物尤里（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和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都说季维尔是他们所知道的阴谋者之一。而且，根据索科利尼科夫的交代，季维尔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阴谋集团的参与者，与他本人建立了个人联系，该集团曾准备谋杀斯大林。

索科利尼科夫：1935年季维尔到我这里并通报，他与扎克斯—格拉德涅夫恐怖集团有联系。季维尔询问了这一集团下一步活动的指示。

主审人：该集团准备谋杀谁？

索科利尼科夫：当时季维尔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准备对斯大林采取恐怖行动……我与季维尔有直接的联系，季维尔与扎克斯—格拉德涅夫恐怖集团有直接联系。季维尔本人是否是该集团的成员，我不知道。^②

^① J. Arch Getty and Oleg V.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② *Процесс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го 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центра (23 - 30 января 1937 года)*. — М.: НКЮ Союза ССР; Юрид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7, с.74.

这里提到的扎克斯—格拉德涅夫也在出版社工作，他是季诺维也夫的妹夫。维克多·谢尔士描述了自己与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会面是在扎克斯那里举行的，其时恰逢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当时党的领导（即斯大林和布哈林），举行游行示威失败，而铁杆托洛茨基分子阿道夫·约费为表达抗议情绪自杀身亡。在那次会见中，与会者讨论了反对派转入地下活动的计划。

在1937年1月的公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和皮亚塔科夫都说出了季维尔的名字；毫无疑问，关于季维尔的活动他们都在预审中提交了供词，显然，只会是比此更加详细的供词。^①而且，当季维尔的名字在诉讼中不断被提到时，他不仅还活着，而且还是自由的。当然，他在1936年8月已被清除出党，看来，这是在8月举行的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诉讼案审理的结果。1936年12月，当谈及布哈林的问题时，叶若夫在与起诉人之一的库利科夫当面对质时提到过季维尔。^②

根据格蒂的说法，为季维尔恢复名誉是应其妻子的请求，她请求为“人民公敌家庭成员”的她和她的儿子雪耻。虽然已经平反，但从今天可以有限接触到的文献资料看，多数材料指出季维尔参与了1930年代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以上所说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点名的布尔什维克党高层领导人的案件有关。

帕·彼·波斯特舍夫

在二十大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称，在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中，实际上对所确定的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这些怀疑最清楚地体现在波斯特舍夫同志的发言中”。^③在1992~1995年公布二—三月全会材料之前，特别是在公布波斯特舍夫在全会

① О сохранившихся стенограммах допросов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н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м следствии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из коротких цитат в: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 / Под общ. ред. А.Н.Яковлева.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228-229.

②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очных ставок в ЦК ВКП(б). Декабрь 1936 год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 3, с.6.

③ С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 №5/6, 1995. Фрагмент, процитированный Хрущёвым,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на с.4.

上发言的速记记录之前，要想核实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否正确，是不可能的。

但在这次全会的材料公开后，发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都是明显的谎言：无论是波斯特舍夫，还是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压根都不曾有过批评“大规模镇压方针”的念头。

赫鲁晓夫的欺诈行为并不仅表现在这一个问题上^①，事实上，波斯特舍夫夫人应对大规模镇压承担个人责任。他的行为被斯大林评价为“枪杀”完全无辜的古比雪夫州党组织成员。恰恰是搞镇压，成为波斯特舍夫被免除职务、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之后被开除党籍，最终被逮捕和正式立案侦查以及被判处死刑的主要原因。

但是，直到今天，俄罗斯政府不仅拒绝公开波斯特舍夫案件的文件，而且也不允许任何研究人员查看这些文件。^②很可惜，禁止查阅侦查档案材料，诸如开庭速记记录、供词、审讯记录——其中包括其他被审讯人提出的对波斯特舍夫的指控和他自己指控其他人的材料，但不查阅这类文献资料，就不可能对真实情况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总之，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提到的每一个因无根据镇压而牺牲的人，都是这样一种状况。

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澄清这些事件的全部内情，无论对波斯特舍夫案件的研究，还是对其他被镇压的中央委员案件的研究，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将目前已经公布的平反材料与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进行比较。

在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有关波斯特舍夫的段落比专门为他所写的相当简短的平反证明还要短。而平反证明，看来已吸纳了所有材料，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在这些材料中加进了大量对斯大林个人猛烈攻击的内容。^③赫鲁晓夫当然对这些材料了如指掌，因为它们已分发给主

① 涉及一月全会的赫鲁晓夫的其他欺骗性声明，在第三章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

② 不允许查阅文件的原因之一是通过了一项奇怪的法律，根据该法律，只有被镇压人员的亲属对涉及其亲人命运材料的公开表示同意后才可查阅。著名经济学家、波斯特舍夫之子列昂尼德曾发表了几次谈话。谈话中，他十分亲切地回忆了自己的父亲，自然而然，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罪行。由于无论是在官方还是非官方层面，被镇压人的家属不断遇到其合法权利受到损害问题，因此，他们才是平反的最大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是家庭成员提出请求为自己被镇压的亲属恢复名誉，虽然具体到波斯特舍夫，看来是赫鲁晓夫本人主动提出平反的。

③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Март 1953 - февраль 1956.* — М.: МФД, 2000, с.325.

席团成员，在某些材料上还有他们的签字。但是，送给赫鲁晓夫的文件最多。^① 以下将主要对平反证明材料进行研究，因为该证明中包含着关于波斯特舍夫的详细材料。

某些事情似乎一目了然：在关于波斯特舍夫平反证明中^②，只字未提他组织对党员进行大规模非法镇压的问题，而这方面，已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予以证实。当然，在“秘密报告”中阐述这个问题，不会引发对斯大林的敌意，也不会增添对波斯特舍夫的好感。

特别重要的是，在平反证明中以视而不见的方式绕开了这些问题。倘若能在那些卷宗中找到哪怕是一点点有助于证明波斯特舍夫清白的事实，他们肯定会在为其所做的平反证明中大书特书的。

只要诚实地研究波斯特舍夫案件，有关他在煽动大镇压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能不引人注目。如果平反证明中提及该问题，那么，赫鲁晓夫政治反对派中的某些人，比如莫洛托夫或卡冈诺维奇，就很有可能正式提出索要为其平反的证据，届时赫鲁晓夫的骗局就会暴露无遗。

赫鲁晓夫参加了1938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波斯特舍夫在会上遭到激烈的批评，之后他因进行镇压活动而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然，赫鲁晓夫不可能不知道波斯特舍夫的过错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原因，而且毫无疑问，他也投票支持了这一决定。

从现有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平反证明材料，还是依据平反证明材料而撰写的波斯佩洛夫报告，都是在撒诈捣虚。两个文件均没有对波斯特舍夫的案件进行客观认真的研究，而是遵循事先已确定的准则，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表明波斯特舍夫从没有进行过任何犯罪活动，要展示其沉冤莫白的无辜者形象。当然，赫鲁晓夫对这些耍奸取巧的花招不可

① Документы с резолюциями членов Президиума см.: Там же. С.203, 207, 217, 220, 227, 229, 231, 233, 236, 237, 251, 260, 261, 263.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Хрущёву: Там же. С.192.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лучаях имя Хрущёва не значилось в качестве адресата, но из пометок на реабилитационных справках следует, что они направлялись именно ему: Там же. С. 188, 191, 208, 233, 236, 237, 251, 264.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справок либо сначала были посланы Маленкову или Булганину, либо направлялись копи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в их архивах и затем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② Речь идёт о записке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рокурора СССР Р.А.Руденко от 19 мая 1955 года. См.: Там же. С.218-220.

能不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波斯特舍夫平反（也是为多数人甚至几乎是为所有被镇压的人平反）这件事上，不仅赫鲁晓夫本人，而且参加一月全会（1938年）的所有主席团成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对赫鲁晓夫玩的这种骗人把戏都是心知肚明。^①

最后，也不能排除，波斯特舍夫可能因一项或几项重大的犯罪活动而被判决，比如参与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在美国有不少这样的做法，即在法庭上用不着对被告所有可以判死刑的违法活动进行审理。因此不排除，对波斯特舍夫的其他犯罪活动并没有进行审判，因为，归根到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一次就够了。

但若若要“彻底恢复名誉”，就必须撤销对犯罪人已承认的所有犯罪行为的指控。如果只有一项犯罪活动，而且对这一犯罪活动的指控不能成立，那么犯人可以被认定是无罪的，唯一的指控将予以撤销。显然，在对波斯特舍夫案件进行平反时，正是用了这种李代桃僵的手法。看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许多，如果不是说对所有“被平反的人”的案件处理中，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在为他们平反时正是引用了这样的平反证明材料。

检察院起草的核查材料证实，波斯特舍夫承认自己参与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活动和为日本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但那些被波斯特舍夫称为自己同伙的人，或在供词中根本没有谈及波斯特舍夫，或称他正是自己阴谋活动所要针对的人。^②

平反核查中的某些材料看起来相当奇怪。请大家自己判断：

“乌克兰共产党前书记尼·尼·波波夫证明，他，巴利茨基和亚基尔曾试图利用波斯特舍夫来进行反苏活动，但他们未能成功。”^③

① 除以上已经提到的主席团成员（即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外，1939年前和1956年，赫鲁晓夫的亲密战友尼古拉·什维尔尼克也是中央委员。1934年、1939年和1956年谢苗·布琼尼元帅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在1934年和1939年是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央委员。布尔加宁在1934年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② Из письма Ульриха Сталину от 16 марта 1939 года следует, что Постышев был среди тех, кто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изнал свою вину в суде. См.: <http://stalin.memo.ru/images/intro1.htm>.

③ Здесь и далее приводятся цитаты из «Записки Р.А.Руденко в ЦК КПСС 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П.П.Постышева», см.: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218-220.*

以上所说的很有意思！如果波斯特舍夫是无辜的，那他应报告企图让他参与阴谋的这些情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波斯特舍夫这样做了。如此，又该怎样认定他“无罪”呢？^①

“波斯特舍夫供出了基辅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司令员约恩·亚基尔大将与他是同一个阴谋的参与者。亚基尔与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同时被处决，但亚基尔却“没有提供关于波斯特舍夫的任何供词”。

关于波斯特舍夫的有关情况，是否审问了亚基尔？如果没有，那么没有提到他就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在平反材料中没有指明这一并非不重要的细节呢？

“斯·维·柯秀尔在侦查开始时曾交代波斯特舍夫是乌克兰军事阴谋的参与者，之后翻供，后来又再次确认。”

这类依据，未必可以认为是在为波斯特舍夫辩护。供词不证明其罪行，与翻供不否定其罪行并无不同。

“在柯秀尔的案件中，附有尼·基·安季波夫的声明。在该声明中他肯定，柯秀尔和波斯特舍夫之间存在着不正常的私人关系，波斯特舍夫不是乌克兰反革命组织总中心的成员。”

1937年3月，波斯特舍夫从乌克兰调到古比雪夫州担任联共（布）州委第一书记。他脱离乌克兰阴谋中心的事实，不能证明他无罪。

“在预审中波斯特舍夫交代，他通过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工作人员鲍·尼·梅利尼科夫、贝·伊·科兹洛夫斯基，与日本情报机构保持着联系。

如检查所确定的那样，鲍·尼·梅利尼科夫承认自己与日本情报部门有联系的罪行，但关于波斯特舍夫，没有交代任何情况；而贝·伊·科兹洛夫斯基根本没有被逮捕。因此，波斯特舍夫关于其在乌克兰的反革命活动和与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供词’，没有得到证实。如现在已经查清的那样，这些‘供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伪造的。”

相反：如果波斯特舍夫承认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供出了秘密联络员

^① Согласно УК РСФСР тех лет, «недонесение о достоверно известном, готовящемся или совершенном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считалось тоже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м (ст. 58-12).

梅利尼科夫，而梅利尼科夫在自己的供词中予以确认，他是日本间谍，那么这一切加在一起，更可能是证实，而不是推翻波斯特舍夫的罪行，不管梅利尼科夫是否提到过波斯特舍夫！

平反证明指出：在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侦查员彼·尤·采尔品托承认，对波斯特舍夫审讯的记录之一，是他和侦查员维泽尔写的，他们两人执行了格·尼·卢洛夫（大概是他们的领导）的命令；而卢洛夫自己则警告波斯特舍夫，让他不要改变供词内容。在同样的证明材料中还说，采尔品托亲自参与了制造假案，其中包括假造波斯特舍夫是共谋的审讯材料。但关于该审讯的内容却只字未提，虽然可以肯定，这里指的是唯一的同一个记录。

为波斯特舍夫平反证明的最后一部分称：“苏联检察院认为，对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关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案件判决提出抗诉以终止他的案件和为他身后平反是可能的。请求你们的同意。”

平反报告的日期是1955年5月15日。仅仅两个月过后，即1955年7月18日，出现了关于康·瓦·乌哈诺夫案件的报告，报告中说：

检查确定，对乌哈诺夫案件的侦查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前工作人员卢洛夫和采尔品托搞的，后来他们作为潜入国家安全机关的罪犯被揭发出来，并因他们的一系列罪行，包括假造侦查案，而被处决。

通过起诉卢洛夫的刑事案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出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卢洛夫的兄弟门德尔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大资本家。卢洛夫是作为交换从波兰来到苏联的。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卢洛夫在列宁格勒工作，他发言反对党的路线。在卢洛夫案中，有一封他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函，该函对季诺维也夫的一次讲话表示赞同。

从采尔品托案看出，1934年，他是萨拉托夫教育学院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一时期，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为不公开的情报员。1937年，采尔品托转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编制内职务。

在采尔品托和卢洛夫的供词中，包含着大量事实，这些事实证明，在审讯犯人时，他们从犯人口中诈取针对无辜人员的口供，特别是强行从犯人口中得到诬告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口供。

在假造刑事案时，采尔品托和卢洛夫竟然诈取针对个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假供词。采尔品托和卢洛夫就是以这种方式制造了大量假案，包括指控波斯特舍夫——如今已彻底为他身后平反，以及指控其他人的案件。^①

简言之，卢洛夫被指控支持季诺维也夫，而采尔品托则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稍后我们会看到这与波斯特舍夫有何关系。在此我们提请注意：平反证明中明确指出，存在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而仅仅几个月后撰写的波斯佩洛夫报告，却绝对否认了这一阴谋的存在。

之后，在关于乌哈诺夫的报道中，列举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与叶若夫关系最密切的他的走卒米·彼·弗里诺夫斯基交代材料中的一段话，说叶若夫鼓励使用刑讯来制造假口供，并企图以此隐瞒其扮演的作为反政府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首领之一的角色。他的这一交代材料曾经经常被引用，但只是在2006年这一材料的全文才被公布。

以上所说证实了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一，有一份审讯记录，在对波斯特舍夫审判之前已由侦查人员拟定。

第二，从内容相当丰富的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中，只引用了供词中涉及制造虚假供词和诽谤性指控的那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涉及弗里诺夫斯基所使用的很像是卢洛夫和采尔品托使用的方法。

1939年2月26日，对波斯特舍夫进行了审判和处决，^② 这意味着，对该案侦查的完成，是在1938年11月贝里亚取代叶若夫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稍后（还是在贝里亚领导该部时期），侦查员采尔品托和卢洛夫被送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233-234.*

② 采尔品托说，他的供词很容易验证，只要把波斯特舍夫和被捕者布勃诺夫叫来进行审讯即可。当时，大概波斯特舍夫已经被处决，只是采尔品托对此一无所知。Церпент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его показания можно легко проверить, если вызвать и допросить Постышева и Бубнова — другого арестованного. См.: Там же. С.219. К 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Постышев, вероятно, был уже расстрелян, только Церпенто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л об этом.

上法庭和被判死刑。

第三，关于波斯特舍夫的平反证明中根本没有提及他对党的干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问题。因而在平反报告出笼两个月之后，波斯特舍夫“彻底恢复名誉”。

第四，波斯特舍夫在其供词中指控的那些人，有的反过来指控他（比如柯秀尔），有的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如亚基尔、安季波夫、梅利尼科夫等）。

第五，供认准备对波斯特舍夫搞恐怖活动的受侦讯的人，同时对自己参与阴谋也供认不讳。

如果波斯特舍夫真的涉嫌参与阴谋活动，那么了解此事的可能也只有很少的几个同谋。因此，其他参与阴谋者密谋反对波斯特舍夫，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清白无罪的证明。

那么，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唯一能够无懈可击地解释上述问题的说法只有一种：为波斯特舍夫所做的平反报告，是赫鲁晓夫蓄谋的骗人诡计。对波斯特舍夫所提出的任何关键指控都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因而，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有助于他恢复名誉。收集此类平反材料的任务，绝对不是为了澄清波斯特舍夫有罪还是无罪。它们只是赫鲁晓夫所需要的遮羞布，以便他借波斯特舍夫死刑之事来攻击斯大林。

出于同样原因，波斯佩洛夫的报告也使用了欺罔视听的平反证明。该报告同样是在搞欺骗。报告中涉及波斯特舍夫的那几句话很含糊，但带有明显抹黑斯大林的意向。对整个波斯佩洛夫报告的设计，不是为了进行切实的核查平反，而只是将其作为政治论战的辅助材料。

亚·瓦·科萨列夫

也有为亚历山大·科萨列夫的平反核查材料^①。但无论是在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及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为赫鲁晓夫准备的“秘密报告”的第一

^①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166-168.*

稿中^①，还是赫鲁晓夫为“秘密报告”所提供的“口授材料”中^②，都没有提及科萨列夫，甚至连一个段落也没有。所以，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科萨列夫所讲的一切，都是赫鲁晓夫自己借题发挥的。此外，我们这里已经掌握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即赫鲁晓夫在准备自己的讲话时，不仅利用了波斯佩洛夫报告、波斯佩洛夫与阿里斯托夫准备的“秘密报告”讲话草稿，而且还亲自查阅了一些有关平反的核查材料。

总之，对科萨列夫的命运我们了解的情况要少得多，特别是与关于波斯特舍夫命运的材料相比。这仅仅是因为，俄罗斯当局暂时没有公开前共青团领导人生命最后几个月的任何材料。在为科萨列夫所做的平反报告中，关于1938年11月28日对他实施逮捕的原因，被解释为由他与贝利亚的个人恩怨所致。如已经认定的那样，起初科萨列夫拒绝提供关于自己进行背叛活动的口供，但之后对他采用了刑讯。12月5日，他在伪造的供词上签名，在该供词中，他承认自己参与了旨在推翻苏联政府的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活动。

平反报告将所有责任归咎于贝利亚。报告说，贝利亚憎恨科萨列夫，而科萨列夫也鄙视贝利亚，因为贝利亚歪曲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而且排挤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后，贝利亚利用自己的权力，第一时间逮捕了科萨列夫和他的妻子。

如平反报告所说，似乎从贝利亚那里得到了指示，这一案件由与贝利亚关系最密切的人——波格丹·科布洛夫和列夫·施瓦茨曼，即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部领导及其助理进行调查。为了得到科萨列夫的口供，不惜采取体罚手段。在侦讯中，科布洛夫和施瓦茨曼对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前书记瓦莲京娜·皮金娜进行了拷打。虽然遭受了肉体折磨，但她仍拒绝提供关于科萨列夫的假供词。

平反证明通报，科萨列夫之所以认罪并确认自己的法庭供词，是为了

① «Проект доклад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й П.Н.Поспеловым и А.Б.Аристовым» в: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120-133; См. также: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53-364.

② «Дополнения Н.С.Хрущёва к проекту доклад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в: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С. 134-150;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365-379.

换取科布洛夫和贝利亚保住他生命的承诺。但贝利亚没有向任何人传达免死的施舍，科萨列夫就这样被处决了。

1953年，赫鲁晓夫镇压了贝利亚及其七个下属，其中包括科布洛夫。侦查员施瓦茨曼也在1955年赫鲁晓夫时代被处决，他（与科萨列夫的遗孀）几乎提供了平反报告中包含的所有材料。在平反证明中转述了关于贝利亚的“可怕往事”——这是与赫鲁晓夫散布的谎言最相似的说法之一，即确认，贝利亚对科萨列夫进行迫害没有任何政治理由，只是因为他与科萨列夫有个人恩怨。

整个平反报告材料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印象，这是因为从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出，对科萨列夫的指控是政治性的，对此以下将会谈到。同时，平反报告不仅没有提供反驳指控的论据，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些指控。

瓦·扎·罗戈温列举的证据证明，1938年3月，科萨列夫会见了共青团列宁格勒州委前第一书记谢尔盖·乌特金，他不久前刚刚出狱并抱怨内务人民委员部强迫他提供不实的供词。科萨列夫对此予以坚决回击并向叶若夫告密，这成为再次逮捕乌特金并把他关进古拉格劳动改造营16年的原因。科萨列夫与叶若夫的亲密关系，也从后者的外甥阿纳托利·巴布林那里得到证实，其供词已经公开。^①

根据罗戈温的说法——他利用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公开的文献，在1938年11月19-22日共青团中央全会召开不久，科萨列夫就被逮捕。许多联共（布）著名的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该全会，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对科萨列夫及其帮凶解除职务并进行侦查的起因是共青团中央教导员米沙科娃的一封信，在此事件之前不久，她曾写信指控楚瓦什共青团领导人。

阿卡基·姆格拉泽在1930年代曾领导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之后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2001年，他在196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终于出版了，其中有关他与斯大林的会面写了很多页。姆格拉泽回忆说，大约在1950年，他向斯大林表示想知道科萨列夫的命运，他曾在某个时间段对科萨列夫非常欣赏。在对斯大林谈起自己的看法时，他说他不相信对科萨列

^①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1939 — март 1946. — М.: МФД, 2006, док. № 40, с. 74-78.

夫提出的指控，并想知道，这其中是否发生了悲剧性错误。

斯大林心平气和地听完了他的所有问题并做了如下答复：在那些年代，每一个人，包括他，斯大林自己都犯了不少错误，但这与科萨列夫案没有任何关系：科萨列夫的案子，在政治局进行过两次讨论。根据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的委托，日丹诺夫和安德烈耶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进行了检查。这时，姆格拉泽自己也想起来，他曾读过共青团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在这次全会上，撤销了科萨列夫的职务。而且，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和什基里亚托夫的发言如此有说服力，这使他对科萨列夫有罪这一事实不再有任何怀疑。

显而易见，对科萨列夫的指控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看来，这些指控包括他与叶若夫的联系——在自己的供词中他已承认，他是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的头目。不排除共青团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档案材料和其他与科萨列夫案件有关的文件，不仅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有过，而且至今依然保存在某个地方，只是研究人员至今还不能查看这些文件。

赫鲁晓夫1964年辞职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无论对米沙科娃还是对科萨列夫都提到了，顺便还提到了共青团中央全会对科萨列夫提出的指控。但关于贝利亚因个人恩怨而“复仇”之事，却只字未提。^①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关于米沙科娃和共青团全会等问题的内容，在1954年的平反证明材料中则完全没有！我们要提一下，赫鲁晓夫曾把科萨列夫被处决的一切责任归咎于贝利亚和他对报仇的渴望。

不管真相是什么，我们没有权利相信平反证明中所写的东西。更何况，它还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使用的文件……

扬·埃·鲁祖塔克

1937年5月，扬·鲁祖塔克与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同时被捕，并与红军

^①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4 книгах. Книга 1. Часть I.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с.199. См.: http://kursk1943.mil.ru/kursk/arch/books/memo/hruschev_ns/11.html.

军事将领们一起被指控参与了同一阴谋活动。^① 在1937年6月2日举行的扩大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详细谈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活动并点到了鲁祖塔克，说他是该阴谋活动的13个领导人之一，侦查人员当时就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字。^②

但日期为1955年12月24日的平反报告，竟然对此只字未提。^③ 平反报告告知，虽然在预审时鲁祖塔克承认自己犯有反苏维埃罪，但他的供词“显然自相矛盾，不具体，也没有说服力”；在开庭时，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也否认了此前从他那里得到的供词，说这些供词全是“编造的”，而且他绝口不提参与军人阴谋活动之事！

波斯佩洛夫报告的相关部分^④，依据的是平反证明及身后平反通知对证明所做的补充：“1955年所进行的缜密检查查明，对鲁祖塔克的指控是伪造的，对他的审判依据是诽谤材料。”如以下将证明的那样，所谓“缜密”检查，完全不符合实情。对鲁祖塔克的平反，是通过已经证明有罪的关键证据采取隐匿和回避的手段，为犯罪人开脱罪行的又一次尝试。

许多受侦讯的人对鲁祖塔克提出了指控。平反报告企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贬低这些指控的意义。

(1) 某些被逮捕的人（马加利夫、埃赫等）在预审中提交了揭发鲁祖塔克的供词，但“在法庭上，他们又否定了这些供词”。

与最开始的供词相比，翻供供词并不会变得“更加真实”。

(2) 阿尔克斯尼斯、格尔曼和“其他拉脱维亚族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都交代鲁祖塔克是自己的同谋，但对他们的案件进行侦查时都“粗暴地违反了法律”。

① Рудзутак и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названы в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ЦК ВКП(б) от 24 мая 1937 года, в котором они обвинялись в участии в «троцкистско-правом заговорщическом блоке и шпионской работе против СССР». 25-25 мая 1937 года оба были исключены из состава ЦК, см.: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1937-1938.* — М.: МФД, 2004, док № 86, 87, с.190.

② Речь Сталин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в: *Источник.* 1994, № 3;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Док. № 92, с.202-209 и перепечатана многими другими изданиями. См.: http://stalin.newmail.ru/stalin_sobr/14-5.htm.

③ Записку Р.А.Руденко 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Я.Э.Рудзутака см. в: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294-295.

④ 同上, 328-329页。

为雅·伊·阿尔克斯尼斯出具的平反报告，^①是在此三个星期后才准备好的。所以在这里提及对他案件的检查结果至少是不明智之举。平反报告说，阿尔克斯尼斯在预审中提交了供词，并在法庭上重复了这些供词，但加上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在审讯中，是在对阿尔克斯尼斯采取了体罚措施后，他承认自己有罪的。”但平反报告中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任何细节：比如，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实施殴打的侦查人员的名字。

(3) 一些人（丘巴尔、克诺林、加马尔尼克和鲍曼）当时被宣布无罪，所以“不可能与鲁祖塔克有反苏活动方面的联系”。

根据对丘巴尔的平反报告^②，他承认自己参与了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集团，并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其他人员的侦查材料中，比如在安季波夫案件中，雷科夫的供词称安季波夫是阴谋者。丘巴尔同样也承认自己为德国进行间谍活动。

在预审中，克诺林^③承认自己参与了阴谋活动，并领导了共产国际中的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与加马尔尼克在反苏活动中保持着联系，与鲁祖塔克和艾德曼共同领导了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反苏组织，以及为拉脱维亚、波兰和其他外国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在法庭上，克诺林也确认了自己的供词。

鲍曼和加马尔尼克根本没有被审判，因此，只是在党的系统内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实际上，与从法律上恢复名誉相比，这通常更被看作是形式上的。

(4) 布哈林和雷科夫的供词证实，根据信仰，鲁祖塔克属于“右派”，他同情他们，但害怕公开承认自己在政治上的偏好。

(5) 克列斯京斯基、罗森果列茨、格林科、波斯尼科夫、安季波夫、茹科夫和其他人的供词“非常矛盾和不具体，因此不能成为证明鲁祖塔克有罪的证据”。

关于这里使用的修辞手法，我们应说几句话。

第一，翻供既不意味他们此前的供词是真实的，也不意味着就一定是

① «Записка Р.А.Руденко в ЦК КПСС 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Я.И.Алкниса» от 14 января 1956 года, см.: Там же. С.300-301.

② 同上，第 251~252 页。

③ 同上，第 272~274 页。

捏造的。对每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无法确认在这两个证据中，究竟哪一个更符合真实情况。

第二，我们不知道，鲁祖塔克是否推翻了他的所有供词，还是只推翻了某些供词。现在只知道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空军中将帕·瓦·雷恰戈夫或内务人民委员亨·格·亚戈达案中，被告确认自己参与了阴谋活动，但坚决否认德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①

第三，丘巴尔、克诺林和其他被镇压的人被“平反”意味着，由于一些诉讼程序原因撤销了对他们的判决，但这与认定他们完全“无罪”不是一回事。

第四，被侦讯人的供词可能会相互矛盾，但据此认定这些供词完全没有意义也是错误的。相反，完全相同的，或非常相似的供词，恰恰会大有疑问。不能因为“矛盾”而抛弃这些供词，至少在没有进一步研究它们出现的原因时不能这样做。

在格林科、罗森果列茨的供词中提到了鲁祖塔克。而在1938年3月对“布哈林案”诉讼期间，克列斯京斯基多次提到鲁祖塔克的名字。平反报告中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

其实，在不久前公布的叶若夫和他的亲属与战友安·莫·塔马林的供词中，罗森果列茨的名字是作为阴谋者而被提及的。而证词多半不是在证明罗森果列茨无罪，而是相信他揭发鲁祖塔克的供词。

鲁希莫维奇1938年2月8日的供词^②也交代出鲁祖塔克。毫无疑问，叶若夫及其帮凶制造了许多假供词并通过刑讯迫使受审人签字，这从弗里诺夫斯基致贝利亚的忏悔书中可以得到证实。一位目睹者证实，鲁希莫维奇遭受了殴打，但施暴者不是叶诺夫的侦查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因制造假刑事案而被判有罪。^③ 尽管如此，在审讯中使用体罚措施本身并不能说明，由此而得到的供词是真还是假。

① О Рычагове см.: Там же. С.165. О Ягоде см.: Судебный отчёт. —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емья, 1997, с.569; см. также: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trotsky/trotsky.htm>.

②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Док. № 290.

③ 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м очевидцев, Рухимовича избивал Мешик, тоже один из близких соратников Берин, который был казнён в декабре 1953 года. В реабилитационной справке на Рудзутака назван следователь НКВД Ярцев, который фабриковал протоколы допросов и который, как специально указывается,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был приговорён к расстрелу. См.: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ом 1. С.295.

伊·德·卡巴科夫

没有为伊万·卡巴科夫的平反报告；他的姓氏与埃赫和叶夫多基莫夫一同列入了36个被镇压的党的最高官员名单中，但没有任何想要查清对他指控是否正确的意思。今天众所周知的侦查档案材料中——在1956年赫鲁晓夫肯定也可以得到这些材料，关于卡巴科夫有相当多的材料证据。^①

1938年3月对右派托洛茨基分子案（“布哈林案”）的公开审讯中，被告雷科夫和祖巴列夫交代，卡巴科夫是反政府阴谋的同谋者。至今没有一个人证实，这些供词是用威胁或体罚方式而得到的，但这些供词，无论在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还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都“未能找到”。美国矿山工程师约翰·利特尔佩奇非常肯定地确认，卡巴科夫是在乌拉尔地区怠工行动的组织者之一。

罗·因·埃赫

罗伯特·埃赫是赫鲁晓夫报告中提到的因斯大林专横跋扈而无辜牺牲者中的第一人。而我们最后来研究这一案件是因为与其他案件相比，它更具有代表性。^②

如同赫鲁晓夫讲话中所提到的其他人物一样，对于“埃赫案”，无论苏联当局，还是俄罗斯当局，都不敢轻易让研究人员查看这一案件的预审和法庭审讯档案材料。但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也清楚：在参与没有根据的大规模镇压方面，埃赫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了协调一致的行动。很可能，他被判处死刑与他的这些罪行直接相关。埃赫与叶若夫并肩地参与镇压的事实，迫使每一个研究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联系是否存在阴谋？虽然我们依然没有做出最终结论的证明。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谈及埃赫的段落结尾部分写着：“现已无可争辩

① 详见第四章。

② Об аресте Эйхе, следствии и суде более подробно говорится в главе 4.

地查明，埃赫案件是伪造的，他现在已得到昭雪。”^①

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发表讲话的日期是1956年2月25日，而根据现有的文献，直到这年的3月才有了为埃赫恢复名誉的决议。但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埃赫花费的笔墨比对其他任何被镇压的党的领导人都多，但是并没有单独和专门地为他撰写平反报告。他与其他35名被镇压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起被列入恢复名誉的名单中。这个文件中只有一个简短的名单，没有任何涉及某个人员的详细情况。^②

大篇幅引用埃赫1939年10月27日致斯大林的信件，成为“秘密报告”有关埃赫内容最多和独立于其他部分的一节。毫无疑问，这是赫鲁晓夫整个讲话中最具感染力的部分之一：埃赫执着地坚持自己无罪，并详细地描述了强迫他交代莫须有的犯罪供词时他所承受的肉体摧残。

这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无比纯洁的共产党人因对其捏造的指控而走向死亡。这样的声明确实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但由于在2002年公布了这一信件的全文，现在可以很容易证实：由于进行了大量删节，埃赫的信已经被严重歪曲。

波斯佩洛夫报告中关于1939年10月27日“埃赫致斯大林的信”的片断与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做的“秘密报告”所引用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

两个报告都对“大概”是全文的信件进行了相当多的删除。使用“大概”一词，是因为出版者的一个说明——他们引用的信件本身是复印的。

这份复印的信件没有任何档案文件的特点，只是在信件末尾处有一个附言：埃赫致斯大林的声明原件“在埃赫侦查案档案中”。但没有指明该档案的编号和存档处。可以这样理解：俄罗斯当局不愿意让研究人员知道有关“埃赫案”的材料存放在哪里，当然，如果这些档案尚未被销毁的话……

甚至连官方出版“秘密报告”的编撰者也不被允许阅读这个信件和

^①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42.

^②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2. Февраль 1956 — начало 80-х. — М.: МФД, 2003, с.16-18. Реабилитирующая резолюц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см.: там же. С.18-19.

“埃赫侦查案档案”！^①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对“没有被收入”波斯佩洛夫报告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信件片断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这样做的某些理由。^② 信件全文附在本章的文献资料中。不同的标志符号让人们一目了然，哪些部分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被引用，哪些部分在波斯佩洛夫报告中被引用，哪些在两个报告中都被引用。当然，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两个报告中被删除的信件段落。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信件的内容，就足以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将埃赫的声明彻底公开，那要想取得“秘密报告”所期望的目标，将只能是水中捞月了。请看这是为什么。

(1) 埃赫引用了他写给“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的信；自然，该信应该写于1938年4月29日埃赫被捕之后，但不会早于同年11月25日，即贝利亚取代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之日。

(2) 如之后声明中所说的那样，“科布洛夫安全委员”怀疑埃赫的所有供词都可能是杜撰的，因而他竭力想弄清楚，埃赫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供词是怎样出现的。这里我们要提请注意：波格丹·科布洛夫是“贝利亚案件”的被告之一，也是在合法外衣之下于1953年12月被处决的六个人（杰卡诺佐夫、戈格利泽、科布洛夫、梅尔库洛夫、梅什克、弗洛基米尔斯基）之一。删除的句子正面评价了科布洛夫，也正面评价了贝利亚，称他们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很有责任感。赫鲁晓夫是绝对不能允许这种评价的。

(3) 从信件可以得出结论，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揭发埃赫是阴谋的参与者。埃赫为自己辩护时将这些指控视为“挑衅”，并竭尽所能地为自己进行辩解。这反而或多或少地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逮捕埃赫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可能的确参与了犯罪活动的阴谋者的供词中。结论是自然而然的：若想确定埃赫究竟犯了什么罪，必须对埃赫案的侦查材料进行析微察异的研究，但赫鲁晓夫不允许进行此类复查，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许多欺世之言浮出水面。

(4) 埃赫将全部责任归罪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个侦查员——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说他们残酷地拷打了他。我们也知道迫害埃赫的这两个

① «Письмо Р.И.Эйхе И.В.Сталину», см.: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С 225-229.

② 自然，以下提出的意见，并非要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文件进行全面研究。

人的某些情况：他们都是在叶若夫的指挥棒下行动的，最终他们也都因为制造假证词和对受侦讯人进行折磨而被逮捕、审判和处决。

(5) 正是在贝利亚时期，开始对许多参与刑讯和制造冤假错案的许多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实施逮捕并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侦查，赫鲁晓夫因积极参与镇压而为自己留下的污点，比任何其他人都多。正是他在1953年对贝利亚的镇压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之后，他不放过任何诬陷贝利亚的机会。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把埃赫陷入绝境归罪于贝利亚，说是他滥用职权所致，虽然这与贝利亚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也不会全部公开埃赫的信，这与他的利益相左。

(6) 除此之外，从埃赫的信可以得出结论，随着叶若夫被免除职务，进行侦讯的方式开始走上法律的轨道。比如，被侦讯人埃赫得到了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书面呼吁的权利。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部领导波·扎·科布洛夫则有可能听取埃赫的意见和努力搞清其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最后，两次允许他将声明写给斯大林本人，而且，这里要说的是，两封信都到已送达收件人手中。

以上所说可以间接地证实，正是贝利亚，当然是与斯大林一起，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与埃赫案类似的案例进行详尽的侦查，搞清楚究竟谁正确，谁有罪。不管怎么说，如若宣读埃赫的全文，那么听取赫鲁晓夫报告的代表们应该都会这样认为。但报告人本人的目标则与此南辕北辙——他要斯大林和贝利亚描绘成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是他们在鼓励肆无忌惮的专横行为。

(7) 埃赫暗示，阴谋本身确实存在。为证实自己的说法，他列举了一系列中央委员的名字，说他们或是自己参与了阴谋，或是在自己的供词中诬蔑他是阴谋者之一。值得提及的是，赫鲁晓夫报告的基本方针是让所有人相信下述意见，即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类似的阴谋。

(8) 埃赫宣称，叶夫多基莫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指控他参与了叶若夫的阴谋活动。可埃赫认为，恰恰是叶若夫和侦查员乌沙科夫应对为得到假口供而对他严刑逼供承担责任。虽然埃赫本人坚决否认他与叶若夫之间存在着某些秘密联系，但弗里诺夫斯基却做了完全相反的证明。

埃赫称叶若夫是应该“被逮捕和被揭露的反革命分子”，这自然涉及前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阴谋活动问题。关于证明存在这一阴谋的材料，直到2006年弗里诺夫斯基的声明和审讯叶若夫的一次记录公布后，才为人所知。没有理由怀疑，叶若夫的侦查人员确实从埃赫口中逼出了供词，因为，无论是叶若夫，还是弗里诺夫斯基，都承认在对被侦讯人的审讯中使用了“体罚”措施。但这一事实本身未必可以证明埃赫无罪。如弗里诺夫斯基所指出的，他本人和叶若夫制造了其同谋们的假案并处决他们，是为了不在贝利亚搞的审讯中暴露自己的罪恶活动。

公布埃赫信件的全文（更不要说公开其案件的其他材料）可能会与赫鲁晓夫的意图相左。重新提出叶若夫组织阴谋的案件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将一切过错归咎于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基本宗旨背道而驰。

查阅信件将会使许多高级党的活动家的名字浮出水面，在搞清供词对错之前，应对他们的侦查案进行很好的研究。

比如，埃赫提到的人中有叶夫多基莫夫，即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都认为是其阴谋中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个同伙。但奇怪的是，在1956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中，叶夫多基莫夫的名字竟然与埃赫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平反名单”中！

又如“平反名单”点到的其他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还有瓦·伊·梅日劳克、斯·维·柯秀尔、爱·卡·普拉姆奈克、尼·伊·帕霍莫夫，后两个人都曾对埃赫提出了不实指控。

埃赫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对指控的反驳，与其承认犯罪的供词相比，可信度并没显得更高。但在赫鲁晓夫和波斯佩洛夫的报告中，都只精心选择了埃赫信中有关自己无罪的段落。

如果将未被删节的信件文本与关于埃赫在大规模镇压中所起作用的其他情况一起研究，我们将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波斯佩洛夫和赫鲁晓夫都在竭尽全力隐瞒埃赫犯罪的证据，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两个报告人都想方设法地阻止任何想认真研究“埃赫案”及其在叶若夫阴谋中担当何种角色的努力。

埃赫提到了斯大林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都有权了解政治局的特别卷宗”的讲话。可能，远不是所有的1956年的中央委员都知道何谓“特别卷宗”。所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吗？

赫鲁晓夫不可能拒绝中央委员，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想研究某个人的侦查档案材料的要求是合法的。可以有把握地说，对接触“特别卷宗”的限制非常严格，因为，甚至像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样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能查阅刑事案的资料。很有可能，正是赫鲁晓夫本人做出了这样的禁止规定。否则很难理解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分子筹划的弥天大谎能不被发觉——正是他们于1957年提出了对“反党集团”的不实指控。

总之，如若对埃赫的信件加以字斟句酌的研究，这很可能成为最具杀伤力的揭穿赫鲁晓夫鬼蜮伎俩的突破口。该信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斯大林和贝利亚辩护并证实存在着大规模的，至少，不仅仅是由某些中央委员参与的阴谋活动。只有在赫鲁晓夫确信，除他和他的支持者之外谁也无法接触到“埃赫案”的资料时，他才敢下决心断章取义地引用这一信件的有关部分。

对平反报告和其他平反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此前几章中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进行的研究做出重要结论。

(1) 相当大一部分对被镇压人员的指控材料，在平反报告中并未得到重视。

(2) 对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提及的中央委员犯罪的任何事实，都没有做过克尽职的认真研究。而与此同时，却将文献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矛盾之处，奉为否定其他证据的不二之选。

不查阅侦查档案，就无法查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但对于我们研究的目的，这倒不是十分迫切的，因为现有的材料已经足以证实我们想要说明的问题。

第一，平反报告并不能确定被平反的人无罪。

第二，这类平反报告并不担负查明真相的任务。它们的作用只是为之后宣布某某人无罪提供“文件保障”而已。

现在，我们已有可能了解，赫鲁晓夫利用了什么材料，波斯佩洛夫掌握了什么材料；还可以知道，他们为鲁坚科提供了什么材料。不管怎么说，分析我们所得到的材料，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向鲁坚科下达了指示，要他搞一个类似“辩护”的文件——多多少少与真实情况近似的平反报告，以便他们利用这个文件来宣布所有被镇压的人员无罪。

在将我们所知道的对被判刑人员的各种指控进行比较时，更应该重视的不是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和鲁祖塔克这类人员的“平反报告”，而是对所有现有的证据进行科学分析。由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有许多欺世之言。我相信，这一结论已是据而有证，无可辩驳。

文献资料

罗·因·埃赫致约·维·斯大林的信^①

1939年10月27日

绝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维·斯大林

今年10月25日对我宣布，对我的案件已经结束侦查并提供了阅看侦查材料的机会。如果我犯了对我提出指控的犯罪活动中的一条，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我也不敢以临死前的声明向您求助。但我没有进行任何对我指控的犯罪活动，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没有丝毫卑鄙行为的影子。在一生中我不曾对您讲过半句假话，现在，在双脚已进入坟墓之时，我也不会对您撒谎。我的整个案子是挑拨、诬陷和违背起码的革命法制原则的样板。对我进行的某种卑鄙的挑拨，我早在1937年9月或10月就已经知道。在与新西伯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交换过来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对被告的审讯记录（审讯希尔绍夫或奥尔洛夫的记录）中，记录着以下明显的挑拨性问题：“您是否听说过埃赫与阴谋组织有关系？”被审问者回答：“招募者对我说，我还是组织中的年轻成员，关于这一问题和组织的情况以后我会清楚的。”

我认为，卑鄙的挑拨是如此的愚蠢和荒谬，甚至都用不着我向联共（布）中央和您报告。如果我真是敌人，我会利用这一愚蠢的挑拨为自己设计一个不错的伪装。这种挑拨对我案件的影响，是在我被捕之后很久才知道的。这一情况，我已向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写明。

^① 粗体字是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斯佩洛夫报告或两个报告中都引用的段落；一般字体则表示无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还是波斯佩洛夫报告均删除的段落。

陷害的第二个来源是新西伯利亚监狱，那里关押着没有实行隔离措施的被揭发出来的敌人，他们是根据我的批准而被捕的，他们凶狠地拟订计划，公开相互勾结：“应当把关我们的人关进监狱。”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局长戈尔巴奇的说法，这是万扬说的话，我在交通人民委员部为逮捕他进行了积极的工作。现有的在对我的侦查中揭发我的供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包含着对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诬蔑，因为许多不是根据我提议也没有我参与而通过的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正确决议，也被描绘成是根据我的提议而进行的反革命破坏行动。普林采夫、利亚先科、涅柳宾、列维茨和其他人的供词，都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而侦查人员完全可以在当地以文件和事实确定这是挑衅性的诬蔑。

这一点从有关我似乎在集体农庄的建设中进行了破坏活动的供词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供词说我在边疆区会议和联共（布）边疆区委全会上宣传建立大农庄。所有我的这些发言都有速记记录并已发表，但在指控中却没有列举一件具体事实，也没有一句引证的话。事实上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对此予以证明，因为在西伯利亚工作期间，我坚决和毫不走样地贯彻了党的路线。西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庄是稳固的，与苏联其他粮食产区相比是最好的。

您和联共（布）中央清楚，瑟尔佐夫和他留在西伯利亚的干部是反对我的，他们在1930年组织了一个团伙，联共（布）中央粉碎了这个团伙，谴责他们搞无原则的宗派主义。但现在却指控我支持了这一团伙，并在瑟尔佐夫离开西伯利亚后领导这一团伙。特别令人惊讶的材料是，说我在西伯利亚成立了一个拉脱维亚民族主义组织。指控我的主要原告之一不是拉脱维亚人，而是立陶宛人图尔洛（据我所知，他既不会读，也不会说拉脱维亚语）。他是1935年到西伯利亚工作的，但他提交的供词称，自1924年开始，反革命民族主义组织就已经存在（这对看清楚在我的案件侦查中使用了何种诡计非常重要），但图尔洛甚至没有指出，他从谁那里听说自1924年就存在一个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反革命组织的。根据记录，他，立陶宛人图尔洛，加入了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反革命组织，其目的是要使这一地区脱离苏联，并入拉脱维亚。图尔洛、特列泽的供词称，西伯利亚地区出版的拉脱维亚语的报纸赞扬资产阶级的拉脱维亚，没有任何引证，也没有指

出是哪一期报纸。我还要单独谈谈关于指控我与德国领事有联系和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

关于参加领事宴会和似乎在腐蚀积极分子的供词是被告瓦加诺夫提供的，他是1932年或1933年到西伯利亚工作的，却说我自1923年起就是宴会狂、搞堕落等（这同样是受图尔洛证词挑拨的结果），可是他并没指出，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情况的。真实情况是，当时我是边疆区执委会主席，而西伯利亚又没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我一年参加两次领事的招待会（魏玛宪法节和拉帕洛条约签署纪念日），我是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这样做的。我从未举行过答谢宴会，为此甚至说我的行为不正确和不礼貌。

我从来没有与领事一同打猎，也不容许腐蚀积极分子。在我家生活的保姆、边疆区执委会经济部工作人员、与我同行的司机，都可以证实我的话。这些指责的荒诞显而易见还因为，如果我是德国的间谍，那么德国情报机关为了保护我，应绝对不会对我与领事的密切关系大事声张，但我从来不是反革命，也不是间谍。每一个间谍都千方百计地想得到最机密的决议文件和指示。您不止一次在我在场时对中央委员们说，每一个中央委员都有权阅看政治局特别卷宗，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特别卷宗，波斯克列贝舍夫可以证实这一点。

前西伯利亚军区司令盖利特在自己的供词中确认了对我从事间谍活动的诬陷，我不得不向您描绘，这样的供词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1938年5月乌沙科夫少校为我阅读了盖利特供词的片断：在一个休息日，盖利特看见我与德国领事两个人在森林中散步，于是他，即盖利特明白了，我在向德国领事转交从他那里得到的机密情报。我向乌沙科夫指出，自1935年开始我与德国领事接触时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和情报人员陪伴，于是他又强迫我承认，是我开车把他们甩了。但后来搞清楚，我根本不会开车。这才没有再打我的主意。现在，放进我侦查档案中的盖利特供词记录，已经被删除。

普拉姆奈克交代，他与我在联共（布）一月全会期间建立了反革命联系，这是无耻的谎言。在联共（布）一月全会期间，我和普拉姆奈克没有在任何时候讲过任何话。我的报告结束后，一群边疆区委书记围在讲台前要求我确定他们何时可以到农业人民委员部去解决一大堆问题。曾有以下

谈话：普拉姆奈克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农业人民委员部？我为他确定了时间，即第二天夜里12点。但他没有来。普拉姆奈克撒谎说，因为我病了。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和委员就可以清楚，自1月11日出院后，我每天都在人民委员部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诬陷的荒谬显而易见，因为像我这样一个被描绘成经验老到的阴谋者，竟然在梅日劳克被捕一个月后，仍按照梅日劳克的暗号，毫无顾忌地去联系。

尼·伊·帕霍莫夫交代，早在1937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期间，他们就与普拉姆奈克讨论了如何利用作为农业人民委员的我搞反革命组织问题。关于拟提议我担任农业人民委员这一职务，我是在1937年十月全会结束时从您那里得知的，而我记得，就是在十月全会后也不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知道这一提议。怎么能够相信帕霍莫夫和普拉姆奈克交代中明显的诬陷呢？

叶夫多基莫夫说，关于我参与阴谋活动，他在1938年8月就已经知道，叶若夫对他说，他正在采取措施保全我的性命。

1938年6月，乌沙科夫对我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以便让我承认企图谋杀叶若夫。尼古拉耶夫为我拟就了这样的供词，而且，这显然经过叶若夫的同意。如果叶夫多基莫夫所言有一句实话，叶若夫可能这样做吗？

我与叶夫多基莫夫曾一同去过叶若夫的别墅，但叶若夫从来没有把我当作朋友和可以依靠的力量，也没有拥抱过我。对此，马林科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均可以证明，他们也曾在里面。

弗里诺夫斯基的供词，对我的案件开拓了又一个诽谤源。他交代，似乎1937年4月他从叶若夫那里得知我参与了阴谋活动，米罗诺夫（内务人民委员部新西伯利亚市领导）曾在信中征求叶若夫的意见，说他，米罗诺夫，在进行阴谋活动方面“可以与埃赫——阴谋组织的参与者联系”。米罗诺夫1937年3月末来到西伯利亚，在尚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事先得到叶若夫的批准，即该对谁下手陷害。任何一个人都会明白，弗里诺夫斯基所交代的，不是掩护我，而是对我组织诬陷。以上我曾强调了图尔洛和瓦加诺夫开始提交供词的时间，尽管说的都是不实之言。当时主管我案件的乌沙科夫可以证明，从我那里得到的假供词后来都被从西伯利亚转来的供词夯实，而我的交代，事先已通过电话转达到新西伯利亚市。

这种厚颜无耻的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普罗科菲耶夫中尉当着我

的面要了新西伯利亚市的电话。现在我将转入讲述自己生命中最耻辱的一页，这也是我对党，对您，犯下的真正的严重罪行。那就是我关于自己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供词。科布洛夫委员对我说过，不能什么都瞎说。的确，我再也不会杜撰什么了。情况是这样的：经受不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对我进行的严刑拷打，特别是前者，他巧妙地利用了我骨折后愈合差的情况折磨我，使我疼痛难忍，迫使我对自己和他人进行诬陷。

我的多数供词是乌沙科夫提示或口授的，其余的，我记得，是重抄西伯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中所列举的事实都算在自己头上。而如果由乌沙科夫创造和由我签署的神话出现某种漏洞，会强迫我签署另一个版本的交代材料。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处理的，开始把他写进了某个中心，后来，甚至没有对我讲任何话便勾掉了。对中心主席也同样，中心似乎是布哈林于1935年建立的。开始我写进了自己，但后来又建议写入瓦·伊·梅日劳克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情况。

我要特别谈谈关于1918年拉脱维亚人民委员会背叛的离奇神话。这一神话完全是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编造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脱离俄罗斯的倾向，而我和与我同龄的整个一代工人，我们都是受合法的或地下出版物——革命的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材料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对于建立单独的苏维埃国家政体，即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问题，我和许多人感到非常奇怪，以至于在里加举行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提出反对的意见，而且我并不孤立。只是当宣布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时，建立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才获得通过。

我在苏维埃的拉脱维亚仅工作了两个星期。1918年1月底，我就赴乌克兰从事粮食工作，直到拉脱维亚苏维埃政权被拔旗易帜。里加陷落的原因主要是它几乎被白匪军包围。白军在爱沙尼亚也取得了胜利，占领了瓦尔克，白军还攻克了维尔诺（维尔纽斯的旧称——译者注）和米塔瓦（叶尔加瓦的旧称——译者注），并进军德文斯克（陶格夫匹尔斯的旧称——译者注）。因此早在1919年3月就建议从里加撤出，但苏维埃政权坚持到1919年5月15日。

我任何时候都没有与柯秀尔和梅日劳克一起参加过任何一次反革命分子的会议。在我的证词中所提及的会面，都有其他许多人在场，可以询问

他们。我的关于与叶若夫有反革命联系的供词，是我良心上最大的污点。这是在侦查员对我进行了16个小时的审讯并使我失去知觉时，在他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问题——请在两杆（笔杆和鞭杆）之间做出选择后，我提交的假供词。我认为把我转到新的监狱是要处决我，因而再次表现出我意志薄弱的大问题，提交了诬陷性供词。当时无论把什么罪加在我的头上，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哪怕尽快被处决，我已没有力量因叶若夫被捕和被揭发为反革命分子而再遭毒打，正是他害了任何时候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犯罪活动的我。

这就是关于我的案件和我的真实情况，我生活和工作的每一步都可以信赖，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从中找到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对党和对您的忠诚。

我请您并恳求您继续调查我的案件，而这不是为了对我宽大处理，而是为了将无耻奸佞的栽赃行径揭露无遗。栽赃如同蛇蝎，它使许多人无法挣脱，包括由于我的意志薄弱和犯罪性诬陷。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您和党。我知道，由于敌人无耻和卑鄙的行径我将牺牲，是他们制造了对我的诬陷。我的理想依然是为党、为您去死而在所不惜。

埃赫

声明正本存放在埃赫侦查案中。

平反名单

伊·亚·谢罗夫和罗·安·鲁坚科关于对第十七次联共（布）代表大会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部分成员案件重新审理和为他们平反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3月2日

苏共中央

在对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部分成员的判决案件审理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检察院查明，这些案件多数是由侦查机关伪造的，而被捕人员的所谓供词是通过严刑逼供和栽赃手段得到的。

在报告以上情况的同时，我们认为，委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和为以下被非法判决的人员平反是适宜的：

1.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柯秀尔，苏联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0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 罗伯特·因德里科维奇·埃赫，苏联前农业人民委员，1905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俄罗斯联邦前教育人民委员，1903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4. 叶菲姆·格奥尔吉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亚速—黑海边疆区前党委书记，191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5. 伊万·帕夫洛维奇·茹科夫，苏联前副邮电人民委员，1909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6.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巴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前州委书记，191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7.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科达茨基，列宁格勒市前苏维埃主席，191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8.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克里尼茨基，萨拉托夫边疆区前党委书记，1915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9.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列别德，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前副主席，1909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0. 谢苗·谢苗诺维奇·洛博夫，俄罗斯联邦前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13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1. 伊西多尔·叶夫斯季格涅耶维奇·柳比莫夫，苏联前轻工业人民委员，1902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2.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梅日劳克，苏联人民委员会前副主席，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3. 伊万·彼得罗维奇·鲁缅采夫，斯摩棱斯克州前州委书记，1905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4. 莫伊谢伊·利沃维奇·鲁希莫维奇，俄罗斯联邦前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13年入党的苏共中央委员；

15. 库兹马·瓦西里耶维奇·伦金，车里雅宾斯克州前州委书记，1915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6. 丹尼尔·叶戈罗维奇·苏利莫夫，前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05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7.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丘多夫，列宁格勒州前州委书记，1915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8.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博尔达耶夫，库尔斯克州前州委书记，191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19. 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格利亚金斯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前执委会主席，1912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0. 伊万·格列博维奇·叶廖明，苏联前轻工业副人民委员，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1. 彼得·伊万诺维奇·斯特鲁别，列宁格勒州前苏维埃主席，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2.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委员会前书记，1900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3.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远东特别红旗军前司令，1916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4. 雅科夫·鲍里索维奇·贝金，巴什基尔州前州委书记，1912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5. 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谢苗诺夫，斯大林格勒州前州委书记，190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6.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卡雷金娜，沃罗涅日市前市委书记，1915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7. 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戈洛杰德，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前主席，191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8.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前书记，1906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29. 叶甫盖尼·伊里奇·韦格尔，奥德萨州前州委书记，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0.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普图哈，远东边疆区党委前第二书记，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1. 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苏联前副国防人民委员，191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2.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菲拉托夫，莫斯科州执委会前主席，1912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3.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科马罗夫，俄罗斯联邦前公用事业人民委员，1909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4. 格里戈里·伊萨克维奇·布罗伊多，医学出版社前主任，191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5. 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库比亚克，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公用事业最高委员会前主席，189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36. 爱德华·卡尔洛维奇·普拉姆奈克，顿涅茨克州前州委书记，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关于指控十七大选出的其他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案件，也将进行审核并报告苏共中央。

请决定。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罗夫

苏联总检察长 鲁坚科

很快，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平反决议：

1956年3月6日

关于为被非法判决的党的十七大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进行平反的决议（№ 3.П.54）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同志和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关于对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以下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非法判决案件重新审理和进行身后平反的提议：斯·维·柯秀尔、罗·因·埃赫、安·谢·布勃诺夫、叶·格·叶夫多基莫夫、伊·帕·茹科夫、伊·德

·卡巴科夫、伊·费·科达茨基、亚·伊·克里尼茨基、德·扎·列别德、谢·谢·洛博夫、伊·叶·柳比莫夫、瓦·伊·梅日劳克、伊·彼·鲁缅采夫、莫·利·鲁希莫维奇、库·瓦·伦金、丹·叶·苏利莫夫、米·谢·丘多夫、鲍·彼·舍博尔达耶夫、费·帕·格利亚金斯基、伊·格·叶廖明、彼·伊·斯特鲁别、约·斯·温施利希特、瓦·康·布柳赫尔、雅·鲍·贝金、鲍·亚·谢苗诺夫、安·斯·卡雷金娜、尼·马·戈洛杰德、尼·尼·波波夫、叶·伊·韦格尔、弗·瓦·普图哈、亚·伊·叶戈罗夫、尼·阿·菲拉托夫、尼·帕·科马罗夫、尼·阿·库比亚克、爱·卡·普拉姆奈克。^①

^① 原文这一名单中缺格·伊·布罗伊多的名字，或许是遗漏。——译者注。

第十二章 赫鲁晓夫的“揭发”暗藏玄机

几十年以来都认为：赫鲁晓夫敢于发表无情批判斯大林的讲话，遵循的正是“秘密报告”所阐明的理由。但现在已经澄清的事实却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所有指责或“揭露”都是谎言。因而，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赫鲁晓夫散布如此明显谎言的原因何在？

赫鲁晓夫为什么发表批判斯大林的讲话

赫鲁晓夫为什么会发表激烈的批判斯大林的讲话呢？从赫鲁晓夫口中说出的理由虽冠冕堂皇，却难以让人信服，它们如同赫鲁晓夫的“揭发”一样雌黄黑白，对此，报告人当然是心知肚明，或根本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有些形势推动赫鲁晓夫这样做，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恰恰闭口不谈这些情势。形象地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秘密报告”外，还有第二个，即真正的秘密报告，而这一报告无人演讲，也无人知晓。对此问题做一概述是想请读者明白，概述的目的不是寻求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以下将会讨论一些显而易见的（或不太明显的）设定，以及未来的历史研究课题。

第一个设定很清楚：赫鲁晓夫极力想抢在自己于1930年代大镇压中的作用被揭发之前发起“平反”运动，并将所有罪责转嫁到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在莫斯科和乌克兰——赫鲁晓夫曾在那里享有“恐怖设计师”的声誉，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他当之无愧的，可只要提出对斯大林的指控，

再加上为被无辜处决的牺牲人员恢复名誉，更重要的是为这些人活下来的家庭成员恢复名誉，就可以缓和这里居民的不满情绪。

不久前，大家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是百分之百的实话。但作者进行的调查表明，这样的看法并不正确。这一结论会不由自主地引发许多问题。比如，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做“秘密报告”？为什么他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假造、销毁和隐匿文件，并利用如此众多的政治牺牲品，难道仅仅是为了做一次假话连篇的报告吗？

答案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赫鲁晓夫和他的支持者是要对苏联的政治方针，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对斯大林时期的方针，做出根本的改变。这里应该回顾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赫鲁晓夫时代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样的解释有真理的成分。类似观点出现的原因源于苏联的现实。制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与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在斯大林刚一逝世即开始了。实际上，在赫鲁晓夫夺取国家统治权力很久以前，即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所谓“斯大林晚年”时期，许多上述倾向的苗头已经出现。

很难说，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对这样的政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政治方面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低。比如，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952年）和第十九次苏共代表大会决议（1952年）中，给人的感觉是，有时候他想指出另外一条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许多年之后，米高扬对斯大林晚年观点的评价是“左得不可思议”。^① 斯大林去世后，“集体领导”得出一致意见：不再提这本书以及斯大林的计划，逐渐地减少党管理国家的职能。

第二个设定是，赫鲁晓夫以批判斯大林为武器，与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特别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进行斗争。采取这样的路线与已知的风险有关：赫鲁晓夫无法预知，他的反对派是否会对他进行指控和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也许正是这里隐藏着下述问题的答案，即为什么他找到了诸如像波斯佩洛夫那样无原则的人作为自己的支柱，而他们在

^① А.И.Микоян. *Так было*. — М.: Вагриус, 1999, гл. 46, с.559.

“销毁”能够揭露赫鲁晓夫在组织大规模镇压中所起作用的档案文件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也许，赫鲁晓夫自己很清楚，除掉贝利亚之后，他将成为唯一的拥有自己“政纲”和贯彻自己政治意志权力的人。

回顾过去，可以看到，在那些年，其他主席团成员是何等消极。看来，他们总是依靠斯大林，把做出最重要决议的主动权让给他。也不能排除，这种消极只是表面现象，其中隐藏着苏联领导人内部的政治思想斗争。

历史学家尤里·茹科夫提出了第三种设定。根据他的意见，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结束与斯大林及其中央主席团（1952年前是政治局）亲密战友，特别是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民主改革，后者曾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定时期内进行了民主改革。变革的实质是取消党不应该承担的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的职能，并将它们转交给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对国家管理的“变革”或“重组”计划在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即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无法遏制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复辟运动不同。

茹科夫详细描述了以力图使党摆脱国家权力职能的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为一方，与坚决反对改革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之间针锋相对的一些情况。

1953年5月，即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执行权力最高机构——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决议案，取消了对党的高层领导人员的额外货币补贴，即取消了所谓“钱袋”制度。这使他们的实际工资收入与国家机关同级别职员相比，下降了大约两级。茹科夫指出，正是马林科夫赞成有必要通过这样的决议案。就其精神而言，决议符合党脱离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管理，并将权力转交给政府机关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贝利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是支持改革的人之一，实施违法的惩罚措施之前不久，该决议案获得了法律效力。

1953年6月末，贝利亚突然被捕，被关进牢房，或根据另一说法，贝利亚被厚颜无耻地就地处决。在当年8月，赫鲁晓夫得以为党的高层官员恢复了“钱袋”制度——只是不知道他是如何运作的，增加了奖金幅度，并补发了停发三个月的“钱袋”。而又过了三个星期，举行了中央全会，几乎是在全会工作的最后时刻，恢复了第一书记职务（即相当于1934年之前的

总书记——译者注），这一职务，当然非赫鲁晓夫莫属。这里不能不看到，党的官僚犒赏了“自己人”……

茹科夫总结说：“我坚定不移地深信，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真正目的在于让党的机构重掌大权。但为隐瞒这一目的……不得不转移对当前事件的注意力，于是，借助于‘秘密报告’，将注意力集中到过去。”^①

没有争议的是：真理的成分既包含在试图对所发生的一切以“权力斗争”进行解释，也包含在“中国（反修的）说法”之中。但看来，只有茹科夫的猜想涵盖了研究中所有已知的事实，同时既与“秘密报告”本身的内容，也与本书作者提供的关于赫鲁晓夫的所有“揭露”均系谎言的证据一致。

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捍卫了苏联民主化的计划，其关键内容之一是，对一个职位推举的候选人应不少于两人，并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记名的选举。这一计划规定了苏联权力的分配应该是由内行和通过差额选举的国家管理人员替代诸如赫鲁晓夫那样的党的领导人。但党也会成为赢家：从不属于自己的职能中解放出来，党就可以为恢复其自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忠诚战士的政治组织，而不是野心家和贪财者的组织奠定基础。赫鲁晓夫得到了第一书记们的支持，他们从内心深处抵制任何此类变革，他们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特权。

当代观察家认为，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严重背离了此前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实际上，政策的改变在斯大林去世后，即当未来的中央第一书记在主席团占据了最有影响的位置后，立即开始了（当然，政策的改变完全是另类的，但在某些方面与后来赫鲁晓夫倡议和支持的东西一致）。^② 通常被认为是与斯大林长期以来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改革”包括以下几点。

① Ю.Н.Жуков Крутой поворот... назад. См.: *XX съезд.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 40-летию XX съезда КПСС, 22 февраля 1996 г.*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на которое отреагировал сам Горбачёв, высказав резкое несогласие с докладчиком. См.: http://www.gorby.ru/rubrs.asp?rubr_id=554&art_id=24755.

②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ледуе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т.н.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началась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жизни Сталина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в области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Эта идея развита в последних работах Вадима Кожина, см.: В.В.Кожин. *Россия. Век XX (1939-1964). (Опыт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Алгоритм, 1999, глава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оттепели», с.309-344.

(1) 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轨。

(2) 将经济的重点从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生产转向日用品生产。

(3) 背离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观念，在国际事务中转向不惜代价地执行避免与帝国主义大国直接武装对抗的政策。

(4) 放弃承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先锋队的角色，以加强与其他阶级的联盟。

(5) 推行通过“和平共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通过议会道路而不是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等新观念。

(6) 否定斯大林有关经过社会主义较高阶段走向共产主义的原理。

没有苏联社会和苏共党内^①的根本改变，赫鲁晓夫永远不可能执掌大权，也不可能策划和准备“秘密报告”，并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宣读这一“秘密报告”，更不可能得到认可和取得成功。

赫鲁晓夫——阴谋参与者

茹科夫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强调：似乎正是罗伯特·埃赫领导的第一书记们开启了1937~1938年的大规模镇压。^②赫鲁晓夫也是第一书记，积极参与了大规模镇压行动，包括处决了成千上万的人。

大部分坐在被告席上的书记被处决了。一些人，比如卡巴科夫被判参与了阴谋活动；另一些人，比如波斯特舍夫，被指控对党员进行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镇压（至少初期是这样）。应当认为，埃赫也参与了这一集团。其结果是书记中的许多人作为自己阴谋活动的领导人被送上了法庭。而赫鲁晓夫不仅奇迹般地逃脱了因1937~1938年的镇压被指控，而且在党内仕途顺利，步步高升。是否会是这样：赫鲁晓夫也参与了阴谋，但作为最高

^① 1952年之前党的名称为联共(布)。

^② Краткий пересказ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гипотезы Жукова вместе с цитатами из его книг и статей изложены мной в работе «Сталин и борьба з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 G.Furr, “Stalin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Reform”, в: *Cultural Logic*, 2005, см.: <http://clogic.eserver.org/2005/2005.html>.

层的同谋者之一而未能被揭发出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提供这一假设的证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恰恰是这一假设能够最好地解释现有的所有证据，并合乎逻辑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常被说成是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前奏。的确，1938年“布哈林案”中的某些被告在二十大过后很快恢复了名誉。所以，布哈林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是合情合理的。但结果却不一样。多年之后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称，不管他多么想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但由于某些外国共产党的反对，这样的想法注定无法实现。正如米高扬所指出的，为布哈林平反的文件已经备妥并签了字，但在最后时刻，赫鲁晓夫变卦了。^①

为什么在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的所有被告中，赫鲁晓夫特别坚持为布哈林平反呢？看来，这一切可以解释为，与其他人相比，赫鲁晓夫对布哈林有着毫不动摇的忠诚。可能，这里所说的只是忠于布哈林主义的思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

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特别是1988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为布哈林正式平反后，布哈林的“无罪”已成为不言而喻之事。但正如笔者与俄罗斯同行共同撰写的文章所证明的那样，做出这样的结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② 虽然现有的证据仅仅是苏联当局1930年代掌握的材料的一小部分，但已经令人信服地证实，布哈林是大规模反政府阴谋的参与者。

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意味着，布哈林在1938年诉讼中提交的供词是真实的。但如已经知道的那样，他当时并没有说出全部实情。如约翰·格蒂所指出的，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捕和提交供词之前，布哈林坚决拒绝承认某些东西。看来，后来布哈林知道了元帅的坦白材料，直到这时，他的名字才出现在布哈林的供词中。

有证据证明，布哈林也知道其他阴谋者的名字，但关于其中某些人的名字，无论在审讯中，还是在法庭上，他都没有吐露只言片语。根据弗里诺夫斯基的说法，在其他阴谋者中有叶若夫。^③ 考虑到我们掌握的关于叶若

① Н.С.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4 книгах. Книга 2. Часть III.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с.192. А.И.Микоян. *Так было.* Гл. 49 «Хрущёв у власти», с.611.

② См.: Г.Ферр, В.Бобров. «Первые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е показания Н.И.Бухарина на Лубянке» // *Клио.* 2007, № 1.

③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1939 — март 1946.* — М.: МФД, 2006, с.47.

夫的材料，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真实。在布哈林知道的人中，有没有赫鲁晓夫？如果有，那么后者肯定属于阴谋活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因而会绝对保密。

从今天知道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是大规模镇压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甚至有可能是除叶若夫及其帮凶埃赫外，最重要的大规模镇压活动的组织者。^①一种解释是，1937~1938年赫鲁晓夫曾在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领导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和州委，之后又领导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岗位上他领导的都是人口众多和作用特殊的地区的党和经济事务。由于阴谋正是在党内酝酿成熟的（至少关于阴谋的来源存在着这样的怀疑），所以认为它深深植根于莫斯科是非常自然的。而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反对派思潮则为它提供了养分。

弗里诺夫斯基以断然的方式强调：他和叶若夫进行的镇压活动，包括使用刑讯、制造假口供，以法律形式办理杀害成千上万无辜人的案件，目的在于，在苏联领导面前制造一种无限忠诚的假象，并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阴谋计划。弗里诺夫斯基描绘的场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事件各种可能性中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似乎，波斯特舍夫和埃赫，这两个使成千上万无辜人惨遭死亡厄运的第一书记，是根据相似的动机行动的，至少埃赫与叶若夫携手参与了镇压活动。难道其他第一书记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吗？如果具体到赫鲁晓夫，难道他就不会为了隐瞒其在1937~1938年事件中的真正作用而参与大规模的镇压，栽赃、陷害和处决无辜之人吗？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数十万被镇压者的确参与了反政府的阴谋活动，另一种则认为这些人被消灭只是因为“斯大林是偏执狂”。不过，今天已知的证据证明，恰恰是斯大林在努力遏制如赫鲁晓夫这类活动家吸血的胃口，是他们要求中央批准增加大规模处决和向“古拉格”劳改营发配人员的“名额”。可是，至今任何人头脑中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想法：赫鲁晓夫是“偏执狂”……

反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信奉苏联是“极权”制度的人常常使用

^① Ю.Жуков.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Иосифа Сталин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7, № 8, 28 февраля.

“偏执狂”这样的词语来阐述苏联过去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可惜，这样的阐述无法清楚地解释任何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合乎情理之处。这里谈不上任何“偏执狂”：因为不是斯大林，而是其他中央委员，特别是第一书记们提议搞大规模镇压的。

弗里诺夫斯基证实：虽然布哈林知道叶若夫参与了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活动，但在预审和法庭上，他拒绝提供关于叶若夫的任何供词。根据弗里诺夫斯基的说法，布哈林的沉默是对叶若夫承诺保住他生命的回报。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但需要指出，这样的解释绝不会增加对布哈林的信任，因为说到底，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是1917年10月莫斯科革命事件的参加者。

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常遭到处决，但他们不会出卖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假设，布哈林并不是为了保命而拒绝供出叶若夫？已经知道，在逮捕和审判之前，布哈林没有一项声明讲出了“全部实情”。由于他并没有“放弃斗争”，为什么他不会继续与斯大林进行斗争？布哈林奴颜婢膝地表示他忠于斯大林和“从内心深处”热爱斯大林，这读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难为情。^① 散发着此类气味儿的声明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斯大林当时对他相信的程度，未必会比我们今天更多些。

我们看到，布哈林只是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捕和承认参与阴谋活动后才开始坦白问题和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如果布哈林走上断头台（为什么并不重要）而不交代自己的同谋（叶若夫），难道不可以认为，他也把其他阴谋者的名字带进了坟墓。

关于赫鲁晓夫是不是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参与秘密活动的人，以及布哈林是否知道他，尚没有确切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1937-1938年之后，苏联一直存在着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某些阴谋者继续留在很高的位置上。^② 我们还知道，在布哈林被处决20年后，赫鲁晓夫始终保持着对布哈林的忠诚。

① 布哈林于1937年12月10日致斯大林的信很快于同一年在两个俄罗斯杂志上发表。对斯大林的热爱之词充斥着全信，写有这样的句子：“请原谅我，柯巴……” *Неизвестное письмо Н.Бухарина // Источник. 1993, № 0, с.24, вторая колонка.*

② *См., например: Grigory Tokaev, Comrade X. (London: Harvill Press, 1956).*

有一种说法，即赫鲁晓夫是隐藏很深的有组织的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阴谋集团的参与者。考虑到赫鲁晓夫在其他众所周知的阴谋活动中的作用，这样的说法更接近真实。

——1953年3月5日那一天，斯大林还没有去世，前政治局成员中的“老近卫军”提议取消半年前十月全会（1952年）上关于增加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数量的决议和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其他带有根本性变革的措施。所有决定都是在未经主席团全体成员（更不要说所有中央委员投票了）任何讨论和赞同的情况下通过的。以这样的方式将权力转移到“集体领导”手中，实际上意味着发生了一次党和国家政变。

——赫鲁晓夫是以逮捕方式除掉拉夫连季·贝利亚，可能还包括杀害他的阴谋活动的主谋。已经知道，最初并没有逮捕贝利亚的计划：从马林科夫讲话草稿得知，要做的只是解除他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同时任命他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由于赫鲁晓夫不让中央主席团成员接触平反委员会利用过的档案，我们有理由说，在为他提供必要材料的人中，存在着秘密协议，即不让任何其他人接触这些档案。

显而易见，波斯佩洛夫参与了这一勾当，他领导着根据赫鲁晓夫坚持而成立的委员会，并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撰写了他需要的报告。阴谋的另一个参加者是苏联总检察长罗·安·鲁坚科，在最重要的平反报告上有他的签字。为平反报告和波斯佩洛夫报告查找第一手材料的其他平反委员会成员、侦查人员和档案员，看来都已承诺守口如瓶，自然他们也参与了阴谋活动。

在有幸研究档案材料的人中，只知道几个人的名字，但没有关于研究人员本人的更多的材料。比如，有一个叫鲍里斯·维克托罗夫的人。根据他的说法，他是从事平反的律师小组成员。199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曾于1988年4月2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1937年6月11日被判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军事首长都是清白的。

毫无疑问，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具欺骗性的骗局之一。

维克托罗夫宣布红军中的阴谋参与者无罪，但没有用任何证据证明自

己的论点。他引用的是性质可疑的文件，而对他肯定看过的真正击中要害的证据，却缄口不言。这些证据现在已经为人所知，但在准备出版维克托罗夫的手稿时，它们还没有被公开。这样，维克托罗夫便暴露了自己是赫氏“阴谋”的参与者之一，其意图就是以“秘密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人无罪的假证据来武装赫鲁晓夫。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档案进行了细致的清理，其结果是许多文件被停止使用，或者应该说是被销毁了。^① 历史学家认同：被销毁的文件多半与赫鲁晓夫在1930年代末大镇压中的作用有关。既然如现在已经清楚的那样，“秘密报告”中的每一个论点都与真实情况不符，而平反报告和波斯佩洛夫报告对过去事件的歪曲也毫不逊色，那么，很大的可能是，还有很多文件被销毁了。

当然，也招聘了大量的档案专家及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视的人员，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巨大工程。其规模如此之大，仅靠鲁坚科和波斯佩洛夫一己之力显然远远不够。所以，相当大数量的档案专家和公职人员，包括整个忠于赫鲁晓夫的党的官员，都参与了该工作。自然，他们都知道，哪些证据是赫鲁晓夫企图隐藏或销毁的。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

1938年1月，赫鲁晓夫被免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之后，他留下的空缺职务，由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担任。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写到谢尔巴科夫时极不友好，其原因尚不明朗。不久前由阿·尼·波诺马廖夫撰写、莫斯科档案总局出版的谢尔巴科夫传记，研究了两者敌对的根源。如那里所指出的，两者的对立起源于谢尔巴科夫顶着赫鲁晓夫的压力，断然拒绝在文件上扩大“创纪录”丰

^① Жупел Сталина. Беседа журналис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абова с историком Юрием Жуковым. Часть 3.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12 ноября; Н.Петров. *Перв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ГБ Иван Серов*. — М.: Материк, 2005, с. 157-162; М.Юнге, Р.Биннер. *Как террор стал «Большим»*. Секретный приказ №00447 и технология е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 М.: АИРО-XX, 2003, с.16.

收的数字，因为该数字是重复计算种子的数据而得出的。^①

在莫斯科 1937~1938 年被开除党籍的人开始纷纷提出申诉和上告，这意味着更大的不愉快：这正是赫鲁晓夫领导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的时段，12000 件书面申诉信中，90% 的案件都以有利于申诉人的结果而解决。但波诺马廖夫没有提到这些，被开除党籍的人中很多已被处决，上诉书是由他们幸免于难的家庭成员递交的。^②

当然，赫鲁晓夫是三人镇压小组的一员，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由其副手替代他。莫斯科“三人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因进行非法镇压而被法庭判处极刑后被处决。有理由认为，对如此严重的丑闻，赫鲁晓夫也深感难辞其咎。归根结底，只有为数不多的像赫鲁晓夫这样进行过如此大规模非法镇压，包括开除党员、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遣送到劳改营和处决的第一书记；能够逃脱自己的责任，免受惩罚。

波诺马廖夫列举的证据证明，谢尔巴科夫对赫鲁晓夫也非常冷淡。他在第十八次联共（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一次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前任。让我们做一比较：格·米·波波夫在谢尔巴科夫和赫鲁晓夫时期都是第二书记，他曾对后者讲了许多赞扬的话，在谢尔巴科夫对赫鲁晓夫沉默不语的背景下，这一事实显得格外引人注目。^③

根据谢尔巴科夫家庭成员的讲述和莫斯科档案总局的文件，波诺马廖夫尽其所能地批驳了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对谢尔巴科夫提出的许多莫须有的指控。比如，他说谢尔巴科夫“有酗酒的毛病”。^④ 而根据谢尔巴科夫子女和同事们的说法，谢尔巴科夫几乎完全不沾酒。波诺马廖夫列举了谢尔巴科夫去世后赫鲁晓夫对其家庭采取的两面派措施。斯大林健在时，赫鲁晓夫对谢尔巴科夫的遗孀遗孤表示同情。可他刚一上台后，就下指示，收回了谢尔巴科夫一家的别墅，所有此前通过的有关赞扬谢尔巴科夫的决

① А.Н.Пономарёв. Александр Щербаков. Страницы биографии.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лавархива Москвы, 2004, с.49 и прим.7 на с.66.

② 波诺马廖夫对“三人小组”工作悲剧性结果进行了描述：1939年4月，莫斯科市检察院对“三人小组”的决定提出了690件抗诉，法庭研究了130件，不予研究的仅14件。同上，第66页，注9。

③ 同上，第51~52页。

④ Хрущёв.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Кн.2. Часть III, с.41.

议也都被取消。^①

不是别的什么人，恰恰是赫鲁晓夫自己具有“毒蛇般的特点”。^② 尽管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与赫鲁晓夫私人关系密切，但他也谴责赫鲁晓夫为人不诚实、对人不善良、喜欢歪曲历史事实。^③ 为什么赫鲁晓夫如此敌视谢尔巴科夫和他的家庭呢？为什么他如此公开地憎恨谢尔巴科夫本人呢？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不知为什么，对谢尔巴科夫在揭发阿·弗·斯涅戈夫中的作用只字不提。阿·弗·斯涅戈夫是1937年阴谋参与者之一。1950年代，赫鲁晓夫与斯涅戈夫关系密切，把他从监禁中解放出来并任命他在内务部担任重要职务。后来，不止一次与斯涅戈夫商讨问题。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他还引用了斯涅戈夫的信件。根据赫鲁晓夫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的说法，斯涅戈夫是赫鲁晓夫的朋友和他可信赖的人。^④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赫鲁晓夫企图掩盖自己参与大规模镇压的真实情况和性质。在斯大林时代，在这方面滥用权力成为许多党的官员和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和被判处极刑的原因。由此可以断定，在近20年中，赫鲁晓夫害怕自己作为大规模非法镇压中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的角色被揭露。他更感到害怕的是，自己参与了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集团的阴谋，而又奇迹般地没有被揭发这一事实最终会被揭露。

① Пономарёв, с.276-277.

② “毒蛇般的特点”是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对谢尔巴科夫特点的概括。В кавычках — слова-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Щербакова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Хрущёва: Хрущёв. *Цит. соч.* С.39.

③ Пономарёв (прим. 32 на с.207) цитируе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икояна «Так было». Автор этих строк проверил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приведённых цитат.

④ А.И.Аджубей. *Крушение иллюзий*. — М.: Интербук, 1991, с.162-167. Посл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Хрущёва на Снегова были наложены партийные взыскания з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троцкистских идей, см.: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2. Февраль 1956 — начало 80-х. — М.: МФД, 2003, с.521-525.

赫鲁晓夫与斯涅戈夫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关系，以至于1954年他亲自要求从劳改营释放斯涅戈夫，以后的年代又给予他支持和保护呢？可以认为，至少在斯涅戈夫被捕之前，他们已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很可能赫鲁晓夫巧用计谋，以便一切能这样办理：虽然有有罪证据，但斯涅戈夫依然免于被处决，尽管他已被列入法院判决的“第一类人员”中。考虑到二者的密切关系以及斯涅戈夫被判参与阴谋活动，而赫鲁晓夫又为“拯救”和庇护斯涅戈夫奔忙，且斯涅戈夫并不在有影响的领导人物之列，做出这样假设是有道理的：可能，斯涅戈夫也知道赫鲁晓夫的某些底细？毫无疑问，如果斯涅戈夫被处决，赫鲁晓夫不会出现任何可怕的情况，而如果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同志，那么赫鲁晓夫为斯涅戈夫所做的一切，便是有意义的了。

关于赫鲁晓夫镇压的恶劣后果，谢尔巴科夫知道的大概比任何人都多。而且，他的意见无论对于斯大林还是在政治局，都举足轻重。^① 1941年5月，谢尔巴科夫被批准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因此，在党的系统的官位等级方面，占有比赫鲁晓夫更高的位置。

谢尔巴科夫于1945年5月病逝，享年44岁。1944年12月他心脏病发作，自那时起，他在家疗养。1945年5月9日，医生准许他起床和在处于节日气氛的莫斯科散步，当时莫斯科正沉浸在庆祝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而取得反法西斯德国胜利的狂喜之中。其结果，他心脏病复发，于5月10日逝世。

为什么医生允许一个心脏病患者起床，而在当时，卧床休息是治疗这种病的基本方法。^② 为谢尔巴科夫治病的医生之一雅科夫·埃廷格尔向侦查员米·季·利哈乔夫承认，他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缩短他的生命，因为他认为，谢尔巴科夫是反犹太主义者。^③ 在国家安全部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那里受审时，开始他否认了自己的供词，之后又予以确认。这之后不久，埃廷格尔死在狱中。

所发生的一切，是所谓“医生案”的一部分，该案的资料中包含着许多明显的侦查造假特征。不排除埃廷格尔的供词是通过刑讯得到的，而他本人可能并没有犯过加快谢尔巴科夫死亡的医疗错误。但是，“医生案”被告中，1948年为安德烈·日丹诺夫治病的医生称，对日丹诺夫的治疗不正

① 作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领导了乌克兰的大镇压。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9年，即差不多12年，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灭迹和保障自己免受可能的不愉快事件的侵袭。

② Пономарёв (с.275 и прим. 20 на с.277) кратко замечает, что врачи «не возражали» против прогулки, которая стала причиной смерти Щербакова. Иначе говоря, Пономарёв затрагивает вопрос о врачебном решении, но пытается расследовать случившееся..

③ Я.Я.Этингер.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забы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М.: Весь мир, 2001, с.87. См.: http://www.sakharov-center.ru/asfcd/auth/auth_pages.xhtml?Key=10153&page=78&print=yes. Письмо Рюмина к Сталину от 2 июля 1951 года, из которого Этингер почерпнул эти сведения, в переводе на английский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Plot Against the Jewish Doctors, 1948-1953.* NY: Harper Collins, 2003, pp. 115-118. Сама книга ужасно ненадежна. Но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там документы могут быть подлинными, ибо помещены в книгу В.П.Наумовым, видным архивистом, у которог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ог быть доступ к такого рода архи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е тексты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е публиковались.

Пономарёв разбирает обвинения Щербакова в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е и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се они беспочвенны, см.: Пономарёв, с.212-213, 218-222, 227-228.

确并最终导致了他英年早逝。他们的病人不仅被允许起床，而且也可以散步；当时被叫来做心电图的女心脏病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日丹诺夫是心脏病发作。负责治疗的医生们断然拒绝诊断意见，要求心脏病专家在写书面鉴定意见时，不要提及上述结论。好一个“错误”！客观地说，医生的行为完全符合“阴谋”的定义，只是不清楚，阴谋者是否真的如后来对他们指控的那样，要杀害党的领导人，或者他们的全部过错在于建立了一个恶性连环保制度。

提请注意，这类事件有其历史渊源。在1938年布哈林-雷科夫案的审讯中，主治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承认参与了杀害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中央委员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的阴谋。亨利希·亚戈达想通过搞掉缅任斯基为自己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以便从副主席晋升到空缺的主席位置。对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的指控，已经从此前没有公开的对亚戈达庭前审讯材料和他与普列特尼奥夫、克留奇科夫和莱温的对质记录中得到证实。还有两份对叶努基泽的预审审讯速记记录。所有以上列举的文件，都证实亚戈达有罪。而莱温大夫还补充说，这与叶努基泽也有直接的联系。^①

1957年5月，拟就了对“布哈林”诉讼案被告的第一人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的平反报告。^②但证明他无罪的唯一证据是，所有在自己的供词中指控伊克拉莫夫（包括布哈林）的人，在1957年均已被宣布“恢复名誉”。^③但有意思的是，平反报告没有一句话提到，在法庭上认罪的伊克拉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очных ставок Ягоды см.: *Генрих Ягода. Нарком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ССР. Генеральный комисса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Казань, 1997, с.218-223. Первый из протоколов допросов Енукидзе (от 30 мая 1937) опубликован: там же, с.508-517. В нём следователь НКВД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более ранний протокол допроса Енукидзе (от 27 апреля 1937), который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1937-1938.* — М.: МФД, 2004, № 60, с.144-156. Последнее издани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е «фондом А.Н.Яковлева», имеет полу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поэтому ране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подлинность апрельского протокола допроса Енукидзе. О контактах Левина с Енукидзе см.: там же, с.222.

^② Вскоре (3 июня 1957) Икрамов был реабилитирован, см.: <http://www.memo.ru/memory/communarka/chapter5.htm>.

^③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Т.2. Февраль 1956 — начало 80-х. — М.: МФД, 2003, с.135.

莫夫和指控他的被侦讯人的行为是被迫的。

1957年12月，还有几个涉嫌该案的人也都以同样方式得到“平反”。除了亚戈达外，所有其他被告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都等到了“平反”的时刻，但他们的“平反”已变为纯粹的形式。在1962年历史学家的一次会议上，向波斯佩洛夫提出了一个问题：该如何对学生们评述在右派托洛茨基分子案中被判刑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无论布哈林，还是雷科夫，当然都不是间谍和恐怖分子。”^①

而实际上，布哈林在法庭上已确认自己参与准备恐怖行动，虽然他否认了亲自送情报一说，他说情报是通过阴谋活动的同谋送出的。雷科夫也否认参与间谍活动的指控，但承认有推翻政府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波斯佩洛夫仅仅公布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暗示的内容：莫斯科诉讼案是伪造的，诉讼中被告人的供词与真实情况不符。

“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宣称“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也是假造的。但当他该说是贝利亚制造时，他撒谎了。而事实上，贝利亚先于任何人发现，这一案件的某些情况非常可疑。

在任何情况下，谢尔巴科夫之死多半对赫鲁晓夫有利。赫鲁晓夫所讲的关于斯大林掌权时的大部分话，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一情况下，让人们“相信”他，确实很难说是明智之举。考虑到在1938年莫斯科诉讼案中已经查清的苏联医疗界某些人参与犯罪活动的证据，那么，断然否认在战后的某些阴谋中有医生参与的可能，至少是草率的。

① *Всесоюз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о мерах улучшени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науч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наукам. 18-21 декабря 1962 г.* — М.: Наука, 1964, с.298. Юрий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известный российский ученый-троцкист,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Поспелов сделал своё заявление, будто бы «резюмиру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секретны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оизведённых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органами ЦК КПСС». Ю.Г.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ы с Бухариным.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А.М.Лариной (Бухариной)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с приложениями.*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3, с.92. Нет никаких причин доверять этому утверждению, поскольку полная цитата из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оспелова звучит так: «Я могу заявить, ч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изучив документы XX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ни Бухарин, ни Рыков, конечно, шпионами и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не был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с трибуны именно XXII съезда были оглашены наиболее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альшивки,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зачитанное Шелепиным письмо Ионы Якира (об этом письме см. ниже). Поэтому нет причин считать, что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Поспелов говорил правду.

最后还有一个谜：尚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病危中的他没有得到一天或更长时间的任何治疗？不管所发生的事件细节如何，赫鲁晓夫是那些事件参与者之一。

现在让我们把赫鲁晓夫的个人动机放到一边，研究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和重要的课题：“秘密报告”产生的后果。

对苏联社会的影响

由于不只是个别论点，而是整个“秘密报告”从头到尾均由谎言拼凑而成，因此我们必须彻底转变以往的一些历史和政治概念。

比如，正是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奠定了“秘密报告”的基础，而该委员会所做的研究极具欺骗性。这一事实，为赫鲁晓夫时期成立的研究各种历史问题的所有委员会投下了一层阴影。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为彻底推翻根据法庭判决处以死刑或长期关押在劳改营的那些人（主要是共产党员）的案件而成立的“平反”委员会。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几乎都是：委员会为被判刑的人辩护，并宣布为他们“恢复名誉”，即原判决书中列举的每一条罪状都不成立，他们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无罪的，所有这些人被宣布为“斯大林镇压的无辜牺牲品”。

可惜，委员会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提供了可以为这些人“平反”的某些证据，而我们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正相反，即依据许多重要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平反”的人并非完全无罪。

比如，在中央六月全会上（1957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全会变成了对“斯大林分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审判，朱可夫元帅宣读了一封被严重歪曲的约恩·亚基尔的信件（这里我们提请注意，亚基尔1937年6月出庭受审，并因参加策划有德国政治界人士和苏联国内反对派集团参与的国家政变而与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起被判极刑）。朱可夫元帅是这么说的：

1937年6月29日在自己（指亚基尔——作者注）临死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请求：“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斗胆给您写信，

因为我已经说出了一切，而我觉得自己多年以来是一个诚实的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战士。我的全部自觉的生活，都是在党及其领导人视线之内的忘我和诚实的工作中度过的。我临死要说的话是：我热爱您，热爱党，热爱国家，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念。”

在这一声明中有这样的批语：“放入我的档案。斯大林”“卑鄙家伙和娼妓。斯大林”“裁定完全准确。莫洛托夫”“坏蛋、恶棍和婊子，只有一种惩罚——死刑。卡冈诺维奇”。^①

所引用的段落，是最明显的谎言之一，因为，与其说亚基尔在自己的信中生动地描绘了其以往声誉的洁白无瑕，不如说恰恰相反，是承认自己犯罪和忏悔所做的一切。以下是该信件比较完整的文本，该信已收进尼·米·什维尔尼克委员会关于“红军阴谋案”的报告中，报告在1964年赫鲁晓夫辞职前不久交给他，但直到30年后才公开（朱可夫宣读信件时删除的部分用粗体字标出）：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斗胆给您写信，因为我已经说出了一切，一切都交代清楚了，我觉得，我重新成为原来的我，多年以来一个诚实的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战士。我的全部自觉的生活，都是在党及其领导人视线之内的忘我和诚实的工作中度过的，之后陷入可怕的深渊，陷入无可救药的背叛恐惧之中……侦查合乎法律。对我提出了叛国的指控，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我已彻底悔过。我完全相信法庭和政府的判决是正确和合理的……现在，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我临死前要说的话是：我热爱您，热爱党，热爱国家，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念。”

在亚基尔的声明中，有下述批语：“放入我的档案。斯大林”“卑鄙家伙和娼妓。斯大林”“裁定完全准确。伏罗希洛夫、莫洛托

^①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8, с.39.

夫”“坏蛋、恶棍和婊子，只有一种惩罚——死刑。卡冈诺维奇”。^①

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错误外（比如亚基尔的信写于1937年6月9日，而不是29日），从朱可夫的讲话中还可以发现许多对事实的严重歪曲。首要和主要的错误，当然是没有讲亚基尔多次强调应对自己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另外，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一起在信上做批注的还有伏罗希洛夫，但朱可夫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几乎是在全会召开前夕，伏罗希洛夫突然“变卦”，不再与主张让赫鲁晓夫辞职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来往。虽然赫鲁晓夫也对伏罗希洛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对他网开一面，不再要求像惩罚其他三人那样惩罚他。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亚历山大·谢列平也宣读了亚基尔这封内容被阉割的信件。^②

1957年，“反党集团”的成员都没有对朱可夫篡改的信件进行反驳。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是卡冈诺维奇，都没有接触这类档案文献的权力，尽管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许，朱可夫元帅自己也没有考虑到，他所宣读的是篡改的文件文本。但对于赫鲁晓夫手下“了解内情的人”来说，玩弄此类骗人把戏并不是秘密，因为亚基尔的信正是他们找来的。另外，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同意，他们也不敢这么做。自然，赫鲁晓夫知道在亚基尔信件上所搞的“猫腻”。

基于同样理由，不能相信任何一个“平反”报告（根据该报告，许多被镇压的党员被宣布无罪）。对其他专门为赫鲁晓夫准备的材料，秉持存疑的态度也是正确的。

这些文件中，有苏联内务部特科-I的材料，它们是由某个“帕夫洛夫上校”签署的。在相对不久前的奥列格·赫列夫纽克的著作中，这些材料

^①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вып. 1, с.194.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также в: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1993, № 1, с.50. Это была перв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Справки Шверника», но сам журнал труднодоступен, а выход ег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го номера окружён ореолом таинственности.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но второй номер «Военных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е появился, а первы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указанный на нём 1993 год был напечатан, по-видимому, позднее.

^② *Правда*. 1961, 27 октября.

是作为“我们认识镇压规模”的主要文献资料介绍的。^① 帕夫洛夫文件中列举的证据，可以让我们对 1930 年代被逮捕和被判刑的人数有一个估计。^② 但由于这一材料是专门为赫鲁晓夫的需要而准备的，所以很难确认这些材料的可靠性。赫鲁晓夫可能愿意扩大，或者在某些具体情况下相反，希望缩小被镇压的数字？或者帕夫洛夫本人（如后来的波斯佩洛夫）也认为，数字应与这样或那样的意图相符？如果注意到为赫鲁晓夫准备的其他材料的欺骗性，我们也没有根据相信帕夫洛夫材料的准确性。

如果谈及历史科学，那么，最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对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说穿了，所依据的都是赫鲁晓夫时代出版的文献和著作。^③ 许多，甚至多数这样的著作，利用的是非移民文献资料，它们被罗伯特·康奎斯特包括在他的力作《大恐怖》中大量引用。另一个例子是：斯蒂芬·科恩^④ 撰写的著名的布哈林传中，最后一章谈及 1930 年代时的所有证据，全都是出自赫鲁晓夫时代的著作，有时干脆引用“秘密报告”中的材料，因而导致几乎作者的每一个论点都是谎言。如果没有能力对“秘密报告”中所有论点进行独立的核查，任何这类研究著作都不能具有科学的说服力。

以上所说的第一资料来源也一样：赫鲁晓夫及其战友们在其讲话和公务来往函件中，以极不诚实的方式引用了这些资料。因此，不查看文件的原件和未经删节的文本就不可能认定，赫鲁晓夫在多大程度上说了谎，以及所谓“解冻”时代那些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引用的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是无懈可击的。

政治后果

“秘密报告”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危机。与此相反的论点是：苏共

①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Yale U.P., 2004), p.287.

② Справка послужила источником для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й статьи Гетти, Риттершпорна и Земскова: Getty, Rittersporn and Zemskov, "Victims of the Soviet Penal System in the Prewar Years: A First Approach on the Basis of Archival Evidence," *AHR*. October 1993, p.1017-1049.

③ Конечно, наиболее здравомыслящие и осторожные учёные уже давно усомнилис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ценности таких работ, как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Роя Медведева (1974) или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1973).

④ Stephen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Кнопф, 1973).

二十大恰恰使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得以健康地发展；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必须勇于揭开过去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外国共产党和苏联国内一些人曾对此一无所知；必须无情地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体内的恶性肿瘤切除，如此，它才能焕然一新、精力充沛地向自己宏伟的目标迈进。

很清楚，在随后的年代里苏联不是向消灭阶级的社会靠近，而更多是在向相反的方向行进。许多人依然对以苏联为首的运动忠心耿耿，保持着纯洁的共产主义信仰。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希望并相信，一个承受了如此巨大损失的社会，而且对所犯罪行进行了如实和严厉判决的社会——正如赫鲁晓夫不止一次说到的那样，会具有足够的团结性和精神力量，能够改正错误，不管发生任何挫折，都会涉危履险、披荆斩棘地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

现在搞清楚了，赫鲁晓夫根本没有考虑“驾驶共产主义的航船”。他的“秘密报告”如此恬不知耻地嘲弄真理，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还是与其他任何高尚的动机都格格不入。任何有创造性的民主的和爱好自由的原则，都不可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

赫鲁晓夫没有努力重建因令人遗憾的错误而偏离正确方针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而是着手消灭它们。

他撕下了伪装的共产党人的面具，暴露了不可救药的饥不择食地追逐个人利益的领导人的面目——在神秘莫测的官员面具之下隐藏着虚伪的本性，并且丧失了高尚的道德理想，与资本主义国家人所共知的那类人如出一辙。如果考虑到1953年对贝利亚及其“反革命集团”的杀害，赫鲁晓夫的形象就更加丑陋，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亡命徒。实际上，正是他自己应该对其在二十大讲话中指控斯大林犯罪的活动承担责任。

赫鲁晓夫报告的欺骗性还在于它迫使人们对那些曾在1957年试图但又未能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斯大林分子”改变了看法，这些人先是被赫鲁晓夫清除出中央，后又开除了党籍。

尽管存在一系列失误，甚至罪行，已是耄耋老人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与费利克斯·丘耶夫的谈话中，仍呈现出他们是无限忠于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有意思的是，莫洛托夫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将

被苏共内部亲资本主义的势力推翻，1980年代他曾亲自积极进行重振共产党的活动。

尽管如此，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曾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使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们每个人对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政策的正确性都有自己的怀疑。他们两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赞成赫鲁晓夫的观点。而且，1930年代进行镇压的情况，他们并不全部清楚，又由于事发突然而惊慌失措，因此他们未能及时对赫鲁晓夫及其心腹对他们的诬陷进行回击。

也许，后斯大林领导人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措施是批评和部分地摒弃围绕斯大林制造的“个人崇拜”。但甚至在这里，赫鲁晓夫也不值得人们信赖。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正是他发言反对格奥尔基·马林科夫采取对个人崇拜的批评措施。马林科夫相当诚恳，他指责了斯大林亲密圈子中拥有个人主义能量的人（包括他自己），而不是指责已经去世的斯大林；他批评他们缺乏勇气和决心结束“个人崇拜”——虽然领袖最终容忍了“个人崇拜”，但斯大林从来没有鼓励过“个人崇拜”，并总是对它抱有恶感。

没有多长时间，赫鲁晓夫便制造了对他个人的比曾对斯大林有过的更大的“崇拜”。由于赫鲁晓夫过于迷恋对自己功绩的吹嘘，1956~1957年甚至受到了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支持者的激烈批评，而他狂妄自大和自我炫耀的癖好也正是1964年中央主席团罢免他所有职务时对他提出的最主要的指控。^①

“秘密报告”的欺骗性特点，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有必要对苏联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进行重新思考，并对斯大林个人进行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形象，应该是既摆脱了盲目崇拜的枷锁，也不再遭受赫鲁晓夫诽谤的。斯大林努力贯彻执行的政策方针，值得在苏联历史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中心地位。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成就和失误不仅是应该重新研究，而且更需要为此来寻找和提供相应的证据。

对托洛茨基主义也应重新研究。在赫鲁晓夫的指控中，很容易发现托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1964)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на котором Хрущёв был освобождён от всех должностей,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 1, с. 3-19.

洛茨基早期试图对斯大林妖魔化的痕迹。1956年，作为政治力量的托洛茨基主义在历史某个被遗忘的角落苟延残喘，其头目本人死于冰斧，充其量被认为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失败者。

“秘密报告”极力想使托洛茨基曾经对斯大林的丑化死灰复燃。现在，共产党人开始与反共人士同样视托洛茨基为预言家。确实是这样：难道不正是他写了某种与赫鲁晓夫的“揭露”非常相似的东西吗？很少有人阅读的托洛茨基的著作已被拂去岁月灰尘。“预言家”及其追随者的声望开始迅速上升。关于“秘密报告”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平反”奠定基础的预兆，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卡娅立即心领神会：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她就向苏共二十大主席团提出为其丈夫和儿子恢复名誉的要求。^① 在缺乏有力材料支撑的情况下，“秘密报告”需要仰仗1920~1930年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形象、苏联社会 and 政策的极端偏见的描绘。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的问题

使赫鲁晓夫一人成为众矢之的没有任何困难。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进行的破坏活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对苏联历史的蓄意歪曲，以及对斯大林捏造了大量肮脏的谎言，毫无疑问，对此值得进行认真的评价。不管赫鲁晓夫的出现和奠定了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时期基础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除他所作所为的个人责任。

赫鲁晓夫永远不可能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如果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没有得到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当然，某种程度上，赫鲁晓夫的晋升与其极为旺盛的精力和主动性有关，而这些品质在其他主席团委员身上要少得多。但他永远不可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如果斯大林或党的其他活动家识破赫鲁晓夫“右”倾分子的面目，发现他有损于忠诚的共产党人的行为。事实上，布尔什维克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观点，自革命后的初期已开始了演变。

^①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610.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些在几十年中与斯大林在一起的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基本上同意“秘密报告”中的论点，虽然并不情愿。显而易见，他们三人都不可能接触为赫鲁晓夫及其同谋准备的文件。从1950年代中期和之后时期的批评意见可以看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并没有怀疑赫鲁晓夫撒谎。何况，他们都接受了该报告的潜台词。

如果马林科夫能够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和将苏联共产党的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那将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秘密报告”；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自然，也可以说是大半个地球的历史，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可惜，许多人都这么认为：如果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党和国家首脑位置上的时间更长一些，苏联会继续存在，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第一把手。但“个人的历史作用”不会提供无数选择的机会，甚至即使是最强的政治领袖。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顺便说，如戈尔巴乔夫时期一样，经历着危机；国家命运的转折点是1953年。

赫鲁晓夫上台，发表其爆炸性和充满谎言的“秘密报告”，敞开其思想，仅仅是因为他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把全党的精英，以及与精英在一起的苏联多数居民和全世界相当大的一部分共产党人（虽然并非没有明显的损失）聚拢在自己一方。对这些事实也需要做出解释。而这一切发生的根源需要追溯到苏联历史的前一段时期，即斯大林领导国家的时期，而在他之前是列宁领导的时期，即导致伟大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胜利的形势。

赫鲁晓夫的报告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这同样需要在苏联历史中去寻找。斯大林坚定不移地确信列宁对当时俄罗斯社会条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分析意见，并努力执行列宁的政策。列宁曾想将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理解贯彻到生活中，试图从当代共产主义学说奠基人的著作中找到在俄罗斯建设社会主义中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答案。

斯大林无意搞任何理论创新，他尽最大力量遵循列宁指出的原则。当时，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许多反对派，也在从列宁同样的著作中寻找他们自己政策正确性的证据。无论赫鲁晓夫，还是他的所有追随者，直到戈尔巴乔夫，都在使用列宁语录，以便以“左翼”面目掩盖其所宣扬

的不同方向的政治思想和方针。

换句话说，在列宁和他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某种东西，它让他们诚实的追随者铸成错误，又让奸诈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加以利用，以掩盖其背叛行径。

但这已是另一项研究和可能是完成另一本新书的课题了。

附 件

“秘密报告”全文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①

1956年2月25日

同志们！在党中央委员会向二十大所做的总结报告和大会许多代表的发言中，以及在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个人崇拜及其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不少。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严格和坚持不懈地执行如下方针：阐明不能容许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地赞颂某个人，把他变成如同上帝那样具有神仙般品质的超人。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无所不能，他的行为万无一失。

对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对斯大林这样的看法，我们已形成多年。

本报告没有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进行全面评价的任务。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写了相当大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学术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对此所有人都十分了解。现在要谈的，是一个对党的现在和未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

^① Текст доклада печатается по публикации в: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128-166.

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成为一系列规模极大和非常严重的歪曲党的原则、党的民主制度和革命法制行为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个人崇拜在实践中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制原则和不受任何限制地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危害，因此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 * *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们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任何个人崇拜的表现的。马克思在写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①

稍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贯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可以例外的是那些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标的情况；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②

革命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极为谦虚是人所共知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生气勃勃和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具有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批评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革命党人关于“英雄”和“群氓”的观点，同将“英雄”和群众、人民对立起来的企图，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28页。

② Соч. К.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ьса, т.ХХVІІІ, с.385.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①

列宁自豪地将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政党比作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所有重大问题交由有觉悟的工人和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②

列宁坚决反对任何在苏维埃国家系统降低或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并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早在革命前的年代，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列宁指出：“党的原则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由中央委员会来维护和解释的。”^③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和威信很高的集体。”^④

列宁生前，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真正体现。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但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一起工作的同志。他耐心地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意见，说服他人。列宁一贯严格地监督党内生活准则的执行、党章的遵守以及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及时召开。

弗·伊·列宁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取得的胜利、对我们党取得的胜利和贯彻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所做的贡献是伟大的。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发现了斯大林一些恶劣的，并在以后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品质。由于关怀党和苏联国家的未来命运，弗·伊·列宁对斯大林做出了完全正确的评语，同时还指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对同志不够关心，任性和滥用权力，应当研究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调开的问题。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例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信里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① 《列宁选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5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89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3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6页。

我没有把握。”^①

这封信是众所周知的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了这个文件，大概，你们今后还会不止一次地阅读该文件。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列宁这些质朴的话语，它们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未来政治方向的关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②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指出他会考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意见，并能够改正使列宁深感忧虑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正是对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斯大林所做评语的补充。

两个文件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负责政治局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现在我宣读这些信件。

1.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鲍里瑟奇：

昨天，斯大林以我经过医生允许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写的一封信

^①《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39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40页。

短信为理由，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中，我没有听到一个同志对我讲一句粗话。与斯大林相比，我更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现在我需要保持最大限度的自制力。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对他无所谓，至少比斯大林要了解。我请求您，请求格里戈里^①——弗·伊·的最亲密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免受对我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免受不应受到的谩骂和威胁。我不怀疑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全票通过的决议，但我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极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这封信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922年12月23日写的。两个半月之后，1923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将以下信件寄给斯大林。

2. 弗·伊·列宁的信

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场骚动）

致敬

列宁

1923年3月5日

^① 格·叶·季诺维也夫——作者注。

同志们！我不想对这些文件进行评论，它们本身已经雄辩地说明了问题。如果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对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党对她非常了解并对她作为列宁的忠贞朋友和自党诞生之日起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予以高度评价，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会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他的这些恶劣品质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了晚年，已达到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顾忌他的指示，而后来开始藐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重警告。

如果对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进行分析，仔细想想斯大林所犯的全部过失，你会确信列宁的担忧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滥用职权的地步，并对我们的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应认真研究和正确分析这一问题，以便排除任何可能再次出现斯大林在世时的问题，哪怕仅仅是类似的问题：在领导和工作中他完全不能容忍集体领导制，对所有人，不仅对与他有矛盾的人，而且对因他的任性和专横感觉到与他的观点有矛盾的人，肆无忌惮地施暴。他不是采取说服、解释和耐心的方式与人合作，而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求无条件服从他个人的意见。如果有人对此抵制或设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个人肯定会被清除出领导集体，接着就会受到精神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与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并得到了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与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原理、坚持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敌对的政治路线的人，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思想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但又是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都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

们可以稍加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如果指望“印花布工业化”或指望依靠富农等思想取得胜利，会是一种什么情况？那样，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面对资本主义的包围，我们将处于赤手空拳和软弱无力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党从思想立场出发，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列宁主义行为的危害和危险何在。而为解释党的路线所进行的巨大工作，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绝大多数党员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贯彻党的列宁路线，建设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甚至在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残酷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都没有采取过极端的镇压措施。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几年之后，当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成，当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经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开始对他们进行镇压。

正是在这一时期（1935~1937~1938年），开始了在国家机关中的大规模清洗，首先是清洗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是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党的干部。而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起步时那些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次引入“人民公敌”这一概念。有了这个术语，你可以无须任何证据就能指控与你辩论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犯了思想错误，就可以对那些仅仅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仅仅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或是那些受到诬陷的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完全无视任何革命法制的原则。“人民公敌”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被告本人的“招供”成了主要的和唯一的犯罪证据，然而后来已经查明，这些“招供”乃是对被告施行体罚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所有准则都是背道而驰的。

这导致对革命法制的令人发指的破坏，使许多过去拥护党的路线的完全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对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也没有足够的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的重大依据。于是，为了给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制造依据，引用了“人民公敌”这一术语。

要知道，很多被宣布为是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后被枪决的人，在列宁生前曾同列宁一起工作。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时期犯过错误，尽管如此，列宁还是在工作中使用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带领他们跟随自己前进。

在这方面，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便函。在确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列宁写道，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知的机关”。

“建议监察委员会承担一项特殊任务：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像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能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建议和意见等等。”^①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偏离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妥协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从列宁在领导党的整个实践中可以看出，列宁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对待那些曾表现出动摇、偏离过党的路线，但最终又能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人。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工作的英明，正表现在这里。

而斯大林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斯大林与列宁的下述特点格格不入：列宁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善于利用集体的力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自己前进。斯大林抛弃了列宁说服和教育的方法，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越来越广泛地、越来越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来行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91页。

动，经常违背现有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联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鼓励和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逮捕和流放成千上万的人、不经审判和正常的侦查程序进行处决，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引发了恐惧，甚至是愤恨。

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和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团结，相反，这使那些诚实的但不合斯大林心意的工作人员，被消灭或被清除出党。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采用列宁主义的立场，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和对人的关心和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丢弃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出现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制和对成千上万的人采用恐怖手段的问题。只有对那些真正犯了反苏维埃制度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历史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甚至于10月18日在孟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上公开发表了对布尔什维克准备武装起义的声明，声明中说，他们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和该起义将在近期发动的决定。

这是对党的事业、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对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的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①于是，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之后，众所周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列宁让他们执行党的极其重要的委托和积极参加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工作。已经知道，在列宁生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犯了不少其他重大错误。在自己的“遗嘱”中，列宁警告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②。但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更不要说提出处决他们的问题。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39页。

或者我们再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和非常客观地弄清这一事情的本质。

要知道，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绝对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阶层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党的知识分子，某些人出身于工人。可以指名道姓地说出一大批当时被视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人，他们曾在革命前积极加工人运动，而后又积极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并献身于捍卫最伟大的革命成果。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与托洛茨基主义分道扬镳并站在了列宁的立场，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吗？我们深信，如果列宁活着，对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

这仅仅是几个历史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形势确实需要时和必要的情况下，列宁从未对革命的敌人采取过最严厉的措施吗？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如果出现这样的必要性，他会无情地使用这些措施。请你们哪怕回忆一下弗·伊·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组织的反苏维埃暴动和1918年与反革命富农的斗争及其他斗争时，列宁毫不动摇地对敌人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但列宁是利用这些措施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有错误、迷失方向，但可以通过施加思想影响带领他们前进，甚至还可以保留他们领导职务的人们。

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即当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当血雨腥风的殊死搏斗白热化时，包括爆发了国内战争时，列宁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斯大林是在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苏维埃国家已经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我们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了巩固和经受了锻炼之时，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和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出偏执、粗暴并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常常不仅对真正的敌人，而且也对那些并没有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犯有罪行的人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弗·伊·列宁曾对他的这点感到不安。

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揭露贝利亚反革命集团后，中央委员会研究

了该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系列案件。同时，发现了与斯大林错误行为相关的极其丑恶的粗暴专横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做了不少滥用职权的事；他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从不征求中央委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经常就极其重要的党和国家事务做出个人的决定，连政治局委员也不告知。

* * *

在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它对我们党的利益有什么损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贯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视其为成功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执政党的重大责任时，号召要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践对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制原则。集体领导制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们党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列宁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①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为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做出了榜样。任何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经商量，或没有得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的同意，列宁是不会做出个人决定的。

即使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也认为必须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并通过经由领导者集体全面研究后制定的决议。

比如，我们来回忆一下1918年，当时国家正面临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生命攸关的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和平问题。1919年，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诸如关于对待农民基本群众、红军建设、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249页。

改善党的社会成分等问题。1920年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任务。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团结”的历史性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列宁认为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党必须首先对内外政策、党和国家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非常值得提及的是，列宁最后的文章、信件和札记，正是写给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的。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和贯彻党的政策的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集体。

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后，这些对于我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得到遵守呢？

如果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举行，多多少少还算正常，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越来越滥用权力的时候，这些原则开始遭到粗暴破坏。这特别表现在斯大林一生中的最后15年。难道可以认为，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超过13年的事实是正常的吗？在这期间，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历了多少事件？这些事件迫切要求党在卫国战争条件下就国防问题和战后年代的和平建设问题通过决议。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时间里也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

几乎没有举行过中央委员会全会。实际上只要说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都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就足够了。当然，曾打算在1941年10月举行中央全会，当时，已专门从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待了两天等待中央全会的召开，但最终也未能等到开会。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中央委员们见面和座谈，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斯大林沮丧到何等地步，以及他如何傲慢和轻蔑地对待中央委员。

这一做法，是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列宁的党的集体领导制原则的表现。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特别表现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粗暴专横对待党的干部的事实后，

组建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的党的委员会，并责成它仔细研究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事件是如何形成的。

委员会查阅了大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文献，查明了大量伪造的反共产党人案件、伪造的指控、令人发指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律等事实，结果是造成许多无辜的人们死亡。已经查明，1937~1938年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人员真实情况是，他们从来都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实际上，他们一直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但遭到了诽谤，而有时因经受不住残酷的拷打，自己给自己罗织形形色色重大的和不可思议的罪名来诬陷自己（在侦查 - 伪造人的授意下）。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大量关于对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和这次党代会选出的中央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文献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这一材料进行了研究。

已经查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139 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人被逮捕和枪杀（主要是在 1937~1938 年），即占 70%。（会场群情激愤）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分如何呢？已经知道，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 80% 有表决权的代表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 1920 年以前就已入党的。从社会出身来看，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群体是工人（占有表决权代表的 60%）。

所以，完全无法想象，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居然是党的敌人。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和伪造对他们的控告，就可以对革命法制进行令人发指的破坏，致使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 70% 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如此命运的不仅有中央委员，还有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代表大会 1966 个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即 1108 人。仅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是多么荒谬、野蛮和不符合正常逻辑。（会场群情激愤）

有必要提请注意，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载入史

册的。被选为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在国内战争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了忘我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直面死亡，毫不畏惧。怎么能够相信，这些人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被在政治上粉碎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之后的时期内，会变成“两面派”，并转到了社会主义敌人的营垒中去呢？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干部使用大规模恐怖手段的结果。

为什么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会加剧呢？因为这一时期斯大林在党和人民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他可以完全不必顾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那么，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在政治上被完全粉碎后，当由于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之后，斯大林越来越不在乎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不用讲话的配角，他让所有其他人都处于对他唯命是从和歌功颂德的地位。

谢·米·基洛夫被残忍地杀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和肆无忌惮地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行动。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没有政治局决议，直到两天之后，才以询问方式办理了决定通过的手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努基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 （1）侦查部门：以快速方式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活动的被告的案件。
-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极刑判决，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认为对类似请求的研究是必要的。
- （3）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司法判决，对以上所述类型的犯罪分子，立即实施极刑判决。

这一决议成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依据。在许多伪造的侦查案中，对被告加上了“策划”恐怖活动的罪名，这就剥夺了被告对其案件核实的任何可能，即使他们在法庭上拒绝承认自己被迫做出的“认罪”供词和有说服力地驳斥了对他们提出的指控。

应该说，与杀害基洛夫同志有关的情况，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这要求进行最细致的调查。有理由认为，负责保卫基洛夫的人中，某个人对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提供了帮助。在谋杀的前一个半月，尼古拉耶夫曾因可疑行为而被捕，但后来被释放，甚至没有对其进行搜查。最可疑的是，当1934年12月2日要对专门负责基洛夫安全的肃反人员进行审讯时，这个人却在汽车“事故”中丧生，而陪他一同来的人无一人伤亡。基洛夫被杀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被撤职，只受到很轻的处罚，但他们却在1937年被处决。可以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掩盖杀害基洛夫组织者的犯罪痕迹。（会场骚动）

自1936年末，即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向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发了电报后，大规模的镇压突然加剧。该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显而易见，在执行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案件的任务中，亚戈达力不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所有党的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州代表的多数都这么说。”应顺便指出，斯大林没有与党的工作人员会见，所以，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意见。

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即在采取大规模镇压方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应当迅速“弥补所耽搁的时间”，是在直接怂恿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进行大规模逮捕和处决。

不得不指出，这一指示，也强加给了1937年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日本-德国-托洛茨基间谍分子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通过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对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中心及对其在地方支持者案件侦查中所查明的全部事实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发这些最险恶的人民公敌方面，至少耽误了四年。

当时，大规模镇压是在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是否真的具有这样的危险呢？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投票赞成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人只有 4000 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人有 72.4 万人。从党的十五大到中央二—三月全会，十年过去了，托洛茨基主义已经被彻底粉碎，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 1937 年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所做的报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肃清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措施》，企图为大规模镇压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使用的是同样的借口：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似乎应越来越尖锐化。同时，斯大林坚定地认为，历史这样教导我们，列宁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实际上列宁所指出的是，使用革命暴力是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需要，列宁的指示是针对那一个时期的，当时存在着剥削阶级，而且还很强大。但当国内政治形势刚刚好转，当 1920 年 1 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最重要的胜利之后，列宁立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活动和死刑。在 1920 年 2 月 2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上的报告，列宁以下述方式论证了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的政治措施：

“我们实行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逼出来的，因为称霸世界的强国不顾一切地派遣大批军队向我们扑来。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行动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作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逼出来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许诺过的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纲领的。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措施。我们用事实证明了一点。”^①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所有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在没有任何重大理由采用大规模非常措施和恐怖手段之时，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实行大规模镇压。

事实上，这种恐怖手段并不是用于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

^①《列宁选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 110 页。

用于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的干部，对他们提出了虚假的、诬陷的和愚蠢的“两面派”“间谍”“破坏分子”等指控，还臆造他们策划某种“谋杀”活动等。

在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中，实际上已经对在与“两面派”斗争的借口下所确定的大规模镇压方针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

这些怀疑最清楚地体现在波斯特舍夫同志的发言中。他说：“我曾认为，尖锐斗争的年代已经过去，腐化堕落的党员已被击败或转向敌方，健康的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年代、集体化年代，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这样的严峻时期之后，卡尔波夫及诸如此类的人会跑到敌人的阵营（卡尔波夫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波斯特舍夫对他很了解）。而根据口供，似乎自1934年他就被托洛茨基分子吸收为其组织的成员。我个人认为，一个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经历了长期的与敌人残酷斗争的人，在1934年进入敌人营垒是难以置信的。对此我不能相信……我无法想象，和党一起度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靠托洛茨基分子。这有点奇怪……”（会场骚动）

利用斯大林关于越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越多的指示，利用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钻进国家安全机关的挑拨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开始以党的名义做掩护，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只要指出，1937年因被控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而被捕的人比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已经知道，对党的领导人员是何等的粗暴专横。根据第十次党代会期间列宁所做的指示而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党籍的极端措施的条件是“应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中央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参加”，只有在这种负责人全体会议上2/3的人投票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被逮捕的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如今，在对某些臆造的“间谍”和“破坏者”的案件进行调查后，已

经清楚，这些案件是伪造的。许多被指控进行敌对活动的被捕人员的供词，都是使用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方法取得的。

与此同时，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所知道的，斯大林并没有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声明发给大家，这些政治家否认自己在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毫无疑问，斯大林看过这些声明。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一系列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伪造案件。

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之一、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就是无耻挑拨、恶意伪造、对革命法制不可容忍的破坏的例证。（会场骚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4月29日根据诬陷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检察长的批准，直到他被捕15个月后才发出这一批准。

对埃赫案件的侦查是在苏维埃法制被粗暴扭曲、肆意妄为和弄虚作假的气氛中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后被迫在侦查人员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的。审讯记录诬陷埃赫本人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反苏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并请求对他的案件进行查实。他在声明中写道：“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制度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写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对他提出的诬告，并指出，一方面，这些诽谤性的指控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为，因为他作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对他们实施逮捕，他们阴谋对他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也是侦查人员搞肮脏伪造和臆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对我宣布，对我的案件已经结束侦查并提供了阅看侦查材料的机会。如果我犯了对我提出指控的犯罪活动中的一条，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我也不敢以临死前的声明向您求助。但我没有进行任何对我指控的犯罪活动，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没有丝毫卑鄙行为的影子。在一生中我不曾对您讲过半句假话，现在，在双脚已进入坟墓之时，我也不

会对您撒谎。我的整个案子是挑拨、诬陷和违背起码的革命法制原则的样板……

……现有的在对我的侦查中揭发我的供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包含着对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诬蔑，因为许多不是根据我的提议也没有我参与而通过的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正确决议，也被描绘成是根据我的提议而进行的反革命破坏行动……

现在我将转入讲述自己生命中最耻辱的一页，这也是我对党，对您，犯下的真正的严重罪行。那就是我关于自己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供词……情况是这样的：经受不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对我进行的严刑拷打，特别是前者，他巧妙地利用了骨折后愈合差的情况折磨我，使我疼痛难忍，迫使我对自己和对他人进行诬陷。

我的多数供词是乌沙科夫提示或口授的，其余的，我记得，是重抄西西伯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中所列举的事实都算在自己头上。而如果由乌沙科夫创造和我签署的神话出现某种漏洞，会强迫我签署另一个版本的交代材料。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处理的，开始把他写进了某个中心，后来，甚至没有对我讲任何话便勾掉了。对中心主席也同样，中心似乎是布哈林于1935年建立的。开始我写进了自己，但后来又建议写入瓦·伊·梅日劳克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情况……

……我请您并恳求您继续调查我的案件，而这不是为了对我宽大处理，而是为了将无耻奸佞的栽赃行径揭露无遗。栽赃如同蛇蝎，它使许多人无法挣脱，包括由于我的意志薄弱和犯罪性诬陷。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您和党。我知道，由于党和人民的敌人无耻和卑鄙的行径我将牺牲，是他们制造了对我的诬陷……”

似乎，这样重要的声明一定会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声明送给贝利亚，对被诬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残酷迫害依然在继续。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移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做了如下声明：“在所有似乎是我的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的签字——我是被迫在记录上签名的。供词是在侦查人员压力下做出的。从逮捕我开始，侦查员就对我进行拷打。之后我就开始写

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我要对法庭、对党和对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阴谋活动。我死到临头依然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如同我在一生的工作中都相信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会场群情激愤）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是伪造的，他现在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做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他是1905年的党员，在沙皇时代曾服过十年苦役。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记录记载了鲁祖塔克下述声明：

“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案件，逼迫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对被指控的情况不进行检查，不给被指控者提供任何机会证明自己没有参与犯罪活动，这些指控是由形形色色人物的各式各样的供词累加的。侦查的方法是强迫杜撰和诬告完全无辜的人，更不要说对受审人自己了。他请求法庭有可能让他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想法，因为他一贯完全赞同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领域的全部政策。”

鲁祖塔克的这一声明没有引起重视，虽然众所周知，鲁祖塔克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想法和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崇高威望的党的机关的主席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唤到政治局见面，斯大林不愿意与他谈话。他在20分钟之内就被判有罪，并被处决。（会场群情激愤）

1955年进行的仔细核查表明，鲁祖塔克的案件是捏造的。对他判刑依据的是诬陷材料。鲁祖塔克已得到身后平反。

罗森布吕姆是1906年入党的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逮捕。从他的供词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如何用人为了挑拨性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在1955年对科马罗夫案进行核实时，罗森布吕姆告知了以下事实：当他，罗森布吕姆1937年被捕后，遭到了残酷拷打，在此期间，从他那里诈取了关于他本人和其他人的假口供。之后将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扎科夫斯基提出可以释放他，条件是让他法庭上提供关于1937年内务人

民委员部捏造的“列宁格勒破坏、间谍、颠覆、恐怖中心案”的假证。（会场骚动）扎科夫斯基以不可思议的无耻暴露了人为制造所谓“反苏阴谋”的卑鄙“方法”。

罗森布吕姆称，“为了看得更清楚，扎科夫斯基向我展示了该中心及其分支机构几个可能的活动方案图解。让我了解了这些示意图之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准备这个案件的材料，而且诉讼将是公开的。

将被送交法庭的‘中心’头目有四五个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泽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每一个分支机构还有两三个人……

列宁格勒中心案将相当可观，而这里证人是关键。其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以及证人的党龄亦有重要的作用。扎科夫斯基说，至于你本人，不用臆造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每一个分支机构撰写了一份现成的提纲，你的事情是背会和记住在法庭上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及答复。这一案件将准备四五个月，甚至半年。所有这段时间你都要准备，以便既不坑害侦查人员，也不坑害自己。而你今后的命运将取决于法庭审判的进程和结果。胆小或捅出篓子，只能怨自己；承受住了也就保住了脑袋瓜，我们将用公家的钱管你吃穿到死。”

请看，这就是当时的卑劣行径！（会场骚动）

制造假案的做法在各个州更为流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揭发”了一个似乎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1914年的党员卡巴科夫领导的所谓“乌拉尔起义司令部”，即由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宗教界人士组成的集团。根据当时的侦查材料，原来，几乎所有边疆区、州、共和国似乎都广泛存在着有分支机构的“右派托洛茨基间谍—恐怖、颠覆—破坏组织和中心”，而且，不知为什么，通常这些“组织”和“中心”都是由州委、边疆区党委、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领导的。（会场骚动）

由于类似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由于相信各种诽谤“供词”以及被迫做出的对自己的诽谤和对他人的诬告，致使成千上万正直的、完全无辜的共产党员牺牲。同样，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及其他人的“案件”也是伪造的。

在那些年代，进行了毫无根据的大规模镇压，其结果是使党的干部队伍遭受了重大损失。

形成了恶性循环，先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拟订人员名单，名单上所列人员的案件由军事审判庭审理，实际上委员部早已确定了对这些人的处罚措施。这些名单由叶若夫送交斯大林本人，并提请他批准所提议的处罚措施。1937~1938年送交斯大林的这类名单共383份，并得到了他的批准。名单涉及成千上万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

这些案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现在正在重新审理，大量案件因毫无根据和造假已经被废止。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自1954年至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已为7679人恢复了名誉，其中很多人是身后平反。

大规模逮捕党、苏维埃、经济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使我们的国家，也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精神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信心的缺失，加剧了病态怀疑的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播种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形形色色的诽谤家和野心家积极进行活动。

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年）使党组织状况得到了众所周知的改善。但即使在1938年，大范围的镇压仍在继续。

仅仅由于我党具有伟大的政治精神力量，它才得以应对1937~1938年的一些沉痛事件，并从这些事件中挺了过来，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1937~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平的镇压造成的干部重大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和国家国防的准备将会更加顺利。

我们指控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指控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比如，难道叶若夫可以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逮捕柯秀尔吗？关于这一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或有没有政治局的决议呢？不，如同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可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什么也不可能做。

现在，我们已经把问题搞清楚，恢复了柯秀尔、鲁祖塔克、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等人的名誉。逮捕和判决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对材料的研

究表明，没有任何根据。对他们实施的逮捕，同对许多其他人一样，没有经过检察官的批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呢？在这些问题上，他就是总检察长。斯大林不仅允许，而且还主动下达逮捕的指示。对此应该说出来，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能完全清楚，以便你们能做出正确的评价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他根本不考虑任何党和苏维埃法制的准则。斯大林是个非常多疑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您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转来转去？”或者说：“您今天为什么老躲着，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对任何人一概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活动家。他所看到的是到处都有“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专横跋扈，从精神和肉体上对人进行镇压，形成了一种任何人都不能表达自己要求的氛围。

当斯大林说应该逮捕某某人，那么就应该相信，他是“人民公敌”。在国家安全机关中为所欲为的贝利亚反革命集团就会竭尽全力地去证明被逮捕的人有罪和对他们所捏造的材料是正确的。为此使用什么证据呢？使用被逮捕者的供词。于是侦查员设法获取这样的“供词”。但如何使一个人承认他从来没有进行的犯罪活动呢？只有一个方法，即体罚的方法，严刑拷打是使一个人丧失知觉、理智和尊严的办法。假“供词”就是这么搞到手的。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之时，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体罚之时，斯大林于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局局长发了一份密电，密电中说：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自1937年起使用体罚是联共（布）中央允许的。众所周知，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是极其卑劣的体罚方式。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死不悔改的间谍，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法，今后肯定会继续使用，即专门对那些显然是人民的敌人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使用。”

因此，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搞刑讯，进行严刑拷打，导致他们诬告别人和自我揭发，如以上所表明的那样，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我们把当时审讯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的侦查员罗多斯召到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他进行了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和鼠目寸光的人，在道德方面，简直是一个败类。就是这个人，决定了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从而提供了导致做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料。

请问，难道这样的一个人，凭他自己的智慧能够领导侦查工作，以证明像柯秀尔和其他类似的人有罪吗？不可能，没有相关的指示，他不可能做很多事情。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柯秀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会场群情激愤）

他只能通过长时间的残酷拷打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详细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这里应指出，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声称：“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囚禁者采用体罚方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在实践中得到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事实说明，党的正确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一笔勾销了，一切都屈从于一个人的专横。

* * *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

如果以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论著”为例，其中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起作用的描写，可谓荒唐透顶。所描绘的通常是这样一种模式：斯大林能够预见一切，苏联军队是在根据斯大林预先制订的战略计划执行所谓的“积极防御”战术，即众所周知的允许德国人兵临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说什么，采取这种战术后，仅凭斯大林的天才，苏联军队就转入反攻并粉碎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和我们英雄的人民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在这类小说、电影和“论著”中，全部被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

应该仔细搞清这一问题，因为这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是历史意义，而且首先是政治、教育和实际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的事实是什么呢？

战前，我们的报刊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旋律是自我吹嘘：如果敌人胆敢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我们会给敌人三倍的打击，我们将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以微小的牺牲赢得胜利。但这些郑重的声明并非为保障我们的边界真正不可侵犯的实际工作所证实。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的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似乎是德国人对苏联搞“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为自己提出了消灭共产主义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法西斯分子是直接说的，他们没有隐瞒自己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些侵略计划，签订了各式各样的条约，建立了一些同盟国、轴心国，譬如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国。战前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希特勒正在将自己的所有力量用于发动反对苏联国家的战争，他在靠近苏联边境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兵团，其中包括坦克兵团。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进行重新部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追逐的是帝国主义自己的利益，那就是挑动德国和苏联两国进行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不过，丘吉尔在他的信件中指出，他希望“提醒斯大林注意到对他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的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斯大林对这些警告不予重视。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指示：不要相信类似情报，以避免挑起战争行动。

应该说，此类关于苏联已面临德国军队入侵其领土威胁的情报，也从部队和外交途径得到了，但由于领导层业已形成的对这类情报的偏见，人们每一次发送这样的情报时总是胆战心惊，并加上不少说明。

比如，1941年5月6日驻柏林海军武官、海军上校沃龙佐夫报称：“苏联籍人波泽尔……通报我海军副武官，希特勒大本营的一名德国军官说，德国人拟于5月14日通过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和拉脱维亚进攻苏联。同时还确定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强大的空袭，而伞兵将在一些边境地区的

中心登陆……”

1941年5月22日，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在其提交的情报中报告：“……德国军队进攻的日期据说是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18日，来自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电报说：“鉴于目前局势，克里浦斯坚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会晚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人已在苏联边境集结了147个师（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重大的信号，但没有为国家的防卫准备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采取充分的措施。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做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的工业发展水平已完全有能力保证苏军得到一切必需品。甚至以下事实对此也是证明：战争期间，由于敌人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我国西部地区和一些重要的工业区和粮食产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国家东部地区组织起军用物资的生产，将从西部工业地区运来的设备投入生产，从而保障了我们的武装部队歼灭敌人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和真正地为保障军队武器和必要的装备而动员起来，我们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牺牲一定会小得多。但没有及时进行这样的动员。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就已经发现，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的坦克和大炮样品，但未曾组织好批量生产。实际上，直到战争开始的前夕，我们才刚刚开始装备部队。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正在淘汰的旧装备，也没有足够的拟装备部队的新式武器。高射炮的情况很糟。反坦克穿甲弹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要塞区的部队在战争开始时束手无策，因为老式的武器撤走了，而新武器还没有装备好。

遗憾的是，问题还不只是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应征加入作战部队的人们。我记得，在那些日子我从基辅给马林科夫同志打电话并告诉他：“群众来到了部队，需要武器。请为我们提供武器。”对此，马林科夫答复我说：

“我们有可能提供武器。所有武器都交给列宁格勒了，请你们自行解决吧。”（会场骚动）

武器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方面，不能不回忆起这样一个事实：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加紧准备进攻所需要的一切，看来，最近就要转入进攻。考虑这一情况，基尔波诺斯提议建立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 30 万居民，并在那里建立几个强大的要塞地带：挖好反坦克壕，为战士建筑掩蔽工事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在边境地区不需要准备任何工程，不要给德国人提供对我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口实。因此，我们的边境没有做好回击敌人的准备。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对射击不予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不顾明显的事实，认为这不是战争，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的部队的挑衅，而如果我们德国人进行回击，那么这将会成为德军发动战争的借口。

已知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德国军队侵入苏联领土前夕，一个德国人逃越我们的边界并报告，德国军队得到指示，将于 6 月 22 日深夜三点钟开始对苏联发动进攻。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但这一信号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对一切都视而不见：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难道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千钧一发的历史时刻的洞察力吗？这种漠不关心和无视明显事实造成了什么后果？后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以及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歼灭了我们大量的飞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我们大量的军事干部，瓦解了部队的管理，从而使我国无力阻挡敌人深入我国腹地的步伐。

1937~1941 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诽谤指控产生的怀疑，大量军队指挥官和政治工作骨干被消灭，这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这些年中，几个层次的指挥干部，几乎从连、营到武装力量最高中央机构，都遭到了镇压，其中，那些在西班牙战争和远东战争中取得了某种经验的

指挥干部，几乎全部被镇压。

大规模镇压部队干部的政策还产生了破坏军人纪律基础的严重后果，因为几年中，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会场骚动）当然，这在战争初期对军队纪律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要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无限忠于党和祖国的卓越的军事干部。只要说一点就足够了，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我指的是这样的同志，比如，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列茨科夫（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以及波德拉斯（他是个优秀的指挥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的其他人，虽然他们曾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为祖国荣誉进行了忘我的战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死在集中营或监狱中，他们再也没有出现在部队中。

所有这一切叠加在一起，导致了战争初期那样的状况，它使我们祖国的命运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不谈以下问题是不正确的：在前线遭受首次最沉重的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认为，末日已经来临。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

“列宁缔造的一切，被我们无可挽回地丢失了。”

在这之后，他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军事战役和完全谈不上干事，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员到他那里并对他说，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因此，在战争初期，我们祖国危在旦夕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本人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只是出现在战争最初阶段——当时我们的军队一片混乱并遭到了重创。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完全不了解前线形成的实际形势。而这很自然，在整个卫国战争中，他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前线地区，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被解放的城市，如果不算在前线状况稳定的情况下闪电般地出行在莫扎伊斯克公路上的那一次。关于这次出行，不知有多少文学作品以形形色色的想象力进行

了虚构，不知有多少色彩鲜艳的油画进行了描绘。此外，斯大林直接干预了作战进程和下达命令，不少情况下没有考虑该前线地区的实际形势，因此不可能不导致人员的巨大损失。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个典型事实，它能说明斯大林是如何对前线进行领导的。这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巴格拉米扬元帅，他曾是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他可以证明现在我要对你们讲的是事实。

对于我们的军队来说，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形成了极为严峻的形势，我们通过了正确的决定：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行动，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役，将会对我军造成致命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强调形势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防止敌人消灭我们的重兵集团。斯大林违背正常的思维，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命令我们继续执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军团已面临被包围和被歼灭的现实威胁。

我给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并央求他：“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请您拿一张地图给斯大林看看，告诉他现在的形势如何。”

应该说，斯大林是根据地球仪拟订战役计划的。（场内活跃）是的，同志们，他拿起地球仪，在地球仪上给人们指示战线。所以，我才对华西列夫斯基说，请在地图上看看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可能继续发起已确定的战役。为了事业，应改变老的决定。

对此，华西列夫斯基答复说，斯大林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华西列夫斯基不会再向斯大林报告了，因为他不愿意再听任何关于这一战役的其他理由了。

在与华西列夫斯基谈话之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没有接电话，马林科夫拿起了听筒。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同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我们这里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虽然斯大林离电话只有几步远。

以这样的方式听完我们的请求后，斯大林说：“一切按照原先决定的办！”

由此出现了什么形势？出现了我们所能预想的最坏的形势。德国人包

围了我们的军团，其结果，我们军队损失了数十万人。你们看，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他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会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不知怎么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不支持他没有道理。

可以想象，斯大林有多么生气！怎么能够认定，他——斯大林，当时会是错误的！他可是“天才”，而天才是不可能犯错误的。所有人，不管是谁，都可能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犯错误，他永远是对的。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自己犯过任何一个大的或小的错误，虽然无论在理论问题上，还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他犯了许多错误。看来，代表大会后，我们有必要对许多军事战役的评价进行重新审查，应对它们做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得以阻止敌人并转入进攻后，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都知道，早在1941年年末，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肩负着进行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役，才使前线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一个更可耻和卑鄙的事实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开始抨击许多对战胜敌人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统帅，因为斯大林不允许出现将前线功绩归功于除他本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任何可能性，不管那个人是谁。

斯大林对如何评价朱可夫的统帅才能有很大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征询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他，他是一个好将军，好指挥官。”

战后，斯大林开始散布关于朱可夫的各种无稽之谈，包括有一次他对我说：“瞧，您夸奖了朱可夫，可实际上他对此是受之有愧。我听说，在前线某个战役开始前，他总是先要抓起一把土闻闻，然后再下达命令说，可以开始进攻，或相反，说不能进行已经确定的战役。”

我当时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杜撰出来的，但这不是

事实。”显然是斯大林杜撰了这些东西，以便贬低朱可夫元帅的作用和军事才能。

在这方面，斯大林自己竭尽全力自我推广，宣扬自己伟大统帅的形象，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高尚品质和天才，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就像库兹马·克留奇科夫（“一战”中俄罗斯的传奇英雄——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会场活跃）

请你们看看我们的历史和军事题材的电影或某些文学作品吧！看这些真令人作呕。因为所有的作品恰恰都在宣传颂扬斯大林是天才的统帅。

让我们哪怕想想《攻克柏林》这部影片。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空无一人，只有几把椅子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儿？政治局在哪儿？政府又在哪儿？他们在做什么，研究什么？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越俎代庖，不考虑任何人的意见，也不与任何人商量。就是用这种歪曲的方式将这一切放映给人民。为了什么？为了吹捧斯大林，而这一切都是违背事实、违背历史真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儿？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为他们留下任何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和它才华出众的统帅及英勇的军人、全体苏联人民，是他们保证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的中央委员、部长、国民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苏联文化活动家、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忘我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庄的农民、苏联知识界，表现了罕见的英雄主义，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战争时期的艰苦条件，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最伟大的功勋，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许多妇女还直接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参战。我们英勇的青年，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事业，为粉碎敌人的事业，做出了自己无法估量的贡献。

苏联军人，我们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永不磨灭！

在战争初期部队遭到相当大的一部分损失后，他们没有惊慌失措，能够很快重整旗鼓，在战争中造就和锻炼了强大和英雄的部队，不仅击退了强大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而且还粉碎了他们。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使其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苏联人民的最伟大的功勋，将千秋万代地铭记在感恩的人类心中。（暴风雨般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主要功勋属于我们的共产党，属于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受党教育的苏联人。（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同志们！现在我们谈谈其他某些事实。苏联有资格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榜样，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所有民族友好相处，其平等权利在实践中已得到保障。因此，由斯大林倡议的粗暴践踏基本的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原则的行动令人发指。这里所指的是，将整个民族强行从他们的家园外迁，无一例外，包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而且，这种搬迁与军事考虑没有任何关系。

早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不可逆转的转折之时，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拉恰耶夫人从所居住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所有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迫从自己的家园迁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往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没有遭受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无处可迁，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的。（笑声，会

场活跃)

不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在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的意识中，都不会容忍这样的观点，即应该由整个民族，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承担个别人或个别团伙的敌对行动的罪责，对他们进行大规模镇压，使他们遭受困苦和煎熬。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骄傲地庆祝以巨大的牺牲代价和难以想象的努力而取得的光辉胜利。国家政治热情高涨。战后党更加团结，党的干部经历了战争烈火的锻炼。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出现阴谋活动的可能。

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突然发生了所谓的“列宁格勒案”。如现在已经证明的那样，这是伪造的案件。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无辜牺牲。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著名的和有才干的领导人。他们曾与斯大林关系密切，只要提及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库兹涅佐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安全机关，可见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究竟为什么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并被消灭呢？

事实表明，“列宁格勒案”也是斯大林专横地对待党的干部的结果。

如果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有正常的工作氛围，如党章规定的那样对这类问题进行讨论并对所有事实进行斟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案件，也不会出现其他类似的案件。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严重。迫害狂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许多工作人员在他的眼中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独断专行，不管是什么事，他都不考虑任何人的意见。

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感到恐慌。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流言蜚语材料“偷偷地送给”斯大林的。

党中央委员会审核了所谓“列宁格勒案”，现已为无辜受害者恢复了名誉，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光荣名声也得到恢复。该案的伪造者阿巴库莫夫等人已被送交法庭，他们在列宁格勒受审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在斯大林生前，搞清此案，以使无辜的人免于牺牲？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处理“列宁格勒案”，当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并不了解案件的全部情况，因而无法干预。

斯大林刚收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一些材料，便在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些材料真假的情况下，下达指示，对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件”进行侦查。这就预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在这方面，关于格鲁吉亚存在梅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也是一个教训。众所周知，关于这一问题，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的通过，没有在政治局讨论，斯大林本人口授了这些决议。决议对许多诚实的共产党人提出了重大犯罪指控。根据捏造的材料断定，格鲁吉亚似乎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借助于帝国主义国家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这一原因，逮捕了格鲁吉亚一批党的和苏维埃的负责人。如后来已经查明的那样，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诽谤。

我们知道，在格鲁吉亚和在其他共和国一样，曾有过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产生了一个问题，或许在通过上述决议时，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真的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即格鲁吉亚面临脱离苏联版图和并入土耳其国家的威胁？（会场活跃，笑声）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很难想象人们脑子中会有这种念头。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格鲁吉亚的经济和文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产值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国新建了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黑色冶金、石油工业、机械制造等。文盲早已被消灭，而革命前格鲁吉亚的文盲占人口的78%。把自己共和国的情况和土耳其劳动者的困苦状况做一对比之后，格鲁吉亚人会希望与土耳其合并吗？1955年，土耳其的人均钢产量比格鲁吉亚低94.4%；格鲁吉亚人均电产量比土耳其高八倍多。按1950年人口普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其中妇女约占80%。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约39000名在校大学生，

是土耳其的七倍多（1000人中）。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格鲁吉亚劳动者的物质福利水平提高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显然，随着格鲁吉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劳动者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消失。

实际上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人，成了专横不法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格鲁吉亚人民的伟大儿子”，格鲁吉亚人喜欢这样称呼自己的同乡，这位“天才”领导下干的。（会场骚动）

斯大林的专横不仅表现在解决国内生活问题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处理苏联对外关系领域。

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详细讨论了与南斯拉夫产生冲突的原因，并指出了斯大林的负面作用。要知道，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没有通过同志党式的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出现这样的事件，没有充分的理由，不与该国断绝外交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领导没有错误和缺点，但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无限夸大了，以至于和与我们友好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

我想起苏联和南斯拉夫冲突被人为夸大的最初的那些日子。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斯大林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把不久前写给铁托的信件抄本给我看并问：“你看过吗？”没有等我回答就又说道：“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会完蛋，就会消失……”

“动一下小手指”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说法表现了斯大林是个自大狂，而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尔；再动一下小手指，波斯特舍夫、丘巴尔完了；再动一下小手指，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许多人也被消灭了。

但这对铁托不起作用。不管斯大林怎样动小手指，而且不只是小手指，还动用了他所能动用的一切，铁托并没有消失。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和南斯拉夫同志们的争论中，站在铁托背后的是国家，是为自由和独立经历了严酷斗争考验的人民，人民支持了自己的领导人。

请看斯大林的自大酿成了什么后果。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感，他不仅对国内的部分人员，而且对一大批党和国家都表现出猜疑和傲慢。

现在，我们认真研究了南斯拉夫问题，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它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人民民主国家全体劳动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支持。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

同样也应该谈谈“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会场骚动）说句实话，不存在任何“案件”，除了季马舒克医生的声明外。她也许受了某个人的影响，或根据某人的指示（要知道，她是国家安全机关不对外公开的人员）向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声明，医生们似乎采取了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收到这封信后，斯大林立即做出结论：苏联有医生反革命分子，并下达了逮捕苏联医学界一批著名专家的指示。他还亲自对如何进行侦讯和审问被逮捕的人下达了指示。他说：给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戴上镣铐，殴打某某。这里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斯大林直接对他说：如果医生们不招供，那就要了你的脑袋！（会场群情激愤）斯大林亲自把侦查员找来，给他指示和告诉他侦讯的方法，而唯一的方法：除了殴打，还是殴打。

在医生被捕一段时间后，我们，政治局委员们，得到了医生的口供笔录。将这些笔录发给大家后，斯大林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瞎子、公猫，没有我会发生什么？会亡国。因为你们不会识别敌人。”

情况就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对侦查的事实进行检查，也没有可能通过与提交这些供词的人接触来对事实进行检查。

但我们感到，医生被捕案是一个齜齜的案件。其中的许多医生我们自己也了解，因为他们为我们治过病。当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查了查这个“案子”是怎样制造的，我们看到，该案是彻头彻尾的假案。

这一无耻的“案件”是斯大林制造的，但他没有来得及（按自己的意见）结案，所以医生们才活了下来。现在他们都恢复了名誉，工作在原先的岗位上，为领导人员包括政府领导人员治病。我们完全信任他们，而他们也一如既往地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策划各种各样的肮脏和可耻案件中，我们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外国情报机构的奸细、骗取了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扮演了可耻的角色。这个挑拨者是怎样占据了党和国家如此高的地位，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

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沿着国家阶梯向上爬的过程中，在每一个阶梯上都留下了大量的尸骨。

有没有关于贝利亚与党为敌的信号？是的，有这样的信号。早在 1937 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就曾说过，贝利亚曾为木沙瓦特党的情报机构工作。中央全会还没有结束，卡明斯基已经被逮捕，而后被处决。斯大林对卡明斯基的声明是否进行了核实？没有，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这一点对于他已经足够了。

也有其他信号。斯涅戈夫同志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声明令人感兴趣（顺便提一下，他在劳改营生活了 17 年，不久前已经被恢复名誉）。

他在声明中写道：

“鉴于提出了为前中央委员卡尔特韦利什维利 - 拉夫连季耶夫恢复名誉的问题，我向克格勃代表提交了关于贝利亚在对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进行迫害中的作用和他的犯罪动机的详细供词。

我认为有必要重复该问题的重要事实，并将情况报告中央，因为我认为把它放在审讯文件中有些不便。

1931 年 10 月 30 日，在联共（布）中央组组局会议上听取了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报告。边疆区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些委员中，只有我还活着。在这次会议上，约·维·斯大林在结束发言时，提出了组建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处的建议，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任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贝利亚的名字作为党的职务候选人提出来）。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立即插话说，他对贝利亚非常了解，因此坚决拒绝和他一道工作。当时约·维·斯大林提议，对该问题先不下定论，以后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两天之后，决定由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将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调离外高加索。

出席这次会议的阿·伊·米高扬和拉·莫·卡冈诺维奇对此可以证实。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和贝利亚之间多年来的敌对关系人所共知；二者的敌对关系源于谢尔戈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时期，因为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是与谢尔戈关系最密切的助理。这成为贝利亚制造‘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案’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在该‘案’中，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指控对贝利亚采取

恐怖活动。”

关于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详细讲述了他的犯罪活动。但某些东西还是值得提一下，何况可能不是所有大会代表都读过这一文件。

这里，我想请大家了解贝利亚对克德罗夫、戈卢别夫和戈卢别夫的养母巴图林娜残酷镇压的情况，他们曾试图让中央委员会了解贝利亚的叛变活动。他们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处决了。判决书是在被处决之后办理的，日期是后填的。以下是老共产党员克德罗夫同志写给安德烈耶夫的信（安德烈耶夫同志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我从列福尔托沃监狱阴暗的牢房里请求你们的帮助。当你们听到可怕的呼叫声时，请不要从旁边走过，为他们辩护吧，帮助废除可怕的审讯和揭开错误吧。我在无辜地承受折磨。请相信，时间将会证明。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成员，如根据诬告材料对我指控的那样。我任何时候也没有对党和祖国进行过任何犯罪活动。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污点的老布尔什维克，诚实地在党的队伍中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奋斗了（差不多）40年……

……现在，侦查人员威胁对我——62岁的老人，要使用更厉害、更残酷、更具有侮辱性的体罚手段。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没有能力承认自己对我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们正在为把我说成最凶恶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寻找证明自己正确的理由，坚持加紧进行迫害。但希望党知道，我是无辜的，任何措施都不能使党的忠诚的儿子、至死忠于党的人变成敌人。

但我没有出路。我无力制止即将来临的对我的新的沉重打击。

但什么都有限度。我已筋疲力尽。我的健康已被糟蹋完了，精力正在枯竭，末日正在逼近。脸上带着可耻的卖国贼和叛徒的印记死在苏维埃的监狱中——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动了。不，不能！这不会发生，这不应发生，我在呼救。无论党，还是苏联政府，还是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都不能允许这样残酷的、无可挽回的不公正事情发生。

我相信，在心平气和、不带偏见、不进行令人厌恶的谩骂、不带着仇恨、对人不搞可怕的嘲弄的情况下很容易确定，对我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深信，真理和公正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审判庭宣告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无罪。但尽管如此，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还是被处决了。（会场群情激愤）

贝利亚也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家庭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则妨碍他实现自己的阴险图谋。贝利亚搞掉了所有可能妨碍他的人，从而为自己扫清了道路。奥尔忠尼启则一直是反对贝利亚的，关于这一点他已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弄清事实，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他容忍对奥尔忠尼启则兄弟的杀害，而将奥尔忠尼启则本人弄到被迫自杀的地步。贝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人。（会场群情激愤）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揭发了贝利亚。经过仔细的司法审理，查明贝利亚恶贯满盈，他被枪决了。

会有人问，为什么消灭了成千上万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贝利亚没有在斯大林在世时被揭发出来？他在以前没有被揭发出来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挑动他的疑心，处处投其所好，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 * *

同志们！个人崇拜形成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规模，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歌颂他个人。斯大林自我吹捧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在1948年出版了他的“传略”。该书是无度阿谀奉承的表现，是搞个人崇拜的典范。书中将斯大林描写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智者、“最伟大的领袖”和“有史以来各族人民的无与伦比的统帅”。对斯大林的赞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没有必要连篇累牍地引用该书中大量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评价。只需强调一点，所有这些都是经斯大林赞同并亲自修改过的，其中一些，是他亲笔写在该书清样上的。

斯大林认为必须将什么内容写进该书呢？也许，他想为其“传略”的作者们阿谀奉承的激情泼点冷水？不是。他要加强的是他感觉到对他的功劳歌颂不够的地方。以下是斯大林亲笔写入的对斯大林活动的某些评语：

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

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苏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是斯大林自己写的！接着他补充说：

斯大林出色地执行着党和人民领袖的任务，得到了全苏联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骄傲自满和自我陶醉的影子。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某个活动家可以如此吹嘘自己？难道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相称吗？不！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坚决反对这样做。对此做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总是进行严厉的谴责。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感到这句话还远远不够，于是亲笔修改如下：

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如我党所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

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可以举出斯大林亲手在该书清样上添加的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自我吹嘘的话。他特别热衷和超乎寻常的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赞扬自己的统帅才干。让我再举一个斯大林对自己军事天才所做的补充。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维埃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确立了那些经常能够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斗技术装备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以及关于最强的兵种——炮兵的运用等方面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都天才地找到了正

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会场骚动）

接着斯大林自己写道：

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既表现在防御方面，也表现在进攻方面。斯大林同志以其天才的洞察力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苏军所进行的战斗，是卓越的作战艺术典范的体现。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统帅的。谁颂扬他？斯大林自己。然而，这时斯大林的角色已不是统帅，而是作者兼编辑，一部自我吹嘘的传记的主要撰写人之一的角色。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关于那本斯大林“传略”，还有一个事实。众所周知，党中央有一个委员会负责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顺便说一下，这本同样个人崇拜味儿十足的著作是由某些作者共同撰写的。而这一状况也以下述措辞反映在斯大林的“传略”中：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和亲自积极参与下，制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这一措辞已经不能使斯大林满意。在“传略”出版时，这个地方已经被以下内容替换：

“1938年，斯大林撰写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问世。”

这里，还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呢？（会场活跃）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集体创造性劳动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写的一部书。用不着再谈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斯大林是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这样歌颂自己？又为什么会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这段历史时期描写成突出“斯大林天才”业绩的背景了呢？

难道能在这部书里找到关于我们党在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党在沿着列宁所规划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前行的描述吗？党所执行的其他各项措施都得到当之无愧的反映了

吗？那里谈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说和报告，一切都毫无例外地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而当斯大林自己宣称，是他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不可能不引起至少是惊讶和疑惑：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写自己，可以这样把自己捧上天吗？

让我们再以斯大林奖金问题为例。（会场骚动）甚至沙皇也没有设立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苏联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但歌词中只字不提共产党，却对斯大林大加歌颂：

斯大林教导我们要忠实于人民，他鼓舞我们去劳动、去建立功勋。

在国歌的这几行字里，把伟大的列宁的党所进行的大规模教育、领导和鼓舞活动，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降低了党的作用。应当向你们通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决定草拟新的国歌歌词，歌词中将表现出人民和党的作用。（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难道斯大林不知道有许多大企业和城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吗？难道他不知道全国各地都在建立斯大林的纪念塑像，即“生前纪念碑”吗？有这样的事情，即斯大林亲自在1951年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上签字，该决议确定在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畔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当年9月4日，他颁布了批准使用33吨铜建造该纪念体的命令。到过斯大林格勒近郊的人都会看到，那里耸立的是什么样的塑像，而且是在一个人们很少会去的地方。为了建造这座塑像，花费了大笔资金，而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战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请你们自己评判一下，斯大林在自己传记中说得是否正确：他“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骄傲自满和自我陶醉的影子”。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纪念列宁却缺乏敬重之情。30年前通过决议建造纪念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苏维埃宫没有建成，这不是偶然的，其建造经常被推迟或被遗忘。应当纠正这一状况并把怀念列宁的纪念体建成。（暴风雨

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能不让人想起苏联政府 1925 年 8 月 14 日“关于设立弗·伊·列宁科学奖金”的决议。该决议在报刊上发表，但至今也没有列宁奖金。这一状况也应该纠正。(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生前，由于采取了众所周知的方法——对此我已列举事实做了说明，比如斯大林“传略”的写作方法，因而似乎列宁在所有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是如此。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对列宁形象的表现是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贬低了。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 1919 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为站在铁甲列车的踏板上举刀杀敌。但愿我们亲爱的朋友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能鼓起勇气把斯大林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是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正着手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能做就好。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将感激他。(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解读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在很多情况下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不管在哪里，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如何做和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经久不息的掌声)

如果我说，在座 99% 的人在 1924 年之前很少知道和听说过斯大林，可当时全国都知道列宁，这大概是不会错的。全党、全体人民，从小孩儿到大人，都知道列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一切应当坚决改变，以便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弗·伊·列宁的作用以及我们的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创造性建设的伟大业绩，能够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

* * *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不良现象的蔓延，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搞单纯的行政命令和各种歪门邪道，掩盖缺点，粉饰现实。我们中间，出现了不少喜欢溜须拍马、吹吹捧捧和欺上瞒下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的、苏维埃政府的以及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

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左顾右盼，害怕新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要提防，工作的主动性越来越小。

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搬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即便在一些最不重要的会议上发言，党员干部也要照本宣科。这一切导致在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中只是走走形式的危险，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脱离生活，不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这一点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所有对国家形势哪怕是有一点儿了解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困难情况，但斯大林却没有发现。我们有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斯大林呢？是的，我们说了，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斯大林哪里也不去，不与工人和农庄庄员会见，不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

他只是通过电影来研究国家和农业的情况，而电影总是美化和粉饰农业情况。在许多电影中，集体农庄的生活被描写成天天火鸡鹅肉满桌。斯大林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生活的观察方式不同，他总是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接待农民代表，经常在工厂发表讲话，也到乡下去与农民座谈。

斯大林脱离了人民，他哪里也不去。几十年都是这样。最后一次到农村是在1928年1月，当时他到西伯利亚解决粮食收购问题。如此他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农村的状况呢？

在一次座谈中有人告诉斯大林，我们的农业状况很糟，国家的肉类和其他畜牧业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的建议并不是包罗万象，但确定了提升畜牧业水平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畜牧业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便通过物质的鼓励来提高集体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人员和国营农场的人员对畜牧业发展的关注度。但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这一草案被束之高阁。

不仅如此，在研究该草案时，斯大林提出对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再增

加征税 400 亿卢布，因为根据他的意见，农民生活富裕，仅靠出售家禽，农庄庄员就可以完全支付国税。

你们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400 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民上交的全部产品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 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上交的全部产品价值才 262.8 亿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这一建议有什么数据依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对事实和数字没有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就意味着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无须算账，只要看看，就足够了，就能立即决定一切应该怎么办。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为他的英明而兴高采烈。

但提高 400 亿卢布农业税的建议英明何在？一点也不英明。因为这项建议不是对现实的真实估计，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

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让我们感到高兴。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关于主要畜牧产品生产的任务。我们相信，新的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经久不息的掌声）

* * *

同志们！现在，当我们对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进行激烈批评并谈到这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崇拜所产生的许多负面现象时，一部分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 30 年，他在位时取得了重大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种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并执迷不悟的人，他们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没有真正像列宁那样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工人阶级和最贫穷的农民与中农的联盟支持下取得的，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列宁的伟大功勋在于，他创建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用关于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党，他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了党。在这一斗争中，党始终不渝地捍卫人民的利益，

成为经过考验的领路人，带领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群众的觉悟，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我们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应归功于党和它的许许多多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们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工作的结果，而绝非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者、以列宁主义者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的实质，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很长时间内，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许多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从不进行研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也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一长制的决定可能使甚至已经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大大复杂化。

最近几年，当我们摆脱了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问题上确定了一系列政策后，大家都看到，积极性简直是与日俱增，广大劳动群众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得到发展，并开始对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产生卓有成效的影响。（掌声）

某些同志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及时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现在才来反对？

首先，应予指出，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开始，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党的干部和党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大家知道，弗·伊·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斯大林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有声望，得到人们的好感和支持。

党不得不与那些企图让我们国家离开唯一正确道路——列宁道路的人

进行斗争，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要的。但在以后，斯大林越来越滥用权力，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对诚实的苏联人使用恐怖方法。如以上已经提到的，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鲁祖塔克、埃赫、波斯特舍夫及其他许多人的。

试图对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提出反对意见，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在这方面，波斯特舍夫同志的不幸就是典型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对波斯特舍夫表示不满，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您究竟是什么人？”

波斯特舍夫带着他的俄国北部方言的重音坚定地声明：

“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布尔什维克！”

开始，这句话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敬，后来则被视为恶意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特舍夫是“人民公敌”，并处决了他。

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与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曾多次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你离开斯大林那儿时，不知会把你送到哪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会使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中明显的错误和缺点，是多么困难。

如已经指出的，许多决议是一个人，或通过征询意见的方式做出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

大家都知道成为斯大林镇压牺牲品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委员的决议，没有在任何地方讨论过，是通过询问方式做出的。同样，关于免除库兹涅佐夫和罗季奥诺夫同志职务的决议，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做出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由于在政治局内部建立各种委员会，成立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政治局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

斯大林建议：

(1) 委托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负责对外事务问题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问题。

(2) 增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为六人小组成员，今后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

这是什么牌迷用语？（笑声）显而易见，在政治局内成立这类委员会——“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在解决一些最重要问题时，一些政治局委员因此而被排除在外。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克里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政治局要开会的事被伏罗希洛夫同志知道后，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是否应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是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多疑和猜疑，斯大林甚至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他竟然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笑声）是的，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特殊装置，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

斯大林一个人做出的决定，也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排除在政治局工作之外。这是肆无忌惮的专横。

以党的十九大之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在全会上斯大林发言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做了评价，对我们党内这些最老的活动家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

不排除，如果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再多待几个月，可能在这次党代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就不可能讲话了。

看来，斯大林有一个迫害老政治局委员们的计划。他不止一次地说，应当更换政治局委员。十九大后他提议选举由 25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追求的目标就是除掉老的政治局委员，让一些经验不足的人进入政治局，以便这些人竭尽全力地为他唱赞歌。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他设

想的这一招，是为了以后消灭老的政治局委员，以便为斯大林所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即现在我们在报告中说的这些事，消灭罪证。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对斯大林的颂扬太过分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做出过巨大功绩的。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上所讲的一切也都是在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或经他的同意而做的，而且他还深信，这一切是为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免遭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所必须要做的。他把这一切看成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不能说这是一个恣意妄为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应该这样做。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绝对需要的品质。列宁本人就是体现最伟大的谦虚品质的人。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遗训。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一些现在还健在的、生活阔绰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用自己名字命名城市、区、企业和集体农庄的活动。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做这件事情要动脑筋，不必着急。中央将讨论这个问题并仔细研究，以便在这个问题上不犯什么错误和出现过火行为。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时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是这样开始广播的：“柯秀尔广播电台……”但有一天广播时，没有提柯秀尔的名字，大家马上猜想到，柯秀尔一定出了什么事，大概已被捕了。

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那些以自己名字命名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同志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被捕了。（会场活跃）

通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是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他的名字命名。难道现在还不是与这种“私有财产”分道扬镳，对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进行“国有化”的时

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但我们不能把这一问题捅到党外，更不能在报刊上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应当知道分寸，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不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领会和评价这些措施。（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和一劳永逸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领域，还是在实际工作方面，都要做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需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谴责和根除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水火不容的个人崇拜，与任何想方设法以这样或那样方式恢复个人崇拜的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和坚持不懈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鉴此，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以便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研究和纠正在历史、哲学、经济学及其他科学领域以及文学和艺术领域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错误观点。包括有必要在近期编写一部完整的具有科学客观性的关于我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就撰写一些苏联社会历史教科书、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书籍开展工作。

始终不渝和坚持不懈地继续贯彻最近几年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自上而下的所有党组织中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特别是集体领导这个最高原则的决议，遵守我们党章规定的党内生活准则的精神，进一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的工作。

必须彻底恢复苏联宪法表达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列宁主义原则，同滥用职权人员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的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破坏。

* * *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新的力量表明了我党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表明了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了党完成建设共产主义伟大任务的决心。(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们现在能够全面提出关于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和关于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党有着伟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二十大决议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党，将带领苏联人民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走向新的成功、新的胜利，对此我们信心十足。(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

文献资料

一 “沃尔科戈诺夫档案室” 文件

1.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оюза ССР.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действующие 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е кодексы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от 1 декабря 1934 года.

2. Шифротелеграмма: “секретарям обкомов, крайкомов, ЦК нацкомпартий, наркомам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начальникам УНКВД” от 10 января 1939 года.

3. Письмо Сталина Ленину от 7 марта 1923 года.

二 出版的文件

1. *1941 год. Документы*. В 2-х кн. Кн.1. — М.: МФД, 1998.

2. *XVII съезд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 М.: Партиздат, 1934.

3.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1993, № 1.

4. В чьи руки вручим эстафет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дела?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ая речь И.В.Сталина на Пленум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16 октября 1952 года (по записи Л.Н.Ефремова). //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000, 13 января.

5. Военные разведчики докладывали...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2, № 2, с 36-41.

6.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В.Сталина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и Наркомате обороны. // *Источник*. 1994, № 3

7.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 Под ред. Г.Д.Обичкина и др. Т. 2: 17 марта — 10 июля 1918 г. —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8.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9. *Жерт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ССР. На 2-х дисках. Диск 2. Сталинские расстрельные списки*. - М.: Звенья, 2004.

10. И.В.Сталин в работе над «Кратким курсом истории ВКП(б)».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 11, 12; 2003. № 3, 4.

11.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 Лаврентию Берии: «Их надо депортировать...»: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 Сост. Н.Ф.Бугай. — М.: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92.

12.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В 5 томах. Том 4. — М.: МФД, 2000.

13. Как снимали Н.С.Хрущёв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1.

14.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15.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ПСС)*. 5 изд.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16.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ВЧК-ГПУ-ОГПУ-НКВД. Январь 1922 — декабрь 1936*. — М.: МФД, 2003.

17.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1937-1938*. — М.: МФД, 2004.

18. *Лубянка. Сталин и НКВД-НКГБ-ГУКР «Смерш». 1939 — март 1946*. — М.: МФД, 2006

19. Малышев В. «Пройдет десяток лет, и эти встречи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шь уже в памяти». *Дневник наркома*. // *Источник* (Вестник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1997, № 5.

20. Массов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оправданы быть не могут. (Документы 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 *Источник*. 1995, № 1, 1995.

21. Материалы февральско-мартов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ВКП(б) 1937 год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995.

22.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Под ред. акад. А.Н.Яковлева. — М.: МФД, 1998.

23.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И.Ленин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исьма, документы.)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2.

24.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двух новых орденов Союза ССР: орден Ленина 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ССР от 5 мая 1930 г. (*СЗ СССР*, 1930, т.36, ст.289). См. <http://glory.rin.ru/cgi-bin/article.pl?id=99>

25.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2. Кн. 1. Начало. 22 июня — 31 августа 1941 года. — М.: Русь, 2000.

26.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2. Кн. 2. Начало. 1 сентяб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41 года. — М.: Русь, 2000.

27.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гг.* / Сост. О.В.Хлевнюк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2002.

28. 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В.Сталин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5, № 2, 3, 4, 5-6; 1996, № 2, 3, 4, 5-6; 1997, № 1.

29. Правка в макете второго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И.В.СТАЛИН».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9.

30. Радек К. *Зодчи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М.: Партиздат, 1934.

31.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1. Март 1953 — февраль 1956. — М.: МФД, 2000.

32.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2. Февраль 1956 — начало 80-х.* — М.: МФД, 2003.
33.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 Т.3. 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одов — 1991.* — М.: МФД, 2004
34.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 / Под общ. ред. А.Н.Яковлева.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35.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8-1941 гг.* / Сост. А.В.Квашонкин и др. — М.: РОССПЭН, 1999.
36. *Сталин и Каганович. Переписка 1931-1936 гг.* — М.: РОССПЭН, 2001.
37. Сталин И.В.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Пленум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КП(б) 5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1 апреля.
38. Сталин И.В. *Сочинения.* — М.: ОГИЗ,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6-1949.
39. Сталин И.В. О недостатках партийной работы и мерах ликвидации троцкистских и иных двурушников. Доклад на Пленуме ЦК ВКП(б) 3 марта 1937 года». // *Правда*. 1937, 29 марта.
40.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М.: АИРО-XX, 1995.
41. *Судебный отчёт [по делу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о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блока].* —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емья, 1997.
42.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5 тт.* — М.: РОССПЭН, 1999-2007.
43. Троцкий Л.Д. По поводу книги Истмена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 *Большевик*. 1925. № 16. 1 сентября.
44. *Устав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5.

三 其他文献资料

俄文：

1. 22 июня 1941 года. Могло ли всё быть по-иному? //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2001, 16 июня.
2. Аллилуев В.Ф. *Хроника одной семьи: Аллилуевы — Сталин*. —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2.
3. Аллилуева С.И. *Двадцать писем другу*. — М.: Вся Москва, 1989.
4. Баграмян И.Х. *Т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ойна*. — Киев: Политиздат Украины, 1977.
5. Балаян Л.А. *Сталин и Хрущёв*. См. <http://www.stalin.su/book.php?bid=1>
6. Бек А. К истор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нин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з архива писателя, беседовавшего в 1967 году с личными секретарями Ленина.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 17, 23 апреля 1989. С. 8- 9.
7. Бенедиктов И.А. О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ёве.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9, № 4, с.12-65.
8.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Сост. В.Ф.Некрасов.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9. Бешанов В.В. *Год 1942 — «учебный»*. — Мн.: Харвест, 2003.
10. Бобылев П.Н. и др.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опросы и ответы*.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5.
11. Богомолов Ю. Сталин и ТВ. См. <http://www.politcom.ru/2003/pvz74.php>
12. Брюханов Б.Б., Шошков Е.Н.. *Оправданию не подлежит. Ежов и ежовщина. 1935-1938*. — СПб.: Петровский фонд, 1998.
13. Бугай Н.Ф. *Народы Украины в «Особой папке Сталина»*. — М.: Наука, 2006.
14. Бурцев М.И. *Прозрение*.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81.
15. Вагнер П.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П.Бер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И.В.Сталин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N14, март-апрель 2001. См.: http://history.machaon.ru/all/number_14/analiti4/vagner_

print/index.html.

16.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А.М.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3-е изд.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8.
17.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1-1945.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70.
18. Волкогонов Д.А. *Лен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В 2-х книгах. Кн. II. — М.: Новости, 1994.
19. Волкогонов Д.А. *Стал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В 2-х томах. — М.: Новости, 1992.
20. Волченков М. 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 См. http://www.4ygeca.com/dv_sovetov.html
21. Горбунов Е.А. *Схватка с Черным Драконом. Тайная вой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М.: Вече, 2002.
22. Горьков Ю.А. *Кремль. Ставка. Генштаб*. — Тверь, 1995.
23. Депортация чеченцев в 1944-м году.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Эфир от 23.02.2000. См.: <http://archive.svoboda.org/programs/II/2000/II.022300-3.asp>.
24. Добрюха Н. К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ойна. История невыполненных приказов.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Субботник НГ*. 2001, 30 июня. См.: http://saturday.ng.ru/time/2000-06-17/1_how-the-war-begun.html.
25. Дуров В. Орден Сталина Сталин не утвердил. // *Родина*. 2005, № 4.
26. Емельянов Ю.В. Миф XX съезда. // *Слово*. 2000, №3.
27. Емельянов Ю.В. *Хрущёв. Смутьян в Кремле*. — М.: Вече, 2005.
28. Жуков Г.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В 2 тт.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29. Жуков Ю.Н. Жупел Сталина. Беседа журналист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абова с историком Юрием Жуковым.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2, 5, 6, 12-14, 16, 19-21 ноября.
30. Жуков Ю.Н. *Иной Стал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СССР в 1933-1937 гг.* — М.: Вагриус, 2003.
31. Жуков Ю.Н. Сталин: иной взгляд. Беседа с автором книги «Иной

Сталин».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04, № 12.

32. Жуков Ю.Н. *Сталин: Тайны власти*. — М.: Вагриус, 2005.

33. Жуков Ю.Н.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нков*. — М.: ТЕРРА, 2000.

34. Залесский К.А. *Империя Сталина.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М.: Вече, 2000.

35. Иванова Ю. *Дремучие двери*. См. http://lib.kharkov.ua/HRISTIAN/IVANOVA_J/doort.txt

36.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дня — 10 апреля.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3, 10 апреля.

37. Казанцев А. 22 июня - два блицкрига. // *Nakanune.ru*. См.: http://www.nakanune.ru/articles/22_ijunja__dva_blickriga

38. Карпов В.В.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Историко-док. изд.* Кн 2. —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нтарный сказ, 2002.

39. Карпов В.В. *Маршал Жуков, его соратники и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и мира*. Книга I. // *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91.

40. Карпов В.В.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е маршалы*. — М.: Вече, 1999.

41. Кирилина А.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Киров*.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42. Кожин В.В. *Россия. Век XX (1939-1964). Опыт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Алгоритм, 1999.

43.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С. Шоковая Терапия Никиты Хрущёва.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 14 февраля.

44. Косолапов Р.И. Уверенно торить тропу в будущее. Доклад «О решениях XX и XXII съездов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2003). См.: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102054935/http://www.socinfo.kiev.ua/dumka/vybir/ist1.htm>

45. Кузнецов Н.Г. *Крутые повороты: Из записок адмирала*.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издание. Испр. и доп. Сост., ред, прим.: к.и.н. Р.В.Кузнецовой. — М.: Фонд памяти Адмирала флот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Г.Кузнецова, 1997.

46. Кузьмин С. К репрессиям причастен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 портрету Н.С.Хрущёва).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6, №3, с.178-184.
47. Куманёв Г.А. *Рядом со Сталиным.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встречи, беседы, интервью,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Былина, 1999.
48. Лифшиц С. Преслову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или *Cacatum Non Est Pictum*. // *Диалог*. 1998. №12. См.: <http://www.m-s-k.newmail.ru/pub/1.htm>
49. Максименков Л. Культ. Заметки о словах-символах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3, № 10.
50. Максименков Л. Очерки 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падные пилигримы у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престола (Фейхтвангер и другие).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4, № 2.
51. Мгеладзе А.И. *Сталин. Каким я его знал. Страницы недавнего прошлого*. — б /м., 2001.
52.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 ев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анализ*. — М.: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2003.
53. Медведев Р.А. *Что читал Сталин? Люди и книги. Писатель и книга в тоталитарном обществе*. — М.: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2005.
54. Мерецков К.А. *На службе народу*.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55. Микоян А.И. *Так было*. — М: Вагриус, 1999.
56. Мусский И.А. *100 великих заговоров и переворотов*. — М.: Вече, 2001.
57. Мухин Ю.И. *Убийство Сталина и Берия: Науч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 М.: Крымский мост, 2002.
58. О судьбе членов и кандидатов в члены ЦК ВКП(б), избранного XVII съездом партии.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2, с. 82-113.
59. Одесский М.П., Фельдман Д.М.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 гиперссылке). //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2003, вып. 20. См.: http://old.sgu.ru/users/project/pdf/osv_dv/vipusk20/09.doc
60. Петров Н.В. *Перв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ГБ Иван Серов*. — М.: Материк, 2005.
61. Петров Н.В., Скоркин К.В. *Кто руководил НКВД. 1934-1941:*

Справочник. - М.: Звенья, 1999.

62.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Р.М., Доманк А.С., Коваленко А.П. *Маршал С.К.Тимошенко*. — М.: МОФ “Победа — 1945 год”, 1994.

63. Прудникова Е.А. *Берия.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х не было*. — СПб.: Нева, 2005.

64. Пыжиков А.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уть во власти (1946-1949).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1. №3, с.89-104.

65. Пыхалов И.В. *Великая оболганная война*.—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5.

66. Пыхалов И.В. *Время Сталина: Факты против мифов*. 2-е изд. — СПб.: Неотек Электро, 2001.

67. Пятницкий В.И. *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 —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8.

68. Радзинский Э. *Сталин*. — М.: Вагриус, 1997.

69. Роговин В.З. *1937*. — М., 1996.

70. Роговин В.З.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 М.: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97.

71. Роговин В.З.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 — М., 1994.

72. Самсонов А.М. *Сталинградская битва*. 4-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М.: Наука, 1989.

73. Симонов К.М.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 М.: Новости, 1988.

74. *Слово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 Сост. Р.И.Косолапов. — М.: ЭКСМО, 2002.

75. Смиртюков М. После расстрела Берии Маленков всё время улыбался. // *Коммерсантъ-Власть*. 2000, №5, 8 февраля.

76. Соловьев Б.Г., Суходеев В.В. *Полководец Сталин*. — М.: ЭКСМО, 2003.

77. *Сталин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истории*. — М.: Новая книга, 1995.

78. Старков Б.А. Как Москва чуть не стала Сталинодаро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12, с.126-127.

79. Судоплатов П.А.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Лубянка и Кремль 1930-1950 годы.*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7.

80. Судоплатов П.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 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 М., 1996.

81. *Суровая драма народа: ученые и публицисты о природе сталинизма.*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82. Сухомлинов А.В. *Кто вы,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 М.: Детектив-Пресс, 1993.

83. Топтыгин А.В.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5.

84. Фейхтвангер Л. *Москва 1937.* — М.: Захаров, 2001.

85. Хлевнюк О.В. *Сталин и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Политбюро в 1930-е годы.* — М.: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3.

86. Хрущёв Н.С.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9.

87. Чернявский Г. Прыжок из партийных джунглей. // Интернет-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азете «Каскад». См.: <http://www.kackad.com/article.asp?article=37>

88. Чиличава Р. *Сын Лаврентия Берия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 Киев: КИЦ Инкопресс, 1992.

89. Чуев Ф.И. *Каганович. Шепилов.*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90. Чуев Ф.И. *Молотов: 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 — М.: ОЛМА-ПРЕСС, 1999.

91. Чуев Ф.И. Несписочный маршал. // *Слово.* 1994. № 9-10, с.44-51.

92. Чуев Ф.И.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Из дневника Ф. Чуева.* — М.: ТЕРРА, 1991.

93. Чуев Ф.И. *Так говорил Каганович. Исповедь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апостола.* — М.: Отечество, 1992.

94. Шаповал Ю. Прощание с властью: случай Никиты Хрущёва. 40 лет назад, в октябре 1964-го, «отец оттепели» был смещен со всех своих постов. //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23-29 октября 2004 г. См. <http://www.zerkalo-nedeli.com/nn/print/48113/>

95. Шаггалов Б. *Испытание войной*. — М.: АСТ, 2002. См.

96. Шепилов Д.Т. *Непримкнувший*. — М.: Вагриус, 2001.

97. Штеменко С.М.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В 2-х книгах. Кн. 2.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89,

98. Юнге М., Биннер Р. *Как террор стал «Большим»*. *Секретный приказ №00447 и технология е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 М.: АИРО-XX, 2003.

99. Яковлев А. С. *Цель жизни*.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3.

其他语种：

100. Bland, W. “The Cult of the Individual.” At <http://www.mltranslations.org/Britain/StalinBB.htm>

101. Brysac, S.B. *Resisting Hitler: Mildred Harnack and the Red Orchest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2. Bugai, N.F., Gonov, A.M. “The Forced Evacuation of the Chechens and the Ingush.” // *Russian Studies in History*. Vol.41, no.2, Fall 2002.

103. Getty, J. Arch and Naumov Oleg 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4. Getty, J. Arch. “The Politics of Repression Revisited,” p. 131 and n. 64, p. 140. In: Ward, Chris, ed. *The Stalinist Dictatorship*. (London, New York: Arnold, 1998).

105. Getty, J. Arch.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193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6. Getty, J. Arch. Excesses are not permitted.: Mass Terror and Stalinist Governance in the Late 1930s. // *The Russian Review*. Vol.61 (January 2002).

107. Getty, J. Arch. *The Great Purges Reconsidered*. Unpub. PhD diss. Boston College, 1979.

108. Haase, N. *Das Reichskriegsgericht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Berlin, 1993).

109. Jansen, Mark and Nikita Petrov. *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5-1940*.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

110. Khlevniuk, Oleg V. *In Stalin's Shadow. The Career of 'Sergo' Ordzhonikidze*. (Armonk, London: M.E.Sharp, 1995).

111. Khrushchev, Nikita S.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Introduction by Anatol Shub, notes by Boris Nikolaevsky.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1962.

112. Littlepage, John D., with Demaree Bess. *In Search of Soviet Gold*. (NY: Harcourt, Brace & Co., 1938 (1937)).

113. MacFarquhar, Roderick.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Vol. 2 (1983).

114. Medvedev, Roy.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London; 1972)

115. Medvedev, Roy and Medvedev, Zhores. *The Unknown Stalin*. (Woodstock, NY: The Overlook Press, 2003).

116. Service, Robert. *Lenin: A Biography*. (Belknap Press, 2000)

117. Taubman, William.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Y: Norton, 2003).

118. Thurston, Robert.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1934-194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研究系列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精）

李慎明 主编
2001年4月

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前景 （上下册）

靳辉明 主编
2004年5月

且听低谷新潮声： 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李慎明 主编
2005年2月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毛相麟 著
2005年10月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刘国平 著
2006年8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

谭索 著
2006年9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

聂运麟 等著
2007年11月

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

周新成 张旭 著
2008年2月

美国保守主义及其全球战略

姜琳 著
2008年3月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批判

周新城 著
2008年4月

变革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研究

聂运麟 著
2008年5月

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李慎明 等编
2008年5月

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王金存 著
2008年6月

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11月

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

谭索 著
2009年6月

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7月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 编著
2010年5月

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6月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 跟踪研究

何秉孟 主编
2010年7月

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 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7月

“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 与执政能力的关系

赵常庆 主编
2011年1月

航天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研究系列 (续)

**历史在这里沉思：
苏联解体 20 周年祭**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9月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
蔡文鹏 著
2011年12月

**世界在反思之二——批判
新自由主义观点全球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2月

**美国中亚战略 20 年：
螺旋式演进**
杨鸿玺 著
2012年9月

“改革新思维”与苏联演变
李瑞琴 著
2012年9月

世界在动荡、变革、调整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1月

**世界在反思 (3)：当代资本
主义评析**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2月

**探索与变革：资本主义国家共
产党的历史、理论与现状**
聂运麟 主编
2014年6月

世界格局与我国安全战略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9月

参考系列

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王玫 等译
2000年11月

古巴英雄卡斯特的青少年时代
[古巴] D. 施诺卡尔
P.A.塔维奥 编
宋晓平 杨仲林 译
2000年11月

**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
戈尔巴乔夫现象**
[澳] 科伊乔·佩特罗夫 著
葛志强 马细谱 等译
2001年6月

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俄] B.A.利西奇金
И.А.谢列平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3年9月

论意识操纵
[俄] 谢·卡拉-穆尔扎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4年2月

苏联的最后一年
[俄] 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译
2005年1月

大元帅斯大林
[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何宏江 等译
2005年9月

富国陷阱
[英] 张夏准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俄罗斯、中国与世界
[俄] A.P.雅科夫列夫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7年5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参考系列 (续)

文明的对话

[保] 亚历山大·利洛夫 著
马细谱 等选译
2007年9月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英] 唐纳德·萨松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8年1月

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

[日] 伊藤诚 著
孙仲涛 等译
2008年6月

总司令的思考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徐世澄 宋晓平 等译
2008年1月

世界规模的积累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 译
2008年11月

富国陷阱 (修订版)

[英] 张夏淮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富国的伪善

[英] 张夏淮 著
严荣 译
2009年1月

苏联的最后一年 (增订再版)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等译
2009年6月

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

[法]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 著
陆象淦 王淑英 译
2010年3月

卡斯特罗语录

[古巴] 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 编
宋晓平 徐世澄 张颖 译
2010年6月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日] 中谷岩 著
郑萍 译
2010年7月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英] 拉斐尔·塞缪尔 著
陈志刚 李晓江 译
2010年8月

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栗瑞雪 等译
2011年12月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

[巴]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著
郝名玮 译
2012年2月

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

[英] 莱斯利·斯克莱尔 著
梁光严 译
2012年3月

亲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张树华 等译
2012年5月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

[俄] 根纳季·亚纳耶夫 著
胡昊 译
2012年11月

帝国的消亡： 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

[俄] 叶·季·盖达尔 著
王尊贤 译
2013年1月



考系列 (续)

资本主义十讲 (插图版)
[法] 米歇尔·于松 著
尔博 插图 潘革平 译
2013年4月

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
[日] 鹤田满彦 著
张迪 译
2013年4月

美国社会主义传统
[美] 约翰·尼古拉斯 著
陈慧平 译
2013年11月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等著
徐曦白 译
2014年4月

苏联军队的瓦解
[美] 威廉·奥多姆 著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2014年7月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
[英] 卢克·马奇 著
于海清 王静 译
2014年9月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埃]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著
沈雁南 彭姝祎 译
2014年11月

书系列

**2005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
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二)**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一)**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5月

**2006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
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三)**
李慎明 主编
2007年3月

**2007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
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四)**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08~2009)——且听低谷
新潮声 (之五)**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09~2010)——且听低谷
新潮声 (之六)**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2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10~2011)——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七)**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11~2012)——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八)**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
研究报告 (2012~2013)**
李慎明 主编
2013年5月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
研究报告 (2013~2014)**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3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
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李慎明 著
2012年7月

“普世价值”评析

汪亭友 著
2012年7月

**戈尔巴乔夫与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王正泉 著
2012年7月

古巴：本土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毛相麟 著
2012年7月

新自由主义评析

何秉孟 李千 著
2012年7月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陈之骅 著
2012年7月

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

姜辉 于海青 著
2012年7月

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

徐世澄 著
2012年7月

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周新城 著
2012年7月

历史虚无主义评析

梁柱 著
2012年7月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革新

谷源洋 著
2013年5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罗文东 著
2013年5月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八集党内教育参考片解说词)**

李慎明 总撰稿
2013年5月

全球化与共产党

卫建林 著
2013年5月

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徐崇温 著
2013年5月

俄罗斯的私有化

张树华 单超 著
2013年5月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朱继东 著
2013年5月

苏联历史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

吴恩远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

李捷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崇富 著
2013年5月

《共产党宣言》与世界社会主义

新辉明 李瑞琴 著
2013年5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王伟光 著
2013年5月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修订版·大字本)**

李慎明 著
2013年7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历史命运(大字本)**

王伟光 著
2013年8月

谈谈民主、国家、阶级和专政

王伟光 著
2014年11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 (美) 格雷弗著；
马维先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6288-2

I. ①苏… II. ①格… ②马… III. ①苏联共产党—党史
IV. ①D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9730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69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著 者 / [美] 格雷弗·弗
译 者 / 马维先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23千字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288-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4-5869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9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秘密报告”，无论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划时代的事件。伦敦《每日电讯报》称此报告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美国报纸则将赫鲁晓夫的这一行为吹捧为历史上最值得表彰的“伟大的英勇行为”。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格雷弗·弗博士，通过对大量文献证据、历史事实，特别是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的研究，在本书中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称为“颠覆性”的结论，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点，无一与事实相符，整个“秘密报告”是由谎言拼凑而成的。

“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竟是欺世之作？！本书的大量举证，为对苏联历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重新解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6288-2

定价：89.00元